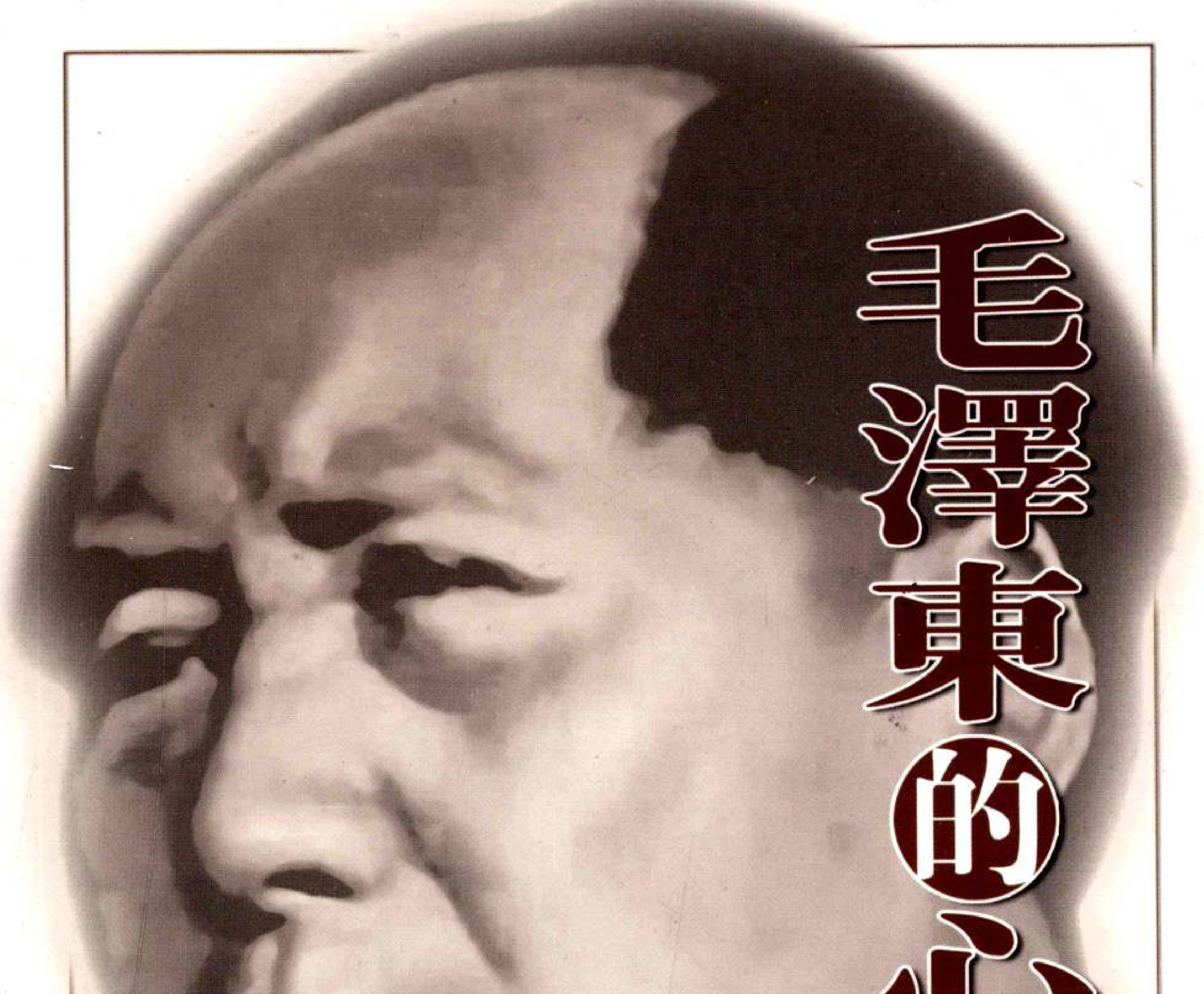


毛澤東的心理分析

白魯恂 Lucian W. Pye 著
劉憲閣 譯

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九思文存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毛澤東的心理分析

究竟是什麼東西促成了毛澤東令人矚目的政治成功(當然，某種程度上也包括他留下的問題)?在白魯恂看來，答案可以從政治學理學，特別是毛澤東和中國人民之間的情感共鳴中來尋找。

不像過去，僅僅滿足于在劇院裏、舞臺上，演一演、唱一唱；内憂外患的現代中國，需要將人們的不滿心理和反抗情緒加以盡情的、公開的宣泄。

誰最有資格來導演這樣一場氣勢磅礴、威武雄壯的歷史活劇?與其他人相比，毛澤東的優勢在于：他恰好具備這樣一種可以達致中國人民的内心深處，調動他們的情感潛能，滿足他們的心理想欲望，而自己却保持清醒、不爲所動的能力。

當然，這又跟毛澤東獨特的情感經歷有關系：從作爲兒子，到成爲父親；從私人角色，到公共人物；從被人冷落，到抛弃他人；從信任親情，到懷疑同志；從動員合作，到恐懼背叛；從提倡策略，到蔑視制度……

毛澤東，一個次屬自戀者，一個邊際性人格者，更是一個國人情感的鼓動者。而這一切，都可以從他早年與母親的抛弃關系開始説起……

ISBN 978-988-17927-9-2
9 789881 792792 >
HK$98.00NT$400.00

九思文化

毛澤東的心理分析

白魯恂 Lucian W. Pye／著
劉憲閣／譯

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2009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Mao Zedong
By Lucian W. Pye
Time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Limited Co.,Lt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April, 2009

版權所有 翻版必究

九思文化

九思文存

毛澤東的心理分析

着 者：Lucian W. Pye
譯 者：劉憲閣

出版者：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九龍彌敦道701號番發大厦22字樓
電子郵箱：times_hk@126.com

香港發行者：香港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220-248號荃灣工業中心16樓1609室

臺灣發行者：臺灣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出版日期：2009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 價：HK$98.00/NT$400.00
ISBN：978-988-17927-9-2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我公司調換

*本書觀點不代表本公司意見
Time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Ltd.
Does not take an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viewpoints in this book.

致　谢

谨以崇敬、感激和爱戴之心

将本书献给

加布雷尔·A.·阿尔蒙德

中文版序

隨着時間的流逝，我們現在對毛主席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有了一個更加清晰的印象；同時，也使我們對毛澤東人格特徵的分析變得比以前更加容易些。在開始進行有關毛澤東人格特徵的研究時，我是以一個受過訓練的精神病學者（psychiatrist）的身份，來看待和分析當時收集到的各種相關資料的。起初，這些資料提供的證據向我們揭示，毛澤東的個性特徵中存在着某種特定形式的心理並發症（a particular set of syndromes）。心理學的有關理論假設也告訴我們，還應該存在其他某些行爲特徵。現在，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告訴讀者：進一步的考察證明，在收集到的資料中確實可以發現某些根據前述有關心理學理論的假設應該存在、而實際上也的確存在的情形。儘管如此，我也很清楚，在嘗試對近乎神化的毛澤東進行一些心理學的分析與解釋時，自己一直在冒險，可以說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我相信，如果自己在分析中運用任何來自精神病學的專業術語，那都將是一種不謹愼的行爲；確實，這樣做還可能會適得其反，引起不當效果。有鑒于此，我從未公開宣稱，毛澤東是一個可能帶有某種邊際性人格特徵的自戀主義者（a narcissist with a borderline personality）——儘管體現出這兩種心理特徵之結合的人並不少見。我擔心，如果聲稱毛澤東正是一個體現了自戀主義和邊際性人格兩種心理特徵之結合的人，那么，一些人將會因此而暴跳如雷，義憤塡膺。

儘管如此，對毛澤東影響現代中國以及在此過程中透露出的人格特徵等有關歷史，學者們現在越來越傾向于持比較客觀的看法。這種情形的出現，就使我們可能公開運用心理學上有關自戀感和邊際性人

格綜合症（narcissism and the borderline syndrome）的觀點，來分析毛澤東的行爲。所謂自戀感，通常可以被理解爲某種對自我的、夸大了的愛。對此，學術界沒有多少爭議。而邊際性人格特徵，可能需要稍加解釋。通俗些說，這種人格的特徵就是：對控制、駕馭和利用他人有着強烈的慾望；同時，總能對自己的情感保持警惕，且對究竟是誰控制誰這一問題有着清醒的認識。具有邊際性人格特徵的人，不但無法發展任何重要的人際關係紐帶（或者說對某人的依戀感），而且還對受到忽視與怠慢有着較爲敏感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他寧願隨時準備拋棄其他人，而不是相反，即冒着被其他人拋棄的風險。具有這種心理特徵的人覺得，自己是特別的，與衆不同的。換言之，自己是一個道德高尚、對社會有用的人，但卻未得到恰當的理解與尊重。這樣一來，任何特別接近自己的人，就可能立即變成對手或者敵人。看起來有些矛盾的是，體現出邊際性人格特徵的人一般臉皮較薄，對批評高度敏感，且很容易感覺到自己是否受到忽視；但另一方面，令人驚奇的是，對其他人實際上究竟如何解讀自己，他似乎漠不關心，無動于衷。具有這一性格特徵的人，其生活中心通常會圍繞着一系列的敵手。結果，他的身上就會體現出兩種同時存在的感情：一方面是個受難者，遭到其他人的欺騙和傷害；但另一方面，則是勇敢地面對和挑戰其他人，永不妥協，並由此生發出某種愉悅感。正如毛澤東的例子所證明的，這種性格特徵還經常會與某種強烈的次屬自戀感（secondary narcissism）聯繫在一起。因此，就會產生某種難以滿足的慾望，渴求成爲他人的關注中心，並追尋他人的奉承、讚美與崇拜。尤有進者，這兩種心理特徵的結合造就了一個對情感重要性非常敏感的人；特別是，他對短暫的、積極的感情究竟可能會是怎樣的，也非常敏感。他使自己確信，其他人只會假裝對自己表現出熱情，但實際上，他們根本就不關心自己。明乎此，就明白了毛澤東當年爲什么會對共產黨人和年輕一代中國人的革命激情產生懷疑。

有關理論認爲，邊際性人格特徵和自戀感發端于一個人的溫暖舒適、安全穩定、得到了充分關愛的嬰幼兒時期。在這段時期，雖然他甚至處于完全的依賴狀態，但是，他的每一次哭喊都會完全地控制、

駕馭他所在的整個世界。這樣一來，他就生活在某種既是無能爲力、同時又是無所不能的幸福狀態中（bliss state of both impotence and omnipotence）。在此狀態中，他似乎僅僅通過發出聲音，就能駕馭和控制整個世界。但隨後他就慢慢發現，自我與他人之間是相互分離、各不相干的。他還發現，就整個宇宙而言，自己實際上並不具有什么神奇的操控魔力。這是一種苦痛的感覺，這種感覺還非常強烈。因爲，它涉及到被那個恰恰是自己依戀的、且與自己關係最密切的人拋棄的那種感情。自此以後，在他的心里就會有一種強烈的渴望，試圖重溫那段美好的幸福時光；但與此同時，還會有一種深刻的恐懼，擔心再度形成對某些人的深刻依戀心理。

在毛澤東的整個領袖生涯中，有關拋棄感的主題反復出現。特別是當他開始反對自己選定的接班人時，就更是如此。與此同時，他需要重新確認自己的高尚情操與可能價值。方法就是，勇敢面對當時國家政治經濟情境中任何處于主導性力量的一方，奮起反抗，向他們發出挑戰。這個被挑戰的對象，一度是美國，後來是蘇聯。儘管如此，在發出挑戰時，毛澤東也渴望得到對手們的尊重。在特定時期，他需要反對那個適時的敵手；但是，他也需要敵手承認和尊重他的價值。

當我們通過心理學提供的有關準則來重溫毛主席的人生經歷時，他的行動中體現出來的那種人性化的品質，就是可以理解的。由此而出現的各種行爲模式，就解釋了他的成功與優勢；當然，與此同時，也説明了他的困難與問題。

白魯恂（Lucian W. Pye）

2003 年 5 月

前言

閱讀本書前，先給大家提個醒。對從心理學角度來解釋歷史人物，一些人會表示反感。有關這一點，存在這樣一個基礎牢固的科學事實，它就像衛生部長作的警告性聲明（Surgeon General's Warning）那樣可以令人信服。事實就是，對這樣一種觀念，即兒童時期的經歷可能會影響他們成年之後的行爲，有些人會感到不安；確實，他們甚至會爲此而震怒。特別是當我們聲稱，甚至對那些歷史偉人而言，可能也同樣如此，即童年經歷會影響他們成年以後的行爲方式時，一些人會爲此而惱怒不已，義憤填膺。任何一個人，只要他認爲自己傾向于對心理學的解釋表示疑慮，那么，他就應該停止下來，不再繼續閱讀下去。

那些願意繼續深入閱讀的人，完全有權利追問：對運用心理學的洞見來研究政治領導人，我的看法是什么？在最近幾年中，人們對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這個全新的研究領域，產生了一定的興趣。我曾受到艾黎克森（Erik H. Erikson）的深刻影響。但在我智識觀念發展的早期階段，我也從其他一些先驅者們的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這些先驅者曾努力將有關潛意識（the unconscious）的理解，運用到公共事務的研究中來。作爲一個政治科學研究者，我深深地受惠于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D. Lasswell），加布雷爾·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內森·雷茨（Nathan Leites）的著作；同時，我也爲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George），阿諾德·羅格（Arnold Rogow），羅伯特·雷恩（Robert Lane）和詹姆斯·戴維·巴伯爾（James David Barber）的研究所鼓舞。作爲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我要感激以下這

些學者：亞伯拉·卡丁納（Abram Kardiner），拉爾夫·林頓（Ralph Linton），克萊德·克萊克霍恩（Clyde Kluckhohn），亞歷山大·英格爾斯（Alexander Inkeles），魯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喬夫雷·戈爾（Geoffrey Gorer），以及其他一些學者。因此，我傾向于認同自己作爲一個政治學家的身份。我沒有表示自己要嚴守一個新的學科；因爲對那些從事着最初由弗洛伊德（Freud）開闢的研究園地中的不同領域的學者們而言，這樣做是不公平的。

毫無疑問，對一個力圖避免陷入心理學這片沼澤的政治學者而言，在許多情形中應該保持警惕。但對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而言，卻沒有必要如此謹小慎微。因爲，在這個領域中存在着某種廣泛的共識：有一個人的性格特徵完全地主導、操控與統治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發展。這個性格特質具有如此影響的人，就是毛澤東。然而，令人驚奇的是，幾乎沒有人曾經嘗試着去系統地分析這種最顯著的個性特徵。當然，人們已經作了大量的努力來研究毛澤東的論著作品，並嘗試把它們放在中國智識觀念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背景中去考察。儘管如此，對毛澤東個性特徵的研究，卻只有兩種原初的、還處于胚胎階段的理論假設。一種看法是，把他描述成一個革命的浪漫主義者，一個有着充滿戲劇化色彩的性格特徵的人物；另一種觀點則認爲，他對死亡和不朽非常敏感。但是，卻沒有一種理論假設試圖尋求把這些特徵與毛澤東的情感發展歷程（emotional development）聯繫起來。

在處理有關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的情況方面，傳記作家們猶豫不決。這就意味着，我們被剝奪了把他當作一個我們熟悉的、完整的人來加以理解的機會——譬如，就像對待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威爾遜（Woodrow Wilson）、路德（Martin Luther）、甘地（Gandhi），以及其他一些偉人那樣。當然，像所有的個人一樣，偉人確實也應該享有隱私權。儘管如此，也有一些理由可以説明，爲什么學者有責任盡力理解公共人物的人性化特點，甚至他們較爲私密的一面。例如，有關動機的重要性。我們知道，個人動機總是影響其公共行爲的一個因素。有些領導人的性格力

量非常強大，並涉及創造和調動強烈的集體情感——就像在對中國人呼籲民族主義和提倡社會變革的熱情時，毛澤東所作的那樣。對這樣一個領導人來説，探詢他怎樣理解人類的感情，以及如何控制自己的激情，以便能夠如此有效地影響其他人的情感，就是合理合法的；而且，也確實是必要的。

對心理學解釋的憂慮，大體呈現出兩種相互矛盾的形式。一方面，是“太多的東西被解釋”——這種充滿濃厚決定論色彩的分析暗示，在個體生命的後期生涯中，如此衆多的東西可以從如此細微的早期經歷中找到其淵源；但另一方面，則是“太少的東西被解釋”——畢竟，有許多人存在着類似的個人經歷，卻沒有引起同樣的公共效果。將這兩種反對意見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第三種説法：“基于太少的證據，造就太多的東西。”儘管如此，心理學解釋的原則不應與在分析人類行爲時的慣常要求有任何不同。眞正的問題在于，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我們通常能夠處理一些“必要”條件；但就目前的知識發展階段而言，我們幾乎無法處理那些可以解釋事情爲什么會發生的“充分”條件。所以，心理學解釋遇到的問題，和其他某些學科的研究者們遇到的問題，基本上是一樣的——譬如，和某些智識觀念史家遇到的情况，就很類似。在考察毛澤東的認識發展歷程時，智識觀念史家們可以確認毛澤東曾經讀過的特定文獻和論著。據稱，這些文獻和論著曾經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影響過毛澤東的智識思想發展。儘管如此，智識觀念史家卻無法解釋，爲什么無數讀過同樣著作的其他人卻沒有受到類似的影響。心理學解釋面臨的問題，與這種情形類似；唯一的區別在于：一些人預期，可以有較多的東西被言説；另一些人則希望，能被言説的是較少的東西。

和試圖理解中國的許多研究一樣，有關毛澤東個性特徵的考察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爲相關信息的稀缺。大約40年前，毛澤東曾在陝北的窰洞里向斯諾做過一次值得注意的自傳性叙述。但除此之外，對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the private man），我們仍缺乏了解。可以説，有關這方面的事實性消息，就和我們讀到的有關中國政治實際進程的作品一樣，微乎其微，少之又少。我們能做的，不過是盡力拼湊所有

可以獲得的信息碎片，然後尋求一個似乎與大多數信息相互吻合或者一致的解釋。本書將分别對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 (the public man) 和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進行嘗試性探討，而對與此相關的文獻資料的反復考察和細心辨析，將構成全書的基本結構。

在我所作的工作中，較爲特别的是：首先將所有可以獲得的，從心理學角度而言與毛澤東個性特徵有着非常關鍵和重要關係的信息並列起來。這樣一來，我就整理了毛澤東和其他人提到的他與母親的關係；我還考察了他以後和其他女人的關係，以及他怎樣對待自己的妻子。我考察了作爲“兒子”，毛澤東怎樣對待自己的父親；以及作爲“父親”，他怎樣對待自己的子女。毛澤東和兄弟姐妹們的關係，則被放到他以後將會遇到的、同學關係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對其中任何一種關係的具體理解，都可能有助于我們對其他關係的理解。我們的目的，是對毛澤東的個性特徵進行解釋；就上述那些關鍵的關係而言，這個解釋將與它們提供的證據相一致。隨後，我們將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的有關描述，和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的有關記録並列起來，並爲尋求有關這個處于領袖地位的人物之理解作些更進一步的調整。

坦白説，這種分析方法意味着，我們會不時地假定和推測，某些事情必定發生了——即使我們還缺少客觀的證據。我們被引向某些有根據的推測。因爲，有關個性特徵的理論傾向于認爲：在所有的生活事件之中，存在着某種一致性；那些在生命的不同階段出現的一些個性特徵，與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後的某些特徵，彼此都有關聯。

在解釋一個偉大的政治人物的心理時，這種途徑把我們引向一個新的重點和一系列新的關注。按照心理學的傳統理論，有關權威和反抗問題基本上是根據與父子關係有關的緊張和壓制來解釋的。但在毛澤東的例子中，我們發現：這種關鍵性的發展是與他的某種前厄狄普斯浦斯或者前戀母情結 (pre-oediapl experience) 的經歷有關的。而這，就涉及到毛澤東與他母親的關係，一種曾給予他強烈的自戀感情的關係；但當他再也不能繼續博得母親專一的關愛時，這種關係也給他帶來某種遭到不公平對待的感覺。我們的假設是，毛澤東的這些最初經歷最佳地解釋了他作爲一個造反者，以及作爲克理斯瑪型權威的

領袖角色（charismatic leader）。它也説明了，爲什么西方社會的激進青年從毛澤東身上找到那么非同尋常的吸引力。和毛澤東一樣，這些年輕人也因類似的挫折感和憤怒感而需要反抗。之所以會有這種挫敗感和憤怒感，是由於這個世界並沒有滿足他們出生後，最初瞥見的對生活的種種期望。當時，正處于嬰幼兒時期的他們，正沉浸于因全能感和幸福感而帶來的、非同尋常的安全感和放縱感之中。

在本書即將開始時，必須強調我們所進行的分析之嘗試性質。但充滿希望的是，如果我們最終可以獲得更多的信息，那么，修改或者進一步證實我們對毛澤東的有關解釋是可能的。同時，當中國政治體系正專注于繼承或者説接班人問題（question of succession）時，檢驗一下有關毛澤東偉大特性的心理學維度，就是一個特別合適的時機。毛澤東如何指導自己作爲公共人物的生涯的最後一個重大問題？理解該問題的任何嘗試，都需要對毛澤東的整個人生經歷有一種發展性的觀點。更有甚者，儘管無法預知在毛澤東逝世之後將會發生什么事情，但非常可能的是，他的生活經歷很快就會被遮蓋在一幅較之此前更加厚重的神話帷幕中。毛澤東的大半生已經成爲歷史的一部分，但尚未最終凝固成永恆不變的神話故事；在此之前，他仍有最後一幕戲劇要上演。有鑒于此，對作爲領袖的毛澤東進行這樣一個嘗試性的心理分析，就適逢其時，非常値得。

在從事這項研究時，我要感謝劉平鄰教授（Alan P. L. Liu）的鼎力相助。爲盡力挖掘有關毛澤東一生經歷中的某些隱秘的事實，他曾經給我以廣泛的幫助。起初，我們曾打算聯合完成這項研究；但後來，麻薩諸塞和加利福尼亞之間無法克服的空間距離證明，合著是不切實際的。因爲沒有經常的、穩定的接觸和交流，我就開始獨自寫作。我在自己對毛澤東個性特徵的解釋中游移不定，越漂越遠。而劉的著作，特別是那些涉及其他人如何認識和評價毛澤東以及毛澤東與同事們關係的作品，是有關毛澤東研究的重要成果，有其獨到之處。本書第二章和第十章參考了這些研究。

我曾與史蒂夫·皮茲尼克（Steve Pieczenik, M. D.）進行過長期的、富有啓發性的討論。這些討論對我形成有關毛澤東的心理學解

釋，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他不斷地促使我去尋求有關個人行爲的更深層次的解釋；他還把海倫·多伊奇（Helence Deutsch）和奧托·克恩博格（Otto Kernberg）的一些頗有幫助的書推薦給我。多羅茜·克勞斯·馮塔娜（Dorothy Grosse Fontana）則幫我收集了有關毛澤東與同事們關係的資料。

我也受惠于那些認眞的、帶有批判眼光的讀者，他們曾從心理學、中國歷史、毛澤東的政治生涯以及本書寫作的行文風格等角度，考察過本書手稿。讓·麥克·波爾（Jean MacKenzie Pool）準確地領會了我有關毛澤東心理解釋的所有維度；出于高度的敏感，他還用更進一步的、精細的假設向我的解釋提出挑戰。哈羅德·艾薩克（Harold R. Isaacs）是研究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首屈一指的人物。帶着批判的眼光，他逐字逐句地審讀了書稿；這一行動，再次體現了學院派同事們嚴謹的學術理想。米歇爾·奧克森博格（Michel Oksenberg）慷慨地擠出時間，與我分享他有關毛澤東統治風格的知識財富。理查德·所羅門（Richard H. Solomon）則在中國人的心理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方面，給予我難以估量的幫助。勞爾·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憑藉他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豐富知識來審視我的文章。在有關毛澤東的孩子們的許多事實性細節方面，愛德華·萊斯（Edward Rice）提供了幫助。我還要感謝以下讀者：加布雷爾·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蘇珊·博格（Suzanne Berger），戴維·德努恩（David Denoon），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D. Lasswell），蘇拉·波爾（Ithiel de Sola Pool），以及邁隆·維納（Myron Weiner）.

我要感謝西德尼·劉（Sidney Liu）對一些關鍵性問題的開掘和他的慷慨。

我很感謝維吉娜·彼爾特（Virginia Peltier）在辨認我模糊難認的手稿，以及打印似乎永無休止的修改稿時表現出來的耐心。

還有瑪麗·派伊（Mary W. Pye），她在潤色我的文章、挑戰我的推理，以及在編輯和校訂等每一個工作環節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如果能與那些曾幫助過我的人一起分擔本書的榮譽，我會感到更加欣慰。當然，本書的所有缺陷和不足，仍由我自己負責。

本PDF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目　録

致　謝
中文版序 …………………………………………………… 001
前　言 …………………………………………………… 004

第一部分
導論：猴子與老虎

第一章 問題
——毛澤東的心理性格及政治得失 …………………… 003
第二章 印象：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 …………………… 016
第三章 印象：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 …………………… 039
統一，還是矛盾？ …………………………………… 044
冒險，還是理性？ …………………………………… 049
直接的嚴密控制，還是間接的權威代表？ ………… 055
信任關係：人格化，還是非人格化？ ……………… 058
政治風格：群衆路線，還是精英主義？ …………… 060
容忍批評，還是選擇衝突？ ………………………… 062

第二部分
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

第四章 家庭與母親 ………………………………………… 071
第五章 兄弟姐妹 …………………………………………… 090

第六章 父親 …… 109
正義感 …… 131
第七章 同學與老師 …… 139
第八章 妻子與子女 …… 172
被拋棄的包辦新娘 …… 178
第一個妻子：楊開慧 …… 181
第二個妻子：賀子珍 …… 201
第三個妻子：江青 …… 210
作爲父親的毛澤東 …… 212
代際的循環 …… 218

第三部分
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

第九章 政治創造性：技能問題 …… 225
意識形態：言辭的魔力 …… 229
情感鼓動家：製造敵對關係 …… 232
利用矛盾：鬥爭的方式 …… 241
從魅力型權威到實質性權力 …… 244
行動：作爲意志力的權力 …… 250
第十章 政治拋棄感：恐懼問題 …… 256
敵對情感和同志情誼 …… 269
三個例外 …… 288
第十一章 問題再思考 …… 297
——毛澤東個性特徵及其政治活動的心理學分析
索 引 …… 308
譯校後記 …… 338

第一部分

導論：猴子與老虎

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爲主。也有些猴氣，是爲次。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 年 7 月 8 日

第一章 問 題

——毛澤東的心理性格及政治得失

無論從什么標準看，毛澤東都應該屬於我們這個世紀少數幾個偉大的政治家之一。他出生並成長于偏僻而閉塞的 19 世紀中國農村，但卻崛起和承擔了領導中國革命的責任，並用在歷史上影響最廣泛和最有力的政府統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終，他還成爲二次大戰那一代的偉大政治英雄中，活得最久的一個。他的生命横跨現代中國的誕生，他的性格塑造了中國革命的方式和風格。

考慮到中國人口令人驚異的龐大數字，如果把毛澤東稱作本世紀最受尊敬和最受狂熱崇拜的人，這看來可能不過是一種微不足道的稱讚。人們相信，大約有八億中國人把毛澤東當作一尊神來絶對崇拜。有鑒于此，我們時代中還有哪個凡人能夠在群衆的擁護方面和他一比高低？儘管如此，不論中國有多大，對毛澤東的擁護已經遠遠超出了他自己國家的人民。幾乎沒有幾個人感受不到他的存在——無論這些人對他是讚美，還是仇恨；是尊敬，還是藐視。全世界的革命極端主義者都將他的名字作爲自己的標記：“毛主義者”；儘管如此，全世界的領導人卻都希望得到毛澤東的接見。羅馬教皇在一天內惠允接見的人，比毛澤東在一年內賜予會見的人還要多。當毛澤東最後一次在公衆場合露面時，一百多萬人歡欣鼓舞；從此以後，只有那些經過挑選的少數人才能有機會與他會面。這種稀有的會見就成了全世界新聞關注的對象。美國國務卿曾經與毛主席會談數小時——對所有人來説，這一消息的發佈是個信號。它表明，國務卿受到了熱情的接待——確實，這是很值得驕傲的。當然，如果訪問中國而不被安排與

毛主席會面，最普通的解釋就是：他沒有得到毛主席的歡心，因而沒有受到熱情款待。

對毛澤東的這種非同尋常的吸引力，是很難確切說明的。有人可能認爲，這不是基于他個人的原因，而更多同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質有關——確實，中國人似乎一度總是身不由己地把他們的所有領袖當成帝王式的人物。儘管如此，事實仍然是：許多外國人，他們與毛澤東出身的農村沒有什么親近關係，社會和個人背景也非常不同，卻似乎都在毛澤東的語録和榜樣中找到了他們政治生命的靈感。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比他受過更正規教育的無數青年人發現，毛澤東的革命熱情和純潔是他們的代言人。

確實，甚至對於那些對他的理想不抱任何同情態度的人們，毛澤東也展現出強烈的吸引力；不管怎樣，他們仍然尊重他，把他當作一個新世界秩序中，善於搞力量平衡的政治家和戰略家。新老國家的政治家們紛紛拜望他，對這位擁有神秘力量並與世隔絶的人物表示敬意。除了這些人之外，毛澤東的個人魅力也激發了諸如安德烈·馬爾羅（Andre Malraux）似的知識分子們的想象力，他們依次等待着毛澤東的接見。

隱藏在所有這些偉大特性背後的這個人的性格特徵是什么呢？對許多人而言，僅僅提出這個問題，本身就有點兒褻瀆神聖的意味。對於中國人和其他崇拜毛澤東及其思想的人來說，只要詳細研究他的公共美德、閱讀他的聖徒傳記就足夠了，研究他的其他方面是不得體的，應當加以拒絶。對於貶斥他的人來說，整個景象是使人厭惡的：毛澤東這個人必定就是隱藏在中國式社會主義極權制度背後的惡魔。儘管如此，還有些處在這兩種極端人物之間，懷着眞誠的好奇心的人——本書就是爲他們而寫的。

衆所周知的材料告訴我們，毛澤東出生於中國鄉村，祖上世代務農，對傳統神話和民間傳説知道得很多。儘管曾經接受過儒學教育，但他同時也是中國探求西方知識的整整第一代人中的一份子。他擺脱了鄉村的閉塞，使自己融入到中國的學生政治和革命規劃的世界中去。這個世界既混亂不定，而又富于競爭性。作爲一個戰士、思想理

論家和運籌帷幄者，毛澤東成爲中國共產黨人游擊戰的象徵性領導人。作爲一個勝利了的統治者，毛澤東又是一個空想家：他的目光超越了如何管理社會的直接問題，而是着眼于如何創造一個嶄新社會的目標，以及如何塑造一種新人。以中國爲中心，毛澤東又是兩大當代國際體系的主要塑造者。他的判斷，有助于促成戰後世界的兩大尖銳分裂的集團；他的決定，釀成了1970年代國家間的某種更加變幻莫測而又錯綜複雜的力量均衡思想。這樣一來，毛澤東的才華就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戲劇性衝突和冷戰中的激烈殘酷鬥爭，從中國第一次覺醒的時代一直延伸到未來的新時代；直到現在，我們幾乎還難以把握他爲這一個新時代勾畫的輪廓。

在最近幾年中，人們曾做了大量的努力和嘗試，試圖去了解毛澤東聲望背後的東西。例如，研究智識觀念史的學者們力求發現他豐富馬克思主義的方式；但是，他們雖然讓人看到毛澤東是一個敏銳的、甚至是確實精明的思想家，卻也不得不承認：毛澤東對偉大的最終追求並不在于他作爲哲學家所寫的著作中。另外有些人猜想，他的聲望來自于他作爲一個軍事戰略家的成功；但無論他們做出的努力多么值得同情，顯而易見的是：毛澤東的天才存在于其他一些方面。還有一些維護毛澤東的聲譽的斗士們則爭辯説，他爲經濟秩序構想了全新的目標，從而使所有傳統的、爲了更高的工業化和物質生活的經濟目標變得陳腐而不合時宜；但是，對毛澤東的政策做更爲認眞的研究便會看到：他顯然對更高的生活水準和更多的人身安全持有一種近乎普遍的渴望。

毛澤東身上體現出的悖論在于，在每一個具體方面，無論是作爲哲學家、戰略家、經濟調控者、空想理論家還是世界政治家，他的偉大都是毋容置疑的，但他的這些品質又不足以説明他的偉大。

他之所以偉大，秘密在于一些別的地方——在于他能夠理解、喚起和引導人類情感的非凡能力；以及以他自己的人格，去駕馭他人的情感與激情的無數種方式。在現代中國，情感領域是特別成問題的。因爲在傳統的儒教中國，正確行爲的本質就在于完全控制、甚至壓抑自己的熱情，特別是攻擊性的激情；但由於在現代世界中因軟弱而倍

受挫折，中國人已經做出反應，開始對訴諸于公衆熱情的行爲很敏感。在傳統中國，將情感表達納入儀式化的軌道（ritualize emotions），是當時人們力圖控制感情的一種手段，這一點有助于解釋他們對戲劇和劇場的理解和欣賞；而現代中國需求的，則是感情的宣泄式表達，這一點造就了衆多想要成爲英雄並在其自身生活中上演人生戲劇的人物①。毛澤東本人便具有獨一無二的能力，可以對中國當時的這種需求做出反應；因爲他具有一種可以稱之爲“戲劇化”的人格，能夠熟練地掌握如何駕馭“他人直接的情感反應”的技巧②。

既然毛澤東的偉大很清楚地在于情感領域，因而有關毛澤東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個政治心理學的問題（a problem in political psychology）。僅僅把毛澤東看作一個思想家或一個精明的戰略家，就

---

① 有关控制冒犯性情绪的中国文化模式与中国人对剧场性行为的心理偏好之间的联系，作者曾做过分析。参见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 I. T. Press, 1968, 特别是第九章。

② Lowell Dittmer 非常有洞察力。他認識到，毛澤東的性格特徵符合 Harold Lasswell 有關“戲劇性”（theatrical）人格的定義，而劉少奇則是所謂“義務性”（compulsory）個性的典型。參見 Lowell Dittmer, Power and Personality in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Ⅷ 1, Nos.1 and 2, 1974, pp. 21–49; Lowell Dittmer, Liu Shao–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Chap. 6.

簡潔地遵循 Dittmer 的引導，通過與劉少奇個性特徵的參照、比較，從而更加明確地勾勒出毛澤東的個性特徵，這對我們的研究目標可能是有益的。毛澤東是一個“戲劇性”人格者；劉少奇是一個“義務性”人格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將是毛澤東的一個“天然的”反對者。Lasswell 有關兩種政治人物的一般類型的描述，看起來似乎完全符合毛與劉的分歧。“戲劇性的個性可能通過愛出風頭、好表現，幽默、風趣，易於惱怒、愛發脾氣，以及自尊等各種個性特徵表現出來；但在每一個例子中，所有的運作機制都圍繞着一個任務，即比其他人‘強’……義務性的個性特徵則傾向于認眞地確定限度，以及各個要素按部就班、協調良好地序列安排；有戲劇性個性的人則精擅于爲鬆散的、沒有明確分類的細節留下一定的剩餘空間和多樣性。前者的標誌性特徵是，強加某種一致性，而後者則容忍多樣性，精擅于細微的差別。有義務性特徵的人會把外部形勢非主觀化，或者說客觀化；而戲劇性的人物則對心理學的維度很敏感。一個否定新奇性，一個則歡迎之。一個受制於人類處境的強迫和壓制，而不考慮其他選擇；一個則遵循人類的自主天性，允許一定的拓展。義務性的個性把自我可以向他人表現的方面單一化，而後者則把個人可以向他人展現的面向和維度多樣化”。參見 Harold Lasswell, Power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W. W. Norton, 1948, p. 62。

會忽略他的歷史角色的主要方面。此外，如果想了解爲何毛澤東能如此成功地調動起中國人以及其他人的情感，我們就必須去發掘他個人的情感世界，去發現他和其他人之間精神聯繫的心理動力。

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是很能吸引人的。他的言談舉止驚世駭俗，出人意料。在談話中，他經常提出一些令人不可思議的話題：爲什么有些非洲人比另一些人皮膚更黑呢？醫學上的進步難道不是產生了更多的疾病嗎？中國人民早就了解馬克思主義了，因爲他們早就懂得什么是矛盾。作爲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毛澤東會突然以信仰來世的信徒的習慣口吻說："我不久將去見上帝了。""當我們見到上帝，或者卡爾·馬克思時，我們將不得不爲自己辯護。"有時，他會將自己描繪成中國歷史上的杰出英雄："是的，我們比秦始皇更偉大。""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在另一些時候，他則謙卑地貶低自己，並沉浸于自悲自憐之中。毛澤東曾這樣描繪自己的一生：到處漫遊，就像"一個打着漏傘的孤獨的和尚"（a lonely monk with a leaky umbrella）①。有些時候，他的談話是機智而富有諷刺性的；而另一些時候，他的談話又是很隨便的閑聊。他的風格通常是生動的、充滿活力的，對細微的差別很敏感，對情感採取反思的態度，並且經常是幽默和風趣的。

除開這些內在的吸引力外，對毛澤東的性格還需要進行嚴肅的分析；因爲，離開毛澤東的個性，現代中國歷史上的許多東西就很難得到解釋。在中國革命不斷變動的環境里，一次又一次的，各種事件和進程都是因毛澤東的個性而採取了決定性的形式。在有着可靠體制的穩定社會中，有關個性特徵的考慮所能產生的影響會被限制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內，它只表現爲不同的個體充當既定角色的方式。但就毛澤東而言，卻沒有爲他明確規定要充當的角色；恰恰相反，他的個性創造着他的角色，並從而塑造着中國的歷史。

因此，中國現代史是由客觀進程、個人風格以及相當可觀的機會

① 譯者案：準確譯文應爲"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毛澤東生前曾多次這樣描繪過自己。但這與上文有關毛澤東謙卑的敘述思路顯然不太一致，因此暫用此譯法。

和偶然事件組成的複雜混合體。

按照通常的規範解釋，中國現代史的動力是巨大的社會和經濟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民族主義的抬頭，農村經濟的瓦解，西方的衝擊，儒家理想的崩潰以及其他等等。從這樣一種歷史視角去看，並沒有給個性力量留下什么空間；相反，各種事件被想象成淘沙的大浪。它把少數人像拉拉扯扯的泡沫和殘渣一樣卷到浪峰上，這些人表達了他們自以爲在駕馭的大浪的意志；而另一些不那么幸運的人，則被重重地拋進浪谷而被擊毀[①]。

這樣一種有關中國歷史的非個人機制的觀點，與下述這種分析經常是並行不悖的。這種分析總是不厭其詳地對在現代中國載入史冊的人物的各種複雜關係加以敘述。因此，將用一章的篇幅詳細闡述社會變革的各種力量，下一章則講述一大群試圖努力去控制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朋友和敵人的事情。在此分析過程中，被忽略的是歷史進程與個人動機之間的內在聯繫。同樣的分析策略，則將中國革命歸因于非個人的因素，然後又稱這一革命的頂峰——即中國的共產主義，是由毛主席獨特的個人品格塑造的。就像科學家同時接受波動理論和量子力學理論來解釋光現象一樣，研究現代中國的歷史學家們也默認了兩種方法，同時並不感到有必要解釋這兩者之間的因果聯繫。

當把現代中國的歷史系統地與毛澤東的活動聯繫在一起時，毛澤東天賦方面的一個關鍵因素便立即突現出來：他在不同時期充當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相互矛盾的角色的杰出能力。當毛澤東扮演着農民組織者、軍事指揮員、意識形態代言人、政治戰略家和國務活動家

① 有關現代中國的各種研究中，存在着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智識觀念史的考察被認爲有着相當的合理性；而有關人物個性特徵在這種歷史轉變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卻鮮被認爲具有與之類似的合理性。研究者們相信，知識分子的觀念以及中國人應對西方觀念的方式，是塑造現代中國的重要力量，這一點不言而喻。但有關這些觀念的力量的討論，幾乎總被與中國人的個性特徵和他們的情感反應等考察分開來對待。有關這些研究，參見 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Tse-tu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Joseph 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Vol. Ⅰ，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Continuity，1959；Vol. Ⅱ，The Problem of Monarchial Decay，1964；Vol. Ⅲ，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時，他也在相互矛盾的公開形象之間搖擺不定：譬如，究竟是熱情的革命家，還是聰明的哲學家；是精力充沛的活動家，還是與世隔絶的隱士；是人類意志無上能力的狂熱鼓吹者，還是深知歷史不可能加速的耐心籌劃者？

恰恰是由於毛澤東蔑視邏輯，並爲一種截然相反的觀點辯解，所以，他總是能以一種非常奇特的方式，來傳達某種有關人類精神的完整性的意義。他稱讚書本（確實，這在神化他自己的、被假定爲具有一定魔力的"小紅書"（Little Red Book）[①]的問題上，可以表現出來），同時他又看不起書生氣十足的知識——"讀書只會使孩子缺乏遠見"。對於暴力，他以同樣的方式給予稱讚和譴責。他維護理性，但又蔑視使人麻痹的理性推理的冲動。因爲對任何選擇都有其恰如其分的表述，這就使毛澤東的知識整體像民間智慧一樣不可辯駁。

對政治家來説，特別是對那些涉足於人類情感的微妙世界中的是非問題的人來説，有關不同角色的整合（integrety of role）問題是個複雜的問題。因爲，他必須同時與願望和現實打交道。而在日常的政治交易市場里，這些因素必定是混雜在一起的。這樣一來，他就可以把客觀事實和主觀設想之間的界限搞得很模糊。因爲對他來説，這兩種事物幾乎沒有什么差别，其重要性可以相互替換。

毛澤東證實了政治心理學的創始人——哈羅德·拉斯韋爾的批判性考察。拉斯韋爾認爲，對所有著名人物來説，首要的一個因素就是："扮演一個角色，以僞裝的面目出現"（playing a role，of being an imposter），耽迷于必要程度的"自我欺騙"（self-deception）之中，這才能夠在虛假的政治"遊戲"中積極地從事活動[②]。

毛澤東和其他絶大多數的政治領袖一樣，在公共生活中取得了成功。對這一問題應該如何解釋？這就涉及到他們對某些只能通過公共活動才能得到滿足的私人需求的理解。但這種解釋的目的，並非要把偉人庸俗化，即試圖通過微妙地歪曲偉人的經歷，來對他的歷

① 譯者案：即《毛主席語録》，也叫紅寶書。

② Harold Lasswell，Psychology and Politics，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30，p. 50.

史活動做出荒唐的夸張；而其實，這些經歷也爲許多普通人所具有。實際上正好相反，偉人並不因他們也曾有過依賴他人的時期而顯得渺小；因爲，人的所有本性中最重要的本質，就是從完全無助的狀態發展到自我實現的境界——而這，是每個人必然都要經歷的人生戲劇。

確實，歷史上的偉人和擁戴他的公衆之間的人際關係紐帶，必定形成于每個人的生活經歷之中。因此，爲了揭示毛澤東的成長歷程和他受到擁護的秘密，就需要考察一下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的某些故事。如果認爲可能驅使一個人進入政治生活的東西，就一定是他受到擁戴的原因，那么這種假設在理論上，一定站不住脚。但就毛澤東的情况而言，我們確實有理由相信，這兩者是聯繫在一起的；因爲，他的成功與失敗，完全都在于他能夠控制情感領域的這一方面。

在考察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的生活細節時，我們必須尋找一些線索，從而搞清楚他何以能適應如此之多的角色和情境，何以能與來自如此衆多的不同背景的人們交流情感。例如，毛澤東作爲一個反叛者的吸引力，似乎並不是出于這樣一種心理需要，即在一個更廣闊的舞臺上，扮演一個發泄對其專制而獨斷的父親的深刻反感之角色。因爲，許多和他們的父親沒有這種矛盾的人，也對毛澤東的反叛呼籲產生了共鳴（我們將會看到，毛澤東和他父親之間的關係既不是那么簡單、輕鬆，也不是那么沉悶、壓抑）。恰恰相反，我們將會發現，毛澤東作爲反叛者的風格，開啓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記憶序列，它們被封閉在很多人的潛意識中。他爲所有感到痛苦和憤怒的人説話，這些人因爲被“忽視”、沒有得到“作爲人的尊嚴”、不能“參與那些影響其生活的決定”而產生挫折感——這也就是説，這些人感到生活拋棄了他們，因爲現實不允許他們重溫在兒時曾體驗的那種無所不能的感覺。那時，他們是世界的中心，每一個願望都能引起別人奇迹般的關注。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毛澤東作爲一個反叛者的吸引力具有某種明確的心理基礎——他的那種能夠撥動全世界中產階級青年的心弦的能力。這些青年曾經熟知自己那段受到嬌縱和寵愛，可以爲所欲

爲、無所不能的時光，他們的雙親曾給予他們極大的關懷；而現在，這一切都不復存在了。

我們認爲，毛澤東的偉大，在于他個人的心理需求與大衆的心理需求之間的聯繫。而這種看法和意見，實際上也是毛澤東本人政治意識的一部分。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接見艾德加·斯諾（Edgar Snow）時，毛澤東承認：在賦予其思想以奇特力量方面，中國人民可能走得太遠了。然而他又説，有時也確要有個人崇拜，在人世間總是存在“崇拜和被崇拜的要求”。

毛澤東説的這些話，確認了領袖和追隨者之間的關係：就像民衆對政治家發揮一種心理功能一樣，政治家也對民衆發揮一種心理功能。領袖和追隨者們互相依賴，他們都需要從對方吸取一些滿足自身需要的東西；但他們各自尋求的東西，卻存在着一個特別的、且很重要的差異。“崇拜”與“被崇拜”的需求是對稱的，但絶不是一種相同的情感。

毛澤東對領袖們及其追隨者的心理需求的洞察，把我們直接引向了具有超凡魅力的克理斯瑪型領導權威的實質。崇拜的需要産生於人類一種基本的要求，即依賴感；被崇拜的需要則是自戀的核心情感——當然，依賴性和自戀感都在人的童年時代有着共同的根源。依賴的安慰和自戀的興奮都存在於人生經歷的早期：那個時候，自我尚未與其他人、與環境區分開來；無助與全能還混淆在一起；當此之時，依賴的舒適同自戀的興奮是聯繫在一起的。在這個階段，軟弱與易受到傷害的哭泣，同每一願望都能因及時引起别人注意而産生的歡愉之間，其距離是無窮小的。出于這種普遍的經歷，絶大多數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感覺到，他們在作爲英雄而受到崇拜時所産生的樂趣，掩蓋了因被忽視而産生的憂慮；而絶大多數領袖人物則可以在更加微妙的程度上感覺到，潛藏在追隨者的依賴之中的，是對權勢的強烈渴望。人們的正義感來自于童年的渴望，即由於能夠完全駕馭因情境而帶來的那種幸福感，他內在的善因而得到了獎勵。追隨者們能夠覺察領袖人物精神上、心理上的弱點，但他們不願意看破他們崇拜的領袖；因爲他們擔心，這會毁滅曾經在他們生活中起過作用的唯一帶有

魔力的回憶。領袖們引發個人自戀的能力，使追隨者們回想起：他們也曾有追求更大的善與力的潛在能力①。

自戀的奇特動力也滋生了政治體系固有的神話，即善可以通過變得強大起來得到報答，權力總是擁有善的權威。這種善將確保那些需要依賴的人得到安全的培育。因此，爲了理解頗有戲劇性的、自負的毛澤東與需要安全和效率的中國百姓之間的聯繫，我們必須認眞地辨認兩種事物。這兩種事物就是，具有超凡魅力的偉大領袖之個人經歷，以及使其在中國革命的背景中得以出現的大衆文化模式。

由於自戀與依賴的相互作用，那些需要崇拜和需要被崇拜的人因彼此需要對方的脆弱而相互連結在一起②。偉人的魅力在于，我們能夠看到他具有自我欺騙和取悅公衆的能力；而反過來，偉人也會因其活動能夠在民衆中得到夸張的反應而感到喜悅和振奮。富蘭克林·D.·

---

① 從相當粗略和較爲簡化的形式看，有關自戀感的理論假設大體可以這樣來歸納。該理論認爲，在嬰幼兒階段的最初時期，尙無“自我”(ego)和“非自我”(non-ego)的區分；而且，這種“自我”完全是脆弱的，任何令人愉悅的東西都被認爲是“自我”。如果環境是恰當的、支持性的話，嬰兒就會覺得，在外部世界和他自己之間沒有什么分別。這樣一來，他和他的世界就混爲一體。嬰兒的每一個希望，就變成了一個命令。他有關自己的善的感覺，就是那種帶有神奇魔力的世界中心性。當通過哭喊——也因此是駕馭他的世界——無法緩解他的痛苦以後，嬰兒就經歷了深刻的挫敗感。對他自己的善的焦慮，還可能是負罪感的開始。這樣一來，全能感和自尊感就與一種有關“基本自戀感的深刻情感”(oceanic feeling of primary narcissism)緊密聯繫在一起。後來，隨着孩子逐漸形成一種有關他自己分離的“自我”的感覺，以及“自我”和“非自我”分化的發生，就有可能恢復這樣一種幻想，即被納入整個世界，並成爲其中的一分子，重新體驗與自己的自戀感相一致的全能感和內在的善。正是這種“次屬自戀感”(secondary narcissism)才是自戀個性的基礎，並且促使他不斷追求自尊（正如Lasswell有關政治人的理論表明的）。這也正是我們有關克理斯瑪型領袖(Charsimatic leader)的理論假設的基礎。自戀感使巨大的心理精神動力集中于“自我”成爲可能。有關自戀感理論的技術性細節，參見Sigmund Freud, 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 in Collected Papers, ed. Ernst Jones, trans. John Revie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Vol. Ⅳ, pp. 30–59; Otto Fenichel, The Psychoanalytical Neuros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45.

② 我要感謝與Dr. Steve Pieczenik, M.D.的討論。是他幫助我形成了有關“對易受傷害性的相互利用”(mutual exploitation of vulnerabilities)這一概念，並以之作爲領袖和追隨者之間那種克理斯瑪型權威關係的基礎。

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從來不會掩飾他在可以操縱群衆激情時而産生的喜悦，而美國公衆也從來不會掩飾他們因自己能夠看透頗有人緣的總統的自我滿足感而産生的愉悦之情。約翰·F.·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的吸引力在于一種非常人性化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仰慕者欣賞肯尼迪對自己不是太過嚴肅的態度，而肯尼迪也理解他們願意接受打趣和幽默。爲什么這種欺騙中的狡黠因素會在旁觀者心中喚起英雄主義的迷戀，而不是清醒理智的冷漠？問題的關鍵似乎在于，人們對自戀的普遍愛好。群衆本能地理解偉人對其偉大感的陶醉，他們會通過放鬆對本人自戀冲動的抑制的方式，而做出善意的反應；反過來，他們也渴望以一種超越其平凡角色的方式去行事。

毛澤東曾在不經意間給妻子寫過一封信，這封信我們將在後文進行具體分析。在信中，毛澤東生動地將自己的個性描繪成有一部分像“猴子”——頑皮，充滿幻想，反復無常，無法預言，總是惹人惱火，逗趣和變化無常；還有一部分像“老虎”——兇猛和危險的君主和統治者，爲衆人敬畏。

“猴氣”與“虎氣”的混合，給毛澤東的行爲帶來一種有迷惑力的特性，使他得以自如地行動。作爲一個意志堅強的空想家，他認爲自己的信仰具有絶對性；然而，他那種基本上是矛盾的心理，又使得他有可能不斷地改變政策，並戲劇性地轉換自己的立場。

作爲大衆情感的主宰，毛澤東自己的感情似乎必然比大多數人更加強烈和不易控制。但實際上，多年來他曾充當多種角色，並成功地處理衆多的相反意見。這種能力，顯示出毛澤東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情感。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人生的基本原則是：“氣可鼓而不可泄。”①

毛澤東那種在調動他人情感的同時，又可以控制自己情感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他的政治才華。但是，毛澤東更多的神秘之處只能從心理學方面得到解釋。我們將會看到，毛澤東的政治風格中充滿着各種各樣的矛盾。他把鬥爭與奮鬥理想化，但始終對批評和競

① 毛澤東：《對一封信的評論》，1959年7月26日。

爭很敏感。他一生都在抨擊權威機構不負責任，但他自己卻不願意承擔行使權力時所帶來的各種責任。他賦予獻身精神、忠誠、絶對服從以最高的價值，但他的行爲習慣卻極富靈活性甚至有所保留。他贊賞眞誠的兄弟情誼的理想，但多年來他卻一個接一個地拋棄了他最親密的同志。

確實，在我們能夠揭示這位很有特色的領袖人物的心理動力之前，我們需要更多地熟悉他明顯的性格特徵。首先，我們必須重視那些和他見過面的人的描述和一般印象。然後，我們需要確定毛澤東作爲一個公共人物的主要品質。只有當我們已經熟悉作爲成年人的毛澤東，並對他行爲的感情基礎的複雜性有了進一步了解之後，我們才有可能來考察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了解他的情感發展歷程，他的心理防範機制，以及他與別人相處的方式。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的生活經歷，開始于他的童年時代。因此，我們必須仔細考察他與父母、兄弟、姐妹、同學、老師，然後是和妻子、子女之間關係的性質。這些基本的人際關係，是偉人和普通人之間共享的類似體驗，他們提供了塑造個人品質和風格的情感戲劇。我們將講述的，是所有人都無法迴避的事情：在一個家庭里成長，學會與同輩人相處，建立自己的家庭，撫養自己的孩子。我們不會把考察僅僅停留在兒童時期，然後再去尋找孩童經歷與成年成爲之間的聯繫。相反，對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的考察，將包括他作爲兒子和作爲父親的整個人生旅程。這種考察，既有實際的理由，也有理論的考慮。要理解一個人對他自己童年的叙述，有一個做法是有益的，即將他有關父親如何對待他的描述，和他如何對待自己子女的記載聯繫起來。的確，比較一個人在童年時代所依賴的家庭（其作用遠不僅僅局限于塑造個人性格）和他成年之後所建立的家庭，對照其中的差異和相似之處，可以揭示出許多東西。

在我們完成對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的探究之後，我們將回過頭來研究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我們的目的，並不是對他一生的政治生涯進行再評價，已經有無數的傳記和歷史著作從事了這一工作。我們要集中考察的，是毛澤東的個性如何促成了他令人矚目的政治成

功。作爲一位政治上開創新紀元的人，他的偉大能力始終在于他對語言、思想的精巧把握和對權力的熟練控制。毛澤東是歷史上一位罕見的政治人物，既是思想家，又是戰略家。毛澤東在這些領域中的技巧似乎都直接與他的情感性格有關。

最後一個問題，是毛澤東能否留下某些持久而穩定的制度(eduring insitutions)。他是一個有創造力的人，這種創造力幫助毛澤東成爲一位思想家和戰略家。但其間的每一步發展，都極爲明顯地驅使他不斷拋棄自己的同事和朋友。這樣一來，作爲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毛澤東在把權力移交給副手時，總是錯誤百出。恰恰是因爲他人格特徵中的某些品質（這些品質正是他的偉大所在，我們將在隨後的研究中識別出這些品質），毛澤東始終不能將自己在推動中國革命過程中的一些偉大的創造性行爲制度化。

第二章 印象：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

毛澤東“偉大”特性的神奇魔力，嚴重遮蔽了他的普通形象，以至於人們幾乎很少用直接明瞭的詞語來描述毛澤東這個人。目前爲止，即使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的生活，仍然還是秘密。有關現代中國的最細緻、最謹愼的分析，大都傾向于力圖確定在各種政策轉向背後毛澤東扮演的角色。儘管如此，我們必須毫不畏懼地承認：有關毛澤東的私人活動，我們幾乎還一無所知。

有關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之形象的迷思，與有關他作爲私人角色之印象的隱密性，混和在一起。這種混和意味着，在開始探討這個偉人的內在品質之前，我們有必要通過那些見證人的語句來描繪他。値得注意的是，雖然毛澤東曾經生活在中國革命的漩渦中心，並成爲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受人愛戴和敬畏的領袖，但是，毛澤東波瀾壯闊的一生中的各種經歷卻幾乎沒有幾個見證人。作爲一個游擊戰士，毛澤東曾經待在江西的山溝里，繼而向偏僻的內地作退卻性的前進，最終在陝北的隱蔽的窰洞里落脚。從那個時候起，直到住在以前的皇帝們曾經沉浸于他們的私人歡愉的地方，享受着領袖權威帶來的那種隔絶與孤獨，毛澤東從來不刻意突出自己的個人形象。相反，在很多充滿戲劇性場景的情況下，這些表演活動本身遮蔽、模糊了毛本人的個性。

要對諸如毛澤東的體質特徵及其處事方式等微末問題進行客觀的描述，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爲，能夠結識一個像毛澤東這樣的偉人，這一事件本身就征服了幾乎每個見過毛澤東的人。因而，這些人通常只能描寫他們自己對這一經歷的主觀感受。譬如，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談及毛澤東如何運用權力以及對歷史的精通；安德烈·馬爾羅則講述了他所見過的一次有關措辭策略和言語合理化的演講；一個日本社會主義者代表團報告説，他們遇見了一個能夠理解他人、並且富有同情心的人。埃德加·斯諾曾經想方設法，努力進入延安，並帶回了西方新聞界有關紅軍以及他本人與毛澤東的會見的第一篇報到。自從斯諾的這一傳奇性經歷之後，就形成了一種傳統。人們把能夠見到毛澤東看作一件不同凡響的事，並認爲它能爲那些有幸被賜予接見的人增色不少。

當我們把那些見過毛澤東的人的各種叙述加以整理，甚至在充分考慮到那些人或者震懾于毛澤東的個人魅力，或者基于政治偏見等各種因素之後，我們肯定能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他們所談論的决不是同一個人，而是好幾個完全不同的人。在一些人看來，毛澤東似乎是一個高個子的人，身體健壯，充滿活力；也有人持相反的觀點：毛澤東身體柔弱，略顯佝僂，有些拘謹，而且寡言少語。在一些人的眼中，毛澤東開放而友好；反之，有些人則認爲，毛澤東是冷淡的，甚至孤獨的。一方面，毛澤東被描述成一個言辭尖鋭、刻薄，反應激烈，好爭辯的人；另一方面的印象則是，深思熟慮，爲人和藹，富有哲學天分。

因而，第一個結論很可能是：毛澤東是個很情緒化的人。毛澤東長征時期的一個警衛員的看法很客觀。雖然在毛澤東身上没有發現任何缺陷，但他曾經暗示，毛澤東的精神狀况經常隨着形勢的變化而起伏不定。[①]

其他一些與毛澤東長期接觸的人，曾經評論過毛澤東個人行爲中的某些悖論與矛盾。在正式會見一些高級領導幹部時，毛澤東經常會突然使用一些民間的俚俗用語。當一些人表現得一本正經、非常嚴肅時，毛澤東則表現得很隨和。當其他人對某些情形表示滿意時，毛澤東就會表達他的不滿，並號召人們進行鬥爭，以及做更多的努力。

在進一步仔細考察毛澤東的情緒化特徵和矛盾心理之前，我們應

① 陳昌奉：《跟隨毛主席長征》，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 年版。

該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這個事實就是，那些見過毛澤東的人描述的這些差異，相當精確地反映了毛澤東在其一生中不同時期所承擔的各種角色。看起來，毛澤東似乎是這樣一個人：任何時候，不管被賦予何種角色，他總能表現得輕鬆自如，恰當得體，而且合乎理想的標準。毛澤東逐步由一個鄉村小子，變成學堂少年，直到激進的知識分子、政黨組織者、游擊戰的領導人、共產黨的代言人和意識形態理論家，最終成爲一個民族的領導者和革命的象徵。在毛澤東的這一成長過程中，人們傾向于用不同的方式來描述他。

自從毛澤東還是一個試圖尋求年輕同學們的認同的無名鄉村少年那個時候起，蕭瑜就認識他了；也正因此，他成爲毛澤東最早的同學之一。蕭瑜曾經這樣回憶少年時代的毛澤東：

> “毛澤東的頭髮稍微向下垂過他的前額，就像古代的藝術家們描繪過的那些惡魔。但是，這種外表並不像有些人堅持的那樣，有任何不同尋常之處。他也沒有任何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特徵。實際上，就他的體貌特徵而言，我從未發現任何非同尋常之處。對我來説，毛澤東看起來總像一個普通人，有着常見的外貌。他的臉很大，但是他的眼睛卻既不大，也無神，沒有任何穿透力，更沒有人們有時候所説的那種聰慧、狡黠的神情。他的鼻子有一些扁平，屬於典型的中國人的那種形狀。兩個耳朵的比例搭配協調，嘴很小，牙非常白，而且較爲平整。這些美麗的潔白的牙齒幫助了毛澤東，使他的笑看起來非常迷人。因而，沒有人會想象到這一點——實際上，他並不是一個真誠的人。”①

幾年以後，毛澤東在師範學校經歷了他的青少年危機。此時的毛澤東，成了一個“不修邊幅”的人。那時候，他開始任由自己的頭髮瘋長，其長度甚至超過了今日中國的時髦青年。毛澤東給人以這樣的

① Siao 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61, p. 31.

印象，即不關注衣着服飾和物質財富。儘管第一次進入小學時，毛澤東曾經對自己服飾的質量還很敏感，但現在，就影響具有自由精神的學生和熱情而有抱負的知識分子們自然隨意、甚至衣着邋遢而言，毛澤東卻是一個帶頭的領導者。李銳是他那個時期的一個同學[①]。李銳寫到：

> "初入四師時，校中發了一套青色呢制服。這套制服他一直穿了幾年，到褪了色，穿了孔，還沒有換掉。除制服外，他還常穿一件灰色布長袍，冬天在里面加件舊袂襖，一條白大布褲，幾乎四季不變。同學們打趣地說他：'冬天用加法，夏天用減法'。夏天常沒有襪子穿，布鞋也是破的。他的被褥是湖南一般農家用的藍大布套被。棉絮又舊又硬（後來在長沙從事初期革命活動時，仍是穿這件灰布長袍和用這套棉被）。同學們都認爲他是一個特別'不修邊幅'的人"。[②]

自其少年求學時起，直到1949年達到政治權力的巔峰，毛澤東在這段時間始終穿着松松垮垮的棉布服裝。甚至當他成爲黨的領導人時，毛澤東也只是把衣服的顏色由黑色變爲灰白。[③]另一方面，在步入青少年時期的懶散隨意、不修邊幅狀態以前，毛澤東對自己的裝束曾經非常挑剔。有趣的是，一旦成爲現代民族國家的權威領導人，毛澤東就恢復了他早年的個性。此時，爲適應扮演一個值得尊敬的角色的需要，他再次講求服飾裝束。

實際上，早在毛澤東青少年時期的某些行爲中，就已經透露出某些將要標誌着他以後一生的性格特徵的痕迹。例如，李銳有關毛澤東

---

① 譯者案：此處有誤。毛澤東出生於1893年，李銳出生於1917年，二人不是同學關係。

② 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③ Jerome Chen, Mao and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210.

1913–1918年間在長沙求學情況的描述表明，甚至在那時候，將要成爲毛澤東晚年生活中非常突出的特點的那種疏離感和孤獨感，就已經很明顯了。星期天，其他學生可能會三五成群的集合起來，自已做飯、聚餐。“只有他打點冷飯冷菜，一人單坐一桌，悄悄吃罷了。”[①]類似的，毛澤東的另一個同學周世釗也回憶：毛澤東“在班上是一個很規矩、很正派、很溫雅的人。他走路不蹦跳，説話不粗率，時常正襟危坐，沉默寡言。”[②]

幾年後，毛澤東成爲游擊戰的一個領導者。儘管此前的描述充滿了溢美之詞和讚揚之語，但是，有關毛澤東這段時期生活經歷的敘述，已經提及了他的一些不好的習慣。毛澤東是一個煙癮很大的人，當他呼吸的時候，“會發出某種奇怪的聲響。對那些聽到這種聲音的人們來説，這實在令人不太高興”。[③]埃德加·斯諾則告訴我們，在延安的窰洞里，毛澤東是如何心不在焉地卷起他的褲管，“抓虱子”；還有一次，在一個彙報會議上，由於天氣太熱，毛澤東如何褪下他的長褲。[④]而那些在毛澤東已經成爲中國的統治者之後，才與他有過接觸的訪問者們，則對他安靜、高貴的氣質和優雅、得體的禮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些人注意到毛澤東身上的“讀書人”氣質。他們是在毛澤東已經從師範學校畢業以後，但又在他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成爲一個職業的政黨組織者之前認識毛澤東的。那個時候，毛澤東已經去了北京，並成爲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一名圖書管理員。在那里，他力圖融入周圍那些由學者和學生們構成的圈子中去。表面上看，其他人的觀察幾乎沒有提供什么證據可以表明，那時候毛澤東曾經爲自己的貧困而感到沮喪和自卑。哲學家胡適告訴我們，他如何碰見毛澤東，並

---

① 李鋭：《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頁。

② 周世釗：《第一師範時代的毛主席》，載《新觀察》，第2卷第2期，1965年，第11頁。

③ Jerome Chen, Mao and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211.

④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96.

把毛當作一個中規中矩的學生。

在生活的下一個階段，毛澤東開始了作爲一個職業革命家的生涯。在此過程中，毛澤東保持了激進主義知識分子角色的一些特性。他並沒有完全擺脫身上的那種鄉村氣息和未加修飾的學生品質。據稱，李昂曾經是中國共産黨的一個早期成員。他這樣描述 1921 年中國共産黨剛成立時，毛澤東的外表："他給我留下了一個很奇怪的印象。從他身上，我發現了一個農村青年的那種樸實和眞誠的品質。他脚踏一雙破爛的布鞋，身穿一套粗糙的長衫。在像上海這樣的地方，很少會碰見這樣一個人。但是，在他身上，我也發現了某種得體的行爲舉止，這種舉止方式與讀書人與社會名流的那種類型很相似。"① 張國燾是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參加者。據他回憶，當時的毛澤東"脫不了湖南的土氣，是一位較活躍的白麵書生，穿着一件長布衫。"②另一個熟人報告說："當時，毛澤東身着一襲長袍，脚穿一雙布鞋……當我和毛澤東一起開會的時候，我發現，他從來不第一個發言。通常，他會在會議快結束的時候站起來，總結大家的觀點，提出解決的辦法。"③

在革命事業的下一階段，毛澤東是個忙碌于工農中間的發動者和組織者。有關毛澤東這一時期的外貌描述又一次有了變化。1921 年以後，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在湖南安源煤礦開展了勞工運動。據曾經在那里工作過的兩個工人回憶，當時毛澤東穿得像一個普通勞動者，戴着一個草帽，褲子挽在膝蓋上，"像是在那里勞動回來。"④據稱，他常常"穿得和紅軍戰士一樣的衣服，只是比紅軍戰士的舊得多，背上還打了一個很大的丁字形補釘。［和一般工人那樣，蹲着吃飯，並用

① 李昂：《紅色舞臺》，重慶：勝利出版社，1942 年版，第 76 頁（譯者案："李昂"並非眞有其人，實際上是個化名。此處引文系據英文轉譯）。

②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 1 卷，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1971 年版，第 137 頁。

③ 尚山（音譯，Sheng Shan）：《我所知道的毛澤東》，《中華月報》（香港），第 718 期，1975 年 7 月 1 日，第 45 頁（譯者案：引文系據英文轉譯）。

④《毛主席在安源的時候·慰問烈士家屬》（烈屬譚昭蓮老太太回憶），《紅旗飄飄》，第 12 號，1959 年，第 149 頁。

筷子從地上的菜碗里面夾菜吃。]”[①]李鋭則告訴我們，毛澤東曾經自覺地研究了工人的行爲方式，仔細地觀察他們的行爲舉止。他試圖努力扮演着一個工人的角色，而不是把自己變成一個勞動者——因爲，那將會限制他進行宣傳鼓動工作的自由。按照李鋭的説法，“毛澤東同志最初接近工人，是下過一番苦功夫的。他常赤脚草鞋，戴草帽，穿粗布短褂，以便跟工人接近。譬如，爲了了解粤漢鐵路工人的情况，他曾在長沙北站的茶館中，同一些鐵路工人、搬運工人一連許多天一起喝茶，終于交到了朋友。”[②]

下一階段，毛澤東是游擊隊的領導者。現在，他的角色失去了那種難以與人民群衆截然分清的特性，而是承擔着負責發佈命令、進行指揮的領導任務。最初，毛澤東仍然扮演着工農兵的角色。但是，甚至早在1930年，他就被看作一個特别的人物，具有精英地位，不再是許多人中的一員。在描述閩西的一次爲紅軍送行而組織起來的群衆大會時，黨的一份工作通報這樣寫到：在向群衆講話的20多個人中，“除了朱德、毛澤東和一個台灣代表，其餘都是工人或者農民”。[③]隨着毛澤東在長征中的崛起，有關他的描述又變了。不論是批評家，還是贊成者，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突然發現：毛澤東行動果敢，精力旺盛；而且，他變得越來越表現出某種冷漠感，以及與其他人的疏離感。

長征以後，毛澤東成爲中國共産黨内的一個主導人物。人們再次開始從他身上發現一種“讀書人”的氣質，渾身洋溢着智慧之光，並透露出高超的决策藝術。此時，有關毛澤東外表的叙述突然又變了。在這個階段，目擊者們開始從毛澤東身上感覺到某種神秘的力量。在

① 《想念毛主席》（萍礦老工人吴友生講），《紅旗飄飄》，第12號，1959年，第155頁（譯者案：此處引文不確，[ ]内文字爲原文所無，系據英文轉譯補入而成）。

② 李鋭：《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頁。

③ 該通報發表在《紅旗日報》，第14號，1930年8月28日。參見Hsiao Tso-lian, 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0-1934: A Study of Docu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1, p. 36（譯者案：引文系據英文轉譯）。

他接人待物的那種冷淡、疏離之中，有一種魔力。埃德加·斯諾回憶了 1936 年，他在延安見到毛澤東時的第一印象。斯諾寫到：

> "我到達（延安）以後不久，就見到了毛澤東。他是一個瘦削的人，與林肯非常像。較之普通中國人而言，身材稍高，有一些佝僂。一頭黑髮，非常長。眼睛有神，能夠看透一切。鼻翼高聳，顴骨突出。他有一張就像讀書人的臉，透出非常精明的氣息。這些只是我眨眼間的印象。但是，我沒有機會利用幾天的時間來驗證這種印象。"①

隨着毛澤東作爲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日益爲人所知，他開始在偏僻、遙遠的延安窰洞中，接待越來越多的中國和西方記者。後來，其中的一個中國記者曾經這些描寫自己對毛澤東的第一印象：

> "身材頎長，並不奇偉。一套毛呢制服，顯見已是陳舊的了。領口是照例沒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畫那樣露着襯衣。眼睛盯着介紹人，好像在極力聽取對方的姓名。
>
> 談話時，依然滿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爲工作緊張的緣故，顯露疲乏的樣子。在談話中，簡直未見笑顏。然而，態度儒雅，音節清楚，詞令的安排，恰當而有條理。我們依次聽下去，從頭到尾是理論的説明，卻不是煽動性的演説。
>
>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先生。
>
> 聽取談話中，我有更多的餘暇審視他。濃厚的長髮，微胖的臉龐，並不是行動家的模樣。然而，廣闊的前額和那個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卻露出了貴族的氣概。一雙眼睛老是向前凝視，顯得這個人的思慮是很深的。"②

---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90.
② 趙超構：《延安一月》，上海：新民報社，1946 年版，第 60 頁。

1946年，英國記者羅伯特·佩恩（Robert Payne）在延安採訪了毛澤東。再一次的，他主要爲毛澤東學者式的外表而打動：

> “他已經53歲了，但是，看起來只有30歲。在英格蘭或者美國的校園中，你每天都會發現這樣的人……
>
> ……最終，眞正看一個人，應該是他的內在品質，而不是他的外表。去掉這些外表，毛澤東給人的全部印象是一位學者。他就像一個令人奇怪的、多變的變色龍，有着類似的優勢和弱點。而這些優勢和弱點正是來自于一種熱烈的學術研討。毛澤東爲自己設定的研究課程是——中國革命。”①

有關毛澤東健康狀況和身體活力的各種描述，也根據他生活的不同時期而不斷變化。幼年的毛澤東，身體瘦弱，容易生病。青少年時期，他則竭盡全力鍛煉身體，增強體魄。有許多次，他的身體狀況惡化了。有時候，這是由於他無法買得起合適的食物；更多的時候，是因爲他沒有時間來吃飯和鍛煉。還有幾次，在幾個值得注意的例子中，是因爲源自于“遭到輕視和忽略”而引起的緊張感，以及源于失敗與挫折的沮喪感。

儘管毛澤東仍然處于父親的影響之下，但是，就如我們即將看到的，他確實容易受到有關懶惰的指控。儘管如此，一旦毛澤東開始發現自我，他就經常表現出，自己可以爆發出聚精會神、全神貫注的巨大力量。埃德加·斯諾記得，在延安採訪的時候，即便他們一直談到深夜，毛澤東也沒有表現出絲毫的疲憊和倦息。斯諾還獲悉，毛澤東的習慣是每天工作大約十三到十四個小時。通常，毛澤東一直工作到凌晨兩三點才休息。②1944年，岡瑟·斯坦因（Gunther Stein）採訪了毛澤東。他們從下午三點一直談到凌晨三點，而毛澤東看起來仍然

① Robert Payne：Journey to Red China，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47，pp. 84–85.

② Snow，Red Star Over China，rev.ed.，New York：Grove Press，1968，p. 95.

“精神充沛，充滿活力”。[①]有關毛澤東旺盛精力的最富戲劇性的説明，是由他的貼身警衛告訴我們的。這個警衛員描述了毛澤東是如何寫作著名的論文——《論持久戰》的。據稱，他整整兩天根本都沒有合眼。到第五天，可以看出來，毛澤東變得有些瘦了。第七天，毛澤東仍然全神貫注地投入他的寫作中；由於沒有注意到自己的脚停留在炭火中，毛澤東甚至燒壞了他的脚指頭。第九天，毛澤東終于完成了這篇文章。[②]

當毛澤東第一次離開偏僻的延安，走出自己默默無聞的狀態，並承擔一個全國性的角色時，他就被看作一個能言善辯的發言人。在發言中，他可以運用自如地談及中國社會的各種因素，並且能夠爲之辯護。1945 年，內戰前夕，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當時的人們認爲，與蔣總司令相比，毛澤東更不計較那些虛僞的禮節與客套。而且，他也被視爲一個容易接近的、友好的人。[③]那時，共産黨正在追求各種“獨立的”以及非國民黨的因素，並用一套有關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全新理解的言辭來發表言論。儘管如此，幾乎共産黨人剛一贏得國家權力，毛澤東的公共形象就變成了一個遙遠、孤獨、不可觸及的決策者。

毛澤東權威風格的神秘光環的最終確立，是在他離開自己的國家，對莫斯科進行爲期近四個月的訪問期間。那個時候，距離毛澤東在北京獲取權力，並在以前皇帝曾經生活居住過的一個宫殿中安頓下來，還不到三個月。按照赫魯曉夫的回憶，當時蘇聯領導階層的那些精英們發現，毛澤東是一個猶豫不決、令人捉摸不定的領導者；這個領導者必須被取悦，但卻不能有效地表達自己的意圖。[④]但幾年以後，赫魯曉夫就改變了這種看法。毛澤東的決斷能力，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時，因爲“對任何人都不説好話”，毛澤東就“聽起來很像

① 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London, 1943, p. 83.

② 翟作軍：《在毛主席身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 10-17 頁。轉引自 Jerome Chen, Mao and Chinese Revolution, p. 209。

③ 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6, p. 237.

④ Nikita Khrushchev, translated by Strobe Talbot,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0, p. 462.

斯大林"。①

一旦毛澤東感到自己作爲中國國家領導人的角色已經確定下來，他的形象就立刻被納入造神運動之中。在神化毛澤東的過程中，他絶對被剝奪了作爲一個普通人的那些正常的性格特徵，而被塑造成一個抽象的象徵符號。這一符號在不同的場合之中會有不同的面孔。一切端賴于中國的媒體與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家們在不同時候强調的不同主題。在考察了毛澤東掌權以後的第一個十年之後，霍華德·伯爾曼(Howard Boorman）發現：稱毛澤東爲一個"被裝飾和塑造過的英雄"(a "lacquered hero")，是很恰當的。②

隨着這種神化原型越來越强烈的變化，那些見過毛澤東的人經常會驚訝地發現，眞實的毛澤東是一個善於言辭、充滿感情的人。1960年代後期，毛澤東的健康狀况越來越成爲一個引起世界範圍内的猜測的問題。那些見過毛澤東的人的描述，經常會主要地集中于有關毛澤東那種看來不很穩定的健康狀况。

毛澤東生命中的晚年時期的情况如何？在所有目擊者中，國務卿基辛格向索爾兹博格（Sulzberger C. L.）所作的描述可能最有意義。

"他（指毛澤東）大略有些胖。但是對於控制周圍的事物，他具有一種非同尋常的能力。由於他的安靜，戴高樂可以主導任何他所在的房間。類似的，毛澤東則通過他對人類意志力的感覺而做到這一點。

"我們只談了一小時多一點。我無法知道，毛澤東每天的有效的精神狀態，是否會超過兩個或者三個小時。但是，毛澤東確實傳達了一種讓人印象深刻的氛圍，即他擁有巨大的權力。最近，我重新溫習了一下我們談話的記録。我發現，這個談話就像瓦格納戲劇（Wagnerian opera）的一個

① Nikita Khrushchev, translated by Strobe Talbot,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4, p. 252.

② Howard L. Boorman, Mao Tse-tung: The Lacquered Imag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 1963. 10–12, pp. 1–55.

前奏。在隨後與周恩來的談話中，我們討論的每一個問題，都已經在先前與毛澤東的那次談話中提到了。”①

其他一些見過毛澤東的人也提及這種感覺，即毛澤東具有強烈的意志力；以及他孤獨、靜謐的品質。確實，毛澤東能夠使自己適應不同的角色，這種能力值得注意。當然，與此相近，還有另外一種能力。見過毛澤東的人也非常敏銳地觀察到這一點：他能夠控制自己的感情，並能向人暗示，在情緒方面，自己可以冷靜而客觀，超然于身邊那些直接的問題之外。

甚至當毛澤東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同學們就注意到他那“深沉嚴肅的行爲方式”。隨着毛澤東的成長，人們越來越爲他寧靜的外表而震撼。這種與人冷淡、疏離的品質，是與很少表現出來的、任何形式的感情與情緒結合在一起的。甚至當毛澤東成功地傳達了一種行動的願望並激起他人的情緒時，從個人角度而言，他看起來仍然還是處于戰略防守狀態，而非體現出進攻特性。並且，較之與其他人的關係，毛澤東與他自己的內心世界之間，有着更加密切的接觸。因此，安源煤礦的一個老工人曾經這樣回憶1920年毛澤東給自己留下的第一印象。

“當時全國的工人運動處于沉寂，而他卻如‘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那樣，胸有成竹，泰然自若。”②

在獲得領導位置以後，毛澤東對自己的感情表達進行約束和克制。這就強化了這樣一種印象：他具有偉大的智慧。毛澤東被看作這樣一個人，他不但能夠完全把握自己的情緒，還能充分地控制整個形勢。毛澤東安靜、鎮定的外表，以及他對自己情緒的明顯完美的控

① A. L. Sulzberger, The Age of Mediocrity: Memories and Diaries, 1963–1972, New York: Macmillan, 1973, pp. 7–8.

②《毛主席關懷安源工人》（萍礦老工人張明生講），《紅旗飄飄》，第12號，1959年5月，第151頁。

制，給曾經見過毛澤東的第一批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37 年 8 月，抗日戰爭剛剛開始，全中國籠罩着亢奮的激情。這時候，尼姆·威爾士（Nym Wales）——埃德加·斯諾的妻子——觀察到："毛澤東以一種鎮定的、提綱挈領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方式在演說，就像一個人在閱讀一本熟悉的書。他從不搖開眼前蓬鬆的、短而粗的黑色鬢髮。他也從不玩弄鉛筆或鋼筆。他粗壯而優雅的大手就像他的聲音一樣鎮定。"①

1938 年，英國的探險者懷利·克羅西·馬科斯（Violet Cressy-Marcks）在延安訪問了毛澤東。後來，他這樣描述對毛澤東的第一印象："與我見過的所有人不同，毛澤東耳朵的頂部特別平。濃黑的頭髮被從中間分開。他的手指非常細長。手的形狀長得也很不錯。他的舉止和聲音都很鎮定。我本來以爲他是一個這樣的人，即從外表上看，他就會給人以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印象……"②

1939 年，斯諾又一次見到毛澤東。這時候，他對毛澤東能夠控制自己的感情，表示出從未有過的震驚。"我發現，毛澤東住在一個'現代的'、有三個房間的窰洞'套房'中。這個窰洞建在黃土山上，離延安有幾里遠。我再一次注意到這個人非同尋常的反應。看起來，沒有什么東西可以使他發脾氣。逐漸的，毛澤東學會了一種和善、慈愛的處事方式。據稱，他遠不如蔣介石那般易怒。"③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某個情形越是充滿戲劇意味和具有劇場效應，那么，毛澤東就越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感情。在延安的那些年里，毛澤東形成了他公開演說的風格。充滿激情的言辭與冷靜、謹慎、不受激情影響的演說者，二者之間的對比在毛澤東的這種演說風格中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抗日戰爭期間，一個在延安待了好幾年的女記者這樣回憶她對毛澤東演說風格的第一印象："他的聲音不高，

① Nym Wales, Inside Red China,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 Co., 1937, p.276.

② Violet Cressy-Marks, Journey onto China,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42, p. 163.

③ Snow,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 Chinese Economic Political Stud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East Asia Center, 1957, pp. 71-72.

但他的鎮定、安靜卻抓住了每個聽衆的心。**這種鎮定和安靜，就像在他和這些聽衆之間沒有任何聯繫似的**。他的發言並不很長，但是人們都熱烈地鼓掌。"①

大約與此同時，克羅西·馬科斯見證了在延安的一個群衆大會上，毛澤東作的一個類似的表演：

> "我認爲，在我所見過的所有演説家中，**演説時根本不作任何的手勢、動作，毛澤東是唯一的一個。他把手背在後面，講了三個小時**。他沒有講稿，只是看着他的聽衆。禮堂外邊很黑，里面也只有一兩盞燈籠在講臺前面搖曳。禮堂的其他部分處于黑暗之中。在我的周圍，那些緊張面孔上的嚴肅眼神，從來沒有離開過毛澤東的臉。禮堂是如此之静，以至於就算有根針掉下來，我們都能夠清楚地聽得見。"②

通過直視來征服他人，以及能夠抓住個體、甚或群體的眼神，這些能力不但需要巨大的心理勇氣，還需要完全的決絶，以便能夠在穿透他人情感的同時，保護自己的情感免于受到他人的影響和誤導。這也是控制他人的一種高超的藝術。

在掌握了國家權力，並成爲一個半神化的英雄之後，毛澤東公開演説的風格仍然沒有變。每當面對一大群人，毛澤東就會變得與人距離很遠，沉默寡言。他成了一個孤獨的人物。在黨的秘密會議上，以及向領導幹部講話時，毛澤東的講話可能會是尖刻、諷刺、幽默的，甚至東拉西扯聊天式的。但是，這些年來，毛澤東越來越傾向于不作公開講話。我們知道，毛澤東不時地巡迴全國，視察各項工程，檢驗各種觀點，以及與人民政府的各級負責人交流意見。在這些場合，經

① 陳學昭：《延安訪問記》，香港：北極書店，1940年版，第133–134頁（譯者案：引文系據英文轉譯）。

② Violet Cressy-Marks, Journey into China,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42, p. 188.

常有大批群衆被動員起來聆聽他的講話。但是，幾乎總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選擇了向群衆招手，而不是對他們發表講話。1958年，毛澤東參觀武漢大學的例子就很典型：

> “毛主席視察了大學生們的工廠之後，來到了武漢大學的大操場前。等在這里歡迎毛主席的武漢大學、武漢測量製圖學院、武漢水利學院、中央民族學院武漢分院等四個高等學校一萬三千多師生員工中，爆發出滾雷般的掌聲和震撼山嶽的‘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珞珈山被搖動了。這些學校的負責人一一向毛主席握手問候。這些大學生們幸福地會見了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就在這個幸福的時刻，學生們看到了我們親愛的領袖的那副健康而紅潤的容顏，慈祥的笑容和走去路來穩健的步伐。人們不約而同的感覺是：毛主席多么健康啊！
>
> “毛主席走上行政大樓前的台階，向全體師生員工們舉手答禮。這是一個多么幸福的時刻啊！多少雙眼睛里含着激動的熱淚，多少顆激動的心劇烈的跳動着。這時候，能說什么呢？大聲的喊吧：‘毛主席萬歲！’……毛主席向歡呼的人群招手致意之後，離別了。於是，掌聲、歡呼聲中又響起了嘹亮的歌聲：‘東方紅……’”①

只有在人數較少的情況下，毛澤東的演說才會引起積極的反應。毛澤東尤其善於通過作一些略帶玩笑性質的評論，來“解放”那些來訪者們的緊張神經。1945年，毛澤東在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當時，毛澤東曾會見了兩對年輕夫婦。其中，一對是工廠工人，另一對則是以農業爲專業方向的大學生。當這兩對夫婦被引見給毛澤東的時候，他帶着微笑，回答說：“噢，兩對夫妻，四個青年，兩個學農，兩個作工，那你們是‘工農聯盟’，很好很好！”正如這些年輕人後來

① 原載《湖北日報》，1958年9月20日；後收入《毛主席在湖北》，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3–54頁。

回憶的那樣："毛主席的話，一句一句地慢慢説着，逗得全屋子的人都笑了。"①

與毛澤東有過私人會見、甚或會餐的一些人告訴我們，儘管在表現一種大範圍的明顯感情方面，毛澤東的能力很強；但在這樣做的時候，毛澤東通常很匆忙，以至於有些人因而懷疑，就感情表達而言，毛澤東傾向于使之充滿戲劇性的表演色彩，並有點兒矯揉造作。

1928 年，龔楚曾在江西碰見過毛澤東。他這樣回憶毛澤東當時的戲劇性舉止：

> "吃飯的時候，毛澤東經常面帶微笑。當談及將來的美好前景，他總會開懷大笑。但是，一旦説到眼下的經濟狀況和食物問題，他的表情就變得充滿憂慮，表現出某種哀傷的神色。當提及黨中央如何對他作出幾次警告的時候，毛澤東就顯得非常發怒。當時，黨中央批評他進攻平江和瀏陽，指責他這是'軍事冒險主義'，認爲他是'一個不願意發動群衆的機會主義者'。當他帶領軍隊撤到井岡山的時候，他被稱爲一個'脱離人民群衆的逃跑分子'。毛澤東攥緊了拳頭，抱怨中央負責的領導人，認爲他們只知道空洞的説教，而不了解實際的情勢。他的行爲舉止暗示出，直到能夠報復他們爲止，他自己不會滿意。我感覺到，就行動能力而言，毛澤東有一種天賦的資質。在很短的時間内，他就展示了喜怒哀樂等各種感情。"②

毛澤東總是對戲院這樣充滿戲劇性表演情境的地方有一種偏好。顯然，在一個安全的、帶有表演性質的環境下，他非常喜歡能夠自由地對待自己的感情。趙超構告訴我們，在戲劇性的表演中，毛澤東是

① 蒲公英：《青年的引路人——記 1945 年在重慶見毛主席》，《紅旗飄飄》，第 10 號，1959 年 1 月，第 21 頁。

② 龔楚：《參加中共武裝鬥爭紀事》，《明報》，第 6 卷第 11 期，1976 年 11 月，第 98–99 頁（譯者案：引文系據英文轉譯）。

如何變得活潑起來，並“開懷大笑”。①羅伯特·佩恩也見過毛澤東的戲劇性表演。他不斷地“咯咯笑，幾乎笑得肚子疼”，或者採取一種充滿敬意的姿態：

> “只是在很少的時候，毛澤東才不打算笑得從椅子掉下來。那個時候，你會注意到，他的兩手合在一起，那種態度就像一個正在祈禱的人。他的表情是嚴肅的。你會困惑，此前你曾經在某個地方看到過這種表情。然後，你想起來了。在他的第一次宴會上，這個男孩立刻變成了異教徒大廳中的一個傳教牧師。他將立即作一個演講，並要求在場的每一個人，不要忘記感恩節的祭獻。”②

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説，戲院是最流行、最大衆化的娛樂形式之一。共產主義制度通常主張禁欲。但確實，戲院是禁欲的共產主義中國允許的、以前各種大衆娛樂保存下來的僅有的少數幾種形式之一。因而，毛澤東對舞臺表演的偏愛，看來可能不過是使之成爲中國文化的一個典型代表而已。但在毛澤東的統治之下，戲院被賦予如此的合法性；甚至，就在他自己準備登上新中國政治舞臺的時候，毛澤東還娶了一個女演員。這兩個事實確實暗示出，毛澤東對戲院懷有某種特殊的感情。

儘管在中國革命的諸種民間傳説中，人們廣泛認爲，毛澤東可能會有雷霆之怒。但重要的問題在于，沒有證人可以提供有關毛澤東無法抑制的憤怒的任何場景。儘管如此，我們確實有一些證據。這些證據暗示了，有時候毛澤東欺騙或者隱瞞自己的情感。因而，斯諾曾經這樣告訴我們：“我自己從未見過他發怒，但我確實聽其他人説過這一點。有好幾次，毛澤東曾經被激起強烈的、極具毀滅性的憤怒。據稱，在這樣的場合，他的尖酸諷刺和惡毒謾罵的本領，是相當經典

① 趙超構：《延安一月》，上海：新民報社，1946年版，第63頁。
② Payne, Journey To Red China,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47, p. 49.

的，並且是致命的。”①羅伯特·佩恩則告訴我們，他看見：爲了強調對那些支持國民黨的外國人的憤怒，毛澤東作出一個“激烈的姿態——他伸出握緊的拳頭”。②對有些人來説，毛澤東性格中的這種易怒脾氣和多變情緒，使他看起來有些許程度的女性化特點。

確實，毛澤東的許多觀察者——不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都注意到，不止是毛澤東情緒變化的行爲方式，甚至就連他的體貌特徵也透露出一定的女性特點。譬如，阿格尼斯·斯沫特萊（Agnes Smedley）這樣描述她在延安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的情形：“這個高大的、難以接近的人物略顯笨拙的向我們走來，並用一種較高的聲調來歡迎我們。兩只大手抓住了我；這兩只手就像一個女人的手那樣長而敏感……他的黑色的、難以捉摸的臉有些長，前額稍高，而嘴則是女性化的……實際上，我對他身上的那些女性化特點有些反感……”③後來，斯沫特萊曾經將朱德與毛澤東作過對比。在她看來，朱德就像一個運動員，容易跟人接觸，活動很積極；而毛澤東，則有着“愛好沉思的古怪念頭……（他的）敏感與本能式的反應，幾乎就像一個女人……”④安德烈·馬爾羅則對他與毛澤東的見面作了這樣的講法：“我去向他道別，他伸出一只手。這只手幾乎是女性的，手掌粉得就像剛被燙過。”⑤

許多人也注意到，到他晚年的時候，毛澤東的握手變得越來越沒有力量。1950年代末期，一個駐北京的外交官對毛澤東缺乏活力的握手感到驚訝。他覺得，“他（指毛澤東）的手似乎沒有骨頭”。⑥當然，在中國文化中，輕柔的、而非過于有力的握手是一種習慣。但是，毛澤東似乎夸大了輕柔的特質。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94.

② Robert Payne, Mao Tse-tung: Ruler of Red China,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0, p. 225.

③ AgnesSmedley, BattleHymnofChina, NewYork: AlfredKnopf, 1943, pp.268-269.

④ Agnes Smedley, 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h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6, p. 226.

⑤ Andrew Malraux: Anti-Memoirs, New York: Holt, Reinhart and Winston, 1968, p. 372.

⑥ 這則材料來自于作者和一個曾經在1950年代駐北京的外交官的私人交流。

非常突出的，毛澤東走路的方式看起來似乎也是非男性化的。一個前上海商人這樣回憶 1955 年 12 月與毛澤東的會面："對一個中國人而言，共產黨主席的身材有些高。他長得有些胖，態度溫和。與那些通常的畫像暗示的年紀相比，他眞人更加年輕。他的行動很緩慢。走路的時候，脚尖翹起，步子很小。對他略顯蹣跚、笨拙的走路姿勢而言，毛澤東兩臂搖擺的幅度似乎超過了正常的需要。"①這不只是年齡增長的結果。因爲，甚至在高中時代，毛澤東走路的姿勢就使人們想起，那些纏足的中國婦女們緩慢、但挪動迅速的運動。蕭瑜曾這樣告訴我們："他（指毛澤東）走得非常慢，還有些'外八字'，這使人們想起一只蹣跚而行的鴨子。不論是坐下還是起來，他的動作也非常慢。"②

在這些觀察中，我們以後會發現更多的意義。這里我們只需要注意到，在我們時代最偉大的革命者身上，存在一些非常神秘的現象。一方面，他是一個戰士，一個充滿激情、勇于行動的意識形態專家；但與此同時，他似乎也是一個溫和的人，行動消極，缺乏活力。這種神秘的、充滿兩極對立與矛盾衝突的特點，很可能是熟悉毛澤東的人在他身上發現的最突出特徵。毛澤東的另一個早年同學蕭三，是蕭瑜的兄弟。他曾坦白地告訴羅伯特·佩恩："毛澤東是我們當中最複雜的一個……對於他，沒有人眞正的理解過。我比任何人認識他的時間都長，但是我也從來沒有達到他的內心深處。"③毛澤東自己似乎欣賞自己能夠傳達某種神秘、歧義和曖昧的能力。尼姆·威爾士告訴我們："在延安摩肩接踵、人群密集的世界中，他確實就像奥林匹亞山上的一個神秘人物。當你晚上去拜訪他的時候，事情看來就像與一個神秘的希臘預言家進行幽會一般，充滿各種細節和禮儀的苛求。"④阿格尼斯·斯沫特萊是在毛澤東變得幾乎完全不可接近之前，了解他的另一

①Robert Loh, Escape from Red China,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2, p. 179.

② Siao 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61, p. 31.

③ Payne, Journey To Red China,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47, p. 122.

④ Wales, Inside Red China,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 Co., 1937, p. 276.

個西方女性。她注意到，儘管就個人而言，自己對毛澤東“身上的女人味兒”有些反感，但是，那些“開始對毛澤東變得非常熟悉的少數幾個人，都對他表現出濃厚的感情。儘管如此，毛澤東的精神氣質仍然停留在他的內心深處，與他的外表相分離”。①蕭三曾經告訴佩恩：“在毛澤東身上，有一種從來沒有向任何人披露過的神秘精神。”②作爲對此的回應，斯沫特萊進一步評論到：“我有一種印象，在毛澤東的內心深處，有一扇門。這扇門他從來沒對任何人開啓過。”③

儘管延安時代的毛澤東，是他一生中最容易讓人接近的時候，但佩恩仍然對此作過這樣的描述，即“與人疏遠”，“不可接觸”和“孤獨。”④這種與人保持距離的孤獨以及神秘的特點，甚至在毛澤東與他妻子們的關係中也存在。從他的第二任妻子賀子珍那里，我們沒有發現任何直接的證據。儘管如此，在記録毛澤東自傳性的回憶時，埃德加·斯諾觀察到：“在毛澤東對他的過去進行回憶的過程中，我注意到，有一個聽衆至少和我一樣對此表示出興趣。那就是他的妻子——賀子珍。顯然，毛澤東講述的有關他自己以及共產主義運動的許多事實，她以前從來沒有聽説過。實際上，對毛澤東在保安地區的許多革命同志來説，這也是眞實的。”⑤在斯諾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的1936年，這是眞的。到那時候，毛澤東已經和賀子珍一起生活了八年之久。

1967年，也就是大約三十年以後，或者説文化大革命的巔峰時期，江青曾在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過這樣一段發言：

“主席對我是嚴格的，主席對於我首先是嚴師。當然，

---

① Robert Payne, Mao Tse-tung: Ruler of Red China,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0,, p. 37.

② Robert Payne, Mao Tse-tung: Ruler of Red China,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0,, p. 37.

③ Smedley, Great Road , 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h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6, p. 170.

④ Payne, Mao Tse-tung: Ruler of Red China,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0,, p. 217.

⑤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50.

他不像有些人把着手那樣教，但是對我非常嚴格。許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爲人，我想同志們也許比我知道的更多一點。我們在一塊生活，他這個人是很寡言的，話不多。”①

最重要的是，當毛澤東已經有機會談及自己個性的時候，他用各種方式表明了潛在于他內心深處的矛盾心理。譬如，1965 年 12 月 21 日，在杭州的一次坦率談話。當時，毛澤東注意到：“馬克思的資本論，從分析商品的兩重性開始。我們的商品也有兩重性。一百年後的商品還有兩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兩重性。我們的同志也有兩重性，就是正確和錯誤。你們沒有兩重性？我這個人就有兩重性。”②

毛澤東將自己內心中的矛盾心理這一個性歸結爲一系列衝突。這種衝突發生在自信和自我懷疑、以及堅強的力量和頑皮的詭計之間。後來，毛澤東給他的妻子江青寫過一封信。在信中，他以一種相當客觀的方式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即他自己的個性中有着強烈的自信感。這種自信通常足以征服他內心中殘存的那些自我懷疑因素。很大程度上，這是由於在自信與懷疑二者各自的天平上，毛澤東佔據的份量比其他人更大，表現得也更明顯：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説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爲主。也有些猴氣，是爲次。”③

毛澤東在“虎氣”和“猴氣”之間游移不定，充滿了矛盾心理。

① 江青：《爲人民立新功》，1967 年 4 月 12 日。

② 毛澤東：《在杭州的講話》，1965 年 12 月 21 日。

③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 年 7 月 8 日。1972 年反對林彪的運動開始時，這封信曾經在黨的各級領導幹部中傳達。有關這封信的各種版本，可見于 Issues and Studies, Vol IX, No.4, Jan, 1973, p75; 《星島日報》，香港，1972年 11 月4 日。

前者是強大、自信和征服等諸種個性的象徵，後者則代表了頑皮、古怪、不受約束和好動易變的精神。看來，再一次的，毛澤東自己的語言相當準確地抓住了他的情感結構。儘管西方人習慣于視獅子爲百獸之王，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理解中國文化。在中國文化中，老虎——而非獅子——被冠以百獸之王的角色。可能需要解釋的，是猴子在中國人的想象世界中佔據的位置。在中國民間傳說中，一個最偉大的故事的主角，就是一只神奇的猴子。這只猴子有着神奇的魔力，可以千變萬化。因此，他就成了一個敏捷好動的冒名頂替者，總愛以僞裝的面目出現。他也是一個調皮的精靈，可以到處飛來飛去。他的現身和隱形並沒有持久的熱情，但卻有着最大程度的戲劇化效果。毛澤東在他的詩詞中，就曾提及對美猴王的同情式理解。①

藉助人類學者盧斯·本澤爾（Ruth Bunzel）有關研究成果，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瑪莎·沃爾夫斯坦因（Martha Wolfstein）總結了對那些像毛澤東一樣，伴隨着有關美猴王的各種傳説而成長起來的中國人來説，這只猴子的形象對他們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 "猴子有着超自然的起源。儘管如此，他的個性卻是非常人性化的，總愛冒犯人，且自以爲是。猴子非常有自信心，無所畏懼，行事魯莽，對於各種活動有一種強烈的冲動。因爲沒有地位差别觀念，也沒有與身份相應的恰當行爲觀念，更沒有至少是臉面或'面子'（face）的感覺，因而在向上級説話的時候，他也會非常坦白，毫無隱諱與禁忌地説出自己的意見。因爲非常聰明，所以自打出生以後不久，他就學會努力用各種力量來武裝自己。而這些力量，對於確保他在任何鬥爭過程中取勝，都是必需的。他爲自

① 1974年夏天，與"批林批孔"運動相聯繫的是往墻上貼大字報。當時，有一系列大字報貼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所在地的外墻上。這些大字報批判了當地的領導人，指責他們沒有正確地遵循毛澤東的革命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大字報上署名的，就是"美猴王"孫悟空。

己的高超體力與智能水平而深感自豪。他相信，這些體力與智能授予他在宇宙中處于一個主導位置。他的正義感與公平感，正是建立在這種信仰之上的。對威望與權力，猴子有一種無法滿足的慾望。”①

在給妻子的信中，毛澤東曾提及：自己的個性中存在着衝突；這兩種相互衝突的因素分別是他自以爲確信的“虎氣”，和自發隨意、在感情方面自由放任的“猴氣”。他解釋説，當其他人沒有認識到一個在道義方面具有優越性的人的優點時，人們並沒有恰當地理解這個道義上的優越者所經歷的痛苦。毛澤東的這一作法表明，他在自信心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負擔。毛澤東向他的妻子寫到：

“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黄瓊信中的幾句話：‘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②

這樣一來，毛澤東的自我評價就爲其他人的看法提供了進一步的佐證。人們認爲，毛澤東是一個充滿矛盾心理的人。在某些方面，毛澤東嘲笑他周圍的環境；但在另一些方面，他又對其他人對自己的看法極度敏感。此外，他特别善於“鼓舞、調動”觀衆的期望。在這些有關毛澤東自信外表的各種線索背後，隱隱約約地潛藏着一些不確定的因素。實際上，這種不確定性是有關其他人是否眞正理解了這樣一個現象，即毛澤東本人希圖相信的、構成他自己内在的優良品質的那些因素。這樣，我們就超越了一般印象的層次，而趨向于尋求更深層次的解釋。但在開始考察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的有關印象之前，我們還有必要初步了解一下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的某些印象。

① Margaret Mead and Martha Wolfstein, ed., Childhood in Contemporary Cultur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246.

②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第三章　印象：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

表面看來，描述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較之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之印象，似乎更加容易。因爲中國的公共媒介組織，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媒體之一。當這些媒介把關注焦點集中于毛澤東的公共角色時，他的私人生活將會變得很模糊——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但充滿悖論意味的是，有關毛澤東的傳說以一種非常奇怪的方式，有效地掩蓋了他作爲一個公共事務的決策者，而非其作爲私人角色的眞實形象。圍繞着作爲革命舵手的毛澤東，人們曾建構起各種政治神話。這些神話還編織出一個近乎封閉、密不透風的大鼇，使我們難以廓清中國政治體系的實際運作狀況。

不特此也。儘管有材料可以揭示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之早年印象，譬如他自己向埃德加·斯諾提供的自傳性叙述，以及許多親歷者有關他在各種非正式情境中的角色之見證等。但是，我們仍缺乏毛澤東和他同事們的完整回憶，以便可以揭示出毛澤東的實際政治角色。據説，新中國的各種積極事物，無不源自于毛主席本人的性格特徵及其思想觀念。毛澤東自己就暗示，由於“三千年帝王崇拜思想傳統的習慣”，對他的個人崇拜可能已經被夸大了①。但隨後，他也維護了這種創造神話傳說的運動。毛澤東注意到：“赫魯曉夫之所以會失敗、垮台，恰恰可能是由於他一點兒也沒有個人崇拜”②。

毛澤東的神話，不止是阿諛奉承的追隨者與新中國的宣傳家們的杰作。全世界的學者和評論家們都同意這樣的看法，即在中國革命

① Edgar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p. 170.
② Edgar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p. 170.

中，毛澤東留下了他充滿個性的烙印；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特殊性源自毛澤東個人的天才。但經過反思，這一點應該是不證自明的，即如果認爲單單一個人的意志與精神就可以影響整個現代中國的歷史，那無疑是不現實的。

其他一些學者更加謹慎。他們對毛澤東在現代中國革命史中起的作用進行了限定。在他們看來，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大部分歷史可以被描述成這樣一種過程，即毛澤東與那些和他政治觀點不同的人們的鬥爭。但即便這種看法，也是得自于文化大革命中令人訝異的鬥爭漩渦的啓發。所以，這一看法就受到某些傳説中的資料的玷污。因爲這一看法強調作爲一種意識形態的“毛主義”（Maoism）的內在連續性，而不注重“毛主義”是作爲一個公共人物的毛澤東，在其整個革命生涯中形成的一個錯綜複雜的結合體。從那些非中國人的、有關作爲一種意識形態的“毛主義”的諸種看法的角度來説，事情看來可能是這樣的：作爲一個政治人物，毛澤東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一個可以爲了革命而革命的信徒，以及一個完全無法認同任何實際考慮的烏托邦主義者。

譬如，在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詳細叙述中，斯坦利·卡爾諾（Stanley Karnow）曾指出一個重要事實，並由此總結了毛澤東的風格。卡爾諾發現的這個事實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毛澤東從來就未曾爲了實現某些精確的目標，而勾勒過一個清晰、實際的計劃。相反，他鼓動追隨者們去反對自己的政治對手。這樣，在遙遠的未來，在某個無法確定的階段，一個未加限定的烏托邦就可能會出現”①。羅伯特·S·艾黎珍特（Robert S. Elegant）的理論假定是：“毛澤東迷戀宏大的理論與超越性的政策”②。羅伯特·J·理夫頓（Robert J. Lifton）則將文化大革命解釋爲，正在老去的毛澤東對死亡做出的反應。更確切地説，“毛澤東的終極恐懼——亦即正在悄悄地、偷偷地靠近他的毀滅景象——就是革命的死亡或終結”。因爲，對毛澤東而

① Stanley Karnow, Mao and China,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2, p. 7.

② Robert E. Elegant, Mao' s Great Revolution, New York and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 1971, p. 62.

言，“革命”本身就已經成爲一個“神聖的事物”[①]。

大多數作者都會同意鮑大可（A. Doak Barnet）的這種看法，即在作爲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毛主義”與毛澤東的個人特性之間，存在一定的區别：

> “爲了確定毛澤東有關革命發展的策略，以及那些被假定爲曾經激發了他革命行動的基本假設、傾向性意見、價値觀與奮鬥目標，人們曾經使用了許多標籤。所有這些標籤都失之于過于簡單化，因而，沒有一個能夠讓人完全滿意。儘管如此，他們中的大多數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譬如，革命民族主義、理想主義、激進主義、浪漫主義、民粹主義以及平等主義等詞語，對於揭示毛澤東思想中的不同特徵是很有裨益的。但是，當這些標籤被用到毛澤東身上的時候，每一個都在某些方面表現出一定的誤導傾向。”[②]

正如米歇爾·奥克森博格（Michael Oksenberg）觀察到的那樣，這些標籤之所以會誤導人，部分是由於毛澤東一直在“試圖調解現代化時期的各種衝突，譬如平等主義與産業主義、自由信念與官僚制度，以及參與和秩序等”[③]。這種夸大毛澤東在以上矛盾中的個人偏好的傾向，在某些嘗試中變得很明顯。譬如，有人試圖將文化大革命解釋爲“毛派”與“劉派”“兩條路線”之間的鬥爭[④]。

---

①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19.

② A. Doak Barnett, Uncertain Passage: China' s Transition to the Post-Mao Era, Washington, D. C.: Brooking Institution, 1974, pp. 8-9.

③ Michael C.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under Mao, 1948-1968: An Overview, in John H. Lindbeck, ed., 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1, p. 83.

④ 有關毛澤東和劉少奇思想觀點差異的各種分析中，一個最嚴格的嘗試可能是由 Harry Harding 做出的。See: Maoist Theories of Policy-making and Organization, in Thomas W. Robins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 113-164。

但是，試圖通過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現象來發現“眞正”的毛澤東，這樣的嘗試不得不依賴于一些間接的證據。因爲，“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從未作過任何“一次公開的聲明”①。確實，如果能夠將文化大革命時期從我們的記憶中完全抹掉，我們就會擁有一個作爲政治人物的、完全不同的毛澤東形象。因而，問題遠非是對共產黨組織的不信任。畢竟，正是毛澤東，在1920年代就曾反對過第一批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毫無紀律、脫離實際的領導。他尤其反對李立三的領導，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説，李立三“不承認革命需要主觀組織力量的充分準備”②。後來，也正是毛澤東，通過1942-1944年的整風運動，才成功地使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剋化③。

不僅如此。“毛主義”的意識形態不但強調革命的激情，也重視獨立、自主。但是，也正是毛澤東自己，在獨立奮鬥了多年、並贏得國家權力之後，匆匆飛往莫斯科。這次對莫斯科的較長時期的訪問，發生在中國革命勝利以後不久，目的是爲了尋求盟友和幫助。對其他任何一個新近剛剛獲得獨立的非洲與亞洲國家的領導人來説，在甫一掌握政權之後不久，就爲了與一個潛在的庇護人進行談判而長期離開自己的國家，這都是不能想象的。但是，根據赫魯曉夫的説法，毛澤東曾公開地向斯大林和其他蘇聯領導人表示他對依賴與自主問題的矛盾心理④。在中國領導人的內部會議上，毛澤東本人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自尊爲代價，堅持認爲：中國應該實行“一邊倒”的政策，並接受蘇聯“老大哥”的指導。

最重要的是，作爲意識形態的“毛主義”，不應該被視爲毛澤東政治思想的一種指導。因爲，正是毛澤東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後期終止了激進的“毛派分子”與紅衛兵的活動。最後，正如他曾經在幕後

---

① Robert E. Elegant, Mao' s Great Revolution, p. 447.

②《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共産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1945年4月20日（譯者案：可見于《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9頁）。

③ Boyd Compton: Mao' s China: Party Reform Documents, 1942-194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2, Chapter Ⅰ.

④ Khrushchev, The Last Testa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4, p. 240.

影響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決策活動一樣，在決定邀請尼克松總統訪華、進而開創一種與美國的新關係背後，我們也可以發現毛澤東的影子。

總之，跟他在中國激進的、烏托邦的努力方面起的作用類似，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在中國日益鞏固的、“實用主義的”政策方面，同樣也很積極、活躍。因而，甚至在追尋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的某些最初印象方面，我們也應該避免這樣的錯誤，即僅僅通過大衆理解的“毛主義”來認識他。對毛澤東來説，他的政治風格不僅僅是對革命的讚美，對平等主義、自發性與民粹主義的激進精神與無限信仰，對農民和未受教育者的信任，對城市生活方式、正規教育以及官僚管理過程的不信任等。實際上，毛澤東的政治風格包含着着比以上更爲豐富的內容。儘管如此，這些因素仍然都是他爲中國政治留下的遺産。

因此，爲了尋求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的某些初步印象，以便指導我們對他的心理進行分析和研究，我們感興趣的就不止是隱含于“毛主義”之中的毛澤東精神。儘管如此，我們仍然需要一幅圖畫。較之毛澤東作爲舵手的那些傳説所提供的形象，這副圖畫將更加精確，且高度集中。

我們需要掌握毛澤東的一些行爲方式。通過這些方式，甚至在他作爲一個“實用主義的”、精明審慎的決策者時，毛澤東的個性仍然影響了他的選擇。因而，我們關心這樣一些內容，即他處理權力問題的風格，運用策略的行爲方式，以及對特定行動的利用。用一個術語來説，我們感興趣的，是被有些人稱之爲“行爲符碼”（operational code）的某種東西。在能夠理解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與他作爲一個公共人物這兩個角色之間的關係之前，我們需要描述毛澤東作爲一個決策者的某些獨一無二的特性。而這，需要依據一系列較爲一般化的、普遍的主題。對於理解任何一個偉大的政治人物而言，這些主題都是合適的。

統一，還是矛盾？

提及任何一個政治領導人的世界觀，有一個必須要問的關鍵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他是否努力使自己的聲明與政策保持一致，並在自己的基本推理模式方面保持精確，且符合邏輯；或者，他是否傾向于很容易就轉變自己的立場，並認可這樣的需要，即尊重處于不斷變化中的各種情境的現實狀況；以及，在自己的思考中，是否非常能夠容忍各種模糊與矛盾？

明顯的，毛澤東屬於這樣的一批人。他們相信，一致性是任何細微思想中一個調皮的搗蛋鬼。在整個革命生涯中，毛澤東不斷改變自己的立場，並就各種矛盾的現象表達意見。對這種角色變化，毛澤東覺得很容易做到，且經常是令人愉快的。確實，20 多年來中國的各種政策呈現出 Z 字形搖擺。看起來，這種搖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對“矛盾”這一概念的困惑。就此而言，一些學者的觀點非常能夠讓人信服。他們辯稱，毛澤東政治思想的最突出特徵，就是他對矛盾觀念的迷戀①。

當然，毛澤東不但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列寧主義者。因而，他被期望能夠在策略方面靈活一些，並尊奉一種辯證的歷史觀。在自己的哲學作品中，毛澤東很大程度上集中于矛盾問題。重溫他對“矛盾”這一概念的使用，我們會認識到：毛澤東對“矛盾”概念的迷戀，遠遠超過了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而這種認識，無需我們訴諸于任何有關個人風格的特殊視角。而且，毛澤東的“辯證”概念，有時具有非同尋常、獨一無二的特性。確實，在特定程度上，這種獨一無二性會使他的“辯證”概念看來似乎有些不太那么符合馬克思主義。譬如，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沒有什么東西會爲人們提供

① Benjamin Schwarz, Ideology in Flux,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02–113; Stuart Schram, ed.,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40–50.

一種如毛澤東向黨的幹部解釋過的那樣一種觀念。他聲稱："又怕又不怕，又高興又不高興，問題解決又不解決，這就是辯證法。比如打仗，開始提心吊膽，越打下去越大膽，沒有幾次路線錯誤，就不會現在這么好。"①

在其他一些論述中，毛澤東揭示了同樣的傾向，即將"好與壞"、"熱與冷"、"老與少"等每一對相反的觀念，視爲與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概念同屬於一類。但令人尷尬的是，毛澤東始終堅持把辯證唯物主義的矛盾觀，與那些構成中國傳統思想基礎的、由相互對立的觀念組成的"對子"聯繫起來。確實，在同一段落中，他不再闡明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對立觀的看法，轉而引用傳統中國的一些哲學家的作品。在這樣做的時候，毛澤東似乎已經認識到，自己對中國古典的思考方式相當迷戀，近乎成癮。他說："天、地是對立的統一。好的東西不要字數太多，老子一輩子只寫了五千多字。"②更有甚者，毛澤東充滿激情地歡迎任何有關"矛盾的對立統一"的例子。這種激情表明，對任何一對矛盾，他都抱有一種良性的、積極的看法。這種看法，更符合中國傳統思想中有關"陰陽協調"的"和諧（合和）"觀，而不是隱含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觀念中的那種"衝突"觀。

毛澤東偶爾也曾經明白地說過，中國傳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是一致的。因爲，中國傳統中不但包含了有關對立面的和諧共存思想，還包括有關矛盾不平衡發展的動力機制。而後者，在毛澤東看來，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矛盾與辯證理論的本質。他聲稱："人心總是不齊的，不平衡的規律是宇宙發展的發則。孟夫子說過：'物之不齊，物之惜也。'人心不齊，又可以齊，有曲折，螺旋式的前進。"③

但是，如果認爲毛澤東的矛盾概念僅僅是中國傳統觀念的某種現代復活，那也是不對的。毛澤東自己作過大量的修正。譬如，中國古典思想認爲，所有的對立面都是生動的、鮮活的，不可轉變的，是持久存在的差別的兩個極端。與此不同，毛澤東相信：任何事物的少量

---

① 毛澤東：《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4月。
② 毛澤東：《在武漢和各協作區主任的講話》，1958年11月30日。
③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27日。

積累，都可能轉變成它的反面。

> 苦戰與休整的對立統一，這是規律，而且是互相轉化的，沒有一種事情不是互相轉化的，“急”轉化爲“緩”，“緩”轉化爲“急”，“勞”轉化爲“逸”，“逸”轉化爲“勞”，休整與苦戰，也是如此。勞和逸，緩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戰與苦戰也有同一性。睡眠與起床也是對立的統一，試問誰能擔保起床以後不睡覺？反之，“久臥者思起”。睡眠轉化爲起床，起床轉化爲睡覺。開會走向反面，轉化爲散會，只要一開會就包含着散會的因素，我們在成都不能開一萬年會。①

但是，從心理學意義上來説，當毛澤東把“矛盾”（contradiction）概念作爲一種中和的、緩解不同主體間的關係時，他對“矛盾”概念的執著熱情就變得很有趣。我們知道，上述那些主體之間的關係，譬如父子關係、夫婦關係，對毛澤東的情感世界來説，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某次對辯證矛盾觀的隨意評論中，毛澤東曾經作過很有啓發意義的暗示。據他看來，僅僅通過假定老年人與年輕人之間的代際差別，以及男女兩性之間的差別並不眞正存在，就有可能剔除不同的代際階層與性別屬性的人們之間的內在緊張。毛澤東聲稱：兒子轉化爲父親，父親轉化爲兒子，女子轉化爲男子，男子轉化爲女子，直接轉化是不行的，但是結婚後生男生女，還不是轉化嗎？②通過這種方式，毛澤東使差異變得模糊起來，進而避免了深刻的人性問題。實際上，他關注的問題並不僅僅停留在代際之間與男女兩性的差異。毛澤東走得更遠。死亡是一個令人困擾不已的事實。毛澤東曾運用矛盾概念，將其作爲一種可以給人帶來安慰的托辭，借以消解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在一次黨的會議上，毛澤東曾談及中國人民如何對共産主義表現出一種基于民族文化特點的親和性。因爲，他們對婚禮與葬禮的“統一”

①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 年 3 月 20 日。
②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 年 3 月 20 日。

(unity)，有一種本能的理解。通過嘲笑二者，毛澤東剝奪了它們通常具有的那種情感維度。

> “(有) 紅白喜事……中國人結婚叫紅喜事，死人叫白喜事……把中國人是很懂得辯證法的。結婚可以生小孩，母親分裂出小孩來，是個突變，是喜事。一個人分裂出三個兩個，甚至十個八個，像航空母艦一樣。新事物的發生、變化、死亡，老百姓叫喜事。［如果有人死了，會舉行一個追悼會。當人們爲痛失親人而哭泣的時候，他們覺得，那也是一件喜事。實際上，確實如此。］你們設想，如果孔夫子還在，也在懷仁堂開會，他兩千多歲了，就很妙。”①

儘管如此，超越于這種嘲笑之外，我們還可以得到一些有關毛澤東如何理解“辯證”(dialectic) 問題的例子。從毛澤東的用法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拒絕死亡的現實性。有關“辯證”問題的這一看法，表明毛澤東看來似乎知道，他的“辯證”觀與蘇聯對辯證問題的認識完全不同。毛澤東曾指出：“蘇聯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第四版關於同一性的一條，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觀點。辭典里說：‘像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生與死等等現象不能是同一的，因爲它們是根本對立和互相排斥的。’這就是說，這些根本對立的現象，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同一性，它們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聯結，不能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這種說法，是根本錯誤的。在他們看來，戰爭就是戰爭，和平就是和平，兩個東西只是互相排斥，毫無聯繫，戰爭不能轉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轉化到戰爭。列寧引用過克勞塞維茨的話：‘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和平時期的鬥爭是政治，戰爭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戰爭與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聯結，並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和平時期不醞釀戰爭，爲什么突然來一個戰爭？戰爭中間不醞釀和平，爲什么突然來一個和平？生與死

① 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第三次講話》，1958 年 5 月 20 日（譯者案：［］內文字系據英文補譯）。

不能轉化，請問生物從何而來？地球上原來只有無生物，生物是後來才有的，是由無生物即死物轉化而來的。生物都有新陳代謝，有生長、繁殖和死亡。生命活動的過程中，生與死也在不斷地死相鬥爭，互相轉化。”簡言之，生與死是可以互相轉化的，“這是自然規律”。《簡明哲學詞典》卻認爲，生與死的轉化是形而上學，而戰爭與和平的轉化更是錯誤的。那么，到底誰對呢？①

所以，在運用“矛盾”概念時，毛澤東就採取了大量不同的方式。在某些情況下，當論及那些可能激發大多數人沉思的差異時，他的言説方式可能是頑皮的、伶俐的；在另一些情況下，通過暗示某些在其他人看來是正常的差異，實際上是一些非常深刻的問題，毛澤東可能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使人警醒起來。通過靈活運用矛盾觀念，毛澤東經常會作出一些驚世駭俗、令人震驚的事情。作爲一個聰明的“猴子”，毛澤東鏟除了矛盾之間的個別特殊性，並且暗示好的東西是壞的，而壞的東西也可能轉化爲好的。

在下面的論述中，人們就可以發現這種精神：

> “我問過在我身邊的一些同志，我們是住在天上，還是住在地上？他們大家都搖頭説，不是的，住在地上。我説，不，我們是住在天上。在地球上看到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們一看我們，不就是在天上了嗎？所以我説，我們是住在天上，同時，又是住在地上。中國人喜歡神仙，我問他們，我們算不算神仙？他們説，不算。我説，不對，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們住在地球上，也即在天上，爲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們不把我們看成神仙嗎？第三，問他們中國人算不算洋人？他們説，不算，外國人才算洋人。我説，不對，中國人也叫洋人。因爲，我們看外國人是洋人，外國人看中國人不也是洋人嗎？這説明，這點上有迷信思想。”②

①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 年 1 月 27 日。
② 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第一次講話》，1958 年 5 月 8.

儘管如此，在其他一些場合論及矛盾觀念時，毛澤東就變得很冷靜，甚至以充滿威脅的警告口吻來説話。在提及這樣一種看法時，他顯然就表現出這種情緒。毛澤東指出，他自己就具有矛盾性；並且，“無論什么世界，當然特別是階級社會，都充滿着矛盾……（世界上）充滿着矛盾，沒有一處不存在矛盾”[①]。毛澤東也不認爲，矛盾是一個可笑的問題。在一次幹部會議上，他發出警告：“矛盾要暴露，問題才能解決”，不應該壓制矛盾；“以揭露矛盾解決矛盾爲好，不要一棍子打死，如果總是壓，結果一定會總爆發，就會變成拉科西，**也不能一味遷就，如果一味遷就，又會變成納吉**”[②]。

這表明，在毛澤東的決策風格中，對矛盾觀念的運用佔有相當廣泛的比重。他善於發現問題。在毫無畏懼地將自己的膽量引入公開的矛盾與衝突中時，毛澤東傳達了這樣一種信息，即對自己的這種勇敢有明確的認識。爲緩和、化解各種問題，並使之朝着良性化的方向發展，毛澤東也曾使用過矛盾的概念。此外，他運用矛盾概念，不但是爲了取笑他人，也是爲了發出威脅。在一定程度上，所有這些可能都是一種審慎的風格。對這個偉大的領導人來説，這種風格顯然起着有益的作用。儘管如此，在毛澤東的個性中，必然也存在着某些能夠使其如此自然地運用矛盾的因素。隨後，我們將不得不尋求毛澤東思想中的矛盾因素。正是這些因素，使毛澤東最終能夠熟練地運用矛盾概念和矛盾的對立統一性。

冒險，還是理性？

任何一個領導人“行爲符碼”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他對冒險問題的看法，以及對理性能力的運用（approach to risk and his use of reason）。當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他如何運用自己的理性？爲了使自

① 毛澤東：《關於團結方法問題的談話》，1964 年 8 月。

②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 年 1 月 27 日。

己低度風險的選擇變得合理正當，他是否採取了謹慎的合理化的姿態？還是相反，通過將之隱秘地納入于合理化的大氅籠罩之下，他修正了自己帶有高度風險的決定給他人帶來的震驚感？或者說，當面臨不確定的風險時，他是否拒絶承認理性的重要性？並暗示自己有能力超越單純理性的局限？

近些年來，有一種看法很常見。人們認爲：中國的共産主義者傾向于在言辭方面可以表現得很極端；而在具體行動中，卻很謹慎。這一點，在外交領域表現得尤其如此①。有人已經觀察到，與中國外交政策方面的審慎態度相反，處于毛澤東領導之下的北京政府不斷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摇擺，即充滿革命性實驗的時期與注重維持和鞏固的時期②。

儘管如此，容易獲得的一些證據表明，毛澤東的摇擺與矛盾通常並不是採取這樣的形式。譬如，毛澤東自己的言辭從來就不極端。在一定程度上，他傾向于使用一些富于進攻意味的言辭。就此而言，這些語言一般被用來指向和反對直接的對手。這些對手經常是聽衆中的某些人。毛澤東會單獨把他們挑出來，並對其展開尖刻的、充滿諷刺意味的攻擊。但在他那憤怒的攻擊性言辭中，我們可能很難發現某種經過修飾和打扮的審慎決定。相反，如果說毛澤東呈Z字形摇擺的決策風格中存在着某種連續性的因素，那么這種因素就是：他幾乎總是不可避免地選擇一些大膽的、充滿冒險性的決策，但卻總能爲這些決定找出某種令人顯而易見的合理性。

作爲一個政治領導人，毛澤東在江西蘇維埃革命根據地做出了他的第一批決策。自從那個時候起，毛澤東就一直堅持採取大膽、冒險而新奇的決策。這一點，在隨後的長征過程中亦然。人們會有這樣的印象，他與大多數承擔重大責任的那些決策者不同。經常的情形是，

---

① James Chieh Hsiung, Ideology and Practice: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Praeger, 1970.

② Michael C.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under Mao, in Thomas W. Robins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 105–6.

毛澤東忽略、不考慮那些規避失敗的風險的可能性。相反，他的决定依賴于行動的過程。毛澤東認爲，行動過程中充滿一些不可預期的因素。對決策失敗的各種可能代價，大多數政治家一直懷有巨大的恐懼。而毛澤東卻爲決策那潛在而巨大的補償與報酬所吸引。這種報酬可能來自于各種長期勝算所帶來的成功。大多數行政官員渴求確定性，僅僅企求“合理的”風險。與他們不同，毛澤東喜歡作一些豪賭，冒極大的風險，似乎只有這樣做，才算合理。

毛澤東的冒險意願似乎與某種全能感有關。這種全能的感覺把他引向這樣的預期，即沒有什么最終的、決定性的結局，總會有其他的機會與選擇。因而，儘管對現狀可能會有各種疑慮，但毛澤東總會以樂觀的態度來指望將來。到那時，他就有希望可以抓住，或者説，重新抓住現在所缺乏、喪失的東西。這樣看來，有關15年趕上英國、“在我去見馬克思前”趕上美國的説法，並非徒勞無益的夸張。相反，這是一種眞切的希望，即由未來提供的不確定的承諾，會成爲現實(就像夢想曾經在過去，一度似乎起過的作用那樣)。

如果想對毛澤東大膽決策的偏好進行充分、完整的描述，那么，將需要對整個中國共産主義運動有一個完整的把握。因而，我們有必要在這里提供一些例子——儘管不多，但是很典型。經過長征的巨大歷險之後，毛澤東來到了延安。以一種異常的勇敢，他不但推動了游擊戰爭，還在抗日戰爭的關鍵時刻，冒了一次險，即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意識形態改造運動(即整風運動)。然後，在眞正的內戰爆發以前，毛澤東與國民黨政權進行策略性的周旋。在談判中的每一個轉折點上，毛澤東都拒絶一些建議。而這些建議，在一個更加審慎的領導人看來，可能會爲後來的政治鬥爭提供合理的安全保證。最後，爲奪取全面的軍事與政治勝利，毛澤東在這場豪賭中冒險下了全部賭注。一旦勝利來臨，毛澤東再次作了一個大膽的選擇，即外交方面“一面倒”。他還親自飛往莫斯科，與斯大林進行曠日持久的談判。本來，一個更爲審慎的領導人可能只會派些不太重要的官員，去試探一下莫斯科的談判氣候。在內政方針上，毛澤東一次又一次否決了同事們基于審慎的偏好和傾向而提出的各種建議。他堅持一些充滿不確定因素

的決策選擇。正是毛澤東，在1950年親自推動了加速土地改革的步伐；1955年最終堅持加快集體化過程；1958年又推進了人民公社化運動。從1956年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起，中經1958年的大躍進，直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每一次毛澤東都承擔着巨大的風險。在外交政策方面，毛澤東大膽決策的記録則包括，從最初選擇參加朝鮮戰爭，到後來決定邀請尼克松訪華，解決與美國政府的關係。20多年來，毛澤東一直在教導他的人民，正是美國這個國家應該被視爲中國最兇惡的敵人。

毛澤東愛做一些驚世駭俗、令人瞠目結舌的決定。這一傾向將他與一般的政治領導人區分看來。尤其是，這也使他與大多數其他中國共産黨人的高級官員不同。爲什么中國現在的政治接班人（或者説繼承）問題會變得日益弱化，不再嚴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年來中國的政制體系有一種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傾向，即更加偏愛謹慎的政治行動家。藉助在防禦性策略、自我保護等方面的技巧，這樣的政治人物能夠安然度過政治繼承的危機。他們也不必爲建立自己的帝國，而對任何人持咄咄逼人的攻擊性態度。那些1949年時與毛澤東一起掌握了國家權力的領導人，通常都很謹慎，試圖維持他們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會企求更多。在中國的官僚體系中，並不存在大量的流動性。官場中的生存與他在行政績效方面的資格有關，而和爬到別人前面無關。毛澤東經常要求下面的幹部，應該採取主動，永遠積極，而不應像一個奴隸式的死守教條。儘管如此，毛澤東的這些號召並沒有改變權力關係的現實。同樣，這也沒有改變這樣一個情況：只有毛澤東自己，才能自由地、毫無拘束地進行各種高風險的決策活動。

在相當程度上，通過把自己的選擇描述成具有不證自明的合理性，毛澤東能夠掩飾他對高風險決策的偏愛。在毛澤東有關政策的各種叙述中，對於風險幾乎沒有什么虛張聲勢或者過度的溢美之詞。爲了激發對某些政策的更多支持，他曾經常會採用一些充滿戲劇性意味的手法。但通常，毛澤東會藉助一些合理的言辭，來爲自己的決定辯護。通過這些言辭，他就把風險這個概念變得微不足道了。

毛澤東面對失敗、挫折時的處理風格，存在着幾種類型。他或者選擇暫時的戰略性退卻，而且同時經常會伴隨某種疾病的症狀；或者忽略、無視這種挫敗，並儘可能繼續前行，就好像什么都沒有發生；再或者，如果最後被逼進了死角，他不是轉而譴責別人，就是以高度個性化的語言，來爲自己的行動作有力辯護。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早期，毛澤東就曾經冒過一些風險，並遭到了各種困難與挫折，由此也使他自己不爲黨的領導人所喜。他的反應是防禦性的，並開始在江西的群山中，進行孤獨而自主的軍事活動。同時，這些惡劣的情形伴隨着一些健康問題[①]。但面對這些問題，毛澤東總能聳聳肩，輕鬆地擺脫一些嚴重的失敗對他的影響。有關他的這種能力，我們知道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那是面對丟掉延安、並把她讓給國民黨軍隊這一事件時，毛澤東採取的處理方式：他拒絕考慮這一事件的重大意義。當時，還是三年解放戰爭的初期。在這次戰爭中，毛澤東冒了一回險，走了步好棋。然後，他丟掉了那塊重要的、具有某種象徵意義的革命根據地。正是這塊根據地，毛澤東曾經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成功地守衛了它。但現在，毛澤東把延安的棄守視爲前進過程中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他拒絕對這次失利作更多的考慮，且讓人覺得就像什么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通過這樣一系列的處理方式，毛澤東就得以淡化和否認國民黨軍隊的所謂勝利的重要性。

但有些時候，毛澤東也不能無視失敗與挫折。因爲，同事們可能會對他最初決定的明智性表示懷疑。每當這個時候，毛澤東就會把受到傷害的、令人心痛的防禦心理，與對他自己行動的辯護聯繫在一起。這些辯護，往往充滿攻擊性意味，也是非常個性化的。此時的毛澤東，其情緒表現可能就像一個受到誤解、遭致不公正對待的領導人。這個領導人已經做出了最大努力，但卻沒得到同事們的理解。然後，他就用一種中國傳統的風格，宣稱他們可以拋棄他。但緊接着，以一種更加非中國化的方式，他可能略帶威脅地補充說，自己會暫時退卻，但仍會反擊。有關毛澤東行事風格中的這一面向，一個較典型

① Edward E.Rice: Mao' s W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72.

的例子可能是1959年7月23日，他在廬山會議上的“三次安眠藥”談話。在這次會議上，他正因爲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敗而遭到嚴厲的批評。深夜，毛澤東來到禮堂，佔據了講臺。他聲稱：“你們講了那么多，允許我講個把鐘頭，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着。”在某種意義上，他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即他已經在努力保持“克制、退卻”，但是現在不能再這么做了。他必須進行反擊。他也確實作了反擊。他宣稱：“無論什么人都有缺點。孔夫子[①]也有錯誤。我看到列寧的手稿，改得一塌糊塗，沒有錯誤，爲什么要改？”在繼續東拉西扯的隨意閑聊中，毛澤東清楚地表明，他已經準備好劃清界限，強化這個問題，但卻是以一種自我憐憫的傷感方式來進行的。“有話就講出來嘛，你們抓住，就整我嘛。成都會議上我說過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緊。還講過幾條，甚至說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殺頭，不要開除黨籍的……不贊成，你們就駁。你們不駁，是你們的責任，我交代了，要你們駁，你們又不駁。說我是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事實上紛紛在駁，不過不指名就是。”最後，毛澤東終于說出了他並不那么隱晦的威脅：“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在發出這種威脅的同時，毛澤東還明確暗示：就個人而言，他是多么地追隨馬克思與列寧，並和他們站在同一條戰壕中。然後，他就以一種意圖使人震驚的評論結束了談話：“我勸同志們，自己有責任的，統統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講，也不要往少講，都吐出來。無非拉屎嘛，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②]（也就是說，保持一個清白的記録）。

在另一個場合，毛澤東對自己的失敗，以及他所遭到的批評採取了這樣一種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攻擊性反應。他向黨的中央委員會宣

---

① 這只是毛澤東提及孔子的無數次談話的其中之一。自從1973發動批孔運動以後，這一點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變得非常尷尬。

②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7月23日（譯者案：可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録》，增訂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稱：如果願意的話，他們可以帶走他的妻子；而他，將會再次上山，拉起另一支紅軍來反對他們①。

直接的嚴密控制，還是間接的權威代表？

爲對公共人物的“行爲符碼”有更一般的理解，另一項有價值的考察就是他們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基本風格。他們是否像一個行政首腦那樣行事（act as chief executives），日復一日地對所有可能的管理事務作繁瑣的控制？或者説，他們是否願意委派代表來分擔責任（inclined to delegate resposiblities）？如果讓人代理責任，他們如何宣稱自己的權威？

由於不是作爲一個行政長官來行事，毛澤東不必關注各種決策的日常運行，由此也強化了這樣一種印象：他可以在很多事務中作些大膽的決策。毛澤東的風格表現爲採取暫時的退卻戰略，觀察政府的運作過程，反思應該做那些事，然後突然調整自己的想法，干預政府的管理過程。這種周期性的行事風格在1949年以後，表現得尤其突出。由於毛澤東在進行管理與實施統治之間搖擺不定（vacillates between reigning and ruling），人們就夸大了其決策的新奇性。因爲，決策通常會來自于行政管理部門的政策執行過程；而毛澤東的那些決定並非直接依賴于以上那種慣常的順序。

在許多方面，毛澤東的風格令人想起中國皇帝的傳統角色。譬如，在退回幕後的時候，毛澤東就會靜靜地巡視全國，考察基層幹部的表現，掌握第一手資料。這種做法，與傳統中國許多皇帝的做法有些相似。通過離開宮廷，微服私訪，那些皇帝尋求有關國家治理狀況的第一手材料。在其他時候，毛澤東的命令採取另外一種形式，即在送他審閲的文件邊上，作一些批注。而這，本來也是皇帝發佈詔諭的一種通常形式。

①Roderick MacFarquhar：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這種暫時後退、再行干預的風格，顯然夸大了中國政治中的波動性因素。因爲，如果眞像奥克森博格觀察的那樣，“在過去的這20多年中，每一項重要政策的動議都是由毛澤東發起的”[①]，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毛澤東實行的每次干預，也都中斷了此前日常行政管理決策的正常流動。由於毛澤東在中國政府過程中扮演着多種角色，因而，當他結束歸隱狀態、再次回到前台時，就出現這樣一個不確定的情形。人們從來無法斷定，在整個政府過程中的哪一點上，毛澤東的新創意將被突然強加進來。這一次，他可能以農業方面的領導權威的身份返回前台；下一次，就是一個意識形態與思想政治工作領域的專家。這一次，他的關注重心可能集中于軍事問題；下一次，他的角色可能又是一個外交政策方面的戰略家。通過全國各地不同等級的領導幹部，毛澤東的新決定産生了令人震驚的波動。如此一來，一旦毛澤東準備對某個領域進行新的干預，那么，這個領域就成爲整個政治體系中的先行者與表率。

這種管理與統治的風格也促成整個政府體系的這樣一種傾向，即對毛澤東甚至最爲偶然的干預，也會做出充滿戲劇性色彩的反應。由於毛澤東不是日常行政過程的一部分，他的任何干預都變成了一個重大事件。這一事件傾向于引發全國範圍内各級領導幹部對此做出廣泛的應對。有時候，毛澤東在某些備忘録性文件邊上所作的批注，就足以激發官僚體系大規模的反應。其他一些時候，毛澤東只是提出某些含糊的、略顯神秘的口號，譬如“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深挖洞、廣集糧、不稱霸”等，也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毛澤東自己就曾宣稱，1958年夏天，在擴大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體現出的被夸大了的激情，實際上源自他對一個記者所説的一個字：“我在山東，一個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説‘好’，他就登了報。”[②]當然，擴大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決定有着遠比毛澤東所聲稱的更爲複雜的背景。

① Michael C.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under Mao, in Thomas W. Robins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88.

②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7月23日（譯者案：可參見李鋭《廬山會議實録》，增訂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儘管如此，在有一點上毛澤東可能是對的。這就是，有關毛澤東“一個（好）字”的報道，向全國幹部們傳達了一個信號，即他們應該加速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步伐。

毛澤東的政治風格展示了這樣一些內容，譬如，一種寬廣的視野，對宏大問題的關注，更爲偏好抽象化的政策而非具體的細節；當然，也對某些特殊的細節充滿好奇，卻對行政管理的那些錯綜複雜的基本事實沒有興趣。他的行爲方式也反映出毛澤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是如此地信任這個世界，以至於感覺到，他並不必親自操縱這個世界，就可以使之按照自己的意圖來行事。而且，這個人對自己的判斷有着足夠的自信。他感到，自己能夠輕而易舉地推翻某些決定，即便這種決定是由一些更加接近實際情況的人們作出的。

儘管如此，作一些限定還是很有必要的。因爲，毛澤東在治理與統治之間的搖擺，也反映了他有關孤獨狀態的某些明顯的矛盾心理。這一次，他似乎需要私人的隱秘性，尋求帝王般的孤獨；下一次，他就傾向于抱怨，其他人在孤立他，而且漠視他的願望。在毛澤東處於隱退狀態的時候，其他人必須管理各種事務。但是，當他們集中精力于手頭的任務，毛澤東有時候就感覺到，自己似乎被遺忘在那個圈子之外。他還抱怨，其他人不向他彙報工作。譬如，1966年10月，毛澤東對此表示抗議：“許多事不與我商量……鄧小平從來不找我。”[①]他進一步評論到，1958年以後，主管黨務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對待他“如喪考妣”。換言之，僅僅表示形式主義的尊重，卻不跟他講話。還有一次，毛澤東抱怨自己在北京地區的講話沒人聽。因爲，當時的北京市長彭眞是如此全面地控制着各種事務，以至於可以說是“針插不入，水潑不進”[②]。

①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工作彙報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24日。

② 轉引自 Roderick MacFarquhar：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p.204。

信任關係：人格化，還是非人格化？

另一個有助于我們接近領導人“行爲符碼”第一距離的緊密相關的主題，是他們處理不同性質的關係的偏好。即究竟是鍾愛與正式的、非個人化的制度（formal and impersonal institutions）打交道，還是喜歡與那些和他們有某些私人聯繫（some personal ties）的個人進行交往？一些領導人感到非常自信，認爲如果自己能夠管理和協調好那些執行政策的正式機構與部門，他們的決策就會得到恰當的執行。另外一些領導人則只有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才會覺得寬慰，即與一個由追隨者們組成的內部團體打交道，而且該團體的成員將在私人關係上對自己保持忠誠。顯然，對內在于官僚機構中的非人格化關係，毛澤東表現出不信任。相應的，毛澤東似乎對以個人化的方式來處理與那些追隨其教導的人們的關係，表現出強烈的心理需求。我們非常熟悉毛澤東對官僚主義的反感，因而，除了以下這一點，不需對此作其他進一步評論。這一點就是，由於官僚主義行政缺乏人情味，毛澤東對此表現出敵意；而且，這種敵意不僅來自于高級官員對基層政府管理階層的說話方式，還與他的挫折感有關。這種挫折感是由於，他雖然處于整個管理階層的頂端，但卻無力命令一個非個人化的官僚機構。毛澤東總是要求，高級官員不但要對人民群衆負責，還要對自己負責。因而，儘管不是線形序列的一個管理者，也不是持續不斷的日常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通過經常干預政府管理過程，毛澤東就了解到基層官員們的名字，進而評論他們的行爲。如此一來，就傳達了這樣一個印象，即毛澤東是通過非常個人化的關係，來熟悉政府工作人員的①。實際上，毛澤東對底層管理人員的了解，必定是參差不齊，非常不完整的。這種了解，更多的是建立于對他們的名字，以及有關其表現的記錄之評論的基礎上，而非依賴于他們的實際行政

① Michael C.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under Mao, in Thomas W. Robins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89.

管理經驗。

毛澤東對非人格化關係的反感，還通過另一種方式得到展現。他阻止、妨礙了大多數中國政府管理體系的制度化過程，尤其是在中央一級的層面。部分的，這個問題是由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毛澤東有很多頭銜和職務。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么毛澤東在他自己的觀念中，從未對各種決策機構的差別作過明確區分。另一方面，毛澤東和集中于首都北京的各種正式委員會、司局、辦公室等，有過各種稀奇古怪的接觸。這就使他傾向于混淆這些管理機構之間各自責任的界限。毛澤東的這些行爲中存在着一個悖論，即他力圖將這些官方的(正式的）關係個人化。這一悖論，產生了一個模糊的、沒有確定形式的、幾乎是神秘性的概念——“中央”（the Center)，即用“中央”這一術語來指稱和表達終極的權威。

從經濟管理到政治統治，中國所有的各種問題據稱都涉及到“中央”的決策。但是，中國人從來沒有弄清，究竟什么，或者說誰才是“中央”？有時候，“中央”似乎不過是北京的某個適當的部，而在其他一些時候，它又以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局或者其常務委員會的形式出現。甚至在某些時候，“中央”可能是黨的中央委員會本身。當提及北京的時候，較低層次的官員們總會說到“中央”。但是，他們究竟在討論哪一個確定的人？對此，似乎沒有什么具體的意義。

在確定中央權威當局的路線時，毛澤東傾向于將“中央”彌散化，缺少明確的限定。這一點有助于“中央”——這個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非常特別的概念的形成。而毛澤東的這一偏好，自文化大革命起，就日益從首都北京傳播到整個全國的各級行政管理機構。因爲，黨和政府之間的權威的區分界限，在當時已經變得越來越缺少明確的界定。特別是，“革委會”與“黨委”之間的差別已經變得很模糊。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在大多數的組織活動與司法過程中，“革委會”與“黨委”兩個機構的人員組成結構基本上是一樣的。也正因爲如此，就像毛澤東有很多頭銜時一樣，這兩個機構的成員發現很難區分自己的角色。

如果要追究毛澤東行政管理風格的個人根源，我們就不得不對他

有關職責的情感表示關注。我們還要追問，爲什么毛澤東看起來似乎從未設想過給職責下一個明確的定義？

政治風格：群衆路線，還是精英主義？

檢測“行爲符碼”區分的另一個標準，是領導人對公開的或者封閉的決策方式之偏愛。也就是説，是歡迎衆人的廣泛參與（broader participation），還是偏好僅僅涉及少數幾個精選過的優秀人物（only a select few）？表面看來，這種區分可能看起來似乎就是大衆的（或民粹的）、民主的方法（a popular or democratic approach）與精英式的方法（an elite approach）之間的那種區分。儘管如此，實際的情形卻是，這樣一個過于簡化的分類是不可能的。一個領導人可能因這樣的緣故而傾向于廣泛的參與，即大衆參與可以稀釋、消解競爭者的影響，並加強了自己的重要性。而一種明顯的、精英主義式的決策進路，也可能與那些支持大衆利益的決策相吻合。

確實，在毛澤東的政治風格中，參與和孤立（beween involvement and isolation）、行動和隱退（beween action and seclusion）之間的搖擺，看來似乎是他整個矛盾心理的一部分。在其内心深處，毛澤東一直很困惑：究竟應該信任、尊奉普通大衆的觀點，還是相反，决定性地偏好某種與精英會議相關的隱秘感？

對民粹主義式的激情，現時代可能沒有一個主要的領導人曾經比毛澤東提出過更爲恰當合理的要求。他讚美群衆，並從他們身上發現智慧與力量。與此同時，世界上也沒有任何其他一個主要的領導人，曾經像毛澤東那樣習慣于以歸隱的方式來實行治理。作爲一個決策者，毛澤東曾經暗示我們，他可以既是群衆利益的一個代言人，同時又是一個孤獨的、神秘的預言家。毛澤東曾經坦陳過對這樣一種價值觀的信念，即政策制定者應該與普通群衆保持長久、穩定、日常性的聯繫。但是，自從掌握國家權力以後，他的主要生活方式卻一直與掌權者相混合。這樣一來，他就把自己對弱者的同情和對權力的認同結

合在一起。

以更加明確的術語來説，毛澤東的民粹主義採取的是這樣一種形式，即支持、偏袒農村民衆，而不信任城市生活。因而，在毛澤東的腦海中，“人民”並非某種受過教育、掌握很多知識、充滿了好奇和各種不同觀點的人口群體。恰恰相反，“人民”是那些單純、樸素、勤勞、溫順的人們。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提陞、改進自己的地位。毛澤東對農村生活方式、農民言行舉止的讚美，與他這樣一種爲人熟知的信念是一致的。這一信念就是，相對於機械技術，毛澤東更加相信人類努力的優越性，以及懷疑、不信任正規教育。不過，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毛澤東雖然總是以正規教育與“書本學習”爲由而攻擊其他人，但他自己卻沉浸于各種書本中。

毛澤東有關大衆參與和精英引退的矛盾心理，已經被轉化爲他所支持的雙重政治路徑。一方面，是“群衆路線”。這一路線的原則主張是，想人民群衆之所想，急人民群衆之所急，或者説“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類似的，另一方面則是某種列寧主義的精英式政黨原則。這一原則被嚴格執行，並達致極端。也正因爲如此，而使整個中國的決策過程成爲這個世界上最爲神秘的現象。甚至一些被認爲是公開的事件，譬如黨的代表會議等，一般也是秘密舉行。這實際上是針對毛澤東及其幾個少數助手們的某些令人吃驚的決策，而做出的一種反應。

應當再次説明，毛澤東決策方式的特徵，必定有其性格根源。因爲他的矛盾心理看來似乎超乎尋常的複雜。當毛澤東聲稱自己“單獨與群衆在一起”的時候，他似乎仍然迷戀于某種對孤獨的渴望；與此同時，他還認同一個非人格化的公衆。所以，只有深入考察他的個性，才可能對毛澤東的那種能力做出解釋，即一方面能將人民大衆理想化，另一方面亦能保護自己的隱私。

容忍批評，還是選擇衝突？

考察任何一個領導人的政治風格的最後一個維度，是他對內在于政治本身的衝突的反應，以及他應對別人的攻擊和批評的方式。一些領導人非常自信。他們喜歡爭議，對任何人身攻擊無動于衷。其他一些領導人則試圖超越衝突，希望自己受到尊敬，並免于任何直接的批評。所有的偉人都傾向于有一個博大、寬容的自我。儘管如此，在那些珍惜、欣賞衝突的領導人和羞于、乃至逃避衝突的領導人之間，在那些臉皮較薄的領導人和臉皮較厚的領導人之間，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異與多樣性。

就像其大多數“行爲符碼”一樣，毛澤東作爲決策者的行爲風格看起來仍然依據某種矛盾心理。因爲，在有些時候，他美化衝突，歡迎各種觀點的碰撞和交流；而在其他一些時候，甚至對某些即便是批評性的暗示，他都表示出精微的敏感。理查德·H·所羅門曾經詳細地描述了毛澤東的這樣一種特點，即隨時準備起而戰鬥的願意，試圖超越傳統中國的那種對和諧的渴望，以及毫無畏懼地接受衝突與混亂[①]。儘管大多數中國人渴望秩序，恐懼無序，或者說“亂”，毛澤東卻似乎以混亂與鬥爭爲樂。

儘管如此，有關毛澤東的這樣一個特點也存在着廣泛的證據。他對攻擊極端敏感，能夠感覺到甚至最爲微妙的批評性暗示。毛澤東並非一個可以容忍各種傷痕的戰士，他的臉皮似乎太薄了，這使他幾乎不適合政治生活。因而，在有些時候，毛澤東公開宣稱擁有一些敵人或者批評者的積極價値或者說益處，並用一種非常隨便、毫不介意的方式，拒絶對多年的敵對記録進行嚴肅的考慮。而在其他一些時候，甚至對最爲間接的攻擊性暗示，毛澤東都表現得很脆弱、很敏感。

早在1939年，毛澤東就曾寫過一篇名爲《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

① Richard H. Solomon, Mao' 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不是壞事》[1]的短文。該文精緻地表達了毛澤東對擁有些對手這一事實的可能優點之看法。1964年，毛澤東詳細叙述了一個日本訪問者的故事。來訪者試圖努力對日本曾經侵略中國的事表示道歉："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但毛澤東不得不打斷這個日本人的話。他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産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教員，也是你們的教員"。這就是爲什么毛澤東會說，難道不應該感謝他們的原因[2]。另一方面，《毛澤東選集》的第一句話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3]在這個開篇性的、富有啓發性的語句中，毛澤東的思想反映了列寧的某些看法。對革命黨人來說，基本的問題必定總是："誰將領導我們？"這個"領導與被領導"或者說"誰領導誰"的問題，正是列寧主義世界觀的核心問題[4]。正像列寧當年認識到的一樣，對毛澤東來說，認清或者劃分朋友與敵人的問題在這樣一個方面是很重要的：即一個人是在更大的社會範圍內來分析政治關係，還是將之限于他與別人之間那些非常個人化的關係？

衆所周知，毛澤東對批評高度敏感。這一點復活了古老中國的某種神秘的風格，即利用充滿隱喻的歷史典故來進行批評性的議論。在這方面，中國的政治傳統是很豐富的，他們藉助某些充滿隱喻的、間接的形式，來進行批評和攻擊。在歷史上，中國古代的大臣們並不希望冒犯或者激起皇帝的憤怒。因而，他們經常會引用過去的一些微妙的例子，並以此作爲一種與皇帝進行溝通的方式。儘管如此，處于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國，卻在歷史典故的使用上達到了前所未有、聞所未聞的高度。

---

①《毛澤東著作選讀（Selected Readings from the Works of Mao Tse-tung）》，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30–132頁。

② 毛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的談話》，1964年7月10日。對該事件的一種看法，參見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p. 205。

③《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11頁。

④ Nathan Leits: The Study of Bolshevism,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3.

譬如，還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澤東就感覺到《海瑞罷官》一劇針對他的微妙涵義。該劇講述了一個皇帝與一個大臣的故事。說的是這個皇帝把某個爲群衆愛戴的大臣革職罷官的事兒。較早一點兒，1958年的時候，毛澤東就發現，在江西黨校的一份出版物中，曾經提到他。但是，似乎將他與秦始皇等同。而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最偉大的暴君；在他的統治之下，還修建了萬里長城。對此，毛澤東做出如下反應："右派講，秦始皇爲什么倒台？就是因爲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搞得一塌糊塗，要垮台了。"[①]從那天起，毛澤東就經常把自己與秦始皇等同起來，而且這樣做的時候，充滿了挑釁的意味。在1973年的"批孔"運動中，毛澤東堅稱認爲，與"修正主義"的儒家相對，法家和秦始皇應該被視爲他們時代的偉大的進步人士。

通過把自己和秦始皇聯繫起來，毛澤東就在和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對着干。因爲，作爲秦朝的第一個皇帝，始皇帝總是被看作一個苛酷的統治者。他反對儒家式的充滿人文氣息的傳統。在黨的八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詳細地解說了一篇文章。該文由一個當代學者所寫，並主張"厚今薄古是中國的一種傳統"。對此，毛澤東加以評論。他認爲，該文作者應該引證秦始皇的例子。因爲，秦始皇就相當典型地體現了這一傳統。這時，林彪打斷毛澤東的評論，插了一句話。我們知道，在失勢叛逃之前，林彪很明顯將會成爲毛澤東的繼承人。而有關他的記憶，現在大多與1974年"批孔運動"聯繫起來。當時，林彪評論到："秦始皇焚書坑儒"。這一向被用來描述秦始皇是如何攻擊儒家經典及其支持者的。毛澤東馬上做出反駁："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萬倍。罵我們是獨裁者，是秦始皇，我們一貫承認。"[②]

在毛澤東身上，對衝突的明顯喜好與對批評的極度敏感之間存在着矛盾。這一矛盾提醒我們，應該對這樣一點保持警惕，即在毛澤東

①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7月23日（譯者案：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録》，增訂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第二次講話》，1958年5月17日。

的個性中，對攻擊性的尺度把握有着明顯的矛盾心理。確實，毛澤東對戰爭的理想化也暗示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他對攻擊性行爲有一種複雜的個人感情。像毛澤東那樣的一個人，曾經在戰場上看到過死亡與暴力，但他一直堅持——尤其在自己的詩詞中——以相當浪漫的語言來描述戰鬥。這樣的一個人看起來似乎在把理想化作爲一種心理防禦機制。在毛澤東的詩詞中，幾乎每次提及暴力時，暴力行爲都是良性的："紅旗躍過汀江"①，"戰地黄花分外香"②，"山上山下，風展紅旗如畫"③，"頭上高山，風卷紅旗過大關"④。在下面這首描寫一次特殊戰鬥的詩句中，毛澤東描述的形象當然不是那種現實主義的衝突。他寫到：

"二十萬軍重入贛，
風煙滾滾來天半。
喚起工農千百萬，
同心干。
不周山下紅旗亂！"⑤

在另一首詩詞中，他毛澤東寫到：

"横掃千軍如卷席。

① 這首詩詞名爲《清平樂·蔣桂戰爭》，寫于 1929 年秋，後收入《毛主席詩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8 年版。汀江是福建的一條河。當時，毛澤東正率領紅軍向福建挺進，而蔣介石則忙于和廣西的軍閥作戰。

② 這首詩詞名爲《採桑子·重陽》，寫于 1929 年 10 月，後收入《毛主席詩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8 年版。

③ 這首詩詞名爲《如夢令·元旦》，寫于 1929 年，後收入周振甫編、臧克家序：《Mao Tse-tung Nineteen Poems（毛澤東詩詞十九首）》，北京：外文出版社，1958 年版，第 13 頁。

④ 這首詩詞名爲《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寫于 1930 年 2 月，後收入《毛主席詩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8 年版。

⑤ 這首詩詞名爲《漁家傲·反第一次圍剿》，寫于 1931 年春天，後收入《毛主席詩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8 年版。

有人泣，
爲營步步嗟何及！”[①]

又如：

“當年鏖戰急，
彈洞前村壁。
裝點此關山，
今朝更好看。”[②]

當毛澤東試圖努力去描述戰爭的苦難與艱辛的時候，這種苦難和艱辛便僅僅成爲一種與大自然的抗爭，而非面臨死亡的暴力行爲。

“紅軍不怕遠征難，
萬水千山只等閑。”[③]

但在大多數時候，毛澤東傾向于把平靜的大自然描繪地令人愉悅，就如下面所引的那般：“紅旗漫捲西風”[④]。即便當明顯是在描述敵人時，毛澤東的情緒仍然是積極的：“宜將剩勇追窮寇”[⑤]。

如前所述，毛澤東的決策方式中，不但存在着歡迎、擁抱衝突與暴力的特點，還有美化這些現象的痕迹。這些特點指出了在其私人生活中存在的、我們即將準備探討的某些因素。在進一步深入考察毛澤

① 這首詩詞名爲《漁家傲·反第二次圍剿》，寫于1931年夏季，後收入《毛主席詩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8年版。

② 這首詩詞名爲《菩薩蠻·大柏地》，寫于1933年2月，反第四此圍剿以後，見《毛澤東詩詞十九首》，第15頁。

③ 這首詩詞名爲《七律·長征》，寫于1935年9月，後收入《毛主席詩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8年版。

④ 這首詩詞名爲《清平樂·六盤山》，寫于1935年10月，後收入《毛主席詩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8年版。

⑤這首詩詞名爲《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寫于1949年4月，後收入《毛主席詩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8年版。

東的個人發展之前，我們應該對這樣一些線索保持警惕：爲什么毛澤東會形成那種非常獨特的政治風格？而在有關其“行爲符碼”的一般印象中，我們已經注意到這種獨特性。那么，究竟是他個人成長中的哪些因素促成了毛澤東的這種政治風格？譬如，如此的傾向于讚美矛盾；如此的傾向于高風險決策；如此的遠離治理過程，但又在個人方面對其表現出如此強烈的興趣；如此的不信任非個人化的組織制度，但又與自己的同事們保持如此疏遠的距離；如此的崇拜群衆，但又如此的希望保持自己的私人風格；最後，如此的願意接受衝突和混亂，但又對他人的批評觀點保持如此的敏感？這並不是一些偶然的特點。恰恰相反，作爲緊密相連的整體的一部分，他們看起來搭配得很好。而且，這些特點只有在考慮到毛澤東性格特徵的內在完整性時，才會有意義。

毛澤東是一個令人驚奇的、非常複雜的人。這部分是毛澤東生活的時代對他的影響的產物，部分也是毛澤東的閱讀生活帶來的結果。儘管如此，就像每個人的形成發展都受到某些力量的影響一樣，毛澤東也是在他的家庭與同輩人的影響之下而成長起來的。

第二部分
作为私人角色的毛泽东

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

——毛泽东：《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1957年11月18日

第四章　家庭與母親

毛澤東出生的地方是整個湖南最爲富饒的地區之一。而湖南，正是被中國人譽爲強悍農民故鄉的地方。這里還出現了許多著名的文人學者，以及雄心勃勃、精明強幹的士兵。實際上，韶山冲是由一系列圍繞着一個山谷的若干小山村組成的。根據傳統，韶山冲按照血緣宗族而組織起來。毛澤東的家族，則是其中最大的一個。甚至今天，韶山冲村民組的絶大多數家庭都姓毛。確實，在某些方面，看起來古老的宗族式領導體制好像重新出現了；只不過採取了現代村民組織的領導形式。

1893 年 12 月 26 日，毛澤東出生了。這個時候，他父親剛開始雄心勃勃的努力，以便使整個家庭能夠獲得更加優越的經濟狀況。毛澤東的祖父建造了他出生的那個屋子的最初部分。但是，祖父卻是一個貧窮可憐，相對來説並不成功的農民。而他的兒子——毛順生則比較成功。是他把這個家庭帶到毛氏家族的領導地位。

成長環境的特徵，對理解毛澤東的個人成長是很重要的。這是個與外部世界隔絶的農村，距湘潭大約三十里。因而，毛澤東早年的成長環境是一個異常安靜、與外部幾乎沒有什么聯繫的世界。甚至對中國農村來説，這也是很典型的。如此一來，毛澤東從來不會像大多數的中國農村孩子那樣，經常體驗到某種進城參觀的狂喜。也正因爲如此，毛澤東可能從來認識不到大多數中國孩子知道的一些事情。譬如，生活中最令人興奮的事，就是每年將近年關時去參加集市貿易(“趕圩”或“趕場”)，觀察市場中各種與買賣行爲相關的活動與喧鬧。中國生活與文化中的這一典型的維度，在毛澤東的童年是缺乏

的。因而，作爲一個成年人，對經濟事務或者説人們生活中的商業與貿易的那一面，毛澤東從來沒有表現出任何興趣。

相反，在毛澤東成長起來的那個社區，幾乎從來沒有什么東西打破過他們的日常生活與久遠習俗。另一方面，毛澤東所在的那個小山村也流傳着大量的民間故事。這些故事充滿了有關當地或者鄰近地區一些成功人物的傳説。這些人離開了他們所在的湖南地區，並在中國這個最高層次的大舞臺上取得了偉大成就。這個地區，曾經産生了一大長串的偉大將軍。此外，還有像曾國藩、左宗棠那樣偉大的讀書人與政治家。他們是 19 世紀朝廷鎮壓叛亂與匪徒的英雄人物。反過來説，大概也是成立的：長久以來，這個地區就曾培養過大量的反抗者與強盜賊匪。

就此而言，指出這一點可能並非冒昧，或者超乎普通人的想法：韶山冲的每個孩子都在夢想，有朝一日能夠成就偉業。如此一來，就很明確地限定了通往成功的道路。這包括接受教育，成爲一個讀書人，然後在衙門中謀取一個出路。在一定意義上，毛澤東的成長環境與美國的那些小城鎮，尤其那些南部市鎮很相似。這些小城鎮看起來很遥遠，與世隔離。但是，也恰恰是這些小城鎮培養了大量的、與其自身規模不成比例的參議院和衆議院議員。偏僻、冷淡而與世隔絶，這些詞不但抓住了韶山冲地區的特徵，也是毛澤東本人的性格特點。終其一生，毛澤東都一直單獨行動，與人不和群，甚至在行動與衝突的漩渦中心也是如此。在現代歷史上，沒有一個主要的政治領導人物會在行事方式上表現得如此私人化，在公開拋頭露面上如此有限，在政治生活的日常運作與公開行動上表現出如此疏離感，以及對建議者和協商者們如此冷漠。

中國文化相當明智地形成了某些傳統習俗，以便約束、克制、戰勝人口密集而衆多的現實，也因而出現了一種隨之而來的缺乏隱私感(absence of privacy)。如此一來，這種文化就在行爲方式與處事風格上促成了這樣一種現象，即將孤獨感、冷漠感與個人尊嚴普通化或者常規化。對中國人來説，一些在西方人看來難以想象、不可理解的行爲，可能只不過是一種出于防禦性心理的行動反應。中國人學會這種

孤獨、冷漠的行爲方式的目的，是爲了保護自己，免受太多的、過于接近自己的人們給自己帶來破壞性的影響。甚至在中國農村，村莊也被以相當親近的方式建立起來。沒有一個人可以長期忍受孤獨的、一個人的生活。

但是，毛澤東的冷漠與孤獨感，遠遠超越于中國文化的傳統習俗之外。而且，這也是一種與傳統習俗完全不同的秩序方式。他的孤獨感不僅表現在內在的精神方面，還包括行動的方式。在中國文化中，人群的密集性特點，強迫人們以公開的方式來做私人的事情。相應的，在某種程度上，毛澤東總是把自己的公開活動弄得就像私人事務，而他自己的私人活動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毛澤東性格中的這種充滿孤獨感與疏離感的特點，將成年的毛澤東與那個曾經生活在與世隔絕的小山村的、童年時代的毛澤東聯繫起來。而且，這一個性特徵貫穿着毛澤東的整個一生，並產生了一個奇怪的混合，讓人們分不清何者爲物質形式，何者爲精神本質？很大程度上，這一方式與中國風景畫很像；只不過，後者是把天地之間的界限混合起來。

隨着毛澤東的成長，他必然感覺到家庭的經濟狀況在穩步改善。他父親在 16 歲的時候，就入了行伍。這樣做的目的是爲了積累必要的資金，以償還毛澤東的祖父欠下的債務，並買回他們家那些曾經被賣給鄰居們的土地。在毛澤東的童年時代，他家的土地從 15 畝擴大到 22 畝。屋子也加蓋了新的房間，最終，毛澤東家的房屋將成爲當地村落中最大的一座。這一穩步增長的印象必定不斷得到了強化。因爲，這個大屋子後來被分開，其中一部分被另一家佔據了。屬於毛家這一邊的墻，最初是由稀泥塗成的，後來改用燒磚砌成；類似的，屋頂起初是茅草，後來則換成了瓦子。另一家佔據的那部分，在房屋大小和建造材料方面，始終沒有任何變化。這就是爲什么這個屋子現在顯得很奇怪的原因：儘管已經成爲一個全國性旅遊勝地，但外形看起來卻似乎尚未完成。

有關毛澤東童年時代物質方面的豐裕情形，很容易得到印證。譬如，這個屋子前面的大池塘，以及後面那片令人愉悅的、鬱鬱蒼蒼的山林。毛澤東很快就熟悉了這個環境。據某些人稱，他 6 歲的時候就

在這個池塘中自己學會了如何游泳。如此一來，毛澤東就開始對游泳活動形成一個將要終生保持的興趣。而這一活動，幾乎很少有中國人學會，對農民來說尤其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些中國精英旅團的軍隊接受了美國式的訓練。其中，將近百分之十的人學會了游泳。通過發展游泳這一技藝，毛澤東使自己脫離了中國通常的習俗慣例。這樣做的同時，必定也有助于促成毛澤東日益增長的自我確信。當然，毛澤東也將游泳作爲一種與世界溝通的方式。他借此向全世界表明，他很健康，隨時準備保持對中國的控制、管理與駕馭。毛澤東著名的長江之游預告了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幾年以後，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向中國的高級官員們抱怨，他已經忽視游泳大約 30 年了。現在，他不得不努力溫習，以便重新把握這項技術。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的講話要點包括了這樣一些內容：在中國，封建迷信和舊的民間習俗很容易就會復活；但是，即便僅僅爲了革命自身的理由，也必須進行各種戰鬥，以便爭取革命的進步。這樣，毛澤東就明顯地把自己童年時代獨一無二的技藝，與中國發展進步的概念聯繫起來①。

有些親戚把毛澤東的父親視爲整個家族中最富有、最有前途的成員之一。毫無疑問，由於被這樣一些親戚包圍着，毛澤東的自信感就得到了強化。當時，這個社區只包括 300 多家；而現在，卻有將近 700 家。因而，在成長過程中，毛澤東認識日常生活中他遇到的所有人，並且知道他們的名字。在後來的生活中，毛澤東有時候對陌生人有關他的可能看法，表現得極爲敏感。這一傾向很可能來源于這樣一個事實，即只是到很晚的時候，毛澤東才學會在匿名關係中，如何正確地調整自己的行爲。但是，當他還是一個年幼的男孩時，在他的社區關係和鄰居群體中，毛澤東是相當自然的。根據一些小故事，在成年人面前，甚至面對一大群成年人，毛澤東都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害怕與輕微的恐懼。

---

① Richard Solomon 曾經暗示，對毛澤東來說，游泳代表着一種擺脫所有控制、以便獲取自由的方式；特別是擺脫他父親，以及受到忠孝義務約束的各種傳統對他的控制。參見 Richard Solomon，A Revolution Is Not A Dinner Party：A Feast of The Images of Maoist Transformation of China，New York：Doubleday，1975。

在離開鄉村和學校給予他的安全感之後，有些時候毛澤東就會因爲得不到他人的承認而表示出不滿，進而退回自己的世界、封閉自己，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羞愧感。而這種羞愧感，與他的強烈的自信感是完全不一致的。對此的解釋，可能在于這樣一個事實：恰恰是毛澤東年輕時代認識村莊中的每個人這一經驗，使他在面對和處置一些非個人化的關係時，感到有些不舒服。無論如何，有個事實值得注意。在晚年的時候，毛澤東形成一個習慣，即每當遇見一個陌生人，他通常會想方設法，儘可能迅速地證實那些人對他的友好程度。無論何時，只要某些關係只能在非個人化的層次上存在，那么，毛澤東就會傾向于退後、離開。

實際上，在賦予毛澤東自信感方面，比社區環境更重要的，是他的直系家庭成員。有關父親對毛澤東的近乎苛酷的、權威主義式的對待方式，人們已經寫過不少。在恰當的時候，我們將不得不通過某些細節來檢驗毛澤東與父親的關係。顯而易見，父親是他童年時代的一個主導人物。但是，首先我們必須注意整體的家庭環境，以及與其他一些人的關係。這些人顯然都在特定方式上，有助于形成毛澤東非常強烈的、但卻充滿矛盾心理的個性特徵。

毛澤東是家中的長子，比大弟毛澤民大兩歲，比二弟毛澤覃大 12 歲。毛澤覃出生於 1905 年。同年，這個家庭領養了一個女兒，這就是毛澤紅①。她是毛氏家族中一個經濟狀況不佳的成員的孩子②。此外，在毛澤東的童年時代，祖父與他們住在一起。由於祖父是個失敗者，明顯依賴兒子來復興家庭的經濟。因而，祖父並不是一個盛氣凌人、作威作福者。也正因爲如此，他看起來似乎並不値得引起中國傳統中對老年人的那種崇敬之意。相反，他似乎爲這樣一種前景提供了生動的證據，即毛氏家族的每一代人都有可能會超過他們的前代先

① 譯者案：據有關資料記載，這個女孩也叫毛澤健。

② Han Suyin 告訴我們，毛澤紅是領養的孩子，參見 The Morning Delug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2。但是，其他傳記作者從未提及這個事實。雖然如此，考慮到毛澤紅和毛澤覃年紀大約差不多，她似乎很可能是領養的。儘管如此，她必定得到了和親生女兒一樣的待遇；因爲，人們並不清楚她的領養身份。

人。祖父在家庭中的任務，包括幫助照看年輕的毛澤東。反過來，他也是毛澤東很早就學會嘲弄的對象，並使祖父服從自己的意願。更有甚者。由於祖父並非個性很強的人，因而，就強化毛澤東對於家庭里面老年人的權威形象而言，祖父的作用並不重要。相反，他可能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向毛澤東表明了這樣一種觀念，即那些擁有最高的合法權威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可能並沒有很多的權力。如此一來，就促成了毛澤東自信心的發展，使他確信自己能夠操縱、駕馭權威人物。

祖父在家庭中的地位極爲脆弱，也不穩固。就毛澤東的家庭之中國特色而言，這一情形可能是其中最不具有典型意義的一個方面。通常來説，祖父是所有關注的中心，也經常是具有命令性權威的人物。儘管如此，毛澤東幾乎從來沒有提過他祖父的存在。以一種非常奇怪的、非中國化的方式，毛澤東的父母默許了這一情形的存在。不論是他們自己對待祖父的行爲，還是他們對孩子們應怎樣對待祖父的教導，這些都沒有顯示出中國傳統中那種非常重要的價值觀，即對前輩先人們的尊敬。這是値得注意的。因爲，它暗示了毛澤東的父母並沒有遵循儒家傳統的一種基本行爲習慣。他們是堅決果敢、積極進取的父母，但他們並未抓住中國文化中有關令人尊敬問題的一些基本特質。這些基本特質，甚至對通商口岸那些最不講感情的暴發戶來説，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就像後來他們的兒子所作的那樣——並沒有展示出“孝”的恰當精神。

祖父在家庭中的無力地位，也指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除了盛氣凌人的父親，毛澤東從年紀很小的時候起就成爲家庭中的一個中心人物。在毛澤東有關自己童年時代的叙述中，這一點很明顯。他總是將自己描述成一個重要的、關鍵的當事人，而非一個微不足道、可以拋開的旁觀者。毛澤東總是集中思考他自己與別人的關係。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忽視了其他人彼此之間的行爲關係。在毛澤東看來，所有人際關係中最重要的，就是與母親的關係。在這種母子關係中，必定有一些非常特別的東西。毫無疑問，文七妹爲自己的第一個兒子付出了很多。這使她的兒子感覺到，自己應該很特別。但是，當她不得

不分出某些關心給比較小的孩子的時候，她也可能從大兒子那兒拿走某些東西。而這些東西，是毛澤東以後將永遠無法重新獲得的。

毛順生的妻子來自一個鄰近的村莊。她長着一張非常好看的臉，很符合中國北方的傳統的“梨形”特徵①。她還有些胖②。從體質特徵方面看，毛澤東更像他的母親，而非他的父親。文七妹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女人。她性情溫和，爲人大方，容易爲他人的痛苦而打動。她還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並尊奉當地所有的“封建迷信”。她來自于一個更爲貧困的家庭，完全爲丈夫所控制，聽從丈夫的擺布。由於從來沒有受過教育，因而，她對丈夫取得的任何輕微的成就都表現出極大的尊敬。

儘管如此，文七妹卻認爲，既然自己已經生了一個兒子——即毛澤東，因而，自己的人生使命就已經完成了。就她生活的那個時代的中國文化而言，她成了她所生活的那個社區中一個有些重要地位的女人。因爲，她不但第一個孩子是個男孩，甚至在此之後，又生了兩個男孩。她的性情溫柔，充分體現了母愛的哺育本能。她對長子毛澤東很和藹。而僅僅因爲由其所生，毛澤東爲了回報母親，曾經做了很多。總之，母親文七妹用一種寵愛和敬畏相混合的方式來對待童年的毛澤東。

文七妹從來沒有直接地挑戰，或者公開地冒犯過她的丈夫。儘管如此，她也總是冒一定的風險。那是由於她支持、偏袒毛澤東，並與其分享某些秘密，因而激起父親毛順生的不快。以這樣一種方式支持自己的第一個兒子，文七妹就保護了毛澤東，使之免于一些超乎尋常的苛酷壓力。而這些壓力，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長子來說，是必定要遭遇和面對的。她也使毛澤東變得堅強起來，從而使他能夠充分應付自己面臨的情境。在中國家庭中，長子必須忍受向他施加的各種壓力。結果，度過這些壓力的磨難之後，長子就經常會變成一個具有強烈的壓抑性人格的人；同時，還有一種嚴格的順從心理（an intensely

① Robert Payne, Mao Tse-tung: Ruler of Red China,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0, p. 25.

② Edward C. Rice, Mao's W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 3.

inhibited and rigidly conforming personality)。另一種可能是，在這種壓力約束之下，他會精疲力竭，瀕于崩潰，變得完全放縱。這一點，在一旦因父母死亡而導致他們的控制被取消的情況下，尤其如此。文七妹這種溫和的、大度的性格，可能強化了毛澤東作爲一個長子所具有的許多心理優越性。

母親和藹可親，充滿同情心，隨時願意接濟別人。這種性格，令毛澤東非常感激和欣賞。他視母親爲一個典範，“隨時願意與之分享她的某些優良品質”①。毛澤東與母親很容易溝通。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毛澤東似乎感覺到，他比自己的父親更爲理解母親，熱愛母親。首先，他感覺到，並且爲這樣一點而感到高興：他覺得自己具有一種天生的傾向，即和母親站在一起，以便反抗自己的父親。並且，一旦他不再因與父親對抗而感到恐懼，毛澤東就會很高興。因爲他能夠動員自己的母親，站在他這一邊來反對父親。

童年時代的毛澤東，就曾爲母親對佛教的虔誠信仰而吸引。這是他母親特殊興趣的一個重要方面。毛澤東曾經談及，母親如何“向自己的孩子灌輸宗教信仰。我們都因爲父親不信佛而感到傷心。九歲的時候，我曾經同母親認眞地討論過父親不信佛的問題。打那以後，我們嘗試過好幾次，打算把他的信仰轉變過來，但都沒有成功”②。在後文中，我們將重新返回這點，反思一個9歲的孩子對父親有着如此的關注，這就將會有怎樣的重要性。但此處，我們的興趣在于，這個年輕的男孩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與母親認同起來，以及感覺到自己與母親一起關心父親的某個瑕疵。看起來，情形似乎是這樣：毛澤東並非通過與父親認同，或者通過獲得早期自主性，來解決自己的戀母情結問題。恰恰相反，他是通過這樣一種方式實現的：他模仿了母親絕大部分的、慷慨大度的性情，並認同了母親的幻想，即不得不像母親那樣，向父親殘忍、苛酷的要求低頭屈服。這種傾向，可能是毛澤東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2.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4.

個性中女性化因素的一種來源。毛澤東戀母情結的這種解決方式，可能引導他產生某種懷疑。他懷疑其他人可能會以某種不正當的方式，試圖支配他。因而，毛澤東變得高度敏感。他認爲，其他人對自己必定是一種威脅。

如此一來，充滿悖論意味的是，毛澤東就把自信與對可能存在着敵人的高度敏感結合起來。而這種結合，對一個革命政治家來說，是非常有用的。

顯然，文七妹是一個異常虔誠的女人；而且，她的宗教神學觀念就是，在信徒與非信徒之間進行區分。這一事實也意味着她給自己的子女提供了一套信仰觀念系統。按照這套信仰系統，因果關係之間將存在着某種邏輯，而且這種因果鏈條超越了直接的、當下實際可見的因果關係。毛澤東必定正是從母親的這種佛教觀念，以及對“迷信”的精緻化理解中，汲取了他對因果秩序最初的自覺理解的某些因素。實際上，在毛澤東看來，超越于事件的偶然表象之外，存在着某種隱秘的秩序。早在還是個嬰幼兒的時候，他就通過某些表情來傳達自己的各種需要，而母親對此的應對方式具有特定的可靠性與可以預測性。正是從這一經驗與記憶之中，毛澤東必定感覺到，茫茫宇宙中存在着某種秩序；而他，正是這個秩序的中心。

毛澤東的母親能夠把一個由以神秘教義爲基礎的宗教力量所支配的世界，以及另外一個世俗的、實際的世界聯繫起來。這一點可能有助于形成毛澤東的這樣一種能力，即把那些他自己捲入的事件置于一種更加宏大的歷史性情境中。在通過閱讀發現這樣的樂趣之後，毛澤東的這種能力就會變得更加明顯。但是，甚至在毛澤東形成和發展這種能力之前，他就已經顯示出了一種重視較長時段的觀察視角，一種對推遲滿足的實現時間這種價値觀的欣賞，一種對不可避免的死亡的自覺，以及對來世的某種可能的認識等等。所有這些主題，在毛澤東感受到的他母親對宗教的獨特體驗中，可能已經透露出來。

隨着與父親的衝突變得越來越強烈，越來越嚴重，毛澤東也越來越感覺到，自己有能力把母親變成盟友。在與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套用共產主義的政治語彙，以玩笑的口吻來指稱他自己在家庭

中的領導地位。

> “我們家分成兩個‘黨’。一個黨是我的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由我、母親和弟弟組成，甚至有時還包括雇工。儘管如此，在‘反對黨’的‘統一戰線’內部，也存在着意見分歧。我母親的政策主張是間接打擊。凡是針對‘執政黨’的任何明顯的情緒宣泄或者公開的反抗企圖，她都會加以批評，説這不符合中國人的做法。”①

只是在部分程度上，毛澤東的母親是正確的。因爲，即便是她，也不是任何時候都以“中國人的做法”來行事的。當她反對“任何明顯的情緒宣泄”的時候，她確實穩穩地居于中國文化的主流。當她支持間接行動的時候，這也是符合中國文化的傳統的。另一方面，對母親來説，公開與兒子結盟，並與之一起討論某些可供選擇的策略，以便反對父親的權威，這樣的例子並不常見。根據中國的傳統，父親的權威被認爲是絶對的、不容侵犯的；母親可以安慰被馴服了的、規矩的兒子。儘管如此，母親通常不能走得比這更遠，更不用説陰謀與兒子一起，挑戰父親的權威。在中國文化中，權威被認爲是巨大、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因而，權威也就不可能在父母之間進行恰當的區分。這樣一來，行使權威職責的父親就會顯得有種疏離感和孤獨感，而母親則更容易讓人親近。此外，丈夫與妻子之間的重要溝通也存在嚴重的限制。這一切，都爲聰明、狡黠的孩子提供了某種轉圜的空間和餘地，使之能夠利用權威明顯處于分裂狀態而獲益，即通過母親的力量來抵消父親的權威。儘管如此，與大多數西方文化相比，中國文化爲此類活動提供的餘地仍然較少。

確實，中國文化承認，存在着某些怕老婆的懦弱丈夫和強悍的河東獅。這種妻子會以尖酸、刻薄的語言，來譴責家庭中任何一個、乃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2.

至所有成員的失誤與過錯。此外，還存在另一種類型的中國妻子。這類妻子也有着强烈的意志力，但她們的行爲處事具有明顯的消極特點。她們安靜地管理家庭事務，保留自己的意見。文七妹的行爲方式卻是一個例外。因爲，她溫順、謙恭，性情平和，不愛出風頭，傾向于間接行動；但與此同時，卻樂意積極地與兒子共謀反對丈夫。

蕭三是毛澤東的傳記作者之一。從童年時代起，他就認識了毛澤東，並從與毛澤東的長期交談中受益不少。按照蕭三的描述，毛澤東的母親在更多時候表現得像一個傳統的、消極的中國婦女，但偶爾也有其個性剛烈、積極主動的一面。他寫到："作爲家長，父親對孩子們很嚴厲。他也不體諒他的妻子。母親則反對這種家庭管理方式，但她並不是公開地抵制。她會訴諸于溫和的勸告和消極的抵抗。有時候，父親自己單獨吃一些好東西，而把殘羹冷炙留給母親。但母親很有自尊，不會吃這些食物。"①看起來，這樣的描述會更符合中國人的行爲特點。儘管如此，就心理學角度而言，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個現象：毛澤東將母親描繪成一個積極支持他的人；而且相信，自己能夠左右、把握母親的行爲。毛澤東不只將母親視爲自己的保護人，他還視之爲一個可以強迫她來保護自己的人。

所有這些都暗示我們，對毛澤東幼年時期的各種要求，他母親確實做出了非常積極的反應；也因此使毛澤東感覺到，他是異常寶貴、值得珍愛的。這樣的一種假設可能暗示，母親給予毛澤東一種深刻的自信感，在面對衝突的情況下尤其如此。看起來，事情似乎是這樣：作爲對所有這些得自于母親的積極品質的回報，毛澤東寧願把母親描繪成一個毫無私心、相當完美的人。這種解釋也會有助于我們理解，爲什么在攻擊他那明顯非常嚴厲的父親時，毛澤東會顯得那么自信。這是因爲，母親的確認不但讓毛澤東感到自信，還使他認識到：與父親的鬥爭，同時也是在保護母親。

毛澤東認爲自己有一個堅強、富于愛心、給人以自信心的母親。

---

① 蕭三：《毛澤東的青年時代》，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版，第19頁。有趣的是，在1949年8月北京出版的修訂本中，這一有關食物問題的細節被删掉了（譯者案：引文據英文轉譯）。

這一看法，與很多證據相吻合。儘管如此，仍然存在一些有趣的事件。這些事件暗示我們，這種關係可能比上述看法更複雜。而且，毛澤東可能會有一些深刻的焦慮，即母親是否正在回報他自己對她的那種感情。有時候，毛澤東的行爲似乎暗示我們，他正在檢驗母親對他的感情，並且，他甚至準備傷害母親。

毛澤東可能非常珍視他的母親，但是，對於母親對他的感情，他卻充滿矛盾心理。從他某些時候的某些行爲中，我們可以發現他的這種心理。譬如，在上初級小學的時候，一個老師曾經對他很嚴厲；隨後，毛澤東就離家出走。就像在傳統中國常見的那樣，上學的經歷對毛澤東來說，意味着面對一個權威主義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中，人們難以找到直接的安慰與舒適。通常，在經歷"入學震驚"（shock of school）以前，年幼的中國孩童被寵愛和嬌慣，在很多方面甚至被溺愛。當然，這樣寵愛他們的，如果不是父親，那么就是母親[①]。早年的嬌慣溺愛與後來的苛酷要求，這二者之間的對比傾向于使學校老師的紀律性命令變得更加生動、鮮明，有説服力。毛澤東告訴我們，5歲的時候，他就被要求在田間幹活。當時，他就感受到了父親的嚴苛紀律。儘管如此，即將到來的學校經驗對毛澤東來説，仍然是一個"震驚"。特別是當他受到體罰的時候，就更是如此。在毛澤東的學生時代，曾有過這樣一段小插曲。只是人們對此事的具體敘述，稍有不同。按照毛澤東對斯諾所説，這件事發生在他10歲的時候。事情源于老師總打他這一實際情况[②]。其他一些資料則表明，那應該發生在毛澤東只有7歲的時候。當時，他反對中國傳統的舊式教學方法，即讓學生站着背課文[③]。毛澤東向人們表明，自己受到了傷害；反過來，他又試圖以離家出走的方式來傷害他的父母。這並不是一個有效的努

① Francis L. K. Hsu, Under the Ancestor' s Shado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p. 124–25.

③ Han Suyin, The Morning Delug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2, pp. 16–17.

力。因爲，毛澤東離開家門從來沒有超過8華里，亦即2英里多一點。富有啓發意義的是，他聽到了母親的哭喊。顯然，這一點讓毛澤東感到些安慰。最終，毛澤東又回到了家。“因爲他想到，（如果不回去）就沒有人保護母親。”①

這樣一來，每個挑戰行爲就與一定的測試活動相聯繫，以便來確定母親以及——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父親在多大程度上愛他。通過把自己置于明顯危險的境地，並體驗那種孤獨感，毛澤東就認識到，他也能夠冒犯他人。通過發現别人是否願意爲他擔憂，以及記挂他，毛澤東就認識到，他可以借此增強自己的自信。毛澤東很清楚，自己究竟得到了什么。“想不到回家以後，情形有些改善。與此前相比，父親對我變得稍微有些體諒，老師的態度也較爲溫和了些。抗議行動的這些效果，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②

我們相信，毛澤東與母親的關係必定很複雜，充滿了矛盾色彩。我們還懷疑，這種關係部分源于毛澤東對他母親的過度的、近于諂媚的讚揚，以及針對自己對母親的愛而産生的種種抗議。儘管如此，毛澤東承認：他與父親的不斷鬥爭，確實“傷害”了母親。他與父親衝突的細節將留待第六章來討論。但其間有個事實卻很重要，即毛澤東承認，與父親的戰爭可能會傷害他的母親；並且他似乎爲自己與父親衝突、鬥爭的歷史記録而高興。

在尋找毛澤東精神中的“猴氣”因素的過程中，我們也爲某種疑慮所吸引。我們不清楚，在毛澤東聲稱的這種絶對化的理想關係中，可能會存在哪些矛盾心理。確實，毛澤東把母親理想化了，而且這種理想化的程度還很強烈。但這種理想化的強烈程度使我們懷疑：他是否並不是把理想化當作一種心理防禦機制，以便抵消他希圖否認的、非常強烈的内在情感。我們會傾向于設想，毛澤東對他母親情感中的任何潛在的矛盾心理，可能源自于這樣一個事實。即母親最初曾給予

① Robert Payne, Mao Tse-tung: Ruler of Red China,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0,, p. 25.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1.

他無法分割的愛心，不但哺育他，還向他灌輸有關道德價值的基本情感。但後來，毛澤東 2 歲的時候，可能隨着第二個兒子的降生，母親似乎不得不收回自己整個的愛，把她的感情在其他幾個孩子中共同分享，從而拋棄了（abandon）毛澤東。

正如我們預期的那樣，一旦做出矛盾心理這一假設，在直接的關係中就沒有什么東西不能被以一種模糊的、令人困惑的視角來看待。有關這一假設的合理性之檢驗，必須有待于若干方面的考察。這些方面將包括，毛澤東對他的兄弟姐妹的態度，他與父親衝突的情緒性特徵，以及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即他如何對待自己的妻子與孩子。一些行爲曾經被引用，並被當作毛澤東對他母親的熱情心理的證據。而這些行爲，也可以被看作毛澤東對這樣一種情形的理想化或者嘗試性努力，即他試圖向母親證明，他仍然無愧于母親對他的無微不至的愛。譬如，就在走出那段長期飄泊、不規律的生活狀態之後不久——我們將在第七章討論有關這一階段的“心理延緩償付期”（Moratorium），毛澤東重新與家庭取得了聯繫。他獲得了父親的必要支持，重新返回了學校。然後，出于一種對農民母親的明顯關心和愛戴，毛澤東邀請母親去他唸書所在的地方，即大城市長沙[①]。儘管如此，從心理學角度來講，他可能確實想給母親留下這樣的印象，即甚至在沒有她的關愛的情況下，他也能夠取得怎樣的成功。

毛澤東不但經歷過母親對他的眞切關懷和強烈感情的那一段時期，他還體驗過母親拋棄他曾經給他帶來的情感折磨。由於他母親去世時發生的一些事情，上述論題的合理性得到了強化。毛澤東當時還在學校。他說：“在我學生時代的最後一年，母親去世了。與以前的時候相比，現在我更加喪失了回家的興趣。”[②]儘管如此，我們知道毛澤東經常因爲“休息”時間而回家。譬如，母親去世後不久，他就回過一次家。有一張攝于當時的照片，其中有毛澤東、他父親、他兄

① 李鋭：《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 年版，第 8 頁。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50.

弟，以及一個直系血親[1]。這張照片透露出十足的中産階級氣息。父親看起來就像一個富庶的中國商人，穿着一襲長袍，配着絲綢馬甲，戴着一頂絲絨帽子；年長的親戚坐在他旁邊，裝飾與父親類似；在二人之間，是一張桌子。桌子上有一個裝飾鍾，一束花，以及兩只西洋風格的杯子。站在父親旁邊的，是排行第三的兒子，身着一套中山裝。而毛澤東的裝束則是一身傳統的中國長衫。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在衣袖上系着一條黑色的、表示紀念意義的布帶。沒有人會猜到，這是一張農民家庭的照片。

在爲母親服喪期間，毛澤東曾寫過一篇祭母文。就心理學角度而言，這是一篇很有説服力的詩篇。它爲我們提供了一把理解毛澤東個性的鑰匙。毛澤東寫到，母親的愛變得很遥遠，特别是，不再是對他一個人的愛。應當説，這些文字準確地傳達了毛澤東的痛苦、哀思，甚至可能是憤怒。

祭母文[2]

吾母高風，首推博愛。
遠近親疏，一皆覆載。
愷惻慈祥，感動庶匯。
愛力所及，原本眞誠。
不作誑言，不存欺心。
整飭成性，一絲不詭。
手澤所經，皆有條理。
頭腦精密，劈理分情。
事無遺算，物無遁形。
……
病時攬手，酸心結腸。
……

① 譯者案：這張照片可見于原書隨後的照片部分，頁 130。
② 李鋭：《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 年版，第 8 頁。

此時家奠，盡此一觴。
後有言陳，與日俱長。
尚饗！

考慮到這篇詩文是由一個總是能精確傳達自己情感的男人所寫，以上詩句必定給我們的理解帶來某種麻煩。因爲，其中的情緒似乎都被系統地顛倒和翻轉過來。通過一些精確的反義詞，毛澤東試圖來展現自己眞正想表達的那些情感；而這些詞彙的選擇看起來似乎有明顯的意圖。當他寫到“遠近親疏，一皆覆載”的時候，難道毛澤東的眞正意圖不正是在說，某種程度上，作爲第一個出生的孩子、作爲母親的兒子，他並未得到母親的特別關愛嗎？在某個情境中，這些言辭本來可能是一種表揚。但在母子關係這一情境下，這些言辭就變成了一種幾乎不加掩飾的批評。簡而言之，這篇詩文講述的就是：由於母親把自己的愛均等地施于毛澤東以及他的其他兄弟姐妹，因而，毛澤東感受到某種被被拋棄了的感覺。當說母親“不作誑言，不存欺心”的時候，毛澤東似乎在表達某種他本來深深希望出現的情形。母親可能曾經欺騙過自己，這一反思行爲是令人煩惱的。因而，在隨後的一句詩文中，毛澤東不得不從情感的領域中抽身出來，轉而插入兩句對母親的推理、計劃與計算能力的評論。儘管如此，難道毛澤東不正是在說，母親對他並未毫無保留地付出自己的全部情感，而且這一行爲完全是有意識的，是經過精心算計的？換言之，所發生的一切並非是偶然的；相反，這是精心謀劃的結果。在這里，我們確實發現這樣一條線索：毛澤東一直懷疑，在情感領域中，理性和謀劃活動是某種掩飾與欺騙行爲的面具。在隨後幾句中，可能是出于一種無意識，毛澤東告訴我們：他知道，藉助于“生病”，他可以重新抓住母親的充分關注和全部感情。他還知道，對那些應該爲自己冷落和拋棄毛澤東的行爲而感到愧疚的人，他有辦法懲罰他們。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在毛澤東的整個革命生涯中，每當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乃至忽視的時候，他就會經常得病。最後，在詩文的末句，毛澤東爲自己的個人情感拉起了一道帷幕。藉助于非個人的、公衆道德的大氅，他掩飾

了自己的眞實情感。

母親最初曾經給予毛澤東一定的安全感。但母親也教會他認識到這一點，即不應該指望人們的感情會持久。爲了保護自己，免于將來可能會出現的失望，就有必要將情感普通化、一般化，而不是再次將其特殊化、具體化（necessary to generalize ranther than ever again particularize affection)。旣然一度曾經被“拋棄”過，就有必要保護自己的感情。從此以後，爲了使自己免于情感義務的重負，就要總是第一個來切斷這種情感紐帶。

這樣看來，毛澤東的詩詞就爲我們提供了這樣一條線索：毛澤東生活中的一個中心主題，可能就是有關拋棄與被拋棄的感覺（a theme of abandonment)。這種拋棄感不但是一種危險，毛澤東對此不得不總是保持警惕；它還是一種心理設置，藉助這種心理設置，毛澤東首先可以用來保護自己。當我們考察毛澤東在其他情境中對親密關係的態度時，尤其是在考察毛澤東對待他自己的妻子與孩子的方式，以及他與同事們之間友誼關係的類型時，我們將會驗證上述假設性論題的有效性。

就作爲公衆人物的毛澤東而言，我們在這里發現了部分的解釋。這種解釋有助于我們理解，爲什么對忠誠、革命義務與背叛等問題，毛澤東會表現出那么非同尋常的敏感。

最初曾經得到過溫暖的哺育之愛，後來卻體驗了被拋棄之感。這種不同經歷的奇異結合也有助于解釋這樣一個問題，即針對人們的情緒與感情對革命動員的重要性，毛澤東表現出非同尋常的欣賞。他不但感覺到利用感情進行革命動員的可能性，還認識到熱情可能會消失的危險性。毛澤東一度曾經掌握、控制過母親的全部關愛。這一經歷使他可能渴望對母子關係進行某種近于虛幻的理想化。從這種渴望出發，毛澤東還可能引申出這樣一種洞見：他相信大多數人們心中的願望的巨大潛能。他把人們對某種願望的希求轉化成對意志力的崇拜。毛澤東感覺到，在一度曾經認識到的、完全把握自己所在的宇宙的那種幸福感，以及一種頑強的信念之間，存在着一定的聯繫。在毛澤東看來，只要意志力足夠強，任何目標都可以實現。儘管如此，毛澤東

也體驗到某種疑慮。確實，那是一種深深的恐懼。他認識到，由於他人虛假做作、裝腔作勢的情感表演，一個人可能會被騙上當，失去對自我的把握。這樣看來，毛澤東早年的個人經歷可能就爲他後來的公共生活準備了條件。這些經歷使他對這樣一些事物有着非比尋常的高度敏感，譬如：對安全感的渴望，對人民大衆的迷戀，對烏托邦理想的冲動，以及對情緒性表達的熱愛等。所有這些，都使這個未來的領導人可能爲某些人提供希望；若非如此，那些人本來會變得毫無希望。但是，他們也沒有因此而喪失有關某種天眞的依賴性心理的不自覺記憶。這種依賴性，與完全的自我把握是難以截然分清的。毛澤東總是向他人灌輸意志力的有效性。儘管如此，他總是懷疑，情緒並不持久，失望是可能的。就其個人而言，他一定不能允許自己的慾望主導自己的行動。

理解情感的潛能，但又懷疑情感的持久性（understanding of the potency of affect but distrust of its durability ）——在毛澤東政治風格的各種特徵中，這是一個中心主題。一次又一次的，毛澤東能夠達致中國人民內心情感的深處，並激發、調動起他們這種波濤洶涌的情感；一次又一次的，毛澤東對人民群衆維係他們熱情的能力表示出懷疑；一次又一次的，毛澤東能夠從情緒性的政策，轉向冷酷的、現實主義的規劃，卻又沒有絲毫個人因素捲入的最輕微迹象。這樣看來，有關拋棄感和被拋棄感，以及對情感的把握與懷疑這兩種情形的雙重性論題，似乎就構成了毛澤東從他母親那兒獲取的遺產的一部分。如前所述，母親還給予毛澤東某種自信感，使之尋求成爲情感等各種事物的主人，而非被支配者。

毛澤東本人對此的反應是，欣賞情感在人類事物中的重要性，但從來不會允許自己再度在情感方面變得依賴于他人。從那以後，毛澤東的目標是尋求自我滿足。沒有一個人會像母親曾經愛過毛澤東那樣愛他。儘管如此，母親卻破壞了毛澤東對愛與被愛的信任。因此，毛澤東必然會假定，所有那些假裝忠誠的人，也會背叛他的信任。

在形成他的基本性格方面，毛澤東與他母親的關係是非常關鍵的。當考察毛澤東一生中與女人的關係時，我們還會發現有關這一假

定的進一步證據。在青少年時期，毛澤東就強烈抵制任何帶有浪漫色彩的關係。他還抹煞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但卻把女人視爲處于從屬者地位。只是在大約 27 歲的時候，他才有了自己的第一次戀愛。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從未有過一個穩定、持久的夫婦關係。

看起來，毛澤東的詩文似乎不僅揭示了他對情感的不信任。這些詩文還透露了毛澤東的這樣一種傾向，即把理想化作爲一種心理防禦機制（idealization as a defense），以便抵禦自己的情感可能遇到的威脅。通過把母親理想化，並使她與整個世界變得相關，毛澤東就使自己再度確信，他自己的感情是對的。然後，他就能夠否認，自己對母親有任何負面的、消極的感情。

我們認爲，由於這種被母親拋棄的感覺，毛澤東在情感方面就受到了強烈的、極爲痛苦的打擊。這種看法的一個重要驗證，通過毛澤東對待比自己小的兄弟姐妹們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來。就像在大多數文化中一樣，如果一個人失去了母親的關心，那么他可以通過特定的方式來得到合理的彌補。在中國文化中，這種補償方式就是：鼓勵較大的孩子尋求新的情感依託對象，允許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支配年幼的兄弟姐妹，並對他們負責。否則，這些年幼的兄弟姐妹就可能同他一起競爭母親的愛。因此，下一步就毛澤東與他的兩個兄弟和一個妹妹的關係進行一番考察，就是很恰當的。我們知道，中國文化通常爲長子保留了某種心理滿足。但是，爲什么在毛澤東的家庭中，他的兄弟姐妹們卻顯然沒有爲他提供這些心理滿足？這是我們在下一章中將要追問的。

第五章　兄弟姐妹

就在毛澤東接近兩歲、剛剛學會説話時，他母親又生了一個兒子，這就是毛澤民。對韶山冲這個小山村來説，這件事不可能再像文七妹當初生第一個男孩——毛澤東時，那般富有戲劇性。儘管如此，對毛氏家族來説，又一個男嬰的降生必定仍然引起了一番巨大的轟動。熟悉這個家庭的每個人都必定認識到，文七妹實在是一個特别的女人。因爲，在生男孩兒方面，她的運氣實在是太好了。

有關毛澤東對這一事件的情感態度，我們從他後來向埃德加·斯諾提供的有關童年時代的自傳性報告中，可以發現一些蛛絲馬迹。在毛澤東的這一整段回憶中，有個非常引人注目的奇怪現象；且從心理學角度而言，極具啓發意義。這個現象就是，毛澤東只在一句話中提到過他的大弟毛澤民；而對比他小 12 歲的二弟以及妹妹，他提都沒提過。論述中唯一提到毛澤民的那句話，還是有關組織“統一戰線”來反抗父親的（參見上文頁 78[①]）。在整個自傳性敘述中，毛澤東基本上把自己描繪成一個獨子，不得不獨自一人與父親孤軍作戰。更有甚者，我們也沒有發現哪怕任何一句公開的陳述，來表達他對自己的兄弟姐妹們的那種強烈的、積極的情感。

考慮到毛澤東提及自己對父親的敵意時的那種相對開放性，這一點就顯得更加突出。如果隨着毛澤東離開家，他的兄弟姐妹們也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那么，這一奇怪的空白可以很容易得到解釋。但事實並非如此。恰恰相反，由於與毛澤東有一定的家庭關係，結果，他的三個兄弟姐妹都因反動派的殘酷鎮壓而犧牲。

① 譯者案：這是英文版的頁碼。

因爲他們與毛澤東的血緣關係，毛澤東的兩個兄弟、一個妹妹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價。但是，毛澤東對他們卻表示出如此的沉默。就心理學角度而言，這就爲我們的理解提供了某種證據。我們認爲，在潛意識層次上，毛澤東對自己的兄弟姐妹們非常不滿意，因爲他們侵入了自己的世界，從而使之體驗到被母親拋棄的那種感覺。當時的情形很明顯，但我們只能推斷出這些心理反應。儘管如此，我們似乎很有理由揣測，當時肯定發生了什么。因爲，在毛澤東隨後的整個一生中，我們可以發現如此之多的證據。這些證據表明，毛澤東從那以後對拋棄問題（the matter of abandonment）——或者說情感紐帶的脫落與斷裂（the breaking of affective ties）——表現出高度的敏感。就個人情緒而言，對任何類似于受到忽視的現象，毛澤東總會表現得很尖刻。

譬如，對受到忽視問題，毛澤東有這樣一段敘述值得注意。這件事發生在他26歲的時候。當時，毛澤東還在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作圖書管理員。但是，他感到那些他所景仰的人根本就忽視他，無視他的存在。因此，毛澤東覺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傷害。其時，他剛從湖南省的一個師範學校畢業。非常幸運的，通過他最喜愛的一個老師的親自干預，毛澤東就成爲當時全國最富盛名的大學的圖書館的一個管理員。確實，這位老師把毛澤東引介給李大釗——當時北京大學最著名的教授之一，也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一員；後來還幫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其時，李大釗是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也是北京大學文科主任。客觀而言，對年輕的毛澤東來說，形勢已經相當不錯。畢竟，他現在已經突然接近了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的中心。儘管如此，毛澤東尖刻地談及自己被忽視的情形："由於我的職位太低下，因而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者的姓名。可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我曾經試圖同他們探討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管理員講南方土話。"[1]

---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51。

後來的一些年中，毛澤東曾多次在黨內會議上表明，自己希望成爲中心人物。毛澤東的行動表明，他的目的並不是爲了權力而鬥爭。相反，他希望，那是超越于同輩人之上的某種自然權利。當沒有得到這種待遇時，毛澤東就會傾向于採取這樣一種周期性的行動策略，即先是戰略收縮，進入沉默和與人隔離的孤立狀態；然後，就會以激烈的形式爆發。中國共產黨曾經歷過一些波摺起伏。但與此相比，毛澤東的波折經歷似乎更加極端。譬如，1958年以後，隨着大躍進運動的失敗，人們日益覺醒。外部世界都很清楚，毛澤東此時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降低了。幾年以後，毛澤東才相當尖銳地談及："(他們) 許多事都不與我商量……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1959年到現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高指標弄得我毫無辦法。到北京開會，你們要開六天，我要開一天還不行。"[①] 然後，毛澤東就以比喻性的口吻說到，他被劉少奇和鄧小平忽視了。他們對待毛澤東，就像"如喪考妣"。毛澤東的這一譬喻讓人們想起傳統中國的葬禮。在這樣的葬禮上，人們對死者表現出極大的尊重與敬意。但是，葬禮上也充滿了儀式化、禮節性的痛哭。當然，其中還包括了某種幾乎不加掩飾的解脫感，即隨着父母權威的終結，個體開始獲得某些自主行爲的權利。這種情形並非少見。由此看來，這段敘述似乎反映了正在老去的毛澤東的某些情緒。這是非常可能的。毛澤東面臨着死亡的前景。他擔心，自己死後只會獲得禮儀上的尊敬，而在實質上卻被忽視、乃至遺忘。儘管如此，在被忽視和生死問題這二者之間，確實可能存在某種聯繫。因爲，有關死亡的虛空性的啓蒙知識，可能始自于有關生命誕生的鮮活認知；而新生命的誕生則教導我們，存在與不存在（或者生存與死亡）之間的距離並不遙遠。一個新的競爭者的到來，可能也會激起毀滅競爭者的渴望，或者通過自我毀滅來實現復仇的幻想。至少，一個年輕的兄弟姐妹的誕生這種經歷，可以使現實生活變得很生動、很眞實。換言之，每一個生命都有其終點。因爲，認識到一個生命的開始是多么突然，就是感覺到同樣的前景，即每一個生命都有其突然

①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工作彙報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24日。

的終結。較大的孩子知道，在新的兄弟出生以前，家庭中的生命正在以常規的方式不斷演進。他可能還會希望，將來的生命仍以這種常規的方式進行。但是，他也可能爲這樣一種情形而震驚，即這個世界會多么輕易地就忽視自己的生與死。對他來説，曾經非常重要的那種東西，即他自己的寶貴性，可能在突然之間就會變得對他人來説似乎一點兒也不重要。如果某個人曾經希望，他的兄弟將會返回不存在的狀態，那么，他就會更加強烈地感覺到這種基于另一個新生命誕生的客觀體驗而形成的、有關自我重要性的主官認知。

毛澤東經常提及，他覺得自己是這個世界上的一個孤獨的、不爲人喜愛的流浪者。簡單來説，毛澤東提及這種感覺時那種特別的生動與眞實，在某種無法確定的程度上可能與他經歷的巨大痛苦有關。這種苦痛經歷就是，隨着兄弟們的出生，毛澤東失去了母親無法分割的愛曾給予他的那種安全感。毛澤東後來成長爲一個綜合了各種心理特點的人，譬如：渴望某種作爲自然權利的領導權；反對任何爲了權力本身或者吸引關注而鬥爭的心理冲動；爲人輕視和受人忽略很容易使他倍感痛苦，對他自己生命中的歷史現象高度敏感；更有甚者，對有關自己的冷漠與疏離感表現出敏鋭的感覺，能夠輕鬆、生動地談及孤獨感，談論離開這個世界以及他自己的死亡。所有這些個性特徵似乎都暗示我們，毛澤東確實以相當豐富的形式經歷了所有的心理潜能。這種心理潜能可能是面對另一個生命誕生時，家庭中最大的孩子的強烈體驗。

在進一步深入探討毛澤東與其兄弟姐妹的關係之前，我們必須先注意一下，他那個時代的中國文化對兄弟姐妹彼此之間的行爲有何期望。有關毛澤東可能經歷的巨大痛苦，我們已經討論了很多。但是，爲了理解那些似乎是他對此做出反應的重要性，我們就有必要注意一下：在多大程度上，中國文化讚揚作爲家庭中第一個孩子所可能具有的積極一面，而忽視其消極意義。中國人曾爲兄弟姐妹的出生順序化賦予了極大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可能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一種文化都無法比擬的。儘管從法律上講，中國人並不實行長子繼承制。但中國人確實總是認爲，對任何個體的性格形成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是他的

出生順序。中國人並不止是用兄弟（brothers）和姐妹（sisters）這兩個範疇來指稱同輩關係。相反，中國人的稱呼方式將會指明，你有幾個比你大的哥哥、姐姐，以及比你小的弟弟、妹妹。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就非常清楚地把每個人置于各自在家庭中所處的等級地位上。藉助于如此精確的方式，中國人通常就指明了一個人在兄弟姐妹們中的排行。由此，中國人傾向于強調個體的某種特性；當然，同時仍賦予集體以優先性。非常奇怪的是，西方文化中缺乏這種傳統。因爲西方人的通常看法是，個體比集體更重要。

和中國文化相對，當西方人面對一些極其困難、難以選擇的決定時，長子繼承權（primogeniture）的法律概念通常被認爲是避免這類問題的最方便、最簡易的方法。而在實際判斷那些影響個人性格特徵的若干因素時，人們傾向于把兄弟姐妹相對年齡的作用看得微不足道，或者說將排行順序的重要性最小化。儘管大量的經驗性證據表明，第一個出生的孩子、中間的孩子，以及最後一個孩子基本上是不同的，但西方有關個性成長的理論卻不這樣看待問題。他們認爲，在經歷相同的成長階段時，所有個體就如同始終處于完全一樣的環境中。而對中國人來説，出生順序是評價任何個體的可能性格的自然出發點。

作爲家中的長子和大哥，毛澤東被期望承擔一些終生的責任。作爲長子，父親不得不以某些特殊的方式來對待他；並在某些義務方面，對他有所期望。在談論毛澤東與他父親的關係時，我們會考察這些責任與義務。作爲老大哥，每個人——不止是他的家庭、宗族，乃至他所在的社區中的每個人——都希望毛澤東能夠對年幼的兩個弟弟與一個妹妹承擔起某些責任。

傳統上，中國人並不認爲老大哥的責任是沉重的。相反，他們傾向于把兄弟情誼的觀念理想化，並讚揚這種被假定爲親密無間的兄弟關係。在中國文化中，僅次于孝道的、最受尊敬的關係，存在于富于保護性與幫助性的較年長的哥哥和忠誠的、充滿感激的、有依賴心理的年幼的弟弟之間。中國人的一個基本道德假設就是，兄弟之間，只應該有尊重、理解和不可破滅的忠誠紐帶。中國人承認，在這種理想

化了的純潔性和忠孝情感的背後，父子之間可能仍然存在着緊張的基礎。而這種緊張，不得不通過正式的訓練才能克服。儘管如此，中國人仍然傾向于希望，兄弟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更加自然、更加自發的關係。

不消說，在具體的實踐中，中國人也無法擺脱兄弟關係的那種自然的、天生的矛盾。實際上，中國家庭中的潛在競爭非常激烈。因爲，父母可以合法地把長子鑄造成一個負責任的角色；但與此同時，又嬌慣、放縱年幼的孩子。更有甚者，中國文化並不堅持對所有的孩子進行“公正”(fairness)、平等的對待。相反，中國父母們被賦予極大的自由。通過某些具體的行爲，他們可以展示，哪個孩子是他們的最愛，哪個孩子並不討他們的歡心。根據中國傳統的看法，權威可以隨心所欲，根據他們自己偶然想到的各種稀奇古怪的念頭來行事。確實，權威可以大張旗鼓地承認那些自己寵愛的人，也可以獎賞那些尋求自己支持的人。部分的，這一看法源于某種長久建立起來的、有關父親行事的社會慣例。這些慣例不但包括父親不斷讓孩子們猜測，在任何時候，誰是最受偏愛的。它還包括，父親獎賞這樣的孩子，因爲他們是父母當時當地感覺到幸福的原因。

所有這些行爲的後果，就是經常在兄弟姐妹，尤其兄弟之間造成一定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既是爲了博取父母的歡心而進行的潛在競爭的一個結果，也反映了爲維係年長的哥哥和年幼的弟弟之間的理想化關係，人們所做的各種努力中體現出來的張力。兄弟關係，是儒家文化中五種重要的人際關係（即五倫）之一。確實，一旦往日共同擁有的父母權威消失了，兄弟們在家庭關係中的通常類型就是各分東西。儘管如此，中國人以一種非常實際的眼光發現，通過爲每個孩子賦予各自不同、獨一無二的報酬與義務，兄弟姐妹間的緊張就可以被弱化。

中國傳統文化假定，那種因新生兒的出現而可能給年長的孩子帶來的震驚，可以通過特定的方式抵消掉。這種方式就是，立刻爲年長的孩子賦予更大的責任感。這個孩子很快被灌輸了這樣一些信念，如他的長子角色是勿庸置疑的，也總是安全的；他可以總是擁有某些特

定的優勢以及準父母式的義務。這樣一來，儘管失去了父母對他的無法分割的愛，但是通過接受自己在家庭中一個新的、特別的身份，他就被認爲獲得了補償。更進一步的，一旦具有了特定的行爲能力——當然是在上學以前——他就會被要求負責照看年幼的弟妹，管理、甚至懲戒他們。中國傳統社會場景中最普通、最常見的一種現象就是，在與其他孩子一起玩的時候，年長的孩子不得不背着一個年幼的弟妹。

這樣一來，較大的孩子在很小時就被鼓勵，要避免把自己想象成處于和年幼的弟弟的競爭狀態中。相反，應該把自己與年幼的孩子們的關係看作是某種早熟的、父母式的。同時，由於父親的敦促，這種對心理成熟的鼓勵被進一步強化了。具體來說，父親會敦促兒子模仿自己行爲處事的規則慣例，並要求他儘早學會與其職責有關的技能與策略。

請記住中國傳統文化的這些特徵。現在，讓我們轉向毛澤東，看看隨着不斷經歷新的兄弟姐妹的出生與來臨，在毛澤東的家庭中究竟發生了哪些事。第一個弟弟的出生，比毛澤東晚幾乎不到兩年。而二弟的出生，則更幾乎是十年以後的事。這種情形意味着，孩子們的出生順序並未給毛澤東帶來那種依據傳統，爲年長的大哥而準備的心理酬報。第一個弟弟出生的時候，毛澤東年齡已經足夠大，可以享受由母親無法分割的愛而帶來的種種喜悅。但是，他仍然沒有成熟到可以承擔準父母的角色。而到二弟和妹妹出生時，毛澤東年紀已經太大，無法繼續感受到弟妹們的阿諛奉承所能帶來的那種激動與狂喜。同時，毛澤東已經成熟到可以承擔一些繁重的任務。

毛澤東完全拒絕中國文化中那些爲緩解長子角色的壓力而提供的種種機制。不但是兄弟姐妹們的出生順序，還有毛澤東對母親的愛表現出的那種原初感情的強烈程度，這二者必定促使毛澤東打算堅決抵制上述補償機制。證據清楚地表明，與反對子女的忠孝角色相比，毛澤東對儒家兄弟角色的抵抗更加強烈、更加有力。他絕對排斥那些應該由長兄承擔的責任，也拒絕接受由所謂早熟的、父母式的特權角色提供的那種補償。

在此過程中，毛澤東也拋棄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認同父親的角色及其所應承擔的職責性活動。

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在毛澤東有關他自己和父親關係的描述中，他總是堅稱，父親曾經對他做出過苛刻的、充滿權威色彩的要求。儘管如此，從中國傳統的家庭關係這一視角來看，用一種不同的眼光來看待這些被認爲是“苛求”的東西，這不是不可能的。確實，我們還可以將這些“苛求”中的許多方面，視作一個父親爲了幫助自己的兒子而作出的嘗試性努力。這樣做的目的，不過是爲了幫助兒子學會承擔孝敬父母、敦睦兄弟關係時所必需承擔的某些責任。譬如，毛澤東聲稱：“我剛識幾個字，父親便讓我開始給家里記賬。他還要我學會用算盤。”①按照毛澤東的看法，父親在粗暴地虐待他。但在其他一些中國人看來，他們可能把父親的要求解釋爲某種努力，以便幫助長子發現早熟的、成年人生活的樂趣。畢竟，父親正在鼓勵兒子從事一些活動，這些活動一旦被掌握，將會確保兒子的日後前程，並且超過父親取得的成就。我們有理由懷疑，毛澤東對他父親的意圖所作的解釋。因爲，第二個兒子並未反抗父親的鼓勵。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他成了一個合格的記賬者和會計人員，並最終成爲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最熟練的經濟學家之一。

在拒絕接受長子角色所應承擔的責任的同時，毛澤東也抵制傳統上爲長子提供的那種補償。這種補償包括，因被允許管理和監督年幼的兄弟姐妹們的活動而帶來的種種樂趣。儘管渴望成爲一個領導人物，但從對他人活動的瑣碎管理和監督中，成年的毛澤東從未發現過任何滿足。毫無疑問，這一點非常重要。毛澤東對領導權的看法是：提供寬泛的政策，而不是作爲一個執行具體事務的行政長官。類似的，成年的毛澤東對年輕人的發展表示出濃厚的興趣。但是，他的關注總是集中于各種政策的形成，並制訂有關不同形式教育政策重要性的決策。毛澤東從來不會關注對年輕人的實際監督。他選擇了教育職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1.

業，以便訓練自己；但是，毛澤東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個教室中履行過持久的職責。

毛澤東的所有這些習性，強化了我們的這樣一種理解，即毛澤東強烈拒絕承擔長兄的各種義務。在這樣做的時候，毛澤東依賴于某種理想化的心理機制。當失去母親無法分割的愛的時候，毛澤東也正是以同樣的一種心理防禦機制來處理自己的巨大痛苦。因此，我們一點也不必吃驚，青少年時期的毛澤東總能夠在這樣兩種選擇中保持平衡。一方面，是對真實的、兄弟性責任的拒絕；另一方面，是對理想化兄弟情誼關係的追求。當毛澤東的年齡大到足以承擔長兄的各種責任時，他正沉浸于閱讀各種充滿浪漫色彩的歷史以及《水滸傳》①的故事。而後者，正是一本將歃血爲盟、志同道合、充滿兄弟般友誼的結義好漢們的故事理想化的書。這種閱讀經歷使毛澤東感覺到，可以參與兄弟般的關係，而不必承擔特定程度、就如他作爲長兄的角色所被預期的那種責任。年輕的毛澤東如何從他最喜愛的、中國古代的浪漫故事等童年讀物中，形成了他對反抗、革命和戰爭等諸種問題的看法？有關這一問題，那些探討毛澤東智識發展的學者們已經作過大量研究。儘管如此，事實似乎可能是這樣，即從他的閱讀經驗中，毛澤東不止吸取了有關反抗的奇異念頭。在他的情感發展歷程中，毛澤東遇到過一種理想化的、兄弟之間關係平等的氛圍。這一氛圍，可以爲毛澤東提供某種擺脫困境的途徑，既免于承擔直接的責任，又不會有較深的負罪感。

毛澤東離開家以後，在他與同學的關係，以及隨後與共產黨內革命同志的關係中，他似乎一直在尋找某種嶄新的兄弟式情誼關係。在這種關係中，毛澤東可以是個年長的大哥；但是，既不必承擔儒家式的義務與責任，也沒有任何威脅。這種威脅，和爲了爭取父母的關注與愛心，而與年幼的兄弟姐妹們競相爭寵所導致的那種威脅類似。毛

① 從字面上講，這部小說的名字是“發生在水邊的傳說故事”（Water Margin Tales）。但是，賽珍珠（Pearl Buck）在翻譯這部有關一群造反者的浪漫小說時，準確地抓住了它的基本精神。賽氏稱之爲：“所有人都是兄弟”，或者說“四海之內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New York：John Day，1933）。

澤東追求的，是一種形式全新的兄弟式情誼關係。這種關係將會具有那些超越于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外的兄弟情誼所擁有的全部積極情感，同時，還沒有實際的兄弟關係中的那種緊張、約束和潛在競爭。隨着毛澤東日益老去，他不斷努力鬥爭，希望能夠在中國維持一種革命熱情，正如他一度曾經熟悉的那種。在此過程中，對兄弟般情誼的無私精神的讚美，就是一個主要的論題。作爲一個 70 多歲的老人，毛澤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想法。他認爲，應該在中國年輕一代中，灌輸兄弟般情誼的崇高意義。而這種令人愉悅的兄弟情誼，正是毛澤東在自己奇特而孤獨的人生旅途中，希圖從革命實踐活動中加以追尋的。

毛澤東傾向于把理想化的、兄弟情誼式的人際紐帶，作爲自己的一種心理防禦機制。作爲一個政治領導人，這一私人偏好使毛澤東有可能向那些會對他的告誡做出積極反應的那一代中國人傳達某種信息。毛澤東希望傳達的信息就是，他可以爲他們提供一個純潔版本的新社會藍圖；而這一新社會，正好與舊社會構成對比。在舊社會中，圍繞着舊式儒家傳統的行爲規範的是虛僞；而且，其中兄弟關係的標準也是造作的、不自然的。爲抵制因他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而應承擔的義務，毛澤東得以通過戲劇化的方式，描繪出某種嶄新的家庭形式。在毛澤東看來，這一家庭形式是新社會中值得提倡的理想追求。而且，這種新社會已經準備好爲傳統的、習以爲常的道德準則，尋求某種替代物。

諸如《水滸傳》之類的通俗小說，曾經描繪過一些強盜團夥和反抗群體。對好幾代中國人來說，這些強盜和反抗者的神秘性，很大程度上在于一種真誠、純潔、免于衝突和緊張的兄弟式的同志情誼的精神。與傳統的儒教觀念相比，這一精神似乎抓住了兄弟式情誼的某種更加真實的意義。在傳統的儒家觀念中，兄弟這一概念是建立于某些有關兄弟間彼此義務的嚴格規則的基礎之上的。這種兄弟觀念是僵化的、缺乏彈性的，而且從道德角度而言，還是很苛刻的。前述《水滸傳》之類的那些小說的吸引力在于，在描繪那些一向被認爲是非法之徒的人們時，他們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被塗上某種親密的風格與色彩。顯然，較之正統的儒家式道德觀念，這種人際關係更加真實，更

加值得讚揚。毛澤東最初從一些小説中，發現了這種革命式的兄弟情誼的精神。後來，在中國共産黨領導革命運動的早期階段，他曾經尋求在共産主義組織中實現具有這種兄弟情誼之精神的人際關係。但是，卻並不很成功。儘管如此，在毛澤東對中國人民的各種呼籲中，這種革命式兄弟情誼的精神始終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要素。大多數中國人曾經體驗過儒家道德規範的嚴苛要求。他們也知道，應該存在某種理想的兄弟關係。因而，這些中國人能夠在不同程度上，理解某種免于緊張、沒有衝突的理想化兄弟關係。按照毛澤東的看法，這種理想應該是可能的。更加純潔，較少僞飾與造作，體現了更多的自由精神，而沒有那么多的繁文縟節——這種理想化的兄弟關係對毛澤東有着如此重大的意義，以至於他將其視爲對中國的年輕一代來説，也是非常寶貴的東西。出于對自己個性經歷的某種回應，毛澤東逐步開始確信，一旦體驗過如此非儒家化的、沒有競爭的兄弟關係所提供的種種樂趣，年輕一代就會像毛澤東當年所作的那樣，從來不會再想失去那種兄弟精神。當然，對那些使這種全新的、體現上述精神的兄弟關係成爲可能的東西，年輕一代也應該總是好好珍惜。

1975年下半年的時候，毛澤東對《水滸傳》的指責令人震驚。他將之視爲一個有關“投降主義”的“反面教員”。這就爲這樣一個事實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實際上，毛澤東是在把理想化的兄弟關係視爲一種心理防禦機制，以便提醒自己，保持對兄弟情誼的平靜心態。迫于政治壓力，毛澤東能夠轉而反對他一直喜愛的小説。終其一生，毛澤東曾經一直將《水滸傳》中那個反叛群體的兄弟式的同志情誼的關係理想化。而到他老年的時候，毛澤東承認，在這種理想化的關係中，實際上存在某些基本上是虛假的、不眞實的東西。

現在，我們必須返回有關毛澤東個人的某些分析。我們要確定一下，在毛澤東開始認識到自己爲母親拋棄以後，他對待兄弟姐妹們的那些事實，是否支持我們有關毛澤東情感發展歷程的種種設想。毛澤東曾經描述了自己與父親在很多問題上的衝突。實際上，這些問題也會對他的兄弟姐妹們産生影響。而且，這種影響的程度如果不是比毛澤東更強烈的話，那么至少也是與他同樣的。在描述這些情況的時

候，毛澤東對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們表現出來的那種非同尋常的沉默，就變得更加重要。譬如，毛澤東曾經告訴蕭瑜，在他決定上學的時候，父親首先問他怎樣才能支付自己的各種花費。毛澤東向父親表明，自己有一些必要的積蓄。然後，父親説："如果你離開家，我就會人手不足，缺少勞動力。你走以後，誰來幫我干田里的活？你説我不必爲任何東西付錢。但是，你忘了，爲了取代你的位置，我不得不再雇一個勞動力。你知道，兒子，我無力支付這筆費用。"①最後，毛澤東從一個親戚那兒借到了足夠的錢，來補償因自己的缺陣而造成的勞動力損失和更換長工所必需的工資費用。從這段叙述中，我們得到這樣一個印象：只是在克服了父親一點也不合理的反對之後，毛澤東才能夠離開家，接受進一步的教育。但是，如果這確實是他父親的看法的話，那么可以設想，對於相繼離開家、出外求學的第二個與第三個兒子來説，這本來將會變得更爲困難。因爲，父親將會更加依賴于他們的幫助。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因而，有個事實就很重要。在大約和毛澤東年齡一般大的時候，兩個弟弟也像毛澤東當年那樣，相繼離開家，接受進一步的教育。但沒有一個弟弟曾經告訴我們，爲了追尋家中的長子、他們的大哥的足迹，他們是否感覺到，不得不克服父母的反對。可以設想這樣一種情况，即通過自己的鬥爭，毛澤東成功打破了父親的意願，從而也就爲他的兄弟們鋪平了道路。但是，根據毛澤東自己提供的證據，他的父親從來沒有因此而變得很靈活、很通融。直到最後，他仍然保持着那種不可救藥的頑固性格。客觀的事實仍然是，正是在三個兒子各自生活歷程的相同階段，爲了在教育上獲得繼續深造的機會，他們都離開了家。即便這意味着，當最小的兒子離開時，仍然經營着農地和小買賣的年邁父親，不得不獨自一人支撑這些事務。

但是，在離家問題上，三個兒子並未全部遵循自主發展的路線。因爲，毛澤東將會對兩個兄弟的職業選擇與人生之旅産生强有力的影

① Siao 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1959, p. 11.

響。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由於與毛澤東的親戚關係，他的兄弟姐妹都將遇到一個慘烈的結局。

要想評估毛澤東後來與兄弟姐妹關係的那種心理學特性，會有一些困難。因爲，根據中國共産主義的那種強烈的運動倫理，領導人不能透露他們的家庭事務。當然，這種忽視個人和私人性事務的傳統，可以追溯到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實踐習慣。但是，在中國的革命運動中，由於隨後即將討論的某些與婚姻有關的問題，上述傾向得到了重新確認。這一點勿庸置疑。對中國人來説，一個被反復説明的、關鍵性的潜在規則就是，任何一個共産主義者都不應該任人唯親，而應超越于家庭關係之上。因而，在他們的行動中，革命黨人就不應該暗示出任何有關家庭親情的考慮。但在某些例子中，這種有關家庭關係保密性的行爲習慣，就會引向某種懷疑。人們擔心，在這種沉默的背後，可能會存在某些偏袒行爲和裙帶作風；甚至也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情況，即某種拋棄問題。

我們知道，在任何意義上，毛澤東都影響了他的兄弟們的人生道路。但是，我們從未發現，毛澤東曾經對他們的悲慘命運公開表達過自己的任何感情。儘管如此，引述一下兩個年輕弟弟人生中的一些主要的事實，確實有助于我們對毛澤東的行爲及其心理底蘊有一個更加清晰的理解。

二弟毛澤民遵循了大哥的道路。就像毛澤東一樣，他也在湖南省會長沙尋求較好的教育。而且，就在毛澤東幫助建立了中國共産黨一年以後，毛澤民被説服結束自己的學校教育。在試圖努力把安源煤礦地區的工人們組織起來的過程中，他成爲毛澤東最早發動的積極分子之一。

顯然，毛澤東毫不猶豫地動用了自己作爲大哥的權威，以便讓毛澤民爲他工作。但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毛澤民轉而去了上海。黨內的這種職務晉陞，完全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在隨後的三年中，毛澤民把革命觀念宣傳、散播到長江沿岸的各大城市。此時，毛澤東正在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作教員。顯然，他曾經勸説毛澤民加入到他的革命實踐中。毛澤民最後確實來了，並參加了第五居培訓班。但就在

毛澤民到達廣東以前，毛澤東剛剛離開了農民運動講習所。

隨着1926年國民國民軍的北伐，共産主義力量進入了武漢。此後，毛澤民成爲《民國日報》的編輯。到那時爲止，在日益成長的共産黨的等級階梯中，二弟毛澤民和大哥毛澤東的地位，實際上是平等的。武漢政府崩潰以後，毛澤民試圖出逃。但是，卻被國民黨軍隊抓住了。在隨後的過程中，毛澤民究竟如何獲得自由？這是一個目前尚未解決之謎。不管怎樣，毛澤民最後來到了上海。在那里，他重新開始在中國共産黨的地下秘密宣稱機構工作。他再次被捕。没有任何明顯的理由，他再次被釋放。這個時候，在黨内的上海司令部和毛澤東組織的游擊隊力量之間，存在着尖鋭的競爭和衝突。於是，毛澤民溜出上海，參加了大哥毛澤東在江西發動的革命運動。在一段時期里，二人緊密團結，一起工作。毛澤民還參加了在瑞金召開的蘇維埃大會。會上，毛澤東被選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自那以後的一些年，毛澤民努力發揮自己的才智，在經濟領域和公共財政領域開展工作。先是在江西蘇維埃，然後是在長征過程中，毛澤東逐步上昇爲一個政治領導人和軍事領導人。與此同時，毛澤民處理的則是一些更加實際的問題，即爲共産主義運動提供資金支持。這樣一來，毛澤民就在中國共産黨内扮演着“會計”的角色——而這，正是父親當年希望毛澤東能夠爲韶山冲的家庭事業所作的。

一旦共産黨人在陜西和甘肅落下腳來，毛澤民就幫助組織根據地的紙幣流通，並解決一般的金融問題。1938年抗日戰爭開始以後，毛澤民的身體健康狀況支持不住了。他被送往蘇聯，接受治療。去蘇聯的途中，爲新疆統治者盛世才所挽留，並因此耽擱原定的行程。盛世才堅持讓毛澤民作他的省財政廳廳長。1943年的時候，盛世才覺得蘇聯可能會輸掉這場戰爭。因而，他就背叛了共産黨人。而這些人，最初正是應他的邀請才來到新疆的。毛澤民被抓起來。並在1943年9月27日被殺害。據稱，有四個人曾經捲入到殺害毛澤民這件事中。共産黨人奪取政權以後，這四個人就被殺了。毛澤民成了新疆的一個光榮烈士。他是一個精明幹練、能夠承擔各種工作的人。毛澤民通過自己的努力，成就了一段非同尋常的革命生涯。可以説，他所取得的

一切成績，從未依賴過他的兄長。對毛澤民的生與死，毛澤東自己從未公開談論過與此有關的任何事情。

毛澤東離開家時，最小的弟弟只有4歲。儘管如此，這個弟弟仍然也遵循了兩個較大的哥哥的傳統。母親去世的時候，他才13歲。就在母親去世剛剛四年之後不久，毛澤覃就離開家，去上學。小弟上的學校，是毛澤東在幫助建立共産黨之後的第二年，在長沙組成的一所自修大學。實際上，這所自修大學是爲共産黨輸送新的積極分子的一種途徑。這樣一來，通過把最小的弟弟帶到這個學校，毛澤東就採取了直接干預的方式，把他吸收到共産主義運動中。這一切，就像一年前他對毛澤民所作的那樣。毛澤覃的行動與大哥保持着非常緊密的關係。1928年，正是通過毛澤覃傳遞的消息，他才幫助朱德把起義後的剩餘武裝力量帶到了毛澤東所在的江西根據地。

這種聯絡員的角色是很有趣的。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重要人物經常以他們的兄弟爲中間人，來進行微妙的談判。這種傳統依據的假設是，各個兄弟彼此之間是高度忠誠的。這一印象通常是可靠的如此看來，毛澤東對弟弟的任用就採取了一種非常傳統的方式。但在這樣做的時候，他也把毛澤覃置于一種非常危險的境地。因爲在這種情況下，兄長並不能有效地保護弟弟——而這，卻是一種不合傳統的舉動。

在江西蘇維埃時期，毛澤覃被分配主管與土地改革有關的工作。當時，毛澤東不爲黨在上海的領導人所喜。他們與共産國際保持聯繫。在反對毛澤東的時候，他們指責毛澤東偏袒自己的弟弟。確實，毛澤東的兩個兄弟都活躍在同一個山區根據地。這一事實爲那些懷疑毛澤東任人唯親的人們提供了充足的理由。1934年秋天，按照當時的一項決定，毛澤覃被留在後方；黨在江西的其他領導人則與紅軍主力部隊一起出發，進行長征。我們並不清楚，讓毛澤覃留下的這個選擇，究竟是出于毛澤東對那些指控作出的某種反應，還是其他的考慮佔了上風？超過十二萬的男人和大量的婦女——包括毛澤東的妻子在內——突破重圍，離開了山區的隱蔽根據地。他們開始了偉大的冒險之旅。當最終到達延安時，大約只有一萬人躲過了這一旅程的千難萬險。那些被留在後方的，包括這樣一些人，譬如上了年紀的人，健康

不好、身體有病的人，還有毛澤覃。不久，毛澤覃就被敵人抓住了，隨即遇難。毛澤東可能一直在實行某種全新的、非個人化的道德觀念。他正在體驗由一種全新形式的兄弟情誼和革命同志所帶來的那種愉悅之感。毛澤東後來說，他的“健康狀況和幸福之感從未比（長征時期的）軍事行動中更好過”。但可以確定的事實是，根據中國的傳統標準，毛澤東失敗了。作爲大哥，他沒有保護好比自己小的弟弟。

最後一個悲慘的故事，是有關毛澤紅——那個被領養的妹妹的。在毛澤東離開家、接受進一步教育的前四年，也就是最小的弟弟出生之後不久，毛澤東的父母決定，他們需要有一個女兒。這個女兒最終將會幫助母親維持家務，而在父母老年的時候，還會是一種安慰。値得注意的是，毛澤東自己從未提及過父母的這一決定。對毛澤東來說，這一情況必定暗示了父母對自己親生的子女並不完全滿足。

重要的是，毛澤東與那個領養的、比他小很多的妹妹，從未有過一種眞正的兄妹關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兄妹關係通常令人非常滿足，很有安全感，且富于同情心。男孩和妹妹之間，不存在任何那種內在于他跟兄弟們關係中的潛在競爭感。而且，由於雙方沒有性的需求，因此，兄妹之間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就體現了某種純潔性、開放性與天眞善良。而這些特性，在夫妻關係中恰恰是缺乏的。與領養的妹妹相比，毛澤東的年齡實在太大了。這一事實意味着，在毛澤東的整個成長過程中，他基本上不理解：在日常生活的基礎之上，與一個和自己年齡相仿的女性一起長大，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們討論女人在毛澤東一生中的地位的時候，我們會再次轉向這個問題。

儘管如此，每當回家探親的時候，毛澤東確實經常見到這個妹妹。在母親去世後，尤其如此。1923年，毛澤紅20歲。而毛澤東32歲。當時，毛澤東正從他的革命活動中抽身出來，進行一段時間的“休息”。那時候，他與黨的領導人的關係並不完全令人愉快。因爲沒有得到較大程度的承認，毛澤東變得很沮喪。父親已經很虛弱，兩年之後就去世了。當時，唯一與毛澤東獃在一起的人，就是他那個領養的妹妹。在這個關節點上，毛澤東展現了自己作爲兄長的影響力。他把這個妹妹吸收進來，參加組織湖南農民與工人的工作，並借此重新

返回革命鬥爭實踐。毛澤紅很快就投身于地下革命工作中，偶爾還會回家看看。那個時候，毛澤東已經去了廣東。但他把自己的妻子與孩子留在了韶山冲的家中，讓她們和自己的妹妹與父親獃在一起。不過，祖傳的古老家庭提供的安全感並未爲毛澤東的妻子與妹妹提供保護。1930年，國民黨當局獲悉，在毛澤東活動在江西山區隱蔽的根據地時，他的家庭卻處于一種毫無戒備的狀態。兩個女人被捕了，迅即遇害。

有人曾爭辯到，在一定程度上，毛澤東的行爲與中國的習俗慣例是一致的。因爲中國人通常會因各種錯綜複雜的理由而利用家庭紐帶。這些原因既包括這樣一種信仰，即一個人只能信任同一家庭的成員；還包括高度實用主義的一面，即家庭紐帶的功利主義的有效性。在一定意義上，周圍有些親戚是爲了有朝一日能夠有用。在後來的一些年中——譬如，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曾毫不猶豫地利用他的妻子江青和他們的女兒，以便在政治方面幫助他。有人認爲，這是由於毛澤東感到，他可以信任她們。正如有些人暗示的，毛澤東之所以把毛澤覃留下，可能是基于另外的考慮。他覺得，在那些不得不留在江西革命根據地的人們中，他需要一個可以信任的代表。儘管如此，有一件事毛澤東必定很清楚，即對那些明顯認同他的理由而留守後方的人們來説，能夠度過劫難、幸存下來的機會幾乎微乎其微。正如另些人爭辯的，實際情形也可能是這樣：毛澤東這樣做，是爲了反駁那些在上海黨中央的政治對手，而做出的某種應對措施。那些反對派曾指控毛澤東在江西革命根據地實行任人唯親。儘管如此，僅僅爲了反擊任人唯親的批評，就可以容忍自己的兄弟被殺害——這種假設看起來似乎有些過分夸張。埃德加·斯諾告訴我們，就像傳統中國的風俗習慣允諾的那樣，毛澤東負責照顧兩個兄弟的孩子。根據公開的記録，我們只知道，他與毛澤覃的一個兒子有過聯繫。這次聯繫僅僅來自于毛澤東和這個侄子的一次談話[①]。正如不久我們即將看到的那樣，這次會談透露出某種十分疏遠的關係。

---

① 譯者案：此處有誤。後文所引爲毛主席與侄子毛遠新的談話，而毛遠新爲毛澤民的兒子。

這樣看來，儘管存在一些膚淺的表象，但實際上，要想掩蓋毛澤東與兄弟姐妹們的關係，甚至將之描繪成典型的中國人的方式，這是不可能的。最有說服力的理由在于，毛澤東不能爲兄弟姐妹們提供保護，使他們免于因自己的公共生活而冒險。毛澤東的妹妹、妻子以及兩個弟弟相繼悲慘死亡。朝鮮戰爭中又奪去了他大兒子的生命。這些事情，把革命的暴力特徵帶入了毛澤東的私人生活中。官方傳記作者們聲稱，親人的犧牲只會使毛澤東成爲一個堅決的革命者，並熱情地投身于革命運動中。實際上，毛澤東在公開場合，很大程度上總是對此保持沉默。但確實有一次，毛澤東曾向斯諾提及這些家庭損失。毛澤東的談話揭示了某種更加複雜的反應類型。毛澤東反思了他的家庭中，有如此衆多的家庭成員都體驗了慘烈的死亡。這一反思，非但沒有把毛澤東引向痛苦和自我憐憫。恰恰相反，它把毛澤東引向一種相當複雜的心理奇迹。這種心理奇迹就是，爲什么只有他一個人應該躲過死亡?

"吃飯的時候，毛澤東提及，他的兩個兄弟都被殺害了。第一個妻子也在革命過程中犧牲了，那是1930年。他與楊開慧的兒子也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遇難了。現在，他說，非常奇怪的是，目前爲止死亡一直從他身邊掠過，卻從未帶走他。許多次，他已經準備好迎接死亡。但是，死神似乎不要他。他能夠做什么？有好幾次，看起來他似乎會死。他本人的貼身警衛員死了，當時，警衛員正好站在他身邊。另一次，他身上濺滿了另一個戰士的鮮血。但是，炸彈卻未碰到他。

"'是在延安的時候嗎?'

"也是在延安。他的警衛員在長征中已經犧牲了。當時眞是九死一生。根據辯證法的規律，所有的鬥爭最終必須得到解決。其中，就包括人類爲了在這個世界上生存而鬥爭。

"'使你活下來的命運中的各種事件，可能使它們成爲中國歷史上也許是最引人注目的事件'。

"沉思了一會兒之後，毛澤東說：你知道，我的生活以

一個小學教師而開始。然後，他再也沒有考慮過戰爭問題。不管怎樣，事情不會按照人們的意願而進行”。①

許多人曾經歷過這樣的災難。在災難過程中，他們最親愛的人都死了，而自己卻莫名其妙地幸存下來。通常，這些人最初會因他人的死亡和自己的生存，而在一段時期內經歷某種負罪感、愧疚感。但最終，他們會被迫把自己的這種情緒合理化，並達致一種信念。按照這種信念，他們的幸存可能證明了自己多少有些特殊，與衆不同。這種得到某種神奇魔力保護的感覺，爲他們賦予了某種全知全能，以及永遠不受傷害的感覺。他們認識到，確實，“事情不會按照人們的意願而進行”。因而，他們認爲，就個人而言，自己天生就注定了要成功，且比他人要承擔更大的風險②。毛澤東年輕的時候，必定曾經爲自己與兄弟姐妹們的關係感到某種愧疚感。考慮到這一事實，下列情形就不那么令人驚奇了，即當他們遇難時，毛澤東已經形成某種能力，可以把自己可能具有的任何有關責任與負罪的感覺，進一步轉變成對自己的不可侵犯性的敬畏。母親以前曾經爲毛澤東的自戀提供了某種基礎，但後來卻又“拋棄”了他。這樣一來，毛澤東感到被拋棄的心理經歷，就激發了他情感成長的某種充滿活力的過程。結果，等到兄弟姐妹們確實遭遇了慘烈的死亡時，毛澤東已經幾乎完全控制了自己的感情。由於早年的被拋棄感，毛澤東已經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同時，他還不得不被迫去克服自己對那些與他競爭的兄弟姐妹們的矛盾心理。這樣一來，到他們的死亡實際上確實發生了的時候，毛澤東的情感反應就被削弱了。現在，他的熱情轉向基于兄弟情誼的某種全新的、理想化的精神，以及對權威與正義的新看法。

爲了理解毛澤東對權威與正義的道德義憤的特點，我們必須轉向他與父親的關係。

---

① Edgar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1972, p. 220–221.

② Martha Wolfstein, Disaster: A Psychological Essay,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7.

第六章　父　親

儘管在整個考察中都可以發現父親的影子，但是直到熟悉了家庭中的其他成員之後，我們才開始引介毛澤東的父親。因爲，毛順生是一個專橫跋扈、盛氣凌人的人，如果讓他過早地登上舞臺，那么我們就很難理解在其他一些更微妙的家庭關係中的那些細節。毛澤東曾將父親赤裸裸的強權和自己作爲兒子對此的激烈反應向斯諾等人作過公開闡述，因而，所有重要傳記作家都承認：毛澤東肯定受到他那據稱具有專制傾向的父親的深刻影響。而父親在影響孩子對權威的態度方面具有重要意義，這一點也爲政治心理學的公認理論所支持。

顯然，父親在毛澤東的個性特徵與政治觀念的發展中確實扮演着主要角色。但是，必須追問的問題是：父子之間的影響過程究竟是在何種程度上，以及通過哪些方式實現的。根據有關毛順生的各種材料的叙述，我們知道毛澤東的父親是一個“相當有主見的人。他善於通過賤買貴賣之間的價格差來謀生。在他的身上，體現了一度被消除的貧困農民所特有的狹小氣量和貪婪等偏見”①。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説，父親是一個“嚴厲的工頭”，一個“暴躁易怒的人”：他“經常打我和我的兄弟們”，“從不給我們零錢”，“讓我們吃最差的食物”②。在社區中，他當然是個不受歡迎的人。他個頭矮小，身體瘦弱，看起來這讓人們難以相信他會是那個高挑、壯實的兒子——毛澤東的父

① 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 China, Vol. 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2。

親。儘管父親在體貌上有所欠缺，但這一點在其他方面得到了較好的補償，譬如堅定的信念、專注的雄心，以及明瞭如何改善、增進家庭的經濟生活狀況的精明感。

我們已經知道，毛澤東如何聲稱在16歲的時候，為了離開家庭、增進自己的教育，他不得不與其頑固的父親進行鬥爭。但有趣的是，在毛澤東的兩個較小的弟弟達到同樣年齡的時候，他們也離開了家，且沒有遇到任何明顯的困難。因而，注意一下這個事實——毛順生16歲時也離開了他的父親——這對於恰當理解毛順生如何對待兒子們的離開可能很重要。毛順生離家的目的，不是獲得更多的教育，而是為了挽救家庭，使之免于破產。明顯的，他滿足于或者至少可以說順從、屈服于最低程度的、剛好夠用的教育水平，即能夠讀一些基本的資料。在毛順生的父親，或者說毛澤東那虛弱的祖父的經營之下，僅僅為了能夠維持生計，這個家庭被迫出賣土地。如果想重新獲得從前的那些財富，以及恢復在那個以家族為主導的社區內的領先地位，這就需要一筆錢。儘管毛順生願意盡其所能，做一切必需的事情，但在當時的中國，要在城里找到一份能夠攢下工錢、並寄回鄉下家中的工作，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而，毛順生被迫從事當時中國社會階梯中一種最下等的工作。他入伍當了兵。中國有句老話："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儘管如此，在毛氏家庭中，毛澤東父子二人不約而同地發現：通過軍隊，他們都能實現各自不同的雄心壯志。對父親毛順生來說，當幾年兵提供了足夠的積蓄，使他能夠幫助家庭擺脫債務危機，建立一個從事穀物交易的小店鋪，並從鄰近地區娶了一個將給他生三個兒子的妻子。對兒子毛澤東來說，軍隊將為他提供一個改變共產主義革命性質的途徑，一種達致中國政治權力巔峰的工具。

毛順生畢生致力于的，是這樣一些事：使他們家擁有的土地從十五畝擴張到二十二畝，改善家庭的生活居住條件，經營一個小型的糧食加工作坊，向長沙以及其他城市販運穀物。以上這些，都需要額外的人手，因而，通常至少會有兩個兄弟和這個家庭一塊兒吃住。

毛順生希望，除了祖父以外，家中的每個人都要為家庭工作。當

然，我們知道，毛澤東對這些要求非常不滿，並覺得受到了殘酷的虐待。在家中，毛澤東通常的任務既包括體力勞動，還有一些管理性責任。毛澤東剛達到父親當年所達到的那種教育程度，就被期望掌管家庭帳目①。當無帳冊可管之時，毛澤東就被安排作些農活。現在，我們很難判斷這些農活可能具有的勞累程度，但我們確實知道這樣一件事。有一次，毛澤東被安排跳糞，他的任務是十五擔。這並不是一件特別累的活——後來，毛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他講述了自己是多么迅速地就完成了這個工作，然後就藏在一棵樹後面讀書。結果，卻被父親發現了。毛順生嚴厲地責罵毛澤東，因爲他認定，毛澤東並沒有完成安排給他的那份工作②。我們還知道另外一件事。這一次，毛澤東被指派採摘莓果。他再度激起了父親的不滿。雖然毛澤東的二弟完成了一大片，但卻幾乎沒有多少莓果；而毛澤東卻集中于一小塊的地方，儘管有很多莓果。父親認定，大兒子做的並沒有他應該做的那么多③。在這個例子中，毛澤東並沒有辯解，但是看來似乎卻把父親缺少（判斷疏密大小的）知識這一事實引以爲樂。它暗示了毛澤東認爲自己比父親更優越的程度。

父親強迫毛澤東從事那些在他看來爲社會所討厭、不喜歡的工作。譬如，年輕的毛澤東被安排向周圍的鄰居們收取父親出賣鷄蛋和鷄的錢。看起來，毛澤東似乎認爲讓人還錢的催債工作是一件極其令人討厭的事，因而對父親將他置于這樣一個在他看來令人尷尬的位置，表現出非常不滿④。

請記住這一點：當被要求修剪草坪時，即便美國中產階級家庭中的男孩們也感覺到強烈的體力痛苦。但我們必須保持警惕，不能忽略

---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2.

② Robert Payne, Mao Tse-tung: Ruler of Red China,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0, Chap. 2.

③ 蕭三：《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版，第9頁。

④ 李鋭：《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9頁。

這樣一種可能性：由於父親的要求，毛澤東確實經受了精神方面的痛苦。不過，與當時乃至現在中國農村的男孩們被寄予的期望相比，毛澤東的日常家務勞動看起來是完全符合常規習慣的。根據我們掌握的證據，要表明父親讓毛澤東從事一些比那個社會的通常工作更艱苦的勞動，這是不可能的。

但在有關自己童年的敘述中，毛澤東作了不恰當的指控：父親虐待他。實際上，我們很難確定，眞正困擾毛澤東的究竟是什么。由於中國文化幾乎沒有爲他提供什么途徑來表達心理的或者精神的痛苦，因而，像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毛澤東感到：夸大任何可能招致痛苦的身體方面的原因，這是必要的。譬如，毛澤東被驅使着努力聲稱父親拒絕養育他，甚至斷言他吃的食物既沒有蛋，也沒有肉[①]。但在同一段敘述中，毛澤東提供了有關這個家庭所消費的以及所出售的大米數目的大量細節。在這樣做的同時，毛澤東運用了數學運算，並表明家中每個人消費的數量是一樣的，他的“家庭省吃儉用，但總能保持盈餘”[②]。毫無疑問，毛澤東有關自己無法獲得充足食物的說法不應該從字面上加以理解，相反，毋寧應視爲特定文化中，一個人必須尋求的、傳達某種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情感表達方式。具體來說，這種文化強調某種依賴于，以及得到養育的飲食之欲的滿足和愉悅之情的重要性。而且，成年毛澤東曾經享受過如此衆多的各種飲食美味，這表明他肯定得到了遠遠超過貧困水平的中國人所經歷的那種哺育和關心。我們還知道，一個童年時代的朋友曾與79歲的毛澤東一起回憶各種湖南菜的樂趣。這種樂趣必定與他早年孩童時代的某些記憶有關[③]。

不管有關虐待的各種指控有什么問題，可以確定的是，毛澤東意圖表達對父親的敵意。在向埃德加·斯諾敘述他的童年時，毛澤東曾

---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2.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1.

③ 這是由 C. P. Li 博士報道的，見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 1973, p. 32。

就自己對父親的情感，作過這樣大膽的陳述："我開始學會恨他"[①]。儘管在任何一種文化中，公然地、不加限定地宣稱恨自己的父親，這都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但在中國文化中，這尤其令人震驚。確實，在中文版的毛澤東自傳中，這些話都被省略掉了。這是很有啓發意義的。顯然，這或者是由於對那些翻譯、出版中文版傳記的毛澤東崇拜者們來說，這些話的衝擊太強烈；或者是由於這些崇拜者們認定，任何一個領導人對自己父親具有如此情感的看法，都會令中國公衆感到震驚。

因而，不管父親對待毛澤東的事實眞相如何，對心理學理解與分析來說重要的是，毛澤東選擇了以公開談論的方式，將父親描繪成一個苛酷的、富有壓迫性的人。確實，如果假定毛澤東從其童年時代與據稱專橫的父親的鬥爭中學會了反抗精神與相關策略，那么這是毛澤東自己的看法，而非任何一個傾向於心理分析的歷史學家的理論。終其一生，毛澤東宣稱與父親的鬥爭深刻地影響了他，甚至在老年的時候，他還願意回到這個主題。譬如，78歲時，毛澤東曾經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有過一次談話。談話中，毛澤東突然提到父親當年如何對待他——就像突然轉到這個話題，而與此前的談話內容毫不相干。

毛主席：不要喝太多的茅台酒。那對你身體有害。

田中角榮首相：我聽説，茅台酒是65度。不過，我眞的很喜歡喝。

毛主席：不是65度，而是75度。誰告訴你的？這是錯誤的信息。順便説一句，中國有太多的古老的東西。讓舊事物束縛你，不是一件好事。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父親對我很嚴厲。我就反抗他。按照儒家的四書五經的説法，除非父母愛自己的子女，否則，他們不應該期望他們的孩子會尊敬他們。我就問我父親，他爲什么對我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3.

不好。不是要換個話題。但你在日本選舉的時候，有一段時間似乎很麻煩，是嗎？①

在隨後一些年中，毛澤東曾經多次在不同場合提及與父親的鬥爭。逐漸的，這些言談變成了略帶玩笑性質的有趣評論，它們可能暗示了毛澤東面臨的、有關對父親的矛盾心理問題的強烈程度之限度。譬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曾經對一個紅衛兵組織說，他們應該少一點暴力，僅僅從身體上傷害那些眞正應該受到懲罰的人。然後，面帶微笑的，毛澤東加了一句：當然，他的父親當年應該受到“噴氣式的待遇”（紅衛兵折磨人的一種習慣動作方式，讓受害人跪着，然後把他的胳膊擰到背後，就像噴氣式飛機的兩翼）。

毛澤東堅稱，自己曾與父親努力鬥爭。這一特殊的論題，一直保留在毛澤東的記憶之中。甚至在父親去世很久以後，毛澤東仍然堅持着試圖證明自己是對的，而父親是錯的。尤其是，有兩個主要的話題。父親的一個指控是：毛澤東不但懶惰，而且缺乏意志力；另一個看法是：毛澤東在讀那些無用的、不切實際的書方面花了太多的時間。看起來，在這兩個問題和毛澤東最終的政治風格以及他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性貢獻之間，可能會存在一種神秘的聯繫。在政治心理學中，通常看來我們似乎很少有這樣一個明晰的案例：一個公衆人物公開說出自己童年時代與父親的抗爭，而且心理上還有一種強烈的動機，即試圖證明父親是錯的。前文提及的兩個問題的歷史後果是，人們會以這樣的方式來記憶毛澤東，而且，這種記憶可能超過其他印象：首先，是他對人類意志力至高無上性的無限信任，以及對體力勞動的優點，尤其是對年輕人來說，參加體力勞動之重要性的迷戀。在毛澤東看來，相對於機械與技術的控制，人類活動具有一定的優越性；其次，當然是紅寶書的誕生。這本書被認爲包含了有關人世間各種問題的答案。

父親指責兒子散漫、懶惰的生活方式，以及缺乏意志和決斷能

① Tokyo Shimbun，1972 年 9 月 27 日（譯者案：引文系據英文轉譯）。

力；兒子則在長大以後將馬克思主義倒轉過來，並讚許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與唯意志主義。父親希望，兒子能在田間工作，並使其教育更加接近農村生活的實際運用，這正是兒子最初極力反對的。但後來兒子卻讓幾百萬的中國青年離開城市和家庭，並終其一生於農村生活的生產勞動中。理所當然的，兒子還堅持中國的所有教育必須是“實際的”、“實用的”，而不僅僅是有趣的和能夠激發想象力的。父親嘲笑兒子對書本的迷戀，因爲他聲稱書本沒有什么實際價值。長大以後，兒子寫了一本書；與其他書相比，這本書因其非常實用性的實際價值而被很多人偶像化。父親對待兒子的方式和兒子後來的行爲，這二者之間的聯繫看起來完全合理，以至於可以得到常識性邏輯的支持（logic of commonsense），而不必求助于精緻化的心理學理論（refinement of psychological theories）。

確實，毛澤東的一些故事，譬如他的反抗激情、對意志力優越于技術且主導技術的信念，以及對不斷的革命鬥爭的熱愛，可以追溯到他與父親相處時明顯遇到的問題。這一點是非常可能的。儘管如此，還是存在一些麻煩的事實。這些事實引起我們對那些看似合理、實則似是而非的理論假設之懷疑，並要求探索其他可能的替代性解釋。其中，並非最微不足道的一個事實就是，毛澤東談論他與父親的問題時體現出的那種明顯的幽閑，甚或愛好。如果當年經歷的苦痛確實像毛澤東本人暗示的那么嚴重，那么，他還可能會在若干年後，以如此有趣的方式津津樂道地討論這件事嗎？而且，毛澤東對待權威和反抗的態度所表現出來的形態，遠比以上這樣的簡單解釋複雜的多。例如，毛澤東並非對任何權威都表示出盲目的敵意。在與父親的抗爭中，毛澤東認識到，愛與恨之間的距離並非很遠；而且，衝突也可以是建設性的，即能夠在敵對雙方之間産生積極的聯繫。不特此也。明顯的，毛澤東很小的時候就發現，挑戰權威，尤其是當挑戰者聲稱具有道義方面的優越性時，幾乎沒有什么風險。後來，毛澤東毫不猶豫地面對自己離家以後遇到的第一批權威。如果當年曾經畏怯于父親的權威，那么在挑戰這些人的時候，毛澤東本來很可能會很拘謹，不敢這么做。但事實上，毛澤東敢於這樣做。如果父親確實像毛澤東説的那樣

頑固、毫不妥協，那么這個事實就是很奇怪的：通過把爭論極端化，發展到遠遠超于一般人想象之外的那種程度，毛澤東形成了對自己有能力戰勝權威的自信心。

根據毛澤東自己的敘述，反叛特性使他能夠迫使父親對他更加體貼。這一點暗示我們，父親並不是一個頑固的、毫不妥協的紀律主義者。爲獲取理解毛澤東與父親關係的有益視角，我們需要注意一下，傳統中國的典型父子關係具有的進一步特徵。我們已經知道，孝在儒家倫理中的中心意義。實際上，中國的父親通常對兒子很苛刻，而且總愛發號施令。當然，在中國，父子之間經常會有衝突，甚至在許多虔誠的儒教家庭中，也貫穿着某種口角和言語衝突的氛圍。充滿悖論意味的是，代際緊張和衝突的一個基本原因是基于某種有關人性的觀點，而這種有關人性的觀點同時也有助于對有關孝的準則的讚美。中國人遠比傳統的歐洲人更加相信這樣一種觀點，即一個人最終的個性特徵，取決于父母自覺的、有意識的影響，而非遺傳。後代可以天生就具有，或者說被自然地賦予某些理想的品質——中國的父母無法從這樣的看法中獲得解脫。爲了迫使孩子們沿着正確的道路成長，中國的父母們感到，有必要對這些努力永遠保持警惕。如果父母覺察到孩子行爲中的任何瑕疵，他們不會認爲那可能只不過是一個過渡階段，並從這種看法中獲得安慰。相反，他們感到，必須責罵、反復教導子女，直至美德和正確的行爲方式佔據優勢。如此一來，恰恰是中國父母有關他們自身影響力的潛能的自覺，以及他們對偶然性事件和遺傳的重要意義的拒絶，意味着如果中國父母對自己的年輕子女抱有任何希望，他們將不會使其子女的心神得到片刻安靜。

按照中國的傳統文化，在家庭中幾乎不允許存在幾種表達感情的方式。考慮到這一點，這些看法就意味着，中國的父親展示他對兒子關心的基本方式，將是毫無休止地迫使兒子改進自己的生活習慣。我們注意到，毛澤東曾經抱怨父親要求他負責記賬。儘管如此，可能的情况卻是，父親正在尋求推動兒子的進步。在兒子還是一個少年時，就讓他承擔男子漢的責任——通過這樣的方式，父親試圖把毛澤東培

養成一個負責任的、有用的人。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父親對待毛澤東的方式，和同時代中國的其他父親對待他們的兒子方式顯然完全一樣。問題在于，對於父親讓他爲了家庭事業而工作的要求，爲什么毛澤東看起來會如此不滿？在大多數中國家庭中，爲了家庭這個集體的生活狀況而努力，是兒子們樂意承擔的責任。既然他們認同一個毫無疑問的義務，即爲了作爲一個整體的家庭而竭其全力，盡其所能；因而，他們通常不會像毛澤東那樣，認爲自己都在爲了父親一個人的利益而遭受剝削。在這里，我們發現一條線索：毛澤東覺得很難認同父親，也難以認同男性繼承人的傳統角色；不特此也，他還並不完全熱衷于家庭這個集體的活動。

在提及爲了孤立父親、爭取母親，他對瓜分自己家庭的興趣時，毛澤東的表達直言不諱，非常明白。這些有關自己與父親衝突的敘述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這樣一些情節，即在這些衝突事件中，母親是如何站在他這一邊，或者對他遭受的痛苦表示同情。因而，他與父親的鬥爭帶來的結果，是使毛澤東更加接近母親。毛澤東覺得，母親視自己爲一個英雄人物；與競爭對手——父親相比，毛澤東是二者之間道義方面的優越者。

這樣一來，當毛澤東感到自己完全贏得了母親的理解時，與父親的衝突就變成了一種途徑和工具，其目的是爲了試圖努力重新獲取他一度曾經擁有的幸福。儘管毛澤東將自己描繪成冒着極度的風險，且處于巨大的危險情境中，但這些衝突的結果，後來卻通常是堅定了毛澤東對自己優越感的信心。從與父親的抗爭中，毛澤東似乎獲得了一種有關自我的感覺，一種有關恐嚇與挑戰策略的理解，以及一種有關爭論雙方情感關係的洞見：那些願意相互爭吵的人，必定也對對方抱有積極的、肯定性的感情。從下面即將談及的、他向埃德加·斯諾提及的一件事中，我們可以感到，毛澤東覺得自己的力量是如何強大，以至於足以挑戰自己的父親。“大約十三歲的時候，我的父親曾經邀請許多客人到我家。當他們都在場的時候，我和父親之間爆發了一場爭論。當着客人的面，父親指責我，説我是懶惰而無用的。這惹怒了

我。我罵了他，又離開了家。母親在後面追，並試圖勸我回家。父親一邊追，一邊罵我，要求我回來。我站在一個池塘邊上，並威脅他，如果再靠近一點兒，我就跳下去。在這種情況下，爲了停止內戰，要求和反要求就被提出來。父親堅稱，如果他願意答應不打我，我就必須道歉，並向他叩頭。”[①]從這件事，毛澤東得出結論：“這樣，內戰結束了。由此我認識到，當我以公開的反抗來保衛自己的權利，父親就會變得溫和；但是，當我保持弱勢和屈服的時候，他只會更加責罵、暴打我。”[②]

儘管如此，看起來似乎還有其他幾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注意。首先，就是激發了父子間充滿戲劇性意味情感的那種閑散和懶惰問題。其次，就意圖在夥伴們面前有所表現而言，年輕的毛澤東身上，存在着一種非同尋常的自信。當然，他是一個熱愛觀衆的演員。這暗示了毛澤東認同這樣一種觀點，即父親比自己更加受到社會禁忌的約束。事實不僅僅是毛澤東比別人更願意吵架。問題還在于，他做事時極少受到任何有關不恰當的時空感的約束。第三，存在着一種有關自我破壞的不合理欺詐，以及這樣一種看法，即一個人可能通過展示某種冒着傷害自己的風險的意願，來威脅他人。既然毛澤東很早時就知道如何游泳，因而，他打算跳下去淹死自己的行動，就不是一個可信的欺詐性威脅。終其一生，毛澤東曾經多次展現他作爲一個游泳者的勇敢和堅毅。在他晚年的時候，這種情形發生過好幾次。一旦遇到嚴重的挑戰，毛澤東就會選擇以公開的方式來進行游泳。這一行爲模式充滿了戲劇性色彩。當然，父親知道兒子會游泳，因而，他不可能爲兒子傷害自己的恐嚇而擔心。相反，父親肯定是被一種丢臉和耻辱感所擊敗，即自己竟會有這樣一個兒子，居然可以當着客人的面，做出如此不知羞耻的不當行爲。因而，這場衝突可能並非像毛澤東後來的回憶暗示的那樣，是一種身體方面的暴力或極端行爲。父子二人肯定都接

---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p. 132–133.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3.

受了這一戲劇性表演場景的象徵性涵義（symbolic significance），而非其實際的意義。兒子在試圖檢驗和確定父母是否眞的重視自己。而父親被迫妥協，卻僅僅是因爲實際上，他並非如毛澤東喜歡描繪的那般苛酷和無情。在提及這一事件的時候，毛澤東說："同時，這件事可能對我有好處。它使我在工作方面更刻苦，並小心地保管自己的書，這樣他就沒有指責我的理由了。"①

毛澤東聲稱，自己曾經受到了父親的虐待。就此而言，這種敘述的可信性爲這樣一個事實進一步地削弱了：在後來的一些年中，毛澤東贊成父親的價值觀，而從未尋求將那些相反的觀念，即毛澤東年輕時自己的看法予以正當化。例如，1914 年冬天，毛澤東結束了自己的飄泊不定狀態和"心理延緩償付期"，並爲了學位而在長沙師範學校努力學習。當時，他曾在課堂筆記中寫到：

> "人情多耽安逸而憚勞苦，懶惰爲萬惡之淵藪。人而懶惰，農則廢其田疇，工則廢其規矩，商則廢其所鬻，士則廢其所學。業既廢矣，無以爲生。而殺身亡家乃隨之。國而懶惰，始則不進，繼而退行，繼則衰弱，終則死亡。可畏哉！故曰，懶惰萬惡之淵藪也。"②

在同一筆記中的隨後部分，毛澤東加入了這樣的觀察："少年須有朝氣，否則暮氣中之。暮氣之來，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墳墓。"③不止是這種情感，就是其中的文字措辭，看起來也很像他的父親。一個恰恰是在懶惰問題上曾極力反抗父親的男孩，僅僅在五年後卻說出這樣一些與父親當年同樣的看法，這怎么可能？

如果我們假定，在一定程度上，毛澤東與父親的這些衝突是在嘗試檢驗父母對他的愛，那么，我們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衝突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2.

② 毛澤東：《講堂錄·修身》，1913 年 11 月 1 日。

③ 毛澤東：《講堂錄·修身》，1913 年 11 月 1 日。

基本上是作爲情感對抗（emotional confrontations）而得以展現的；在這種對抗中，由於對自己情感的較好控制，毛澤東能夠宣稱自己對父親的優越性。在毛澤東的描述中，父親通常會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確實，他總是使自己的情感處于不加戒備的狀態，以至於兒子能夠輕易地操縱、駕馭他的情緒。在中國文化中，人們廣泛認爲，一個人如果不能控制和隱藏自己的感情，就很容易爲他人操縱。這就是爲什么要對孩子們進行精心的調教。因爲他們的情感經常領先于理智，而經過調教，他們就能學會更加審慎地表現自己的感情。我們知道，在教導毛澤東任何時候都要控制自己的感情方面，母親起了重要作用。“她反對任何公開展示的情感宣泄。”[①]通過控制自己的情緒，刺激父親並使之失去對情感的把握，毛澤東能夠向母親證明：就個人行爲方式而言，父親並不是一個合適的榜樣；在父子關係中，就精神成長或情感控制而言，兒子才是成熟的，而父親卻實在是一個小孩。

這些考慮暗示我們，並非完全對自己的父親表現出恐懼，或者對他形成深刻的敵意，毛澤東感覺到：父親是有弱點的；他能夠證明自己相對於父親，在道義問題上以及情感方面的優越性；他能夠操縱自己的父親，因爲他比父親更好地理解控制和影響情緒的方式。作爲一個孩子，毛澤東對自己的情感竟然具有如此的絕對控制能力，這怎么可能？我們必須假定，答案在于被母親拋棄的這一感覺的後果和影響。由於一度曾經遭受過被人拋棄的那種傷害的痛苦，因而，從此以後毛澤東就會在暴露自己的情感方面保持謹慎。他與父親鬥爭的經驗強化了這一點。後來，毛澤東決不允許自己以情緒化的方式來處理其他任何關係。

與父親的衝突能夠輕鬆地使毛澤東重新確認他的內在優越品質，尤其是這些衝突提供了一個便當的機會，使之感覺到自己是母親眼中的一個英雄。但是，這樣的衝突最終也是極度讓人沮喪的。因爲，在衝突結束以後，冷酷的現實仍然是：他沒有，也不可能重新抓住母親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2.

無法分割的愛。

如此一來，從其與父親的鬥爭中，毛澤東獲得的基本教訓必定是雙重的：一方面，這可能有利于激發針對他人的強烈憤怒以及爆發性情感。但另一方面，事實上一個人不必眞正從情感上捲入這些衝突。如果一個人打算通過自己的情感來影響他人，他可以假裝發怒，而實際上卻必須保持冷靜、無動于衷。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從不表現出“虛弱和順從”①。

這些考慮使我們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毛澤東處理政治爭議的杰出能力，不僅來自于他與父親“成功”鬥爭的經歷；而且，在一種更加深刻的心理學層次上，這種能力來自于一種有關其家庭關係的整體性的心理動力機制（total psychic dynamistics）。這種心理動力使毛澤東非常善於隱藏他的感情，而在衝突情形中，尤其如此。當然，這種在衝突中控制自己情緒的基本能力，對任何文化中的政治領導人來說，其價值都是無法估量的；但對於一個現代中國的領導者而言，這種能力尤其重要。在儒教中國，就像在許多傳統社會中一樣，基本的文化教義是抑制冒犯性的情緒和行爲的，社會規範贊成和諧以及對爭議進行壓制與約束。爭端被弱化了，乃至歸于沉默；而禮節制約着社會關係，並將情緒控制在適當範圍內，而不至於破壞社會生活。中國文化中最嚴重的擔憂是，冒犯會表面化，從而導致秩序混亂和社會失調②。只要中國社會具有儒教秩序的內聚力，那么，所謂“冒犯是合法的”這種情形，就幾乎不會出現。但隨着舊秩序的解體，焦慮增加了；而且，這種焦慮還引發了更加強烈的、表達爭議與反抗的冒犯性情緒的傾向。與此同時，更加富于競爭意味的情形也增加了，這一情形刺激了衝突，並由此產生了一種需要，即合法地表達爭議（express aggression legitimately）的新途徑。在大多數現代社會中，各種利益必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3.

② See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 I. T. University Press, 1968; Richard H. Solomon, Mao' s Revolution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定處于相互競爭與衝突的狀態之中，而這些衝突是由制度化的對立角色來體現的，譬如律師和立法者。在大多數過渡社會中——在現代中國也當然如此，接受對立的習俗實踐尤其困難。因爲，面對明顯的、但同時並不具有冒犯色彩的衝突，人們幾乎沒有什么經驗。因而，在現代中國政治中，捲入衝突情境中的人們傾向于表現出巨大的冒犯，這種冒犯反過來經常降低了他們的影響力。在中國的領導人之中，毛澤東是一個很突出的人物。他不但能夠投身于政治爭議中，而不爲情緒所困擾；且善於利用政治爭議，並能夠在這些爭議不再有用時，將之棄于一邊。先是從與母親的交往經歷中，繼之則是從與父親的鬥爭經驗中，毛澤東學會了抑制自己的感情，並避免使自己的感情捲入衝突中。因而，這就使毛澤東能在後來的政治爭議中，幾乎沒有什么困難地控制自己的感情。

充滿諷刺意味的是，作爲一個現代性角色的扮演者，毛澤東的感情基礎是從其家庭經驗中獲取的。因爲，在幾乎所有與父親的爭議中，毛澤東都準備好使用傳統的立場和姿態。前面我們已經提到，九歲的毛澤東是何等"沮喪"。因爲父親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他與母親討論如何"改變"父親的信仰狀態，但是他的努力換來的，只是父親的"責罵"。在毛澤東入學以後，他開始引用古籍經典和儒家言論來批評父親的行爲。基本上，毛澤東是用傳統的道德標準來批評父親的舉止。

在這方面，毛澤東和後來不計其數的自覺青年們相當不同，他們是在毛澤東成年之後的二三十年中成熟起來的。在20世紀的早期，面對現代世界的潮流，不計其數的中國青年們企圖"改變"父輩們的思想觀念，使之接受新觀點；當無法做到這一點時，他們就開始輕視他們的父親。兒子們希望，有一個並非"落後的、不合時宜的"父親。兒子們崇拜新潮流，他們只能蔑視父親們，並視之爲軟弱，無法把握現代世界。就像毛澤東一樣，這些年輕人覺得，就對父母權威的敵意而言，自己是正當的；他們很容易接受反抗的優點。他們認爲，反抗具有一種道義上的優越性，幾乎是一項開創性的聖潔事業。儘管如此，毛澤東並非一個反抗怯懦的、傳統主義父親的不安分的現代主

義者；恰恰相反，他的道義優越性是古老的中國式的，既包括佛教內容，也包括儒教因素。因而，毛澤東的反抗，並不僅僅是一個迅猛變化的世界中，年輕人的那種與正在消逝的、瀕臨死亡的事物決裂而不結盟的反抗。實際上，事實並不如此簡單。毛澤東用舊事物自己的言辭來反對它們。他發現，舊事物並非如它們看起來的那般威風、強大。

作爲一個成年人，毛澤東極度自信。他堅信中國的舊事物可以被清除。毛澤東這種自信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在與父親就支持新事物、反對舊事物而進行爭論時，他從來沒有“失敗”過。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毛澤東對中國的過去，總是持有一種令人驚奇的矛盾心理。有時候，他從中發現一些有益的價值；在其他一些時候，他覺得中國的過去應該而且能夠被一掃而光；甚至在某些時候，他爲舊事物的頑固韌性而感到沮喪。儘管如此，毛澤東總是樂意運用從中國過去得來的譬喻和暗示來支持自己的論斷。

既然毛澤東的個性特徵中有如此衆多的悖論和矛盾，我們發現，可以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支持我們對其個性特徵的解釋。現在，重新回到毛澤東和田中角榮首相之間的完整對話，這是很恰當的。在本章開頭，我們曾引用過其中的某些論點。那些從表面上看起來，起初可能是無關的一些想法，現在看來卻是非常嚴謹：

> 毛主席（對周恩來總理和首相說）：爭論還沒有結束嗎？爭論對你們有好處。
>
> 田中角榮首相：我們的交談很融洽。
>
> 毛主席：真正的好朋友只有通過爭論才能得來。

然後，毛澤東提及宴會，以及過度飲用茅台酒的危險。在這一點上，談話接下來就是毛澤東對“中國存在太多古老的事物”的評論，對自己父親的反抗，以及對日本選舉的觀察（見上頁116①）。接下來

---

① 譯者案：這是英文版頁碼。

的談話是:

> 田中角榮首相: 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 我經歷過十一次大選。我也在街頭作過好多演說。
>
> 毛主席: 街頭演説是一個艱苦的工作, 你得注意自己的健康。
>
> 田中角榮首相: 在日本, 如果不搞街頭演説, 你就無法引起民衆的注意。在現存的 政治體制下, 除非作街頭演説, 否則, 你無法當選。
>
> 毛主席: 議會政制怎么樣?
>
> 田中角榮首相: 它也有自己的問題。
>
> 毛主席: 日本當然也有自己的問題, 不是嗎? 街頭演説必定讓你很勞累。①

從以上分析中, 我們現在可以發現, 這些談話並非隨意從一個話題跳到另一個話題。在毛澤東的觀察中, 存在着某種一致性。這種一致看起來表達了毛澤東深深信奉的某些情感。從他的評論中, 我們發現了明顯的矛盾。一方面, 毛澤東相信爭吵在交友過程中的價値; 另一方面, 他又不喜歡競爭。他認爲, 道義上的優越者應該被自動地承認爲權威。類似的, 存在着一種矛盾: 一方面, 是舊事物的 "約束力"; 另一方面, 是毛澤東樂意引用中國的經典來捍衛自己的立場。這一切使毛澤東旣是中國價値觀的反抗者, 又是這一價値觀的典型體現者。與父親的爭吵, 爲毛澤東提供了一種渠道, 使之從父親那里獲得這樣一種暗示: 父親是關心、熱愛自己的兒子的。這也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 即父母承認他的優越特性, 認爲應該使之超越與其弟妹們等人的競爭, 以便證明毛澤東自己意志的合法性。毛澤東從其非常溫和、富于愛心的母親那兒, 獲得了有關自己優越性的認識。這使毛澤東假定, 只要能把人們的注意力集中于他的眞正自我, 他們最終也會

---

① Tokyo Shimbun, 1972 年 9 月 27 日 (譯者案: 引文系據英文轉譯)。

認識到他的内在優越性。因此，他需要不斷地引起父親的注意；而且他能夠通過與父親的衝突引起這種注意。看起來，對毛澤東來説，每一個衝突都具有雙重的意義，因爲它們不但重新確認了毛澤東的道義優越性，還確認了父親對他的感情。一切表明，這不是一個忽視兒子，或者不關心其發展的父親。終其一生，父親都很關心兒子，就像晚年的毛澤東不能忽視父親的影響一樣。

由此看來，若干因素一起灌輸、形成和培植了毛澤東尋求克理斯瑪型權威角色的心理基礎（charismatic role）。這種心理基礎，是各種因素的混合物。它包括一個富于強烈的哺育精神、充滿了同情心的母親，一個愛發號施令、最終被情境化且被認爲不如兒子具有道義優越感的父親，以及一個通常來説具有支持、維係功能的較大家族和社區的情境。在毛澤東的權威角色中，英雄的和善良的、被愛戴的和孤獨的形象，被糅合在一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強者與道義的結合。這些結合抓住了由其家庭形成的毛澤東個性中的關鍵因素。

毛澤東與父親的衝突，不止爲他提供了這樣一種途徑，即強化他的自尊心，喚醒他的自戀感，以及使之確信，在放棄對他的完全責任感方面，母親是錯誤的。這些衝突也是有關男性魅力問題的一些檢驗。其中一般都涉及這樣的對抗，即體能方面的強大，或者説“虎氣”；與智慧方面的狡黠，或者説“猴氣”。在他們的關係中，父親明顯被置于一個象徵着成熟男人、體能力量的男性化角色，而兒子則通過作爲一個聰明的“讀書人”，精妙言辭的運用者，以及幾乎是女性化的人物特質，來尋求自己的重要性。儘管如此，兒子也崇拜強壯的體力，夢想激烈的行動，並認同一些英雄角色。這些英雄人物在作爲士兵和戰士的角色方面，遠遠超越于他的父親。與父親對體力活動、生産勞動以及實用性職業的要求相反，兒子從文學中尋求解脱，躲進了書本以及那個充滿幻象以及想象的世界中。

父親是充滿活力的；爲了特定的目的，總能保持積極。因而，他認爲兒子懶惰、虚弱、不實用。就像毛澤東後來説的：“爲了反對父

親説我懶惰的指控，我的辯解是大人應該比年輕人做更多的工作。既然父親的年紀比我大上三倍，他就應該做更多的工作。我還説，等我到了他那么大的年紀的時候，我一定會比他更出力地工作。"[1]最終，毛澤東把體力活動視爲道德價值的終極檢驗標準；但作爲一個孩子，他的反應不能不是智識方面的優越性強于體力活動。毛澤東承認，他是“家中的讀書人”[2]。

儘管如此，作爲“讀書人"，毛澤東再次尋求矛盾心理的安全感。毛澤東可以精于經典，並引用它們來回擊父親，確立自己的道德觀念。但毛澤東也向他的父親宣稱，他“不喜歡經典"；而父親則認爲經典具有實用性的價值。因爲“有一次，他在一個官司中被打敗了”[3]，那不過是因爲對手使用了一個很有説服力的經典引語。相反，毛澤東偏愛浪漫的小説和通俗歷史。因而，甚至作爲一個“讀書人"，毛澤東也尋求展現他對嚴肅的、負責任的、“虎氣”特性（部分的，他具有這一特徵）的疏離感，以及對輕靈的、充滿想象能力的，以及“猴氣”精神的偏好。

在這里，我們發現一條重要的線索。毛澤東追求矛盾現象的確定性，並且堅持不懈，這反映了他本人有關情感義務和理智選擇的一種畏懼感，或者説擔心。毛澤東拒絶情感的欲求，但又渴望疏離的情緒，這與他不願對理智作出嚴肅承諾的那種勉強心理是一致的。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通過扮演“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角色，通過廣泛閲讀、但總是對自己讀過的東西表示輕蔑，通過暗示大衆、“普通”人是一切受人尊敬者中的優越者，他的自尊心很容易得到強化。最後，毛澤東暗示，與他最雄心勃勃的思想一樣，甚至他那些隨意的、未加準備的評論，也與偉大的卡爾·馬克思的作品屬於同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2.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2.

③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3.

一類型。

考慮到他與父親關係的實質，對毛澤東來説，體力活動與智力活動的區分是非常真實的。很早的時候，毛澤東就認識到，他能夠運用言辭來抵消、貶低父親的體質活力與活動能量。腦力和體力之間的兩分，變成了內在固有的優越性與不證自明的自卑感的區分。

如此一來，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他能夠而且應該運用自己的書本知識和他的讀書人身份來反抗父親的權威與權力。毛澤東認爲，父親讓他參加農活方面的體力勞動這一要求是不恰當的；因爲，他注定要成爲一個讀書人。這一觀念貫穿着毛澤東的童年，並且在推翻滿洲王朝的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再現于他的活動中。那時候，毛澤東將近十八歲，還是長沙的一個學生。“我決定參加正規軍，爲革命的成功盡力……我的軍餉是每月7元……在這7元之中，我每月花2元在伙食上。我還得買水。士兵必須到城外去挑水，**但我是一個學生，不屑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買。”[1]

但與此同時，毛澤東明顯妒忌體力的英勇，還遠沒有準備好不加限定地讚美學者的角色。譬如，當毛澤東參加正規軍而不是學生團時，每一次他都感到帶水有辱自己的身份。他也拒絶那時他本可以獲得的讀書人立場：“這時，很多學生都參加了軍隊。一支學生軍已經組織起來……（但是）我不喜歡學生軍，我認爲它的基礎太混雜了”[2]。

本來，在這條路上可能會有明顯的岔路與尖刻的分歧；這個岔路和分歧本來可能引導毛澤東遠離父親對體力活動充滿熱忱的那個世界，轉而導向對智力活動的無限認同。但事實上卻恰恰相反。幾乎剛一離開父親，毛澤東就開始重複父親的論斷。我們已經注意到，在1914年的課堂筆記中，毛澤東表現出的那種激情。當時，他宣稱：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42.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42.

“懶惰爲萬惡之淵藪。”[1]當毛澤東還是一個學生時，他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在該文中，他把健康的體魄、充滿生機的活動與民族國家的發展聯繫起來。毛澤東辯稱，中華民族的衰弱在於人們的懶惰和缺乏活力。他願意支持健康體魄的重要意義。這一點必定反映了毛澤東青少年時期的矛盾心理，而且這種矛盾心理對他來說，非常普通，並不罕見。儘管父親曾經提及努力奮鬥的重要性，但是就身體素質而言，兒子才比較好。他能夠游泳，而父親卻不會。因而，儘管很難把自己的體力集中起來，但毛澤東知道，在體能素質方面，自己確實比父親優越（當然，這要把能夠主導對母親的吸引力這一重要差別排除在外）。因而，毛澤東自己不能向其他人那樣，否認讚美強健的體力爲他提供的優勢。

毛澤東並不止是在年輕的時候，才重複父親的某些觀點。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的一個會議上作了次重要講話。從這個講話所用的言辭之中，我們幾乎可以聽見他父親的聲音：

① 毛澤東：《講堂錄·修身》，1913年11月1日。作者引自《毛主席的革命實踐活動》，無出版時間，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于1966年出現在北京。據稱，這份宣傳材料的編輯者把毛澤東有關懶惰的危險性的主題精緻化了。他發現：“一旦一個民族懶惰了，就會出現修正主義，蘇聯就是一個好例子”。然後，以一種相當有趣的，但又是非常能夠體現中國傳統的手法，編輯者把懶惰和好吃懶做聯繫起來。所謂暴飲暴食，就是一種在飲食文化方面，最具誘惑力的自我放縱。“去年，蘇聯歌舞團來到長沙。歌舞團的成員好吃懶做，爲了滿足他們自己的食欲，他們不斷到處尋找好東西。當他們來到省委自己種的無子桔園的時候，他們變得非常饞，問我們是否可以吃一些。當我們說可以的時候，他們就儘可能的多吃。然後，他們問我們，是否可以帶走一些。我們告訴他們，可以想拿多少，就拿多少。他們還問我們，這些桔子可以保存多少日子。因爲他們想把桔子帶回家，給他們的妻子兒女嚐一嚐。我們問他們：‘莫斯科沒有無紫桔子嗎？’他們回答說：‘連桔子都沒有，更不用說吾子桔子了’。

“另一次，三十多個人來參觀韶山。其中，就有十二個是蘇修分子。我們的賓館用鷄肉招待他們，他們竟然用手拿着吃。他們的衣兜里面裝滿了各種水果。他們是如此貪婪，以至於他們根本不知道羞耻是什么東西。

“毛主席寫這篇文章是在五十多年以前的1914年，當時，他只有二十歲。現在，一些人已經變得墮落了。因爲從懶惰開始，他們就沿着懶惰、貪婪和好吃懶做這條黑線越滑越遠。毛主席50年前，就指出了這個問題”（譯者案：引文系據英文轉譯）。

"現在這個大學教育，我們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菽、麥、谷、稷，看不見工人怎樣作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怎樣做買賣，身體也搞壞了，眞是害死人。我曾給我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讀了幾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作老師，向你們來學習。'其實入學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歲，接觸社會很多，兩歲學說話，三歲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點兒，就拿小鋤頭，模仿大人勞動。"①

有關毛澤東對智識事業與體力活動的矛盾心理，在以後考察作爲一個意識形態專家，毛澤東對理想觀念的運用；以及作爲一個事務管理者，他獲取權力的方式時，我們還將重新回到這一話題。但在這里，我們只需要強調，毛澤東有關書本知識和體力活動的矛盾心理，以及他有關二者各自相對價值的搖擺不定，看起來似乎已經深深地植根于那種更加基本的、有關他與父親關係的矛盾心理之中。毛澤東發現，就反對、抵制在體力活動方面比他更加健壯有力的父親而言，思想觀念和言辭文字的力量是有用的。儘管如此，毛澤東也認識到，就對母親的吸引力而言，最後總是這個強壯的、但是又很單純的男人，擁有最終的發言權。面對父親的時候，毛澤東總是不得不保護自己，以便抵禦這個講求工作效率、注重實際行動的父親的可怕一面。爲了反擊父親，毛澤東通常藉助這樣兩種方式來實現：一方面，他聲稱，當自己長大的時候，會變得更加強壯；另一方面，則是退回書本中的奇妙世界，尤其是退回到小說化了的演義歷史中。

有證據表明，毛澤東認爲，就身體素質而言，自己是虛弱的。因而剛一離開家不久，他就開始參與各種健身計劃，並通過靠近大自然

① 毛澤東：《在杭州的講話》，1965年12月21日。對毛澤東來說，在1965年談及"商人"作爲孩子們的榜樣，這有一些奇怪。看起來，毛澤東就好像已經忘記中國經濟已經進入社會主義了；他似乎在思考父親所熟悉的那個世界。

的生活，來試圖增進自己的體魄。毫無疑問，這不但與他終其一生所迷戀的健康問題有關，還與一個非同尋常的事實有關。據記載，無論何時，只要毛澤東的自尊心受到嚴重打擊，他的健康狀況就會惡化，身體就會出現某種疾病。

這些年中，各種報告不斷重複、夸大毛澤東健康問題的嚴重程度。毛澤東有嚴重的身體問題——部分而言，這一廣爲流傳的看法得到了某些頻繁發生的事實的支持。無論何時，只要政治命運不佳，毛澤東的身體健康狀況就確實會遇到某些麻煩。在一些場合，譬如，當毛澤東因爲在家“休息”而沒有出席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並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的身體出現任何有關疾病的症狀。秋收起義失敗後，毛澤東與中央委員會意見不合，且被迫離開政治局。這個時候，毛澤東的身體健康狀況很糟糕。因爲很多不適的病症，毛澤東需要住院治療①。後來，黨的領導人指責毛澤東在富田事變過程中過于狂熱和殘酷。面對這些指控，毛澤東的身體健康狀況隨後開始遇到各種麻煩。高崗是共産主義革命勝利以後被拋棄的第一個領導人。就在高崗被清洗之後不久，毛澤東明顯地害了一場病。結果，劉少奇不得不代替他在七屆四中全會上作重要講話②。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前不久，毛澤東被擠出了權力的中心；而據有關報道聲稱，他的健康狀况出了問題③。

不管其眞僞價値如何，前蘇聯當局有種説法聲稱：在跟斯大林打交道時，毛澤東的健康狀況與他感受到的壓抑情緒之間，存在一種明顯的伴生關係。爲什么在 1949 年征服全中國的偉大勝利之後不久，毛澤東會在莫斯科歇了將近 3 個月？前蘇聯當局宣稱，那是由於毛澤東的身體狀況又一次遇到了麻煩。特別是，他們聲稱：在會見中，毛

① 傅連暲（Nelson Fu）是長汀浸禮會教會醫院的一名醫生。他曾給毛澤東看過病，認爲毛澤東需要長期的休息。參見 Edward C. Rice, Mao' s W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 62。

② James P.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New York: Praeger, 1972, p. 468.

③ James P.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New York: Praeger, 1972, p. 467.

澤東的臉色會變得蒼白，明顯喪失了能言善辯的能力。而當年，正是這種能言善辯的語辭威力使毛澤東成爲他父親的主人。

當面臨政治挑戰時，毛澤東的健康問題總會出差錯。與此相反，由毛澤東本人的經歷所提供的證據表明，其身體狀況從來沒有他參與軍事行動的時候那么好。因而，毛澤東就容易在這樣二者之間搖擺：一方面因強健體力的英雄光輝而得意，這一點滿足了他的自戀感；另一方面，正如我們可以從其寫給他母親的祭詩里認識到的，毛澤東又利用體力方面的不足來吸引人們的注意力。

正義感

我們已經準備好考察業已離開家、並開始學習處理與同輩人以及新權威的關係的毛澤東。但在我們離開他與父親關係的探討之前，仍然存在着最後的一個向度，亦即毛澤東的正義觀（concept of justice），或者説他有關正義的看法，是如何受到他自己與父親以及兄弟姐妹們的緊張關係的影響的。在兄弟關係的情境中，如何處置與父母權威的關係？通常來説，這個問題是形成人們有關正義情感的一個強有力因素。大多數個體在童年的時候，就學會了那些最終幾乎成爲他們本能地處理與權威關係的方式。他們通常發現，在一個由與父母、兄弟的關係組成的情境中，爲了保護自己，一個強有力的護衛工具就是對正義觀念的運用。許多人也發現，運用正義的辯論，不但能夠適用于防衛性目的；而且，他們還能運用正義這個概念來約束、限制，甚至傷害他人。

通往正義的途徑千差萬别，各不相同。這種不同不但反映了個體的差别，也反映了文化的迥異。一些人看起來似乎是從其特殊的家庭關係中認識到，如果他們想得到“公正”的待遇，他們就必須不斷戰斗。另一些人可能更爲平和，因爲他們期望正義將會自動起作用。年齡小些的孩子經常因遭到忽視和沒有受到同等待遇而表示出強烈的敏感；另一些孩子更可能因爲父母對他們苛求太多而感到不公正。

從文化的角度來説，恰恰由於家庭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差異，因而，在不同的文化中，也傾向于存在完全不同的接近正義的途徑。譬如，在美國文化中，正義的觀念與平等對待的要求緊密相連。權威必須是公正的，每個人應該被同等對待，必須嚴格遵循業已確立的規則。

美國的兒童一般都堅信，所有的兄弟姐妹應該被同等對待。如果有人得到了更多的照顧，這些兒童就會對此表達不滿，並爲之而鬥爭。如果能夠證明父母是“不公正的”（unfair），他們對某個孩子表示出偏心和袒護，以及並未按照業已設定的行爲準則行事，那么，美國兒童就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戰勝自己的父母，贏得平等對待。由於公正與即時的、當下的平等緊密相關，因而，在試圖闡明任何特殊待遇的理由時，美國的父母經常感到無能爲力。相對而言，英國文化中的“公正”觀念（fairness）更多的是與審慎，以及懂得在特殊境遇中，什么是必需的等看法有關。英國兒童們希望，獲得任何對他們來説都是應該得到的特殊待遇，而並不要求各種明顯的規則約束。英國兒童們相信，通過獲得和給予一定的文明禮節和相應待遇，他們可以生活得比較舒適。在法國家庭中，似乎存在一種截然不同的模式。法國兒童們發現，要求每個人必須遵循所有的規則，這一點幾乎沒有什么益處。他們對於專斷的懲罰表現出非同尋常的容忍。如果因自己沒做的事而受到懲罰，美國的兒童會經歷巨大的痛苦。有關研究則表明，法國的兒童對此則表現得更像一個禁欲的斯多噶主義者（Stoical）。他們默默無聲地接受這樣的懲罰，因爲他們可以很容易地想起其他一些事；在這些事中，他們的確做錯了，但卻沒有被發現。因此，只要人們認爲，因做錯事而受到懲罰與未作錯事而被冤枉這兩種情形處于一種恰當的平衡狀態，那么，正義（justice）就在起作用①。

這些文化差異可能爲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的實踐，以及毛澤東的特

① 有關法國文化中“正義”的心理機制，Nathan Leites 有非常深刻、極具洞察力的看法。參見 Nathan Leites，The Rulers of the Game in Paris，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66。

殊經驗，提供了一個有益的視角。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在中國文化中，權威被希望按照他們稀奇古怪的想法來採取行動；父母能夠通過採取偏袒行爲來宣稱自己的權力，而孩子們如果能夠學會有效地把握父母的情緒狀態，也可以期望得到較好的對待。較之僅僅尋求空洞的正義，這種對待要好的多。通常來說，中國的孩子們都知道，如果僅僅因爲所有的孩子並沒有得到同等的對待，就暗示父母可能是不公正的，以至於惹惱了父母，那么，自己就會冒一定的風險。他們會成爲父母毫無約束的狂怒情緒的犧牲品，且沒有絲毫的防禦能力。通常情況下，孩子們會認可這種有差別的待遇。因爲他們知道，他們得到特殊待遇的機會最終總會到來。短期而言，作爲對良好行爲的回報，一個人總是可以希望受到父母的寵愛。但從長期來看，每一個孩子都可以期望屬於他自己的特別待遇的特別時期。在一個相應的階段或者年齡，一個人就應該期望適當的相應待遇。如此一來，年紀小的孩子就可以指望逐漸成長壯大，並最終成爲留在家庭中的最年長者。在他們的一生中，父母被希望以不同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孩子。但隨着父母的死亡，每個孩子都會得到一份均等的財產。這樣，對最年長的兒子來說，當平等最終佔據優勢、發揮作用的時候，他們曾經得到的偏袒地位就得以被修正。

爲了影響他們的父母，中國的孩子們使用了大量的、廣泛的策略。這些策略既包括訴諸于幽默、奉承、給予榮譽與留下印象，還有溫順地屈從于父母的命令。孩子們的目標，是通過爲他們受到的不當待遇尋求憐憫，來軟化父母的愛心，或者使父母處于羞愧的境地。如此一來，在中國文化中，正義的概念通常與把權威人物描繪成精神暴躁、易於發怒有關。人們通過爲不當待遇企求憐憫與同情來追尋正義。

毛澤東的政治成功，部分依賴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分享了有關正義與憐憫之間的關聯這一文化情感（cultural feeling about tie between pity and justice)。這一問題是値得注意的。與此同時，毛澤東形成了某種有關正義的獨一無二的情感，這種正義感強化了他在政治方面運用這一概念的嫻熟技巧。

理所當然的，毛澤東與同代人分享了一些共同的觀點。按照這種觀點，如果一個人大量運用細節，來精緻化地呈現和表達自己因處于權威控制之下而遭受的痛苦，並企求憐憫，那么他實際上是在表達一種對正義的渴求。値得注意的是，在掌握國家權力 20 多年之後，晚年的毛澤東仍然堅信：除非不斷向他們灌輸那些在毛澤東當政前人們所經歷和遭受的悲慘故事，並使其從中受到教育，否則，中國的年輕人對於革命事業將幾乎不會有什么熱情。因爲在通常情况下，對他人的憐憫與同情可以產生對現存狀態的某些優點的欣賞與感激。

就傾向于把不公正個人化，並視之爲情緒暴躁者的“杰作”而言，毛澤東的正義概念與中國的傳統情感是吻合的。人們通常認爲，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毛澤東傾向于對歷史進行唯物主義的解釋，並認爲歷史過程中的正義與非正義是非人格化力量的結果。儘管如此，實際的情形卻不是這樣。毛澤東堅持思考地主和其他敵人的行爲活動的罪惡動機與兇殘性格。在毛澤東看來，並不是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運行導致了不公正；事實上，恰恰相反，他總是傾向于強調各種政治階級中特定個體的不良道德品質。

毛澤東同意中國傳統的觀點，認爲權威必定是導致正義與非正義的首要來源。儘管如此，毛澤東對其他可能的來源完全視而不見；特別是，對同輩人關係中可能引起的非正義，毛澤東相對而言很不敏感。這種情况非同尋常。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對自己的兄弟姐妹，毛澤東幾乎總是沒有什么可說的。他從來沒有敏感地認識到，作爲老大哥，他本人可能正是兄弟姐妹們眼中的不公正的原因。相反，他認爲，在整個家庭中，只有父親才該被指責爲不公正。在毛澤東後來的生活中，通常只有權力持有者才會引發不公正。儘管毛澤東在與同學們的同輩關係中也曾遭到挫折，但他仍然堅持認爲：老師，特別是校長，是導致不公正的基本原因。

通過只將權威與不公正聯繫起來，毛澤東在此過程中很早就形成了一套行動策略。按照這套行動策略，毛澤東會訴諸一種更高層次、但又很抽象的正義概念，以便反對頂頭上司和直接權威的不公正。毛澤東告訴我們，許多次，“我對父親引經據典”，“我告訴父親經書

上說……"，"當我提到經書的時候，父親不能回答"[1]。以一種幾乎是西方的、而非中國式的方法，毛澤東利用一個權威來反對另一個權威。儘管如此，毛澤東同時又聲稱："我恨經書。"[2]如此一來，他就將自己置于所有的權威之上。毛澤東貶低、排斥傳統經書，部分的是因爲他們"太約束人了"。但是，既然是經書"約束人的"品質使其有助于毛澤東控制父親，那么，構成毛澤東敵意對象的，實際上是這樣一種可能，即他自己應該被那些能夠約束他人的規則所約束。在後來的一些年中，毛澤東將要尋求一種全新的意識形態，來服務于自己的目的，並發揮當年儒家經典對其控制父親時所起的那種功能。但最終，他並沒有發現任何這樣的體系——包括馬克思主義——可以使自己完全服從于該意識形態的權威。因而，他自己的個人意志不得不成爲正義的終極淵泉[3]。

面對父親，毛澤東擁有某種道德優越感。而且，在鬥爭過程中，他還能夠訴諸某種由他自己確定的抽象權威。儘管可以把這兩種能力結合在一起，但這並沒有使毛澤東成爲家庭中的和平建立者，以及正義的寶貴分配者這樣的角色。那些認定自己在立法性質的辯論方面擁有某種潛質的聰明孩子，總會通過作爲理性的永恆代言人，並能在任何情況下比成年人更加優秀地確定什么是對、什么是错，來尋求主導

---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2-133.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3.

③ 毛澤東試圖追求一個更高層次的、抽象的權威，以便控制那些直接的、具體的權威。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經歷和早期的路德主義者、加爾文主義者的情況類似。爲了反抗世俗父親的權威，他們提出了"神聖的天父"（Heavenly Father）這一概念。Robert Bellah 曾經指出，早期新教徒的這種思考方式，使他們可能維持對權威的嚴格服從這一觀念；但實際上，同時也革新了正義的概念。這是可能的。因爲，"神聖的天父"這一概念恰當地授予人們某種權力，使之可以產生與最高權威有關的念頭；但與此同時，也體現出某種非常合適的模糊性，即允許人們做個體選擇。參見 Robert Bellah, Beyond Belief,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類似的，毛澤東先是藉助于傳統經典，進而藉助于馬克思主義，也把抽象的權威和他自己的個人創造性結合起來。

他們的家庭事務。這種情況我們會經常看到。作爲家中的長子，毛澤東可以很容易地就承擔這樣一種角色。並且，通過處理各種爭論和要求家庭中的其他成員“説出”他們的不同意見，毛澤東就證明了自己的優越性。

並非訴諸理性，毛澤東顯然偏好這樣的機遇，它使自己可以合法地表達抗議與不滿，並向正義發出呼聲。任何不公正，不論是針對他自己、抑或他人，都使敵意的爆發變得正當而合理。在一定意義上，毛澤東冒犯“不公正”的父親，使他從某種心理焦慮中解脱出來。這種心理焦慮就是，他曾放棄了作爲長兄的職責。

美好德性的化身，充滿自戀意味的自我，以及針對“不公正”而表達出的強烈的、極富敵意的情緒：這種結合，爲以一種浪漫的方式來反抗邪惡準備了基礎。在很大程度上——正如中世紀的歐洲騎士那樣——只要反抗的合法性是基于反對某種不公正，那么，毛澤東也可以將反抗的那種近乎震顫的狂喜與刺激理想化。

父親是“不公正的”——毛澤東的這一強烈看法，似乎與這樣一種感情有關。他覺得，父親並沒有賞識自己；而且，在失去母親的唯一關注之後，毛澤東曾經渴望得到父親的特別對待，但父親卻沒有給予他這種對待。毫無疑問，毛澤東對此感到焦慮：就身體方面而言，他並非如父親期望的那般強壯有力。在有關美德與正義的論述中，無論何時，只要可能提及他的優越性，毛澤東總會毫無顧忌地表現出敵對情緒。這些考慮綜合起來，就使毛澤東感覺到：他能夠批評、挑戰、操縱甚至利用自己的父親，而且毫無負罪感。

毛澤東有關自己離開家鄉的描述暗示我們：他基本上和父親鬧翻了，斷絶了關係。儘管如此，當需要獲取生活費的時候，他還是做好準備，與父親講和。因此，毛澤東試圖否認依賴性。他宣稱，自己的行動是出于某種日益覺醒的社會正義感的刺激。毛澤東覺得，自己從父親那兒帶走的東西是他應該獲得的那份。在轉向毛澤東作爲一個離家的青少年那段經歷時，我們需要記住：他堅持把自己看作父親的兒子；確實，當涉及家庭財産時，是父親的唯一兒子。父親死後，究竟發生了什么事？這一點很模糊，很不清楚。但我們確實知道，毛澤東

承擔了整個家庭在韶山的財產所有權。而且，毛澤東還運用由此收集來的資金來支持自己的革命活動。他的妻子、妹妹以及兩個弟媳仍然依靠這筆財產過活。正是在這里，他的妻子與妹妹被國民黨抓起來，後來被殺害。有關這筆財產，毛澤東後來有一次曾將自己描繪成一個典型的地主：這個地主的父母對兒子極度忠誠；甚至當他們本可以沒收這筆財產，並從中獲益的時候，他們仍然尊重兒子的財產權。“我聽到傳言。當地的農民相信，我很快將會返回家鄉。有一天，一架飛機從當地天上飛過。他們認爲，我就坐在那里面。他們警告當時正在耕種我家土地的農民。他們説，我已經回來，要看看我家的農莊，以及那些樹木是否被人砍了。他們還説，如果確實有樹被砍了，我一定會要求蔣介石做出賠償。”①

從父子間最初的爭吵時期起，中經試圖改變父親信仰狀況的嘗試，直到針對父親財產的態度：以上這些有關毛澤東與父親關係的整體回顧，爲我們提供了一份備忘録，並揭示了有關矛盾心理的連續性。毛澤東不滿父親的主導權，但他也感覺到自己的優越性。他知悉自己可以對父親以智取勝的能力，但這樣做的時候，他必定感到了負罪感。如何評估我們有關毛澤東與父親關係的解釋？這須留待適當的時候進行。到那時，我們不但已考察了他自己對權威的運用，還考察了作爲父親角色時，毛澤東採取的特定處理方式。在這里，我們只需指出，毛澤東拒絶承擔自己作爲孩子的父親所應承擔的責任；他偏好扮演新中國的父親這樣的抽象角色。這兩點表明，毛澤東在相當程度上必定已經認可了這樣一個現實：在面對一個富于反抗精神的兒子時，一個父親將要經受的易受傷害的特性和難以維係的立場。很早的時候，毛澤東就認識到：在父子間的衝突中，父親不可能“赢”。因此，從心理學上講，毛澤東從來不會允許自己陷入作爲父親的角色所必須承擔的那些責任。

毛澤東後來成了一個丈夫和父親，並創造出自己的家庭環境。爲

---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75.

了檢驗我們有關毛澤東早年的家庭經歷對這個新家庭關係的影響的觀點，我們還必須觀察一下，當毛澤東離開自己的家庭、日益成爲一個越來越具有自主性的個體時，他是如何應對老師的權威、學校環境的競爭特性，以及兄弟性友誼和充滿敵意的自作主張的各種機會。在一定程度上，這些與權威、紀律以及同輩人的外部衝突，強化了毛澤東在與母親、兄弟姐妹以及父親的關係中形成的那些情感和心理防衛機制。儘管如此，隨着他不得不處理各種選擇，以便確定什么將構成他以後的生活道路，毛澤東就不斷地成長，並逐漸修正自己的行爲方式。從具有一定依賴性的兒子，到一個完全獨立的丈夫和父親——爲了完成毛澤東私人生活的這個圓圈，下一步我們必須考慮這樣一些因素，即一個孤獨的少年人在離開家庭的直接影響後，其行爲舉止的改變、政治覺醒的渴望、事業抉擇的要求，以及在此過程中遊歷旅行和知識觀念對他的刺激和影響等。

第七章　同學與老師

正如毛澤東在回憶中揭示的，他離家求學的故事是一個各種因素的混合物。其中既包括對父親意志的挑戰，也有對知識的渴求，還涉及對當時社會覺悟意識的強烈感覺的回應。在 19 與 20 世紀之交，對那些十五六歲的中國男孩來說，離家是一件相當常見的事。父親經常送自己的兒子外出打工賺錢、尋找機會。確實，對那一代中國領導人來說，大約較四分之三略強的人在他們 17 歲的時候，就已經離開家鄉，在學校寄宿學習。這些人不但包括國民黨的領導人，還有些是共產黨。在共產黨人中，有些 1949 年以後進了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那批國民黨人則與後來撤退到台灣的蔣介石關係密切。

後來，毛澤東長大了，到了人們希望那一代中國年輕人放棄對家庭的依賴感、尋求某種更大程度的自主性的年齡。這時候，父親同意，毛澤東可以離開家。但並非爲了接受更多的教育，而是去一個與父親毛順生“有些關係”的米店當學徒。顯然，父親再次認爲自己是在幫助兒子，以便他能夠有一個比自己所經歷的更加美好的生活。只不過，這種生活仍然限于韶山冲的情境之中。

毛澤東拒絕了父親的建議。他更希望接受更多的正規教育。在當時的文化氛圍中，毛澤東的選擇確實意味着父子二人在人生目標和發展軌迹方面的重要分歧。儘管如此，人們並不這樣認爲，即在這種區別中，接受學校的正規教育比做工、當學徒更不實際。認識到這個事實仍然很重要。因爲對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來說，學校教育並不被認爲僅僅是體驗一種智力的、自由主義的人文教育（intellectual and liberal

arts experience)。恰恰相反，上學接受教育是一種途徑。它可以爲人們打開一扇通往某些特定職業優勢的公開、開放的大門。因而，教育是一項由某一個體，更可能是他的家庭，甚至他的宗族所進行的某項實用性的投資。這樣看來，接受更多教育的要求通常可以被解釋爲，表現出某種爲了獲取更大物質成功的強烈動機。

若干年以後，毛澤東已經確立了自己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他充滿感情地談起自己對農村學堂的不滿，以及對獲得較好教育的渴望。儘管如此，無論毛澤東的眞實動機是什么，他的言辭和推理方式卻將這些東西都掩蓋了。因爲，他的那些動機似乎是從一些直接的、充滿冒犯性色彩的語句中突然跳出來的。“父親自然反對我。我們爲此而爭吵。最後，我離家出走。”①然後又轉向一些非常崇高的考慮。這種情形反映出的那種熱衷于將事物理想化的傾向，看起來似乎與我們分析毛澤東在母親去世時所寫的作品中發現的那種傾向一樣。

特別是，毛澤東曾經提過三件事。他宣稱，正是這三件事喚醒了他有關社會自覺和民族屈辱的感覺。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後來承認，“這些一起發生的、有着密切聯繫的事件，在我年輕的頭腦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象”②。儘管如此，經過仔細的區分定位、排定日期以及明確闡述，斯圖爾特·施拉姆 (Stuart Schram) 向我們揭示出，這三件事發生在好幾年中。時間跨度從他仍然在家的時候起，直到他離家求學的兩年以後③。有關第一件事，毛澤東聲稱：它“影響了我的一生”④。這一說法顯然有所夸張。施拉姆已經確定了這件事的眞實情況。那跟一個湖南官員有關，他就是黃興。因爲政治雄心遭到了挫敗，所以在 1904 年，黃興打算暗殺一些重要的帝國官員。當時，那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4。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6。

③ Stuart R. Schram: Mao Tse-tung, London: Penguin, 1966, pp. 20–23.

④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5.

些人正爲了慶祝慈禧太后的壽辰，而齊聚湖南省會長沙[①]。這本來是一個因政治原因而驅動的個人復仇行動。但在毛澤東的記憶中，卻變成了一個充滿戲劇性色彩的、包含某種道德寓意的舉動：這是在大饑荒的情形下，一場圍繞着糧食騷動的戲劇性表演。騷動的火花是由一個巡撫點燃的。他對一個請求賑濟的代表團説："你們爲什么沒有糧食？城里多得很，我向來就沒有缺少過。"[②]根據毛澤東的記憶，人們表現出正當的道德義憤；得到民衆的支持的好官，曾與那個道德敗壞的巡撫進行過鬥爭。但是，如果不是由於皇帝"不喜歡"富于美德的正直官員，那么，那個好官本來總有一天會勝利的。一個新的巡撫被任命。然後，他就把帶頭反抗的人抓了起來，還砍了他們的頭。反抗者的頭被挂在木杆上示衆，"作爲對將來'叛亂者'的警告"[③]。根據毛澤東的敘述，大多數同學都很同情那些"反抗者"。但是，毛澤東本人的看法與他們有所不同。因爲，"他們並不了解，這次反抗對於他們的生活有什么關係。他們感興趣的，不過是把這件事當作一個有刺激性的事件而已。然而，我卻永遠不會忘記它。我覺得，這些'反抗者'都是**一些與我的家人一樣的普通百姓**。於是，我對他們遭受的不公平深感痛恨。"[④]明顯的，年輕的毛澤東將事情作了轉化。那不再是有關某個官方陰謀的毫無疑問的混亂敘述，而是一個具有深刻意義、能夠打動人心的事件。這一事件涉及到"人民"（the people）；而"人民"，按照毛澤東的描述，就是像他"自己的家庭"那樣的"普通百姓"。在這里，對自己家庭的階級地位與社會身份，毛澤東表現出非常奇怪的矛盾心理。但是，這決不是最後一次。

在第二次事件中，他父親是某種形式的糧食騷動的攻擊目標。當時，這個地區的稻米很缺乏。但作爲一個穀物商人，毛澤東的父親卻

---

① Stuart R. Schram: Mao Tse-tung, London: Penguin, 1966, p. 22.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5.

③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135.

④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5.

把米運往省會長沙，並在那里賣到更好的價錢。“其中的一船米被窮人劫去”根據毛澤東的說法，父親“對此大爲光火，憤恨不已；但是，我並不同情我的父親”。不過，毛澤東還加了這樣一句話：“當時，我以爲村人的方法也是不對的。”①。對一個未來的革命者而言，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實。

第三件事涉及一個地主和一些秘密社會成員之間的衝突。那個秘密社會，就是哥老會。地主提出了訴訟，並在法庭上打贏了官司。但秘密社會的成員卻拒絕“屈服”。他們躲進山里，建立土堡，鼓動反抗。地主則傳播謠言，說哥老會的人“用一個小孩作爲犧牲”，並聲稱這是叛亂分子激發反抗的儀式的一部分。據此，他要求增派軍隊。最後，抓住了起義的領導人，並砍了他的頭。

在重新敘述這些故事的時候，毛澤東正在艱苦奮鬥，試圖將自己的努力合法化。當時他正躲在山區的根據地中，動員農民，並與政府軍戰鬥。就其心理學意義而言，由這樣一個革命領導人講述這些故事，幾乎不需要任何的精緻化。一方面是日益覺醒的社會自覺和社會責任感，一方面是繼續求學和進行深造：在這兩種決定之間，毛澤東究竟覺得存在何種聯繫？從心理學角度來說，這個問題並不像前述情形那么不證自明。在毛澤東有關自己經歷的敘述中，潛在地蘊含着這樣一種觀點。他假定，那些關注社會不公正的人，會“自然的”尋求更多的教育。儘管如此，作爲一個政治領導人，毛澤東最終有不同的看法 他將成爲他所認同的世界觀的發言人。這種世界觀相信，正規教育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學生對社會的認識；如果年輕人要想獲得政治自覺，就必須走出教室，經受農村和工廠生活的考驗。爲了解釋當初自己爲什么會選擇接受更多的教育，毛澤東引用了自己對家庭的反抗，以及對那些正忍受着因社會不公正而帶來的痛苦的人們的同情，但在這樣做的時候，毛澤東並沒有闡明這樣幾件事：他是否認爲，更多的學校教育將會使他更加清楚社會不公正狀況？或者更加了解，爲了反抗社會不公正應該做哪些事？甚至，學校教育是否將可能爲他提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136.

供一定的社會地位，以便在這個位置上更加有效地推動社會變革？

毛澤東政治觀念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有關教育的矛盾心理。不管怎樣，我們發現在毛澤東自己有關教育問題的初始選擇中，這種矛盾心理就已經得到了明顯的表達。同時，我們還發現，毛澤東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將某些合理性因素理想化。正是由於這些合理性，毛澤東才認爲自己當初離家求學的決定，是恰當的、合適的。毛澤東的思維充滿跳越性，可以從令人不快的私人考慮轉向非個人化的義務約束。在爲説明接受更多教育的必要性而提供的另一系列的解釋中，這一傾向更加明顯，且更富戲劇性。毛澤東曾經談過自己讀過的一本書，即《盛世危言》。這是一個家境殷實的上海買辦鄭觀應寫的。鄭觀應在書中表示，希望通過支持議會政制來改革中國。他還試圖運用西方的技術成就來復興國家，以結束外交方面的耻辱。毛澤東宣稱，這本書“激起我繼續求學的慾望”。在隨後緊接的一句話中，他又説：“我也已經變得反感、厭恨在田里進行勞動了。”①

有關當年實際發生的事情，我們知道這樣一些情況。通過離家出走，與一個失業的政法學生住在一起，以及主要學習儒家經典著作，毛澤東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步行動。然後，毛澤東就回家，作了一次短暫的停留。直到最後，他終于獲得了父親的支持，去母親老家所在的湘鄉地區上學。那是一個受西方影響的高小。當時，毛澤東 16 歲。住的地方離家大約 20 里。毛澤東已經放棄了自己的鄉村社區曾給予他的那種安全感。儘管如此，毛澤東的冒險行爲並未走得比這更遠。因爲，他面臨的仍然還是一個熟悉的世界。在那里，人們説着同樣的方言。他們也是中國鄉村文化的一部分。而毛澤東，則生活在他母親那邊的親戚之中。確實，毛澤東甚至與一個表兄弟一起去上學。在討論毛澤東與他母親關係的時候，我們已經注意到：毛澤東偶爾會宣稱自己在母親所屬的郡縣，有些本地的淵源，或者説是湘鄉本地人。毛澤東最初這樣作的目的，顯然是爲了獲準能夠去上學（但一旦後來認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4.

識到，要想入學，湘鄉本地人並不是必需的條件，毛澤東就糾正了這一說法)。我們並不清楚，毛澤東與他的表兄弟及其家庭的關係之親密程度。但明顯的，毛澤東開始寄宿在學校以後，那個堂兄弟仍然對他不錯。他還爲毛澤東提供了大量的書籍。恰恰是這些書，擴展了毛澤東對中國現代化的興趣。這個堂兄弟曾經向毛澤東介紹過梁啓超的作品。而梁啓超，正是世紀之交那場改革運動中以筆爲劍、以文爲槍的宣傳家。當時，毛澤東認爲：這個堂兄弟“很進步”。但後來，這個堂兄弟卻變成了一個“反革命”。他是“土豪劣紳”。1925-1927年間，還參加了“反動派”。而此時的毛澤東，正積極地活躍在湖南各地，調查以農民爲基礎的革命的可能性。在講述他的堂兄弟時，毛澤東似乎在暗示，自己與堂兄弟已經分道揚鑣了。或者，也可能是這樣：作爲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宣傳組織者，毛澤東曾動員吸收家庭中每個可能的成員來加入他從事的革命事業；在此過程中，他與那個堂兄弟之間發生了一場政治性的爭吵。

毛澤東含糊不清、曖昧難明的態度，以及他對自己和那些親戚的家庭的疏離感，是有重要意義的。因爲，1970年代中期，毛澤東已經是一個年邁的中國領導人。當時，在外交部爲他收集、整理、傳遞信息的人，是外交部長助理。那是一位女性，名叫王海蓉。據信，她是毛澤東那位堂兄弟的孫女兒。也就是說，毛澤東母親的姐姐的重孫女兒。儘管毛澤東暗示，自己與母親那一方親戚們的家庭關係很疏遠，但他顯然仍與他們維持某種聯繫。

考慮到毛澤東對自己離家求學情況敘述的矛盾狀況，上述這些情形就顯得特別有趣。毛澤東的敘述，似乎混淆了兩個問題：究竟是他拋棄了家庭，還是相反，家庭拋棄了他？毛澤東宣稱，自己求學等活動完全是獨立自主的。但事實上，父親不但支付他在湘鄉東山小學的所有花銷；而且，他隨後的教育費用也是由父親承擔的。通過有意識的忽略、貶低上述事實的意義，毛澤東似乎在暗示我們，他的家庭已經拋棄了他。在描述自己在學校遇到的各種問題時，毛澤東把自己描繪出一個孤獨的、幾乎就像一個“被拋棄了的孤兒”式的孩子。但是，通過自己的智慧和強烈的意志力，最後他成功了。而這些品質，

恰恰正是父親當年指責他，認爲他所缺乏的東西。

最初入學的時候，毛澤東很好斗。他會挑戰自己的同學、老師甚至校長。在這樣做的時候，毛澤東那種令人尷尬、捉摸不定的行爲方式暗示我們，他確實感覺到某種被拋棄的感覺。爲了證明自己的優點和德性，就需要吸引別人對自己的注意力。特別是爲了向那些權威人士證明這一點，就尤其需要如此。後來很快就成爲毛澤東好朋友的同學蕭瑜，爲我們提供了一段生動的敘述。根據蕭瑜的說法，毛澤東最初來到東山小學的時候，他的行爲特徵主要是體現出某種困惑與焦慮，充滿敵意，以及直率、大膽與魯莽。毛澤東指責警衛和看門人。他要求獲準進入，而警衛等人則不讓他進去。這就造成了一個壯觀的場面。在場圍觀的同學們都笑了。他們說，毛澤東不了解事情是怎樣作起來的。最後，毛澤東引起了校長的注意①。對抗引發了緊張的場景——這樣的情形，在毛澤東的一生中很常見。此時，就會有一個調解者出場來干預。這是在中國文化中非常普通和極爲常見的一個人物。不可避免的，在努力尋求和解的過程中，調解者就會把毛澤東採取的極端立場合法化。東山小學的校長拒絕了毛澤東的入學請求。因爲他認爲，毛澤東不合格。而毛澤東則堅持要求被允準入學。這時，一個教員出面干預。他建議，可以給毛澤東一個機會，讓他通過考核來證明自己。要想在這樣的條件下，還能被接受入學，這對其他孩子來說，是不可能的。但是，毛澤東做到了這一點。確實，在進入學校這次新的冒險歷程中，也是年輕的毛澤東孤獨感非常強烈的一個時期。因爲，很明顯，毛澤東曾和有些同學談起：在熟悉和結交新朋友方面，自己過得並不輕鬆。

在毛澤東生活中的這一階段，有關他接觸社會的困難問題有很多個維度。首先，有個不太合乎自然的事實：毛澤東比他的同學們都大。這種年齡差大概有六七歲的樣子。儘管如此，從學習成績來看，毛澤東的表現卻不如他們那般好。在傳統中國，人們對年齡群體並沒

① Siao 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1959, pp. 18-23.

有什么強烈的感覺。各個年齡段的孩子們經常混和在一起，來聽一個嚴厲、刻板的先生講課。而這個先生，可能是當地唯一可以找得到的老師了。把學生分成不同的年級，接受一些在不同方面有專長的老師的指導，並借此來實現累進式的教育——這種系統化建制的學校觀念(concept of systematic schools)，是一種從西方引進的產物。在那個世紀之交，它才剛剛開始實行。儘管如此，這一教育觀念確實已經開始得到實行，並且非常迅速。結果，到 1911 年辛亥革命的時候，中國人已經開始形成現代的“同學”觀念（the concept of classmates)。所謂“同學”，就像一種非常親密的朋友。而且，在一生中剩餘的那段時間里，你會和他有一種特別的聯繫紐帶。在傳統上，中國文化會把朋友觀念看得非常重要；就此而言，這種重要性的程度之高幾乎沒有幾種文化可以與之相比。因此，我們非常容易理解，爲什么中國人會如此輕易地就把有關朋友的那種深厚、持久的情感轉入到“同學”這種觀念之中。最終，“同學”這個中國概念確實激起了中國人一系列的強烈感情。譬如，彼此之間的義務，共同分享的幸福，以及長伴一生的友好關係等。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情感會變得更加濃厚，而不是淡化。

毛澤東加入了一個體現現代教育風格的學校——這段經歷發生在 20 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當時，同輩人群體的觀念（the concept of peer cohorts ）才剛剛開始在那些中國年輕人的文化觀念中佔據主導地位。因而，儘管毛澤東比同學們大很多，但通常，這一事實並不足以使毛澤東變得那么稀奇古怪、引人注目。毛澤東自己從未提及這一明顯的事實，即他自己其他同學都大好多。但在同學時代就認識毛澤東的蕭瑜告訴我們，其他同學是如何看待毛澤東的。他們把毛澤東看作一個鄉下來的男孩，有着較爲夸張的雄心。還認爲他實在太大，而不能僅僅獃在六年級或者七年級[1]。確實，就在毛澤東第一次來到東山小學，提出想被接受入學的時候，門衛都覺得他實在太大、不合適。認爲這

① Siao 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1959, p.20.

個人可能精神有點兒問題。當時，毛澤東已經16歲了。更有甚者，他的年齡與長相並不相稱，看起來遠比實際年齡爲大。因而，很容易就被誤認爲至少有十八九歲。學校的學生大概都在十到十二歲。第一眼見到毛澤東的時候，他們就認爲，他已經是大學生的年紀了。他們覺得，毛澤東可能會是校園中的一種威脅①。

可以對比一下這兩種關係，即毛澤東與他父母的關係、以及他與年輕的兄弟姐妹們的關係。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對毛澤東在學校里全神貫注地把精力集中于獲得老師們的關注這一事實，就不必覺得驚奇。跟與同學們的友誼相比，毛澤東在獲取老師的關注和偏愛方面更爲成功。毛澤東自己承認，他"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多的小孩聚在一起"②。明顯的，就像同學們不知道該如何對待他的角色一樣，毛澤東本人對自己的角色也很不確定。不論是韶山冲，還是他的家庭背景，都沒有爲毛澤東準備任何東西，以便幫助他處理同輩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毛澤東立刻就認識到，自己的臉皮實在是太薄了。他完全不能習慣于被別人嘲笑。毛澤東唯一能作的反應，就是採取武力回擊。那些比毛澤東小6歲左右的孩子，可以輕鬆地戲弄和欺負他，使他覺得自己就像一個粗魯、野蠻、愚頑、遲鈍的農民。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告訴我們，在陌生人中間，毛澤東的自信心和不確定感處于怎樣的搖擺不定之中。對毛澤東來説，陌生人之間的不確定感，完全是一種全新的體驗。

爲什么自己與同學們的接觸會很麻煩？毛澤東自己提出兩點解釋。第一點，"我穿得比旁的學生都蹩脚。我只有一套得體的衣服，是上衣和褲子連在一起的那種長衫。許多家里比較有錢的學生都**輕視我。因爲，我通常總是那些穿破破爛爛的褸褲**"③。第二點，"我不爲人所喜，還因爲我不是湘鄉本地人。做一個湘鄉本地人非常重要，而且來自于湘鄉的某一區也很重要。湘鄉分爲上區、中區，與下區

① Siao 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1959, pp.19-20.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37.

③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p.137.

……在這種衝突中，我總是採取中立地位……結果，三個區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覺十分苦痛”①。

在論及同學們對他的態度時，毛澤東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對他們的觀點過于敏感。這與他在處理與自己家庭的關係時表現出的那種自信心，恰好形成鮮明的對比。年輕的毛澤東剛一離開家時，還有相當的自信心。但突然之間，他的自信心就被一些比自己小好幾歲的孩子所擊敗。毛澤東對衣着問題很敏感；對社會地位與等級秩序也有着早熟的、與他的年齡不相稱的關注。這些都暗示我們，毛澤東多么渴望能夠被認同和接納。隨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訓練使毛澤東對自己很自豪。16歲的時候，他就能認識到：“湘鄉分爲上區、中區，與下區。上區的學生與下區的學生不斷地打架，那完全是基于鄉土觀念。雙方好像要拼個你死我活似的”②。有一件事雖然並不能歸因于馬克思主義，但卻更加具有啓發意義：毛澤東覺得，自己並不是矛盾對立雙方的一部分；而且，他認爲自己完全處于當時的社會狀況之外。因而，毛澤東發現，自己爲每一個人所“輕視”。

打那兒以後，毛澤東就對社會地位以及成爲被嘲笑的對象，表現出非同尋常的敏感。東山小學時的毛澤東，如何理解其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對此，毛澤東自己曾經有過論述。除此之外，在別處我們也可以發現類似的證據。當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作管理員的時候，他的“職位如此之低，以至於人們都不屑于和我來往”。對大多數人來說，“都不把我放在眼里，當人看”。而當時知識界一些很重要的人物，“沒有時間來聽一個操着南方口音的圖書館管理員講話”③。毛澤東對於被“輕視”和“被人看不起”的敏感，就從他在一個較大學校的最初經歷，擴展到他從師範學院畢業以後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顯然，毛澤東懷疑其他人對自己可能有諸如此類的輕視、嘲笑。這就傾向于支持這樣的假設，即毛澤東對自己的價值有一種內在的懷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p.137.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p.137.
③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p.151.

疑。當毛澤東感覺到母親已經拋棄了他，父親對兒子表現出的敵意又無動于衷時，這種懷疑就必定已經被深深地植入毛澤東的內心之中。這樣一來，我們發現：在一個全新的場景中，毛澤東重新溫習了自己的第一次經驗，再度按照自己的家庭關係演出了一幕新劇。其他人可能並不了解自己基本的良好品質——爲這樣一種疑慮所困擾，毛澤東就傾向于把人們置于一定的等級序列中。他假定，那些處于這一等級秩序頂部的人，會輕視、看不起那些處于他們底層的人們。對毛澤東來說，基于權力的等級地位已經很重要。而且，毛澤東不能容忍，自己被排除在最高層次的那一類人之外。更加重要的是，因爲自己完全是一個"外鄉人"，他就"感到沮喪"。所謂"外鄉人"，根本上就是完全來自于外地，甚至連本地"最下層的地區"都不如；而且，還操着某種"外鄉人"的口音。

毛澤東的反應就是，努力證明自己的價值；方法就是，努力展現自己在智力和道德方面的價值，以便給那些比自己地位高和優越的人們留下印象。與此同時，毛澤東試圖尋求那些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們的尊敬，方法就是證明自己的勇氣，以及在積極進取、銳意反抗方面的能力。

毛澤東在敘述自己的孩童時代時，有意識地忽略了自己與兄弟姐妹們關係的所有細節。類似的，有關他在東山小學經歷的描述，也是如此。除了注意到其他孩子輕視或者嘲弄他，毛澤東幾乎沒有告訴我們任何有關他跟同學們之間的關係。儘管如此，其他人也爲我們提供了自那個時代以來，有關毛澤東軼聞趣事的某些敘述。這些事件暗示我們，在毛澤東後來的行爲舉止和他在韶山冲家里時的行爲舉止之間，存在着某種一致性。毛澤東在韶山冲的時候就認識到：在試圖尋求主導、影響自己的母親和兄弟姐妹的同時，他得付出一定的代價，即對父親應該直言不諱，且表示出一定的敵意。在東山小學，每當與老師意見不一致的時候，毛澤東就會試圖大膽地爭取同學，讓他們站到自己這一邊。每當與班級中的學生幹部發生衝突時，毛澤東就會直接挑戰他們，並從年幼的同學那里尋求支持。毛澤東會毫不猶豫地表現出自己的憤怒，或者把一些小事陞級爲大型對抗。然後，他會把對

抗推向身體暴力的邊緣。有時候，毛澤東甚至不惜以個人關係的完全破裂爲代價。

蕭瑜告訴我們，毛澤東曾經爲了心愛的《三國演義》(San Kuo Chi Yen Yi,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①而深深地捲入了一場爭論。這次爭論發生在毛澤東與歷史老師和同學們之間。毛澤東充滿激情，堅稱《三國演義》是眞實而確切的歷史。老師和同學們則嘲笑他的這一看法。他們看不上《三國演義》，認爲那不過是針對歷史上實際存在的某些事件和人物，經過特定組織、編撰之後的一種敘述而已。毛澤東與歷史老師之間有了麻煩。他的應對方法是，努力贏得其他同學的同意，以便解雇那個老師。他把問題告到校長那兒。但校長斷然拒絕毛澤東的提議。於是，毛澤東立刻也向這個權威人物發出挑戰。②

毛澤東的攻擊風格是，暗示兩個敵人的關係中存在某種不同于常規的東西。他指責校長在袒護歷史老師，因爲二人是"堂兄弟"。但實際上，每個人都知道他們不是。然後，一個男孩站出來。他公開挑戰毛澤東，而支持校長。於是，毛澤東立刻譴責他，指斥他是校長的侄子。事實上，那個男孩當然也不是。他還指責其他所有的男孩，認爲他們是膽小鬼，而不敢站在他那一邊，支持他。這就否定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坦白說，那些孩子可能確實不同意毛澤東的某些觀點。更有甚者，毛澤東還單獨挑出一個男孩，譴責他背信棄義，是個"叛徒"。實際上，在所有同學中，他和那個男孩的關係最密切，具有某種眞正的友誼。

在他作爲公共人物的整個生活中，毛澤東經常會與同事們發生矛盾和衝突。一次又一次的，他都通過同樣的辦法，克服這些矛盾，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政治成功。毛澤東經常無視問題的實質性癥結所

① 譯者案：直譯爲《三國誌演義》，有誤。實際上有《三國誌》和《三國演義》兩種不同的古書，前者是歷史典籍，後者是文學作品，毛澤東喜歡讀的是《三國演義》。

② Siao 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1959,, pp. 24-25.

在。他會把問題轉化，變成一種有關個人勇氣和忠誠的問題。毛澤東第一次運用這種方法是在自己的家庭關係中。當時，爲了維持整個家庭的團結，母親總是試圖把家中的每個人都聚合在一起。而父親，總會在適當的時候屈服，避免出現任何無法挽回的極端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其他人迫于形勢的壓力，通常總會在事情鬧得不可開交的最後一刻，替毛澤東解圍。這種形勢壓力，迫使其他人容忍毛澤東的行爲，而不是冒險破壞任何可能存在的群體團結。在東山小學，學生們之間不得不相互包容、彼此協調。因而，爲了獲得一定的教育這一共同的目標，他們不得不妥協，而不能允許與毛澤東之間的衝突。後來，促使人們接受毛澤東的願望，而不是冒着更大的破壞性風險的，正是其他人爲共產黨所賦予的價值和革命的目標。

與此同時，毛澤東一方面挑戰那些老師的權威；另一方面，他還試圖向他們證明，他是一個比別人優秀的人，不但在道德上，就是智力上也是如此。就像他在與父親的關係中表現的那樣，毛澤東希望，自己的反抗行爲會引起他人的注意，並帶來較好的待遇。根據毛澤東自己對所發生的一切的理解，“我在這學校里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教員們都喜歡我，尤其是教經書的。因爲我古文作得不錯**”[①]。我們再次發現，毛澤東承認：他的人格力量恰恰在于父親當年鼓勵他從事的那個領域，即對儒家經典的學習。對此，毛澤東並未認識到其中的諷刺性意義。

在毛澤東開始在東山小學接受留校查看的前幾個月中，毛澤東展示出一些非常確實的、引人注目的品質。這些品質包括，智能方面的集中精力，以及體能方面的持久耐力。這些品質，將是他在後來表現出高度創造性的那一段時期的重要特徵。毛澤東輕而易舉地就說服了那些老師，使他們相信，他應該被允許繼續獃在東山小學，直到這一學年結束。儘管如此，就在毛澤東在這個新環境中變得越來越安全、穩定的時候，他與同學們的關係，甚至與那些老師們的關係，已經日益變得充滿各種緊張和公開衝突。這一事實充滿了悖論意味。

---

① Siao 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1959,, p150.

當時發生的事情顯然是這樣的：隨着他與老師關係的成功，毛澤東獲得了某種自信心。與此同時，毛澤東覺得，有必要提醒那些老師，他們對他的看法是錯誤的。在與同學們的關係中，毛澤東現在準備好，將爲自己經受的那些折磨、痛苦進行反擊。在這樣做的時候，毛澤東自然就運用了年齡較大，身體更強壯，智力上也比那些同學更加發達這些事實性的優勢。因此，毛澤東開始採取一種非常明顯的、帶有挑釁性的，且幾乎是欺凌弱小的戰鬥風格。有時候，這種風格幾乎是他的許多人際關係的重要特徵。

確實，毛澤東在東山小學那段時間的行爲舉止在同學們中激起了一些敵意。儘管如此，仍然有證據表明，他仍然在尋求某些兄弟式情誼的紐帶。較之與他自己的兄弟們的關係，毛澤東作爲學校里年齡最大的學生，似乎在追尋某種更加有效的老大哥角色。在自己的家里，毛澤東曾經壟斷了父母的關注。他覺得自己沒有必要去保護比自己小的兄弟姐妹。但在東山小學，毛澤東發現，有可能從那些年紀比自己小的人身上學到某些東西。反過來，自己可以爲他們提供保護。這是毛澤東邁向兄弟情誼，或者說同志式精神（spirit of comradeship）的第一步，儘管還有一些猶豫。這種情誼和精神當然經過毛澤東的理想化加工。它最初來自于毛澤東最喜歡的那些小說，特別是《水滸傳》中有關歃血爲盟的英雄好漢們的叙述。但是，幾乎沒有幾個同學接受、認同毛澤東，因爲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害怕他的“暴烈脾氣”①。

與此同時，毛澤東的智識世界正在迅速擴大。有關政治的知識也增加了。大體而言，對那些佔據着湖南事務管理權力的終極頂點的人們，毛澤東似乎有一種積極的看法。毛澤東後來承認，他相信皇帝和大多數官員是“誠實，善良，而且比較明智的”。他們“所需要的，僅僅是康有爲的改革方案的幫助”。那段時期，他也“爲有關中國古代的著名君主的歷史記載而心折，譬如，堯、舜、秦始皇和漢武帝”。毛澤東開始學習“外國歷史”和地理。他最初是通過一篇文章，才認

① Siao 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1959,, p30.

識美國的。那篇文章提及了美國革命。其中還有一句話，是毛澤東一直牢記在心中的："經過八年的艱苦抗爭，華盛頓赢得了戰爭的勝利，並且創造了國家。"有本名叫《世界英雄豪杰傳》的書，讓毛澤東很激動。其中，講述了拿破侖、俄國女皇葉卡特琳娜、彼得大帝、威靈頓、葛萊斯頓、盧梭、孟德斯鳩以及林肯等人的故事①。

這樣，我們就發現了一個16歲男孩的令人奇怪的境遇。他了解到一個有關各種偉人和政治活動的世界。儘管如此，他卻是通過那些本來是爲八到十歲的兒童設計的圖書資料，才獲得這些知識的。就此而言，他獲取的知識必然不可能很完整、很可靠。因爲，毛澤東告訴我們，只是在慈禧已經死了兩年以後，他才知道這件事。此外，直到將近18歲的時候，他才第一次看到報紙。

如此一來，在毛澤東個人成長的這個非常關鍵的階段，他的學習經驗中卻存在着某種奇怪的矛盾。一方面，毛澤東是通過二手材料才認識到外面那個更加廣大的世界。根據這些文本，那個世界完全是善良的，充滿了堪稱模範的領導人。在毛澤東一生中的這個階段，他從未在以下二者之間建立某種聯繫，即他自己對待權威和敵人的方式，以及他有關政治和歷史實際運轉的看法。相反，對毛澤東來說，歷史是一場偉大的戲劇。其中充滿了英雄人物。甚至當代中國的某些場景中，也有許多"善良、誠實"的人。

毛澤東爲什么離開東山小學？有關這個問題，存在着相互衝突的證據。有資料聲稱，那是由於毛澤東人際關係中的某些令人不快的因素。另一個解釋是，毛澤東希望體驗一下省會長沙——這個比東山更大的地方所帶來的那種刺激。根據蕭瑜的說法，"在東山小學，毛澤東激起了某種恐懼感和敵意感。這種恐懼感和敵意感是如此強烈，以至於毛澤東最終決定，永遠離開那里。一天，天氣很好。毛澤東收拾了他的簡單行李，開始徒步前往省會長沙"②。可以假設，這是毛澤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p. 138.

② Siao 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1959, p p. 26.

東在某一場合談到自己爲什么離開東山的説法。這與毛澤東對自己當初離家求學的描繪是一致的。儘管如此，毛澤東後來的解釋卻與此有所不同。他這樣告訴埃德加·斯諾：

> "我開始渴望到長沙去，那是一個大城市……聽説，這城市是非常大的，有許許多多居民。那里還有許多學校，巡撫衙門也在那兒。這簡直是一個偉大的地方！這時，我很想到那里去，並且進入那個爲湘鄉人所辦的中學。那年冬天，我請求我在高小時的一位教員介紹我前去。他答應了，於是我步行到長沙。當時，我的心中極端地興奮，同時又很疑慮，擔心被拒絶入學。幾乎不敢希望眞的能夠進入那個偉大的學校，做一名學生。而使我驚異的，是很容易地就被録取了。"①

無論這種理由究竟是什么，毛澤東正在對自己的行爲變得日益充滿自信。他已經準備好，即將踏入一個更加廣大的世界。部分的，這是因爲毛澤東可能已經發現，他身邊那個直接觸手可及的世界並不是令人愉快的。儘管如此，仍然沒有什么東西能夠證明，他對個人的、乃至事業的熱情使命將會引向何方？

那個時候的中國社會，有一些確實值得注意的制度設計。對那些甚至是穩健的冒險者來説，這些制度也可以強化他們的自信心。正像毛澤東指明的，他已經準備去一個大城市。但是，他仍然渴望被某個學校接納。儘管這個學校具有地方保護性，只接受來自于他母親所在的那個地區的學生。在那個時代中國的各個省會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組織。通過照顧、保護那些來自于同一地區或者宗族的人們的利益，這些組織試圖反對大城市中的匿名現象。類似的，在整個國家的首都北京和諸如上海、廣東等地區的大城市中，將會發現某些社會團體。這些團體會幫助同鄉或者同宗的人們建立勞務契約，保護他們的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p. 139.

利益，以便抵禦那個對他們含有潛在敵意的世界。

在大城市中，毛澤東仍然維係他與其他來自農村地區的人們的聯繫。因而，他並未被拋入一個完全陌生、沒有任何了解的世界。同鄉會等組織幫助人們適應由農村向城市生活的轉變與過渡。這樣一來，移民們就可以繼續維係他們家鄉的社會風俗和生活習慣。因而，新移民的情緒通常是消極的，充滿感激的。但是，毛澤東在長沙的高小(九年級) 只默了 6 個月。然後，他就離開學校，去支持 1911 年推翻滿洲王朝的辛亥革命。甚至就在 1911 年春季和夏季的那幾個月中，儘管毛澤東已經是在學校登記注冊的學生，他實際上全身心地投入于湖南省乃至全國性的政治運動中。那個時候，毛澤東看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報紙。他認識到，社會中存在着一些活的英雄人物和烈士豪杰。他們不止是存在于歷史書中。

很快，毛澤東就了解到一些全國性的事件。1911 年初秋，毛澤東寫了他的第一篇政論文章，並把它貼在學校墻上。若干年以後，1966–1969 年文化大革命中被稱作“紅衛兵”的那些中國學生也寫過大字報，並把這些大字報貼在墻上。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爲了試圖重新體驗毛主席當年的革命經歷。在那篇文章中，毛澤東提出了一個相當天眞、幼稚的建議。他主張，當時被他看作英雄的三個人，應該被任命爲中華民國的總統、總理和外交部長。而毛澤東晚年時代的那些紅衛兵，將會提出更加令人震驚的革命性建議。

毛澤東正在成爲一個積極的活動家。爲了支持他那種新近建立起來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前共和政制 (pre–republican) 的革命激情，毛澤東希望超越單純的口頭革命或者說言辭革命，而轉向實際的革命行動。毛澤東最初的革命性行動之一，就是和一個朋友一起，強制性地剪了十多個男孩的辮子。在清代，中國人被要求留着長長的辮子。那是他們臣服于滿洲、做清廷子民的一種象徵符號。清朝末期，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們有時候會採取剪掉自己辮子的方式，來表達對傳統和清廷當局的挑戰。根據毛澤東的說法，“我和一個朋友毅然剪去發辮，但其他一些約好相繼剪去辮子的人，後來卻不履行他們的諾言。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擊他們，並強行剪去他們的發辮。結

果，有十多個人做了我們剪刀下的‘犧牲者’”[1]。

這一事件引發了大量的爭議。毛澤東承認，爲了證明剪辮子的合理性，他不得不與一個來自于鄰近法政學校的年齡較大的學生辯論。那個學生認爲，根據傳統和儒家經典，每個人的身體屬於自己的父母；因此，沒有父母的同意，一個人就不能破壞自己的身體，甚至哪怕是頭髮，即所謂“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損傷”。毛澤東宣稱，通過提出一個“以反滿爲政治基礎的反理論”[2]，他就能把對手駁得啞口無言。在這里，毛澤東第一次表達了這樣的信仰：政治正當性比其他任何問題都更重要。

毫無疑問，當時的時代氛圍加速了毛澤東日益覺醒的政治意識。隨着辛亥革命的爆發，同學們都在爲這場危機帶來的興奮和刺激而歡呼。他們也爲帝國政制的崩潰而鼓掌。對這場起義運動，毛澤東比他人有着更加切身的個人體驗。他覺得，在這些創造歷史的事件中，自己應該做一個參與者。1911 年十月，長沙地區有些軍事活動。但根據施拉姆的看法，毛澤東對這些起義活動的描述，“很大程度上帶有小說式的夸張色彩”[3]。顯然，政治考慮佔據着毛澤東的整個想法，並以一種充滿浪漫意味的方式，歪曲了毛澤東對問題的理解。毛澤東告訴我們，他參加的第一次戰鬥的情形，以及戰鬥之後見到的街頭屍體。這一切，都發生在“地主和商人”反撲“窮苦民衆”的革命激情的時候。

1911 年辛亥革命爲毛澤東提供了一個機會。他第一次進入軍隊，體驗行伍生活。究竟是什么促成了毛澤東對軍事問題的最終興趣？就此而言，這次經歷並沒有太多的相關性。相反，對教育問題和學生在社會中的地位，毛澤東有一種矛盾心理。而這次經歷，對此確實揭示出一些更有意義的方面。在辛亥革命等事件的刺激下，長沙以及來自于湖南其他地區的學生們組成了一個“學生軍”。這是一個準軍事性

---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p. 140.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p. 140.

② Stuart Schram , Mao Tse-tung, London: Penguin, 1966, 33.

組織，旨在支持中華民國的武裝力量，以及譴責——如果不是反抗的話——任何持續存在的帝國余孽。毛澤東告訴我們，他是如何拒絶加入這樣一種軍隊的想法的。因爲，他“認爲學生軍的基礎太複雜”①。毛澤東顯然認識到，“學生軍”這樣的組織是不會有效的——不論就其軍事意義，還是教育意義而言，無不如此。毫無疑問，與其他同學並不愉快的相處經歷，這一事實也影響了毛澤東的上述看法。因此，毛澤東覺得，像同學這樣的團體，對自己幾乎沒有什么吸引力。因爲在這種團體中，其他人可能會分享某種兄弟式的同志情誼，而他卻要被排除在外。同時，與毛澤東相比，那些同學要比他小很多。因而，對那些必定是同學們中天然領袖的較大學生，毛澤東幾乎沒有什么機會去結識他們。

這樣一來，毛澤東就邁出了非同尋常的一步。他報名參加了黎元洪的正規軍。當時，黎元洪孤注一擲，把自己和反滿的力量拉在一起。毛澤東的行動似乎否定了他的學生身份。儘管如此，一旦進入軍隊，毛澤東就重新強調自己的學生身份。他還宣稱自己的某些特權。譬如，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毛澤東拒絶自己帶水②。在家里那種環境下，毛澤東對自己作爲“讀書人”的角色，不但表現出某種自我解嘲，而且還利用這種角色。同樣，毛澤東在軍隊中也是一樣做。一方面，他拒絶其他學生們的某些行爲；另一方面，他又爲學生賦予某些特別的屬性。毫無疑問，隨着時間的推移，毛澤東對學生和士兵之間角色區分的態度，將會經歷根本的變化。儘管如此，他對教育問題的矛盾心理仍然沒有什么改變。

儘管毛澤東的軍隊經歷僅僅持續了6個月，但這一經歷卻強化了他對自己的身份具有某種特殊性的理解。一有時間，毛澤東就會看身邊那些可以獲得的報紙、期刊。而大多數普通士兵則是文盲，不識字。毛澤東認識到，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平庸之輩；還有一個是流氓”③。毛澤東確實喜歡一個煤礦工人和鐵匠。他説，“我和隊長及

---

①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42.

②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42.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p. 142.

一般弟兄的關係都很友好，能夠合得來。我能寫，讀過一點兒書，他們很佩服我的‘博學’。我能夠幫助他們做一些諸如寫寫家信之類的事情”①。

蕭三宣稱，毛澤東的這種軍事經歷引導他得出一個結論：“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施拉姆對此表示懷疑，他可能是對的②。儘管如此，毛澤東並未發覺行伍生活是不愉快的。這一事實也很正確。因爲，毛澤東這一次覺得自己無可置疑地擁有某些優勢，是一個優越者。確實，行伍生活令毛澤東很興奮。他給好幾個同學寫信，討論他日益擴充的政治思想。但是，只有一個人回信。就毛澤東本人而言，行伍生活具有某種令人滿意、令人興奮的氛圍。正是在這種氛圍中，毛澤東第一次讀到了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毛澤東告訴我們，他完全被社會主義思想所征服。實際上，只是在幾年以後，毛澤東才對社會主義的各種原則表示出深刻的信奉。儘管如此，就社會主義原則問題而言，毛澤東已經形成了某種基本的政治框架。這一事實是毫無疑問的。毛澤東還把這種政治觀念和他作爲一個“普通的”、但又具有明顯特殊性的“學生–兵”的令人滿意的經歷聯繫起來。

毛澤東第一次行伍經歷僅僅持續了半年時間。因爲，1911 年辛亥革命後的軍事鬥爭狀態是很短暫的。事情看來似乎是這樣，孫中山和袁世凱將會協同努力，通過某種共同的、大家都能接受的途徑，以便建立一個中國的“共和國”。

離開軍隊以後，毛澤東並未馬上返回學校。相反，他進入了一個毫無明確目標的飄泊狀態。革命之初，他對政治問題曾經表現出某種興奮。但現在，這種興奮似乎已經耗盡了能量，走到了盡頭。毛澤東處于某種失望、苦悶，猶豫不決的狀態。返回學校，繼續與那些比自己小很多的同學呆在一起？這種前景並無吸引力。儘管如此，一旦沒有了可以與之抗爭的老師和同輩人的社會結構的約束，毛澤東的所有目標似乎都失去了意義。回家？他也沒有這樣的慾望。他沒有謀生所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p. 142.

② 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 London: Penguin, 1966, p. 34.

必需的專業技術。他也缺乏和某些人物之間的政治聯繫。他曾經處于各種事件的漩渦中心。但現在，所有的事件都已經離他而去。他一個人被留在那兒，精神沮喪，情緒低落，缺乏動力，不想做事。

在這種無目標、無方向感的狀態中，毛澤東似乎已經進入了所謂"心理延緩償付期"。艾黎克森認爲，這種"心理延緩償付期"是個人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關鍵階段；或者説，處于某種繞路走、但最終會抵達目的地的狀態的特定時段。在此期間，一個人的心理成長會趕上他的身體發展。在大多數社會中，個人生命中的這一"心理延緩償付期"階段，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制度化。其方式就是，不使年輕人對他們的行爲負完全的責任；即便就身體發展而言，他們已經可以被認爲是成熟了。根據艾黎克森的看法，在"心理延緩償付期"中，年輕人經常會發展某種技能或者技巧。對他們隨後的社會身份來説，這些技能或者技巧將會變得非常重要。或者，這些技能或者技巧將會爲他們賦予某種有關組織紀律的感覺。這樣的話，他們就會更加有效地運用其他一些技能或者技術。路德（Luther）的"心理延緩償付期"是在修道院中度過的；弗洛伊德是在他有關醫學和科學的訓練中完成的；蕭伯納（G. B. Shaw）是在一個商務公司實現的；達爾文（Darwin）先作了幾年的醫學實驗，然後還有兩年，乘着"獵狗號"軍艦周遊世界；而温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則在印度軍隊中度過了他的"心理延緩償付期"。艾黎克森暗示，那些在思想觀念方面有所革新的人物，其"心理延緩償付期"的共同模式都是在預先沒有任何規劃或者設計的情況下，突然間靈光乍現，完成自已生命中的偉大作品。嚴格的、有規律的訓練，是一件事；而富于創造性的革新，卻完全是另外一個領域的問題[①]。

1912年，毛澤東離開軍隊以後，他就進入了這樣一段猶豫不決、徘徊不定的時期。還在艾黎克森提出"心理延緩償付期"這個概念好多年以前，羅伯特·佩恩就已經注意到，在毛澤東的生活中存在着這

① Lucian W. Pye, Pers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deology, in Bruce Mazlish, ed.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N. J.: Rentice-Hall, 1963, pp. 165-166.

樣的一個時期。他評論到："在那些後來成爲革命者的人們的生活中，經常會出現這樣一些時期，即特定時期內難以容忍的窮困潦倒和猶豫不決。他們的生活根基已經被連根拔起，沒有着落，缺乏銀錢，突然要面對迫切的生活必需品，於是，他們只好退回到自己的世界中。與此同時，根本就僅僅爲了能夠生存，他們不得不從事那些最卑微、下賤、爲人看不起的行業。因而，希特勒（Hitler）畫各種明信片，並成爲一個裱糊匠；蔣介石成了一個酒保；列寧（Lenin）則是校對工人"①。

生活中缺乏明確的目標，使毛澤東會跟着自己遇到的無論任何事而隨波逐流。他剛剛發現了報紙。於是，報紙就成了他生存的中心。如果説在毛澤東生活中的這一關鍵連接點上，還存在任何什么可以令困惑、迷惘的他感到敬畏的東西，那么，它就是印刷文字的力量。通過閲讀長沙的各種報紙，毛澤東認識到這一點。那個時期，中國社會正在慢慢調整，開始逐步適應大衆媒介的潛能。儘管毛澤東還處于大衆傳播的新技術接受者這一方，但未來中國的領導人和中國社會之間的溝通關係已經開始確立。當我們分析毛澤東作爲政治代言人和意識形態理論家的角色時，我們應該記住一個事實：儘管在運用印刷媒介、激發民族感情方面，毛澤東已經變得很嫻熟，但不要忘記，當初這個人還只是一個孩子。他是在處于某種猶豫不定的迷惘狀態的時候，從大衆媒介中爲自己的情感找到了安慰的。

毛澤東看過長沙的各種報紙。儘管如此，最吸引毛澤東的卻是有關廣告的板塊。很大程度上，廣告版是爲了個人需求而設計的。作爲一個飄泊的年輕人，毛澤東看起來很無助。他渴望爲任何可以給自己的將來提供指導的需求所吸引。儘管如此，我們也一定不能夸大毛澤東對報紙與廣告興趣的強烈與獨特程度。因爲，在中國歷史上的那段時期，對大多數來自于農村的人們來説，可以存在每天印刷的信息傳播、交流與溝通工具，這是令人恐懼的。普通中國人認爲，在報紙上

① Robert Payne, Mao Tse-tung: Ruler of Red China,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0, pp.44–45.

必定有些特別的東西；它們不但被賦予了有關需求的問題，還具有一定的權威特性。對毛澤東來說，報紙的吸引力是很強烈的。這可能是由於他沒有其他可供選擇的消遣。在那段時期，以及在好多年中，毛澤東與女人和年輕女孩並無任何交往和聯繫。對這個非同尋常的特殊事實，我們將會推遲到適當的時候再來討論。但在這里，我們需要指出，毛澤東也因此不受這些飲食男女等娛樂性分心事物的影響。要知道，對大多數男性青年而言，這方面的問題都是一種巨大的心理負擔，需要付出相當的身心精力。

値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曾經非常坦誠地描述過，隨着在報紙上讀到不同的內容，他的情感心態是多么輕易地就受到左右，搖擺不定。毛澤東住在一個廉價的、有多個房間的屋子中。只要能從朋友那兒借到一點錢，他就把錢花在買報紙上[①]。正如毛澤東自己描述的：

>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一個警官學校的廣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於是我就去報名。但是，在受試以前，我看到一個製作肥皂的'學校'的廣告。不收學費，供給膳宿，而且還可以有一點兒津貼。**這個廣告很有吸引力，還能激動人心**。它提及製造肥皂的巨大的社會效益，以及如何可以富國富民。於是，我就變換了進警官學校的念頭，決定改做一個肥皂製作者。我又在這里交了一元的報名費。"[②]

毛澤東爲一個警官學校所吸引。對他來說，這並不完全是偶然的。因爲，在毛澤東默在行伍之間的那段時期，他和軍警憲兵之間顯然鬧過某些不愉快[③]。毛澤東選擇做肥皂製造工，也並非完全是非政

① Robert Payne, Mao Tse-tung: Ruler of Red China,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0, p 45.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43.

③ Robert Payne, Mao Tse-tung: Ruler of Red China,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0,, p. 45.

治性的。因爲，他曾經讀過梁啓超的一段話。在那段話中，梁啓超表示：中國需要向西方學習的若干事里，有一件就是清潔衛生的重要性。" ①

儘管如此，毛澤東對這兩種選擇的興趣並未持續多長時間。因爲，從那以後不久，他就爲"一個法政學校的廣告"所激發，"里面承諾了許多了不得的事情" ②。一個朋友也敦促他，讓他參加這個登了廣告的學校。"最後，我給父母寫了一封信，詳述廣告上的保證。我請他們寄學費給我。我爲家人描繪了一幅有關自己前途的光明燦爛的圖畫：把自己畫成一個法律工作者和大官。於是，我向法政學校交了一塊錢的報名費，同時等待着父母的回音。" ③

一會兒把自己想象成一個卑微的警察或者肥皂製造工，一會兒又把自己想象成一個高級政府官員——這種想象能力證明了毛澤東處于不斷摸索狀態的思想狀況。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但對興趣偏好而言，卻沒有什么標準。這樣一來，隨着新興趣不斷出現，今天看來有些吸引力的事情，第二天可能就不再是那樣。這不是一個充滿疏離感的個體，他也不會對任何業已確立的常規職業抱有敵意。只要毛澤東能夠決定自己究竟想成爲怎樣一個人，那么他就願意接受任何的權力和位置。

儘管如此，在毛澤東繼續堅持自己去上法政學校的看法之前，"命運再一次插手。這次，是一則有關某個商業學校的廣告" ④。毛澤東講述當時發生的那些事情的方式，再明白不過地揭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在多大程度上，毛澤東把自己看作一個消極被動的人物。這是一個與宣傳媒介密切相關、充滿誘惑力的現代世界，而他則爲這個世

① Robert Payne, Mao Tse-tung: Ruler of Red China,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0,, p. 45.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43.

③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43.

④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43.

界所操縱。大多數中國人會把這些混亂和轉折歸咎爲“命運”或者“運氣”。但是，對像毛澤東這樣一個人來説，這樣做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自己有着摇擺不定的目標。因爲，毛澤東信仰的是歷史唯物主義。在他看來，有這樣一條準則：“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偶然性”。這樣一來，成爲一個官員的那種前景，就讓位于另一個朋友的建議。那個朋友説：對中國人而言，“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夠建立和發展國民經濟的經濟學家”①。儘管如此，還沒有來得及報名參加那個學校，毛澤東就讀到了另一個廣告，它“描寫了一個高等商業公立學校的魅力”②。

應該記住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對毛澤東來説，這個選擇問題不但對他自己將來的生活具有重要意義，就是對國家的健康發展而言，也是同樣。即便如此，圍繞毛澤東的各種難題，仍然不過是一個選擇某個高級學校的問題。毛澤東的選擇經常摇擺不定。這就證明他處于某種“心理延緩償付期”狀態。毛澤東相繼試圖在法律、商業甚至肥皂製造業尋找一份職業。這種追尋以它自己的方式暗示我們，對毛澤東那一代的中國年輕人來説，他們確信：中國必須找到自己的道路，以便能夠進入這個基本上是資產階級化的現代世界。中國必須從那種因日益沒落的儒家傳統而帶來的腐敗和毫無目標的狀態下，擺脱出來。無論對毛澤東，還是對這個國家而言，所有這些有關可能學校的選擇，都暗示了某種雄心壯志。在這個意義上，這些選擇都能夠實現某種只能稱作西方中產階級文化的社會理想。毛澤東希望自己是現代的。他更加希望，中國是現代的，並能夠立于這個世界的現代民族國家之林。

更有甚者。商業專科學校還有其他的吸引力。正如毛澤東所説的，“我把自己的決定寫信告訴了父親。他很高興。父親很快就知道有了商業智慧的好處。我進了這個學校，而且在那里留下來——有一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43.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43.

個月的時間”[1]。毛澤東之所以離開那個學校，是因爲那里的大部分課程是用英文講授的。而當時的毛澤東，連字母表幾乎都認不全。在毛澤東生命中的這一階段，考慮到他爲了推進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個人熱情，就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在他那一代中國人中，大多數人都抱有與他類似的雄心。但毛澤東的做法卻與他們有所不同。他並不試圖像其他人那樣，去努力學習英語或者其他一門外文。恰恰相反，毛澤東聲稱，他自己英語知識的缺乏是一種絶對先天預定的東西。他認爲，這不是一個通過個人的後天努力就能改變的問題。確實，毛澤東對於學習、掌握英語的整個認識方式是非常具有啓發意義的。因爲，通過很多方式，毛澤東都向我們揭示了一點：就其個人心理而言，毛澤東希望掌握所有那些因學會英語而能提供的種種益處。但與此同時，毛澤東卻又不希望多費精力。而對於學習一門新語言來説，這些精力是必須付出的。毛澤東也不希望放棄一門他已經熟悉和非常擅長的語言，那就是漢語。毛澤東希望成爲一個現代化的人。但是，毛澤東並不希望被西方的生活方式同化。他也不希望再次成爲别人眼中的一個“初學者”，從而令自己受到侮辱。最終，共産主義將會爲毛澤東的追求提供一個獨一無二的解決方案。換言之，沒有“西方化”的“現代化”。通過共産主義，毛澤東可以實現現代化。而按照他最初的看法，現代化被視爲來自于西方世界的産物。現在，共産主義的現代化——即較少的都市化，以及更多的、以中國傳統爲基礎的風格——不會令毛澤東放棄有關身份認同問題的意見。

無法應付商業專科學校的英語，毛澤東就在方向上作了一個非同尋常的轉移。他立刻報名參加了一個相當傳統的中學。在那里，毛澤東全神貫注地投入于學習中國經典文獻。在大部分時間中，毛澤東沉浸于閲讀帝國法令，以及偉大的中國皇帝——乾隆所作的公文批注。這實在是個不合時宜的現象。恰恰正是在帝國體系剛剛崩潰的時候，毛澤東卻在帝國權威的傳統世界中，在其最宏偉、最敏鋭的高度上，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43.

找到某種回家的感覺。當然，那時候毛澤東還曾是中華民國軍隊的一個士兵。這支軍隊的目的，就是爲了反抗那些由舊制度代表的一切東西。對一個曾經宣稱要尋找一個職業的年輕人來說，這所學校不可能爲他提供任何東西。對那些譴責儒家經典、只尊重現代知識的有抱負的熱血青年而言，毛澤東的行爲是難以理解的。這只能解釋爲"心理延緩償付期"的一個例子。閱讀二十四史和乾隆批注持續了大約6個月。完成這樣的閱讀之後，毛澤東發現，學校里再也沒有其他什么東西能夠引起他的興趣。

然後，非常突然的，毛澤東說：

> "我離開學校，制訂了一個自學計劃。按照計劃，我將每天在湖南省立圖書館中閱書。我非常有規律的執行計劃，並且自覺的履行。這種讀書自學的方式，大約花了半年的時間。我以爲，這半年對我是極端可寶貴的……在這自修的時期內，我讀了許多書籍。其中包括世界歷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極大的興趣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圖，並且仔細研究過。我讀了亞富·斯密的《原富》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我還讀了由約翰·斯圖爾特·穆勒所著的一本有關倫理學的書。我讀過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學》和孟德斯鳩所著的一本有關法學的書。我不但讀詩歌、浪漫文學和古希臘的神話傳說，同時，還讀有關俄、美、英、法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歷史和地理作品。我把各種東西混合起來讀。"①

毫無疑問，當毛澤東閱讀了這些譯介進來的西方經典以後，儘管我們無法確定他究竟從中吸收了哪些東西，但他的眼界確實擴大了。對毛澤東的個人成長而言，與他在讀過的書中碰見的某些特殊觀點的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44.

影響相比，更加有意義的可能是這樣一些東西，譬如對知識的追求，每天從開門的時候就進入圖書館、一直獃到閉館的那種強烈的冲動，以及在閱讀中體驗到的巨大成就感和極大滿足感，等等。

這是在漫無目標的時期，保持自律行爲的一種方式。它也強化了毛澤東對書本的那種深厚的感情——儘管如此，他仍然懷有某種矛盾心理。通過讀書，毛澤東顯然發現了一種擺脱他的悲慘而黯淡的生活環境的途徑。當時，毛澤東一度對應該如何處理自己未來的生活道路，仍然猶豫不定。通過讀書，他發現了可以把這種憂慮棄置一邊的方法。那個時候，毛澤東在處理同輩人之間的關係時，仍然存在某些問題。通過讀書，他發現了避免這些問題的出路。書本也爲毛澤東賦予了某種有關身份認同的感覺——他還是一個“學生”（student）。書本還爲他躲避批評，提供了庇護所。他閱讀自己選擇的書目，而不必接受任何意義的“考試”，也不必對他人的挑戰進行反擊。儘管如此，恰恰是由於所有這些原因，以及另外一個原因，毛澤東在長沙公共圖書館的經歷必定強化了他的自信心；與此同時，使他輕視書本。這後一個原因就是，顯然，毛澤東如此輕易地就掌握了這么多書的內容。因而，這種經歷鞏固了毛澤東的生活風格：從此以後，他再也不會遠離書本；無論何時，只要可能，他就會把自己沉浸到書中去。儘管如此，還有另一方面的問題：毛澤東會毫無拘束地譴責書本的價値和有用性。他將任意地貶低追求智識事業的抽象性和不切實際。

整整6個月，毛澤東沉浸于自我強加的每日閱讀的習慣性制度約束中。這6個月，也把毛澤東的思想從一個令人煩惱的問題移開。這個問題就是，他應該如何對待自己的未來？毛澤東仍然生活在湘鄉地區老鄉會的某個房子中。因而，在這個城市中，他並不是完全孤獨的。確實，這段時期出現了一個現象。毛澤東正在變得越來越善於建立男性的友誼關係。但是，他與女性仍然沒有接觸。在毛澤東的生活中，他第一次提及了那些對他有影響，而且願意聽取他們意見的朋友。這種“朋友”，已經不再是僅僅聽從他的要求、按照他的意志辦的“朋友”。這種關係，已經不再像他在學校的時候，與那些年紀較小的同學們之間的那種關係。

儘管如此，毛澤東的生活條件也並不完全是令人愉快。住在老鄉會的房子里面的年輕人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學生，毛澤東當然視自己爲其中一員；另一部分爲當兵的，或者已經退伍的前軍人。“會館中的學生和兵士總是吵架，有一夜，他們之間的敵意終于爆發，演變成一場武力的衝突。兵士們攻打學生並且要殺死他們。我逃到洗澡間里去躲避，一直等到打完。”①

那段時期，毛澤東的消極情緒是非常突出的。就在不久以前，他還在爲 1911 年辛亥革命時充滿衝突的社會場景而感到興奮。而且，在毛澤東一生中的早年時期，他非常容易跟人發生衝突，距離和別人發生爭斗的情形從來都不是很遠。更加突出的是，僅僅大約一年以後，毛澤東最終成爲了一個師範學校的學生。當時，一些士兵爲了尋找營地，試圖佔據師範學校的校舍。爲了抵抗這種侵佔行爲，一些學生組織起來，以他們的血肉之軀進行抗爭。在這方面，毛澤東起了領導作用。有關這件事，他的朋友蕭三是這樣告訴羅伯特·佩恩的：

> “士兵們接到命令，要求佔領學校作爲軍營。這樣的情況經常發生。我們的學校也接到了最後通牒。毛澤東立刻站出來，號召進行抵制、反抗。他負責這件事，就好像他已經得到了國防部的授權。毛澤東召集了一些同學和教授。他的命令，即便是向一些高級教授發出的，都被立即遵守。他派出學生去購買武器和醫療物品。我們把士兵擋在校外。毛澤東對此評論到：‘這是我第一次發佈軍事命令’。他似乎知道，這決不會是自己的最後一次。”②

毛澤東需求的，與其說是權威，倒不如說是別人對他自己情感的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 pp. 144–145.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45.

迅捷反應。

在毛澤東與同學們衝突和與士兵們衝突的行爲中，存在着某些差別。這些差別告訴我們一些有關毛澤東在這兩次事件中“心理延緩償付期”狀態的情況。而且，當毛澤東返回學校的時候，他再一次陷入某種結構化的情境中。在這種環境中，他比自己的同學大好幾歲。老師們也不認爲他是一個普通的學生。

毛澤東堅持總去圖書館看書。但是，部分是由於父親拒絶替他爲此類活動承擔更多的費用，這一時期不得不結束了。手頭的經濟狀況，以及離開老鄉會的念頭，驅使毛澤東再次注意看廣告。毛澤東告訴我們：“同時，我認眞地考慮了我的‘職業’問題。我覺得，自己最適宜于教書。”[①]有趣的是，毛澤東是在其他一些活動暫停的情況下，得出這一結論的。當時，毛澤東並不在學校中。而驅使他重新返回學校的，主要是由於來自父親的壓力。此時的毛澤東，還沒有像後來那樣，遇到過一個能夠給予他很大啓發和鼓勵的老師。儘管如此，如果説在一定意義上，除了革命與政治之外，毛澤東曾經獲得過某種職業身份，那么，它就是作爲一名老師。在毛澤東隨後的一生中，他將維持這種身份，並不斷重複宣稱自己作爲一個老師的職業理念。在掌握國家權力之後，教育政策成爲毛澤東特別關注的幾個領域之一。他總會把自己卷進有關教育問題的爭論中。當然，在幾乎所有的問題上，毛澤東都對自己的判斷能力有着強烈的自信心。儘管如此，毛澤東總是覺得，他特別適合於談論教育政策和教育實踐。因而，他就經常覺得被迫表達一些令人震驚的、不合正統的觀點。這些觀點經常會成爲格言，僅此而已，並不需要什么正當化論證。

既然已經決定自己的職業應該是作爲老師、從事教育工作，毛澤東就被一個有關長沙省立第四師範學院的廣告所吸引。“我饒有興緻地閱讀了它的優點：不收學費，膳宿費很便宜。”[②]然後，毛澤東作了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45.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45.

一個非常有趣的坦白説明。這種坦白表明，在何種程度上他已經準備結交一些朋友。“兩個朋友也勸我前去。其實，是他們要我幫助他們預備入學論文。**我將自己的打算寫信告訴家里，得到了他們的同意**。我代兩個朋友做了論文，也自己做了一篇。結果一齊録取——因而，實際上，是我被取了三次。那時，我並不以爲替朋友代考是一件不道德的事。**這僅僅是一種有關友誼的問題**。”①

毛澤東不但不認爲，這種行爲是不道德的。他的經歷似乎還使他對考試和其他教育要求充滿蔑視。考慮到1913年春天毛澤東的活動狀况，我們就可能較好地理解，毛澤東70歲時作的那段似乎令人震驚的陳述。當時，在一個教育工作者的座談會上，他説了這樣一段話：“考試可以交頭接耳，**冒名頂替**。你答對了，我抄你的，抄下來也算好的。交頭接耳、冒名頂替，**過去不公開**。現在，讓它公開。我不會，你寫了，我抄一遍也可以。可以試點。”②

一進入師範學校，毛澤東就試圖努力幫助朋友；同時，寫信徵求父母的允準。這一事實暗示我們，毛澤東正在試圖擺脱他的“心理延緩償付期”經歷。他對自己有一種較爲强烈的自信心。這就使毛澤東能夠較爲容易地處理與其他人的關係。他不再像過去那樣恐嚇他們，而是緩和他們之間的關係。

1913年秋天，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和第一師範學校合併了。毛澤東發現，自己成爲長沙學校教育界中的一名精英分子。師範學校既不是一個學院，也不是一個大學。但是，它確實有一套自己的標準。這些標準，將師範學校置于通常的高級中學或者一般中學的地位之上。

如果一個人有毛澤東那般學識能力，對師範學校講授的那些科目，他就不應該覺得有任何困難。但是，毛澤東有着强烈的愛憎之感。對那些他不喜歡的事情，他就不會盡力，也做不好。毛澤東後來説：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45.

② 毛澤東：《春節談話》，1964年2月13日。

“新的学校中有许多规则，而我只同意其中极少的几条。譬如，我不喜欢自然科学中的必修课程。我希望专攻社会科学。对我来说，自然科学实在没有什么特殊兴趣。我不学习这些课程，因而，这些课程的分数大都很坏。我最讨厌的一门必修课，就是静物写生。我认为，这是极端愚笨的办法……幸运的是，我社会科学有关课程的分数都非常好。这样一来，就可以和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扯平。①

反叛的情緒仍然存在。但是，毛澤東也展示出建設性的維度。他願意接受一些老師的影響。他對友誼的尋求仍在繼續。毛澤東採取的方式是，在長沙的一份報紙上發了一個廣告。該廣告稱，他要尋找“一些熱心于爱國工作的青年”②作志同道合的朋友。現在，毛澤東已經準備好成爲一個領導人。這個領導人能夠把那些與他自己一樣志同道合的人，吸引到自己身邊來。儘管如此，毛澤東並未僅僅停留在非正式的友誼關係上。他很快就把這個朋友群體轉變成一個正規的社團，也就是新民學會。這個學會將變成湖南學生政治運動的一個重要中心，並在全國享有盛名。對自己所處的周遭環境，毛澤東能夠作一些必要的調整和適應。因而，他能夠在學校獃5年，並且最終獲得了學位。不應該忘記其中的悖論：年輕的時候，毛澤東正在尋求領導權，他需要把自己的人際關係正式化；但老年的時候，毛澤東卻宣稱自己的領導權，而譴責所有形式化、正規化了的關係。

這些年可能是毛澤東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毛澤東正在穩步地獲得較大的承認。就在毛澤東即將畢業的時候，他已經發現了一個熱情的保護人。那就是楊昌濟，這個學校最有學識、最西方化的一個老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45.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46.

師。後來，楊昌濟將會把毛澤東引介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去工作，並爲他和全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進行交往、溝通提供了條件。此外，楊的女兒將成爲毛澤東的妻子。

現在，我們已經到達這樣一點，即必須追問毛澤東與女人的關係。這意味着，通過考察毛澤東從一個兒子轉變爲一個丈夫和父親時，創造了怎樣的一種家庭，我們就可以完成對毛澤東私人關係之圈的探索。

第八章　妻子與子女

儘管有關毛澤東生活中的許多方面仍然缺乏足夠的資料，但我們最模糊、最不清楚的問題，可能就是他與女人的關係以及他作爲父親的角色。我們已經注意到，他是怎樣將母親理想化的。我們還假定，這是毛澤東因自己不能一個人壟斷母親的情感而做出的一種心理防禦姿態。在家庭中，他與妹妹從來沒有什么緊密的聯繫。可以說，毛澤東基本上是和男性夥伴一起長大的。在他剛上學的那幾年里，毛澤東是整個班級的同學中年齡最大、身體最壯，也最有雄心的一個。他自己投身于和同學們的競爭之中。與此同時，毛澤東的身體健康狀況也一直有些問題。青少年時期的毛澤東，在行爲舉止中還透露出某種與他自己的男性氣質和身體耐力有關的焦慮。

還在長沙師範學校時，毛澤東就跟與一群頭腦敏銳、思想“嚴肅”的男孩們有交往。他們“沒有時間去討論瑣碎小事”。毛澤東本人曾經描述過他自己以及那些朋友們的熱誠情感。他還告訴我們，“他們是如何沒有時間去追求戀愛和‘浪漫’。他們認爲時間太重要了，追求知識的渴望也很急迫。因而，他們沒有時間去討論有關女人或者說個人的問題”。毛澤東坦率地告訴我們：

> **“對於女人，我沒有任何興趣**……除了完全不談女人的魅力——通常，對那些處于這一年齡階段年輕人來說，女人的事情在他們的生活中極爲重要——以外，我的同伴們甚至連日常生活中的瑣事都不屑一談。我記得，曾有一次在一個青年家里，他和我談起‘買肉’的事情。他還當着

我的面叫來傭人，和他商量買肉的事，然後就讓他去買。這使我很惱怒。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和他來往。我和朋友只想討論大事，只談個人、社群、中國、世界，乃至宇宙等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①

如此一來，毛澤東自己就指明了這樣兩種現象之間的一致性，即缺乏對女人的興趣與嘲笑實際生活中的細節問題。這種統一聯繫的關鍵在于毛澤東運用理想化思考方式的需要。而理想化的思考方式，則鼓勵有關歷史抽象和人類境遇的浪漫主義情懷。毛澤東的心理動力被引導着遠離兩性問題，而集中于語言的運用和社會理想的創造。有些人把自己想象成某個特殊女孩眼中的理想偶像或者英雄人物，但毛澤東渴望的並不是這種喜悦。恰恰相反，他寧願把自己想象成一個創造歷史的英雄，並努力追尋由此帶來的那種情感滿足。母親去世後，爲了把她塑造成一個具有普遍意義而不僅僅是個體依戀的人，毛澤東運用了理想化的思考方式，以便表達某種情感。與此類似，當長到對兩性問題感興趣的生理年齡時，毛澤東發現自己很難集中于某個特定的女人。他更偏好某種一般化的、較爲抽象的女性所提供的穩定感和安全感。

青少年時期的毛澤東曾經抵制性欲；與此相聯繫的，是他的另一個興趣。毛澤東對這種興趣充滿激情，有時候甚至體現出某種強制性，此即“鍛煉其身體，野蠻其體魄”。毛澤東和朋友們進行一種他們自己稱之爲“身體訓練”的活動。不論是炎炎夏日，還是寒冷冬天，他們會跑過田野，爬過群山。寒冬臘月，他們在冰冷刺骨的水里游泳。瓢潑大雨中，他們脱掉衣服，到處奔跑。甚至下霜以後，他們還會睡在露天的空地上。這種“野蠻其體魄”的狀態，也涉及到對個人服飾的嘲笑。毛澤東放縱自己的頭髮瘋長，其尺度超過了那時的通常習慣。他的衣服一點兒也不整潔。他的外表也不加任何修飾。在整個學校生活期間，毛澤東似乎努力否認自己身上的任何女性化因素。

---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47。

甚至暑假時，也是如此。毛澤東曾和一個朋友就像流浪漢那樣，利用暑假徒步漫遊了整個湖南全省——這一點，非常像後來美國那些年輕的搭便車旅遊者和背包旅遊者。當時，毛澤東還曾寫過一篇著名文章，題爲《體育之研究》。這也是毛澤東正式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對男性和身體的讚美是貫穿全文的基本主題，而且這種讚美甚至有些近于奉承。

其中寫道：

> "運動宜蠻拙。騎突槍鳴，十蕩十決；暗嗚頹山嶽，叱咤變風雲；力拔項王之山，勇貫由基之禮。其道蓋存乎蠻拙，而無與于纖巧之事。動動之進取宜蠻。"①

在歐美各國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那些接近身體成熟的青少年們身上會體現出各種不同特性共同存在的狀況。譬如，對社會與歷史問題表現出眞誠的浪漫主義；關注重大議題，舉止嚴肅，缺少幽默感；看不起任何私人瑣事和世俗雜務；渴望在淳樸的大自然中，進行登山和野營等運動，尋求危險的刺激，體驗生活的艱辛，鍛煉人們的身體；衣着邋遢，不修邊幅，毫不雅觀；以及最重要的，拒絶個人浪漫，抵制性欲趣味，如此等等。對歐美國家的青少年而言，曾經體現出這些特性的綜合症是非常自然，極爲常見的。儘管如此，對那些生活在20世紀第二個十年（也即1910年代）的中國青年而言，這卻是一種非同尋常的行爲。爲了適應新出現的各種現象，中國文化正在開始演繹、形成新的行爲規範。這些新現象包括，實行住宿制的學校和學院，宿舍生活，以及剛剛離開家，開始生活在一個全新的同輩人群體文化中——當然，其中男孩較多，且幾乎沒有多少女孩。這些令人興奮的經歷使得年輕人可能會立刻沉浸于一種幻象之中。按照這種幻象，年輕人通過上學，實際上可以擺脫傳統中國中因家長權威而來的種種苛求。要不然，這種權威束縛將會無孔不入、無所不在，滲透于

① 毛澤東：《體育之研究》，《新青年》第2卷第1號，1917年4月1日。

他們生活中的每個角落。在這些中國學生的心目中，同樣還存在着一種渴望。他們希望，能夠擁有一種更加充滿生機，更加充滿活力，以及更爲積極的行事風格，以便突破保守、拘謹的儒家傳統所能允許的限度。他們還希望，能夠擁有一種與成年人的現實所鼓勵的相比，更加具有現實意義、更加充滿浪漫色彩的願望。在那些年輕的中國人看來，因儒家秩序的衰敗而激起的，不僅僅是普通青少年通常體會到的那種對行動力量和理想潛能的敬畏。

自從外國傳教士把寄宿學校和宿舍體制引入到中國以後，在中國學生的生活中，就以非同尋常的高發生率來不斷涌現出對理想世界的追求和道德價値的提陞。由政府支持的學校和學院也遵循了傳教士們的傳統，譬如幾乎每天都有的向上帝禱告、自我奉獻的各種集會和儀式，以及向老師們分配任務，要求他們培養、訓練學生們的個性。甚至最世俗化的教育機構，也沒有把智識的發展和道德的培育分隔開來。同輩人群體具有某種內在的一致性和聚合力。通常，這種內聚力都會很強烈。因而，如果任何一個老師試圖僅僅關注智識教育，那么，他就會發現，自己在課堂上幾乎沒有什么權威。而那些能夠激發學生們潛在的理想主義的老師，則更容易受到歡迎。

當毛澤東還在學校的時候，日益覺醒的中國青年還沒有把他們的注意力集中于有關民族主義的各種觀念 (ideas of nationalism)，就像 1919 年的凡爾賽會議、以及隨後的五四運動給他們帶來的那種震驚以後發生的那樣。在毛澤東的學生時代，年輕人的理想主義主要在這樣兩種心理之間徘徊：一方面，夢想着一個全新的、更加充滿活力的社會；另一方面，對那些獲得解放的年輕人來説，他們希望尋求更加令人滿意的個人行爲標準。尤其値得注意的是，與確定兩性之間關係的新規範相比，宿舍生活這種全新的文化使抽象的民族理念的合法化 (legitimize abastract national ideals) 變得更加容易。民族理想的合法化，很容易就被表達爲對權力、進步，以及反對外來干預的追求。在大多數社會中，社會領域的現代化意味着，整個人口中，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認同社會上層或者説上流階級的微末的、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若干成分中最具有進步意義的因素。但是在中國，上層階級剛剛從

傳統禁忌的束縛中擺脫出來。他們尚未形成某種可以被那些正在出現的、受過教育的現代階級認可的、全新的社會生活模式。儒教禮儀文化的終結，帶來了廣泛的腐敗行爲和不道德狀態。與此同時，卻未創造出一種具有重大意義的、體現出自由主義思想傾向的精英式因素。

這樣一來，現代中國的青年先驅們就繼續遵循了一種天眞淳樸、基本上屬於新教徒式的嚴謹的私人行爲規範。與此同時，他們仍然宣稱自己是更加自由的，彼此之間的關係也沒有任何約束。男孩和女孩都堅稱，他們已經做好準備，將要大膽做出自己的決定。儘管如此，他們的選擇仍然幾乎不可避免地表明：在兩性關係中，他們仍然是謙遜、羞怯的。他們僅僅表現出有限的自由。中國的男孩和女孩之間的關係，與性無關。在共產黨人掌握政權以後，這一現象曾引起世界範圍內的爭論。一種廣泛流傳的解釋是，這種無性關係是獻身于革命事業的一個象徵符號。但實際上，我們可以在毛澤東那一代大學生們的文化觀念中，發現這一現象的起源。當然，這種無性關係的穩步確立，大約在 1920 年代末到 1930 年代初。

這樣一來，毛澤東就屬於較早期的那一代接受了現代化觀念的中國人。那代人希望，確立某種有關社會生活的全新風格和時尙。他們認爲，女人應該從古老風俗習慣的專橫壓迫下解放出來；同時，女人還應該被允許有一定的職業權利。他們的浪漫理想是婚姻自主、個人選擇，而不再由父母包辦、安排。儘管如此，直到結婚以前，兩性之間的關係將完全是純潔的。因爲，隨着男孩和女孩之間接觸和混合的機會越來越多，他們彼此之間的行爲也應該是兄妹式的。年輕的、充滿理想主義的那一代中國人似乎渴望向老一代人，或者說，在他們看來是腐敗的、成年的那一代人證明某種現代觀念。在年輕一代看來，有關男女兩性行爲的傳統約束是基于肉體具有普遍的弱點這一假設；而年輕男女是可以從這種傳統的約束之中解脫出來的。一旦這些年輕人獲得了解放，他們當然會超越而不是沉溺于肉體生活的放蕩與混亂。不特此也。與虛僞的父輩們相比，在約束性欲方面，這些年輕人還會採取更加高尙、更加純潔的標準。

所有這些都可以表明，作爲一個年輕人，毛澤東的許多行爲符合那一代中國學生作爲先行者，領導時尚新潮流的特徵。當時的時代精神是，偏愛眞誠而輕視浪漫。同時，加強鍛煉身體，注意體育運動，以及培養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精神氣質，所有這些都是學生領袖們的基本共識。儘管如此，在崇尚趨同或者一致性的時代情境中，毛澤東的行爲仍然有其獨一無二的特性：有點兒更加極端，而不是中庸；更加傾向于內在的自我主導，而不是僅僅順從大衆潮流所要求的那種一致性。

在毛澤東的同輩人中，他顯然比其他人更加邋遢不羈、邊幅不修。毛澤東曾經在湖南的鄉村漫遊，在露天的星空下睡覺。就此而言，幾乎沒有幾個人能夠和他相比。此外，也沒有多少人的飲食習慣會像毛澤東那般不規則。毛澤東有一篇有關體育的文章（即前文《體育之研究》）。在評論毛澤東對權力問題的態度時，我們還將不得不仔細地考察這篇文章，連一個細節都不能錯過。就本處而言，這篇文章明確暗示我們，對視身體發展爲一個全新社會的基礎這樣一種理想觀念，毛澤東比大多數中國學生傾注了更加深厚的感情。最後，不論是在把女人理想化這一抽象的層面，還是在避免與女人接觸這一具體的層面上，毛澤東都比學生亞文化要求的走得更遠。

毛澤東對待女人的方式的全部記録，或者說，他忽略女人、利用女人，以及拋棄女人的那種能力，似乎爲我們先前對毛澤東與他母親關係特性的懷疑，提供了重要證明。爲什么毛澤東會變得可以熟練地運用他人的情感以達致某些目的，但與此同時，面對情感對自己的要求，卻能保持無動于衷，不受這種情緒的感染、影響和操縱？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對此的理解與先前對毛澤東和他母親關係的解釋，體現出同樣的色彩。因而，有必要仔細考察一下毛澤東與那些曾經和他結過婚，以及爲他生過孩子的女人們的關係。有關拋棄感的主題非常重要。它使我們確信，我們離發現毛澤東個性特徵中的核心因素已經不遠。同時，我們也非常接近于發現，究竟是那些私人性的情感因素，幫助塑造了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的情感。

被抛棄的包辦新娘

毛澤東曾經告訴斯諾，他對女人缺乏“興趣”。在對該問題充滿理想化的激情敘述中，毛澤東曾提到過這樣一件事。在他14歲時，父母感覺到毛澤東已經長大了，到了合適的年齡，應該爲他安排一下將來。於是，他們就與另一個家庭聯繫，商討毛澤東與那家的、幾乎比他大6歲的女兒的婚事問題。根據毛澤東的説法，這件被預先聯繫、安排好的婚事，從來就沒有實現過。儘管如此，這樁婚事確實存在。毛澤東不得不努力拒絶這樁婚事。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是在否定父母的權威。這就必然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毛澤東早年對待其他女人的方式或者態度。我們不應隨意地忽略這一事件，就像毛澤東聲稱他當年做的那般偶然和隨意。因爲，這種包辦婚姻的制度，曾經深刻地影響了那些剛剛接受了現代化觀念的中國年輕人，並且使那一代處于早期現代化歷程中的年輕人的文化個性，染上了這一制度安排的色彩。對那些曾經捲入到這種包辦婚姻的制度安排中的幾乎每個人來説，這種制度安排都將有相當深遠的後果。

爲什么在兩性關係上，接受了現代化觀念的中國年輕人會支持一種新教主義式的禁欲模式？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他們試圖努力抵抗的傳統文化。這種傳統文化對較早的婚姻和多子多福的理想，有某種強烈的壓力和迫切的需求。確實，傳統的中國人擔心子女早年的放蕩，並對“私生子”（或野種、雜種）的觀念有一種恐懼。這種疑慮、憂懼心理的根源在于這樣一種可怕的景象，即兒子拒絶承擔延續家庭血脈的任務。一旦延續血脈的義務可以得到實現，那么，傳統中國社會就會允許丈夫去尋求多餘的性夥伴。

這樣一來，對在社會意識方面已經覺醒的中國年輕人來説，他們反抗包辦婚姻就涉及到很多問題。這不僅僅是希望獲得某種更大的個人自主選擇權，也不單純是爲了追求某種浪漫的角色。這也表達了對父母偏見的反對。父母催促子女，要求他們儘可能早地承擔起延續家

庭血脈的義務。就毛澤東的情況而言，他必定有着更大的壓力。因爲毛澤東的婚約並不是那種通常的包辦婚姻。包辦婚姻一般會在較早的童年時代就確定下來。這樣就爲實際舉行婚禮的時間，提供了一定的靈活性。實際上，與毛澤東定親的那個女孩，已經20歲了。人們顯然希望，她很快就會過門以及生兒育女。就像中國人通常所作的那樣，毛澤東的父母必然曾經考慮到：如果給他娶個媳婦，這個總愛任性胡鬧、充滿反抗精神的兒子可能會變得不那么難纏。這種考慮並非不可能。因此，毛澤東什么時候成家立業的問題，無論何時都必然會或明或暗地涉及一場有關毛澤東個人選擇的衝突。這就是，毛澤東決定離家求學。

在中國，包辦婚姻制度是如何運行，以便保證父母對兒子們的權威，並抑制更加具有男人味的理想觀念的？有關這個問題，目前幾乎沒有引起什么關注。注意力大都集中于這種風俗習慣壓迫女人的方式。毫無疑問，包辦婚姻幫助強化了這一傳統，即富于挑釁性的、盛氣凌人的婆母會虐待兒媳。這種傳統使中國女人很可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確實，女人受到不公正虐待的原型，就是一個年紀較大的女人苛酷、殘忍地對待另一個較爲年輕的女人。這就意味着，儘管每個女人可能不得不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但如果她有一個兒子，那么，她反過來就可以有機會去支配和控制另一個女人。這一事實表明，簡單地把西方的婦女解放觀念運用到中國語境中，存在一定的不恰當性。因爲，有關西方婦女解放的觀念假定，不公正的待遇很大程度上來自于男性的行爲）。包辦婚姻也在削弱男人的地位。因爲，包辦婚姻中貫穿着兒子的依賴性。它阻礙了中國男性的自主權，使他們不能擺脫父母的控制。甚至他們已經長大的時候，也是如此。在大多數文化中，男人娶一個妻子的行爲意味着，他準備承擔男人應該承擔的所有責任。這一行爲的基礎在于，他對自己的身份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和發現。因爲，擁有和保護一個妻子，是個體自主權的最基本的一個表現方式。但在傳統中國，包辦婚姻並未給男性提供機會，使之認識到心理自主權。他不但不能宣稱自己對一個伴侶的要求，或者對女性的征服；而且，他甚至不能保護那個被給予他自己的女人。確實，正是婚

姻行爲，再一次確認了兒子對父母的依賴性。這也確認了兒子並未獲得一種全新的、獨立自主的狀態。面對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對新娘的明顯殘忍的虐待，他無能爲力、不敢干預。在保護妻子方面，他也是完全無助、沒有希望的。這就意味着，在某種奇特的意義上，他仍然被自己的父母認爲是不成熟的。

由於所有這些原因，很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一方面，毛澤東不服從這種婚姻安排的決定，這勢必使得他與父母的關係變得複雜化。另一方面，從那以後毛澤東有關婚姻的情感就會與他對父母的情感聯繫起來；而且，這種情感的聯繫會比以往更加強烈。

毛澤東撕毀了婚約。這個問題不可能僅以與父母關係的困難與麻煩而結束。還有另一方面的問題，即毛澤東對那個女孩應該承擔的責任。毛澤東不可能不認識到，他的毀約行動可能傷害了一個女孩。根據傳統，他對這個女孩應該有某種義務。這樣一來，就像毛澤東當年曾經拋棄了內在于中國傳統的、作爲長子角色應該承擔的某些責任一樣，現在，他又一次無視父母已經爲他安排好的那些責任。在這兩個例子中，毛澤東在挑戰父母的權威；同樣，他也忽視自己的行爲對其他人造成的影響。

在毛澤東那一代的中國人中，許多人都曾試圖擺脫包辦婚姻。其中的大多數人都有這種或者那種複雜的心理反應。一些人因此形成了對那些與婚姻有關的傳統習慣的反感。他們試圖把婚姻的“現代”和“世俗”問題極端化，拒絕任何正式的婚姻儀式，並否認所有跟個人義務有關的承諾。一些人則對自己的妻子承擔了責任。這些責任遠遠超過了傳統中對丈夫的要求。對那些由他們自己選擇的妻子，他們還給予了無窮的關心和愛護。此外，還有些人自此以後，很容易變得放縱、輕浮，不嚴肅對待隨後的婚姻義務。

處理這個問題的一個常見辦法，是遵從父母的安排，娶一個指定的女孩；然後，當繼續在外求學以及從事其他職業時，重新另娶一個自己選擇的女孩。有時候，“城里的”或者說“現代的”的妻子，並不知道“鄉下”妻子的存在。但經常的情況是，她們知道自己的丈夫有“鄉下”老婆。她們接受這種現實，並認爲這是傳統風俗的不可避

免的結果；隨着她們這一代人的終結，這種傳統習俗也會最終消失(有時候，因遺產分配以及不同妻子所生的孩子的不同要求，可能會引起法律糾紛。特別是如果“鄉下”老婆的孩子們知道，他們與“城里的”那些兄弟姐妹們是平等的，父親有責任讓他們像後者那樣接受都市的教育，過上現代的生活，這個時候就更是如此)。

像毛澤東那樣，完全忽視父母的安排，這是一個大膽的舉動。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種沒有同情心的舉動。因爲，那個女孩仍然生活在農村環境中。她可能並不必然覺得，自己“獲得了解放”。她感受更多的，是自己被別人拋棄了。確實，這個女孩必定遭受痛苦。因爲，在當時的中國農村，像她那般年紀的被拋棄了的新娘，要別人再娶她，幾乎是不可能的。當然，對其他像毛澤東家那般殷實的家庭來說，更不會再與她訂立新的婚約。

大約在這個時間，毛澤東的母親去世了。毫無疑問，這就更容易使毛澤東忽視這個婚約。父親顯然認可了毛澤東的決定，而沒有提出進一步的抗議。後來，毛澤東先後娶了三個女人做妻子。現在來考察那些有關毛澤東對這三個女人的行爲方式的已知事實，我們對前述有關毛澤東拋棄那個因包辦婚姻而來的新娘的假設，就可以有更多的信心了。在這些女人身上，有關理想化和拋棄的主題，變得非常明顯。

第一個妻子：楊開慧

如果説毛澤東拒絶接受包辦婚姻的妻子，是一段有關他挑戰父母願望的故事，那么，他的第一次實際婚姻卻有點兒充滿悖論色彩。這種悖論意義體現在，毛澤東與那個將要成爲他妻子的女人之間的關係，是以把她的父親當作自己的父親的方式來開始的。楊開慧的父親去世一年以後，毛澤東就娶了她。這次婚姻，幾乎體現了這樣一種特點，即以結婚的方式來報答自己的精神導師。

沒有什么證據能夠證明，在楊開慧嫁給毛澤東以前，毛澤東曾經與她有過任何的浪漫關係。按照蕭瑜的説法，毛澤東曾和一個名叫陶

斯咏的女孩談過戀愛。1920年，他們兩個人曾經一起合作，在長沙開過一個書店。但後來，他們發現彼此的政治觀點分歧太大。於是，那個女孩中斷了與毛澤東的關係，轉而去了上海[①]。不管他們最初的關係可能是怎樣的，這是一個有趣的事實。首先，它與毛澤東的政治活動和革命生涯是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第二，這個女孩是楊昌濟教授教過的女學生中最優秀的一個。而楊教授，則是毛澤東的精神導師，也是他後來實際上迎娶的那個女孩的父親。

重要的是，毛澤東發現了一條通往婚姻的途徑，即可以與一個女孩由最初的交往，經過戀愛，直到最後結婚。這是一種特殊關係的結果；而且，這種關係可能是毛澤東曾經擁有過的唯一一次與男性之間的關係。在這種同性關係中，毛澤東面對的是一個年紀比自己大很多的男人；而且，他發現，對這個男人可以表示出完全的、充分的敬意和愛戴。楊昌濟教授能夠爲毛澤東浪漫的理想主義賦予一定的目標和動力。在毛澤東曾經用來描述熟悉人物的所有言辭中，有關楊教授的語言是最友好、最積極的。

> “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一個從英國歸來的留學生。在後來的生活中，我和他的關係將變得密切相關，親密友好[②]。他講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同時，他也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尊奉的道德價值、倫理觀念有着非常強烈的信念。他還努力灌輸、引導他的學生，希望他們成爲具有正義感的、有道德的、高尚的人；同時，也是對社會有用的人。在他的影響之下，我讀了一本蔡元培（蔡氏時爲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也是把近代社會科學和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的庇護人——引者注）

---

① Siao 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1959, p. 52.

② 實際上，毛澤東是在楊昌濟先生去世以後，才娶了他的女兒。儘管如此，毛澤東把他們之間的關係看作是“親密相關的”。就好像，他早就知道自己已經把楊昌濟當作自己的岳父。

翻譯的有關倫理學的書。受此啓發，我還寫了一篇文章。名叫《心之力》。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唯心主義者。從其唯心主義的觀點出發，楊昌濟教授對我的文章給予了高度讚揚。他爲這篇文章打了一百分。"[1]

毛澤東特別指出，當他後來成爲一個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者時，他最終超越了楊昌濟的唯心主義。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如此，毛澤東還是異常慷慨大度地感謝楊昌濟。他承認，不但是自己的思考方式，還有在實際行動方面，楊昌濟所起的激勵作用都是很關鍵的。在長沙時，楊昌濟幫助毛澤東建立了新民學會。這是毛澤東在學生時代時取得的最大成就。學會最初是一個朋友性質的群體。而楊昌濟則幫助毛澤東，把它改造成一個大約由六七十個來自于不同市鎮的學生組成的嚴密組織。這是毛澤東曾經承擔過的第一次組織性活動。通過觀察，楊昌濟教授發現，毛澤東是一個熱情的人。在組織活動中，展現了他的能力，並吸引了大量來自于湖南各地、富于獻身精神的熱誠學生。後來，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爲共産主義運動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楊昌濟幫助毛澤東建立了與《新青年》的聯繫。這是一本非常有影響力的雜誌，由中國共産黨的創立人和第一任領導者陳獨秀主編。1918年春天，毛澤東畢業了。楊昌濟也離開了長沙師範學校，前往國立北京大學任職。他鼓勵毛澤東跟他一塊兒去北京。在那里，他把毛澤東引介給中國共産黨的另一個奠基人——李大釗。李大釗當時是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他給了毛澤東一份工作，讓他當圖書館管理員。那個時候，毛澤東還得依賴于楊昌濟教授。他接受了楊昌濟的支持。但是，他從未認可自己對父親的依賴。在當時的處境下，就像在家里與父親的關係時一樣，毛澤東也有許多抱怨。儘管如此，北京的新環境還是有大量的好處。

就物質方面而言，毛澤東當時的生活狀況還很悲慘。每個月他有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46.

八塊錢的收入。但是，與他 8 年前作一個普通士兵所得的餉錢相比，只比那時多一塊錢。他和其他七個人一起住在一個小屋里。睡覺的地方只有一鋪炕。他們很擁擠，幾乎貼在一塊兒。根據毛澤東的回憶，在翻身時，他們不得不互相打個招呼①。儘管如此，就智識觀念方面的發展而言，這可能是毛澤東一生中最令人興奮、激動的一段時期。因爲，在楊昌濟的幫助之下，毛澤東正在逐步靠近那些日益覺醒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中心。當然，毛澤東仍然處于這個圈子的外層。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毛澤東相當敏鋭地感覺到自己的邊緣地位。

從 1918 年到 1919 年，毛澤東一直獃在北京。他發現，作爲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之一，北京城有許多古老的美麗景觀。毛澤東喜歡漫步于這個城市的各個公園，或者走過那些路旁栽着樹木的街道。

> "……在公園里和古老的故宮廣場上，我看到了北方的早春。當北海仍然結着冰的時候，我看到白梅盛開。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頭懸着晶瑩的冰柱。這使我想起唐朝詩人岑參描繪這一場景的詩句。在描述北海的披上冬裝的樹木時，他認爲它們就像：'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嘆和讚美。"②

一個鄉下男孩從一個值得尊敬的老師那兒，得到了父親般的幫助；然後，在這個老師的幫助下，來到北京；他不但臣服于這個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之一的魅力，而且也對這個精神導師的女兒產生了感情——如果一切只是有關這樣一個鄉下男孩的故事，那么在毛澤東的行爲舉止中，就沒有什么神秘性。因爲，在這里，一個溫馨的、也很

---

① 毛澤東不但向斯諾提及過他當兵的餉銀數目。1964 年時，他還注意到另一個問題。那時，他已經七十歲。毛澤東回憶説：1918 年時，自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時一個月只有八個銀元。他表示，自己對這種生活條件極爲不滿。參見毛澤東：《春節談話》，1964 年 2 月 13 日。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52。有關唐詩中提及的北海問題，毛澤東必定很困惑。因爲，北京的北海只能追溯到明代。

普通的故事的所有因素都具備了。但實際上，對日益覺醒的中國民族主義來說，1918–1919 年是極富戲劇性的一年，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一旦我們想起這一點，毛澤東行爲舉止的神秘性就出現了。1919 年五月，北京學生群體的挫敗感最終將突破所有的約束。當時，凡爾賽會議宣佈，戰勝國的盟友之一——日本，而不是中國——將接收德國放棄的在中國的所有租借地。而在中國人看來，本來應該是戰勝國的另一個盟友——中國自己來收回這一切。中國學生們的感情爆發了。通常，這次情感的爆發被歸結爲這樣一個名字："五四運動"。這是日益覺醒的亞洲和非洲的最偉大的事件之一。五四運動完全改變了中國學生們的智識生活的音調。當這些事件發生時，毛澤東離當時最進步的人們很近。儘管如此，他的反思和回憶卻停留于他自己的一些尷尬情境，譬如身份地位、物質生活條件等。最不同尋常的，是毛澤東敬畏的對象：那不是針對當下發生的現實劇目，而是針對傳統中國和有關過去的各種傳說故事的。

當時，毛澤東與楊開慧都在北京。但我們並不清楚，這一年中毛澤東在什么情况下，或者説隔多長時間，會見到楊開慧。毛澤東經常造訪楊昌濟。他曾經提到，在 1918 到 1919 年的時候，自己"遇見了楊開慧，並且與之戀愛"①。據稱，楊開慧"從外表上看，非常像毛澤東的母親"②。1919 年春天，毛澤東投身于那些最終將會導向中國共産黨建立的組織性活動。儘管在學生生活中，毛澤東非常忙，也很積極。但是，毛澤東似乎仍然是孤獨的。他置身于當時的那些事件之外。對自己的未來行動計劃，毛澤東猶豫不定，難以抉擇。他參加到把中國學生送到法國去勤工儉學的活動中。這個活動計劃是由法國支持的。當時，在西方的所有盟友中，只有法國承認並感謝中國在抵抗德國的戰爭期間做出的努力和貢獻。而中國做出貢獻的方式，就是向法國派出華工，幫助挖戰壕。毛澤東很猶豫，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出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52.

② Han Suyin, The Morning Delug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2, p. 64.

國。在自傳性敘述中，毛澤東暗示：既然自己還不是很了解自己的祖國，他就不傾向于出國。但其他人則暗示，毛澤東確實曾經嚴肅地考慮過去法國的問題[1]。

有一件令人奇怪的事。1919年2月底或者3月初，毛澤東決定離開北京以及他的新愛人——楊開慧。他打算不惜以巨大的代價和痛苦，一個人獨自去上海，爲那些將要去法國的朋友"送行"。毛澤東告訴我們，他的錢只夠買票去天津。在那里，他在火車站碰巧遇見了一個同學。"幸運的"，這個同學借給毛澤東一筆錢。從天津到上海，爲了參觀古老中國的各種風景，他在沿途的很多地方下車。他還探訪了各地儒家傳統的遺址——而當時，他的同輩人都在激烈地譴責這種傳統。毛澤東在孔子的墓地作過短暫逗留。那是一個小鎮。在那里，聖人孔子度過了他的童年。毛澤東還去過孔廟。據稱，孔子曾經在那里栽過一棵樹。毛澤東還曾下車參觀過孟子的出生地，以及孔子的另一個門徒的家。在山東，毛澤東中斷自己的旅程，去登泰山。而泰山，是傳統中國很神聖的一座山。作爲一個對中國歷史充滿崇敬之情的後學者，毛澤東懷着虔誠的態度，在南京和杭州的城墻之上漫步。在歷史傳説中，這兩個城市都極富盛名。尤其是南京，對毛澤東來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爲，那里是他喜愛的浪漫歷史——《三國演義》[2]中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上演的舞臺。這樣一來，就構成一個鮮明的對比。當時，同學們的關注點都集中于當代世界，爲中國遭受的、源自西方的屈辱而憤怒。同時，他們充滿激情地探討，未來中國的合適而恰當的前景究竟應該是什么樣子的？與此同時，毛澤東卻踏上了一個孤獨的旅程。他參觀古老中國的、尚未受到西方衝擊的一些地區。在那里，中國本身的傳統巍然獨立。在這次旅程中，毛澤東花完了身上的最後一個銅板。甚至，還丢了他自己唯一的一雙鞋。但是，"幸運之神"再度降臨。在一個火車站外面，毛澤東碰見一個"來自湖南的老朋友"。這個老朋友是"我的幸運之神"，他借給毛澤

① Stuart Schram，Mao Tse-tung，London：Penguin，1966，p. 51.

② 譯者案：此處有誤。原文爲 San Kuo Chih （The Legends of the Three Kingdoms），直譯爲《三國誌》。而毛澤東喜歡讀的是《三國演義》。

東足夠的錢，使之能夠繼續完成上海之行。

上海之旅以後不久，毛澤東突然返回長沙。那里，是毛澤東上演他學生時代的成功與失敗的舞臺。這使他不同尋常的行爲舉止和非常奇怪的精神狀態變得很有戲劇性。去法國勤工儉學運動的項目顯然擁有足夠的資金，可以讓毛澤東完成他的回鄉之旅。

這個春天發生的一些事件似乎向我們揭示，在那個時候，毛澤東對自己未來的人生目標仍然模糊不定。但他有足夠的自信，可以决定自己要走的道路，而不關心實際的問題。毛澤東基本的安全感和穩定感是很充實的。因而，無論做什么，他都相信，自己將受到眷顧和保護，而不會遭到重大損失。毛澤東覺得，自己的“運氣”會很好。儘管如此，仍然存在着某種神秘性，或者説，難以理解的東西。爲什么在這個特别的歷史時刻，毛澤東會離開北京和他所鍾愛的楊開慧，去遊歷中國的歷史聖地，進行一次——按照他自己的説法——爲一些朋友“送别”的旅行？有關他内心的精神狀態，我們唯一清楚的就是毛澤東的直率斷言：他戀愛了。那么，楊開慧對他的感情如何？對此，毛澤東什么也没告訴我們。楊開慧是否回報了毛澤東的情感？她是否在拖延毛澤東？或者，毛澤東是否在擔心，這個女人可能再次收回對他的愛？

毛澤東聲稱，自己處于戀愛中。他認爲這是事實，並以這種説成實情的方式做出斷言。儘管如此，毛澤東的這一論斷幾乎什么也没有告訴我們。因爲，在中國文化中，人們認爲：没有必要對感情發展進行精確化、細緻化的表達。譬如，在傳統中國的小説中，感情通常是突然出現的，而且已經非常成熟。男主人公看見一張“美麗的臉龐”，然後立刻就陷入愛戀之中。僅僅一個微笑，甚至僅僅是驚鴻一瞥，就足以解釋深刻的感情。在中國文化中，對這樣一些情形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興趣：譬如，確定一個人向另外一個人表達感情的方式，兩個人的感情如何交匯、成長，抑或死亡。最重要的是，幾乎没有什么文化傳統，可以用來考察一個人的情感如何影響了另一個人的情緒。一旦主人公被宣佈處于戀愛狀態之中，然後，所有的關注點將被集中于外部客觀條件。譬如，他怎樣安排一次合乎當時的社會交往規範的相

會？女方的父母會同意這樁婚事嗎？通常，對男女雙方的主觀精神世界，缺乏進一步的討論。

在這個例子中，毛澤東窮困潦倒的經濟狀況和楊開慧家的殷實富足形成對比。這樣的情形，對二人的婚事來說，可能幾乎沒法給毛澤東任何希望。儘管如此，另一方面的情況也很重要。楊昌濟教授對毛澤東的幫助是非同尋常的。他顯然很喜歡這個來自湖南的、聰明的年輕人。因而，如果女兒和毛澤東確實相愛，希望結婚，那么，他就不太可能反對這樁婚事。毛澤東的行動暗示我們，在第一次接近戀愛狀態的時候，他的行爲舉止中透露出些許的羞怯心理。事情看起來似乎是這樣：毛澤東無法確定楊開慧的感情。這或者是由於楊開慧對他實際上有些保留意見；或者，更加可能的是，毛澤東發現要克服自己的恐懼實在是非常之難。他擔心，由於把感情全部傾注于另一個人身上，自己會再度受到傷害。我們不清楚，在毛澤東離開的那段時間，他和楊開慧之間甚至是否聯繫過。

返回長沙以後，毛澤東全身心地投入到具有高度目的性色彩的組織活動中。湖南地方的統治者極其殘忍。他們試圖積極鎮壓那股因五四運動等事件而激起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洪流。當時，在北京有成千上萬的學生示威遊行，抗議凡爾賽和會的決議。很快，來自首都北京的學生分散到各地的省市中心。毛澤東再次投身于動員朋友和學生的運動中。在全國範圍內，許多大學都關閉了。這就提供了相當數量的既有激情，也有時間的年輕人。他們積極投身于政治性示威遊行和討論之中。

正是在這段時期，毛澤東打破了寫作活動與積極的組織活動之間的平衡。在毛澤東日益增強自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導地位的大部分時間里，這兩種活動之間的平衡是一種重要特徵。在寫文章方面，毛澤東很成功。他的一些文章引起了知識階層的注意。不特此也。在安排下屬從事一些組織性的工作和任務方面，他同樣也很成功。軍閥、湖南省督張敬堯越來越注意到毛澤東的活動。他相繼關閉了兩份由毛澤東編輯的雜誌。還取締了毛澤東幫助建立的湖南學生聯合會。1919年秋季，張敬堯召集了一次由學生代表參加的會議。會上，張敬堯向

學生發表演説，要求他們不要干預政治。他叫囂："如果不聽我的告誡，小心我會砍你們的腦袋。"其中的一個女學生代表哭了。毛澤東告訴她："別在意張敬堯，那不過是狗叫而已。"①

毛澤東繼續堅信，在自己的身上存在某些充滿魅力的東西。因而，在當年剩下的那些日子中，毛澤東加速了秘密組織工作的步伐。通常認爲，毛澤東這段時期的注意力基本上集中于全國性的政治發展。儘管如此，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是，毛澤東傾注了最大熱情的主題是有關女人的平等權問題。當時，長沙有一個女孩自殺了。因爲父母強迫她嫁給一個她不願意嫁的人。對此，毛澤東爆發出某種非同尋常的精力。在十三天中，他寫了九篇文章。這些文章譴責舊式的婚姻風俗，歡迎"自由戀愛的偉大潮流"②。

人們禁不住會困惑，在多大程度上，毛澤東對正義的明顯熱情受到他自己的某種負罪感的驅使。這種負罪感源于毛澤東對一個女孩的拋棄。而這種拋棄正是由於一次包辦婚姻造成的。當時，還有許多其他的問題引起了中國年輕人的熱情關注。考慮到這一點，毛澤東把注意力集中于需要對婚姻制度進行變革，就是一件非常突出的事（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在即將獲取國家權力之前，毛澤東領導的政治制度實行的第一批社會改革的主要領域之一，就是改革婚姻習俗）。不管怎樣，毛澤東這一時期的活動，成功地使他成爲某種浪漫的英雄人物。不但在積極的女孩眼中如此，就是在活躍的男孩心里亦然。

在毛澤東的情感發展歷程中，1919 到 1920 年之間的那個冬天，是一段非常關鍵的時期。他已經走出了"思想延緩償付期"的那種飄泊不定的狀態，轉而進入積極的行動時期。他也不再是一年前那個夏天中的孤獨旅行者。當時，他正尋訪古老的中國；而其他人正在充滿激情地尋找一個新中國。現在，毛澤東處于行動的核心，指揮他人的活動。他不但集中自己的精力，還能調動其他人的情感。最重要的是，隨着毛澤東逐漸成爲一個明顯的冒險者，他的行動中越來越體現

① 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 London: Penguin, 1966, p. 56.
② 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 London: Penguin, 1966, p. 55.

出某種大膽、無畏的精神。事實似乎很顯然：毛澤東有着強烈的自戀感；這種自戀感使他能夠以極大的精力來做事。

毛澤東的各種充滿激情的活動是以“政治”的名義（in the name of politics）來進行的。儘管如此，這一時期毛澤東充滿創造力的一個主要表現，卻是處理如何對待女人的感情問題。這個男孩曾經宣稱自己“太嚴肅”，而對“女人沒有任何興趣”。但是，當第一次眞正投入嚴肅的政治活動時，他並沒有熱情地討論政治問題，而是突然開始“談論”女人。在這種悖論的背後，存在着毛澤東一年前那個夏天中的行爲舉止的神秘特性。當時，毛澤東宣稱他已經“陷入戀愛狀態”。但隨後，他卻迅速地離開了愛人所在的那個地方，踏上了一個毫無目的的旅程。此後，他也並未給楊開慧寫任何求愛信。恰恰相反，他傾注了全部的精力，來寫文章公開宣稱愛情的重要性和合法性。

事情看起來似乎是這樣。這個男孩曾經從他母親那兒，不但獲得過自戀的滿足；而且，他還認識到把自己的感情寄託于另一個人身上的危險性。但現在，這個男孩已經長大成人，正在準備再度冒險，把自己的情感放在另一個人身上。儘管如此，他仍然不能直截了當地就那么做。因而，在一定意義上，通過用一般的、通常的言辭來表達愛，毛澤東就驗證了自己情緒的後果。就像他處理與母親的關係時那樣，毛澤東再次地訴諸于對女人的理想化。他把自己對愛的看法寫在了紙上。結果，引起了一種積極的、普遍的反應。毛澤東的自戀感得到了滿足。從那以後，毛澤東已經準備好，以更加公開的方式來控制自己的情感。因爲他認識到，通過強烈的表達某些私人的感情，自己就可以在公共領域獲得益處。

1920年1月，楊昌濟去世了。而此時的毛澤東，正處于上述那些重要的認識和發現中。2月份，毛澤東離開湖南，前往北京。楊昌濟曾經爲毛澤東提供了一定的組織機構、社會聯繫和熱情支持。這些幫助使毛澤東可能發現自我。但現在，這個人卻拋棄了毛澤東，離他而去。在一定意義上，毛澤東再次變成孤身一人。他不能確定，是否可以依賴于任何人，而不必冒險來傷害自己的感情。與此同時，繼續獃在湖南則要冒一定的生命危險。因爲，省督正對毛澤東的行動表現出

日益增長的敵意。這樣看來，毛澤東去北京的決定就是兩種感情的混合物。一方面，爲看望楊昌濟教授那個破碎的家這種心理動機所牽引；另一方面，則是出于某種因日益變得危險的政治形勢而產生的心理驅動的壓力。

儘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僅僅在北京獃到4月份。大多數的毛澤東傳記認爲，這段短暫的、不足三個月的時期，是毛澤東發展成爲一個眞誠的共產黨人的關鍵時期①。正是那個時候，毛澤東第一次讀到了《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卡爾·馬克思論階級鬥爭》的中譯本，以及柯卡普的一本有關社會主義史的書籍。毛澤東自己指出，這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自從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爲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這種信仰就從未動搖過……到1920年夏天，我已經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不但是在理論上如此，一定程度上在具體的實踐行動中亦然。從那時起，我就把自己看作一個馬克思主義者"②。毛澤東已經發現了一個全新的權威人物，以便取代楊昌濟。而此前，楊昌濟曾是他認可的唯一權威人物。在北京的那些短暫的日子里，毛澤東忙碌、熱切地閱讀所有可以得到的有關蘇俄發展的資料，聯繫激進的學生與教授，並作爲"通訊委員會的頭兒"，傳播激進的觀點。要在僅僅三個月中完成這些活動，這就需要非同尋常的集中精力。儘管如此，那段時期的生活經歷也強化了毛澤東最基本的矛盾心理之一。一方面，傾向于逃避，躲進閱讀帶來的那種孤獨和疏離感之中；另一方面，渴望行動，希望引起年輕學生們的注意。

這段時期毛澤東充滿迷亂和困惑。應該後退，還是採取行動？他已經被這種選擇搞得筋疲力盡。也正是這段時期，毛澤東開始再次見

---

① 有關毛澤東第一次和第二次造訪北京的確切日期，目前還沒有一致的看法。在向斯諾講述自己的經歷時，毛澤東說，他第二次去上海是在1919年。但實際上，那必定應該是1920年，即他第二次造訪北京之後。施拉姆和其他一些傳記作者已經指出了日期方面的這些失誤。這里，我們遵循他們對毛澤東的活動順序和日期所作的重新考訂。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55。

到楊開慧。第一次的，二人之間開始有了對他們之間未來關係的彼此理解。楊昌濟曾經先後在日本、英國和德國求過學，爲時大約十年。他支持改變中國有關性問題的思想觀念和傳統習俗。尤其是，他支持寡婦再嫁的權利。因而，儘管在傳統中國，人們禁止在父親去世後的服喪期間考慮婚嫁問題，但楊開慧的家庭決不會因此而感到約束。雖然如此，雙方之間的經濟差距仍然存在。顯然，在任何情况下，不論是誰，只要不同意毛澤東有關冒險問題的偶然、隨意的看法，毛澤東就不會支持他們。

1920年4月，毛澤東突然決定再次離開北京，重新踏上去上海之旅。有關這次上海之行的原因，目前尚無人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當時，毛澤東正積極投身于某些活動之中，並發覺自己已經完全成爲一個職業革命者；同時，他也正在考慮，準備成爲那個剛剛逝去的精神導師的女兒的保護人。這次上海之行仍然有嚴重的經濟問題。毛澤東沒有錢支付這次旅程。爲了買一張火車票，他不得不賣掉了那件冬天穿的、可以保暖的惟一外套[①]。通常的解釋是，毛澤東希望見到曾經在北京大學任職的陳獨秀；但是，由於捲入馬克思主義運動，他已經去了上海，尋求公共租界提供的那種相對的智識自由和政治自由。因爲，中國當局無法干預租界事務。毛澤東聲稱，他曾經與陳獨秀討論過自己的“湖南重建同盟”計劃。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澤東覺得，有必要獲得陳獨秀對這種計劃的支持與祝福，而不計這一行動的如此高昂的個人代價？對此，我們並不清楚。本來，如果毛澤東在北京耽得時間再長點兒，那么，他就仍然有機會對北京的共産主義運動做更多的了解。當時，北京共産主義運動的智識氛圍和政治氛圍是非常令人興奮的。當然，留在北京，他本來也能有更多機會見到楊開慧。

毛澤東突然再次離開北京，離開自己曾經聲稱愛過的人。他這樣做，似乎更多的是出于對某種冲動的心理反應，而非審慎的政治考

① Edward C. Rice, Mao' s W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 23.

慮。有人認爲，毛澤東去上海，可能是出于共產國際的某項使命。但這種看法並不能令人信服。當時，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尚未把他視爲一個可以信賴的共產主義者。進一步而言，如果這是負有政治使命的官差，那么，毛澤東就應該得到資金方面的支持。愛德華·萊斯(Edward Rice)相當敏鋭地指出，由於毛澤東對那些阿諛奉承外國人的中國人深惡痛絶，因而，讓他接受任何這樣的幫助，對他來説都是完全不可能的①。到達上海時，毛澤東身無分文，一貧如洗。在他的一生中，還從未生活在這樣窮困潦倒的狀態中。最後，毛澤東在一家洗衣房找到了一份工作②。他的處境確實很悲慘。既沒有朋友，也沒有和陳獨秀建立起某種親密關係。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毛澤東顯然不但在拒絶自己作爲一個革命者的職業生涯，他還抵制自己第一次捲入和一個女人的情感關係。客觀而言，毛澤東確實面臨一定的問題。因爲，只要他還不過是一個"激進的學生"，那么，在楊開慧和毛澤東的人生旅途上，二人之間的客觀差距就無法得到彌補和與溝通。儘管如此，甚至就主觀世界而言，毛澤東也無法找到某種安排，可以允許自己和楊開慧獃在同一個城市中。

重要的是，最初提出動議來解決這個問題的，不是毛澤東本人。再一次的，這是由他以前的另一個老師幫助他實現的。這個老師成爲毛澤東的資助人，把他從上海的悲慘處境中解脱出來，並代爲安排，幫他找到一份工作。這樣一來，毛澤東最終就可以養活楊開慧，並且表現出某種中產階級式的令人尊敬之處。隨着他的對頭、軍閥省督張敬堯被驅逐、趕出他的家鄉湖南省，毛澤東的運氣也開始有了轉變。新軍閥譚延闓選擇了易培基作他的教育廳長。而易培基是毛澤東以前在長沙師範學校上學時的老師。反過來，易培基又任命毛澤東爲長沙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的校長。這將是毛澤東在政治以外的世界中獲得的最高級别的、也是最重要的職位。1920年8月，毛澤東返回長沙

---

① Edward C. Rice, Mao's W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 23.

② 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 London: Penguin, 1966, p. 57.

任職。這就使他可以有錢養活一個妻子。

那年秋天，毛澤東再次投身于緊張的活動中。他重新與那些一年前認識的長沙老朋友建立聯繫，開始忙于組織各種團體。一個是俄羅斯問題研究會，以送學生去蘇維埃俄國爲目標。另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該組織最後變成了湖南共産黨的一個關鍵支部。也正是這個組織派毛澤東去上海參加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再一次的，就像從一月到四月那段時期一樣，毛澤東把讀書生活、組織工作和浪漫愛情結合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的傳記作者們在一定程度上，大多是從他的智識發展與政治發展的視角下來看待毛澤東，而沒有把他看作一個完整的、充實的個人。毛澤東與楊開慧究竟是什么時候結婚的？對此，還沒有一致性的看法。有個情況，似乎也沒有引起人們的震驚，即在有關現代中國這個曾得到最多描述的人的一些關鍵性統計中，歷史學家們並沒有解決某些基本的問題，譬如，毛澤東這個人的結婚日期和他的孩子們的出生時間。

毛澤東曾經告訴埃德加·斯諾，在“1920 年夏天，我已經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不但是在理論上如此，一定程度上在具體的實踐行動中亦然。從那時起，我就把自己看作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就是在這一年，我和楊開慧結婚了”①。人們通常傾向于認爲，這段陳述應該解決前述的問題。因爲，一個男人總會記住自己是在哪一年結婚的——這個假設很合理。但即便如此，這段敘述中還有一個問題：1920 年的什么時候？如果是毛澤東獃在北京的那段時間，即從一月份到四月份，那么，他去上海和作爲一個洗衣工的活動，就會變得更加模糊，解釋不清。進一步的，這也意味着楊開慧結婚時，離她父親去世僅僅有兩三個月的時間。而即便是最信奉現代化觀念的中國人，在這段時間里也會處于某種程度的哀悼之中。因而，根據斯諾的記録，事實似乎更可能是這樣，即毛澤東與楊開慧是在 1920 年的秋天，或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55。

者那年的初冬結婚的。但是，這也就提出了另一個令人尷尬的問題。因爲，埃德加·斯諾還告訴我們，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毛岸英是1920年出生的[①]。

大多數的傳記作者暗示，他們是1920年底結婚的。斯圖爾特·施拉姆說，正是由於毛澤東被任命爲小學校長的職務，才使他們"在那一年隨後的冬天結婚成爲可能"[②]。唐納德·克萊恩（Donald Klein）和安妮·克拉克（Anne Clark）遵循了這套推理方式。他們指出："他（毛澤東）獲得了一個職位，擔任長沙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的校長。不久以後，他就和楊開慧結婚了。"[③]伯爾曼（Boorman）認爲："楊開慧回到了長沙。1920年秋天，她與毛澤東結婚。"[④]韓素音指出，他們是在1920年初定的婚，當時，毛澤東剛回北京；在"隨後的那個冬天"，他們結婚了（甚至在毛澤東離開北京，去上海之前，楊開慧就和她的母親一起回到了長沙）。但隨後，韓素音又說，毛岸英直到1929年，也就是僅僅在楊開慧被害前一年，才出生[⑤]。人們廣爲接受的看法是，毛岸英生於1920年。可能是爲了處理由此引出的問題，羅伯特·潘恩提出了一個最不可能的看法：他們是在上海結的婚，換言之，也就是毛澤東還是一個洗衣工的時候[⑥]（確實，在試圖把中國人的出生日期和年齡聯繫起來的時候，西方人會遇到困難。因爲中國人有一種習慣，他們把出生時的年齡定爲一"歲"。所以，在說年齡的時候，就會有某種不確定性，搞不清楚這種算法究竟是依據中國的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468。

② Stuart Schram , Mao Tse-tung, London: Penguin, 1966, p. 57.

③ Donald W. Klein and Anne Clark,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71, Vol. 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677.

④ 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 China, Vol. 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5.

⑤ Han Suyin, The Morning Delug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2, p. 86.

⑥Robert Payne, Mao Tse-tung, New York: Weybright and Talley, 1950, p. 61.

方式，還是西方的習慣)。

在一定程度上，埃德加·斯諾試圖努力解決毛澤東的結婚時間問題。他說："在湖南那些激進的年輕人當中，他們（毛澤東與楊開慧）之間的婚姻被視爲一種'理想的浪漫情懷'。這似乎是作爲一個現代新型婚姻的嘗試而開始的"①。陳志讓是有關毛澤東生平的最爲審慎的編年史家。他無視毛澤東宣稱自己1920結婚這一敘述，並且斷言，直到1921年十月，毛澤東和楊開慧才結婚。而毛岸英，則生於1922年。由此，他可能解決了前述的問題②。一個私人朋友和職業同事（革命同志）則把毛澤東的結婚時間定在1922年，他們的兒子則出生於第二年。因爲這個熟人記得，在一次會面中，毛澤東遲到了兩個小時。對此，他表示道歉，並解釋說："因爲不得不送我的妻子去醫院，所以我晚了。"③

由於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個重要行爲習慣，歷史學家的這個問題就被弄得很複雜。這個行爲習慣就是，他們遵循了布爾什維克的傳統，否認私人事務的重要性。而在毛澤東的這個例子中，問題就更加複雜化了。因爲，從心理學角度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即毛澤東不斷在熱情的政活動和組織活動與消極的隱退狀態之間搖擺。這種搖擺的節奏，恰好與他在私人領域加快自己行動步伐這一現象，構成一種巧合，而不是一種替代性的選擇。歷史學家提出的全部有關毛澤東和楊開慧結婚時間的那些日期，都與毛澤東政治生活中的某種里程碑式的標誌性發展緊密相關。這樣看來，儘管在歷史學家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爭議，但也有某種共通性。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把毛澤東的結婚時間，確定在他日益捲入政治活動的某個關鍵發展階段。譬如，他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或者全身心地投入秘密地下工作以及建立共產黨支部的時候，抑或剛剛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p. 156n.

② Jerome Chen,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378.

③尚山（筆名，音譯，Sheng Shan）：《我所知道的毛澤東》，香港：《中華月報》，第718號，1975年7月1日，第46頁。

並被任命爲湖南省委書記的時候。歷史學家們爲什么會傾向于忽視毛澤東私人生活的維度？毫無疑問，其中的一個原因恰恰就是由於這樣一種非同尋常的行爲模式，即毛澤東的公共活動的份量，總會遮蔽他私人活動中的任何些許增長。

總而言之，我們面臨的情形就是：不知道毛澤東什么時候結婚。沒有人知道，是否舉行過任何的婚禮儀式。各種傳説都支持這樣一種看法，即在毛澤東與楊開慧的婚姻中充滿某些浪漫主義色彩。對許多年輕的中國人來説，毛澤東和楊開慧的婚姻被認爲是那個正在出現的、日益捲入共產主義運動的群體中，一個激進行動的典範。因爲，這樁婚事把彼此雙方共同獻身于更大的政治事業和個人的自由選擇結合在一起。

在毛澤東與楊開慧的關係中，存在某些特別的東西和浪漫的色彩。這種看法，在毛澤東 1957 年時所寫的一首詩詞中得到了極大的支持。當時，已經是楊開慧遇難二十七年之後了。那一年，毛澤東給一個烈士的遺孀寫了一首詩詞，以便紀念她的丈夫和楊開慧的犧牲。她的丈夫姓“柳”，即柳樹的“柳”；而楊開慧則姓“楊”，即楊樹的“楊”。這首詩詞是題獻給那些“不朽”（Immortals）的革命烈士的[1]。其開篇是這樣的：

我失驕楊
君失柳，
楊柳輕颺，
直上重霄九。

1960 年代，神化毛澤東的一個特徵，就是把楊開慧描繪成毛澤東身邊的一個革命工作者。根據這樣的一些敘述，1920 年代的毛澤東一直忙于在上海、武漢和廣東等各地之間奔波，而楊開慧則一直陪伴着他[2]。另一方面，當時的證據表明：在這些旅行中，毛澤東一直是孤

① 譯者案：原詞題爲《蝶戀花·答李淑一》。

② 童林（音譯，Tung Lin）：《毛主席革命的一家》，出版日期和出版者不詳。這份紅衛兵出版物很可能來自北京，大約是 1966 年和 1967 年，第 9–10 頁。

身一人。這可能是由於當時是那些孩子出生的時候，因此楊開慧就不得不留在家中照看他們。事實似乎更可能是這樣，在從1921年到楊開慧遇害的1930年的這段時期中，毛澤東和楊開慧獃在一起的時間，只有兩年多一點兒。常見的歷史資料都暗示我們，當毛澤東爲了黨的工作而日益頻繁地奔波于各個積極活動的中心地區時，他並無妻子做伴。1921年夏天，就在剛剛參加完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成立大會以後不久，毛澤東即返回原來的工作崗位，擔任中國共產黨湖南支部的書記。毛澤東號召他的兩個兄弟，幫助他發動、組織安源煤礦公司的工人。他的所有時間都用在工作上面。和他一起工作的，有剛從法國回來的李立三以及從蘇俄回來的劉少奇。在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這兩個人都將成爲著名人物。後來，毛澤東和他們的關係都相繼破裂了。到1923年4月，毛澤東不得不離開湖南，以免被捕。他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尋求某種安全感。當時，楊開慧正懷着他們的第二個兒子，因而沒跟毛澤東在一塊兒。在上海，毛澤東接替張國燾（這是他以後與之關係破裂的另一個同志），繼任中國共産黨組織部部長。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有所提高。他成爲黨的中央委員會的一個成員，同時，負責某些行政性事務工作。儘管如此，毛澤東在上海獃得並不愉快①。和他一起共事的那些中央委員會委員們，或者受到較好的教育，或者有過出國留洋的經歷。而且，毛澤東並不喜歡擔負行政性工作的責任、職務。於是，接近1924年年底的時候，毛澤東托稱自己身體不好，回到了湖南老家。

他離開自己的妻子已經有將近一年半的時間。但是，毛澤東離開上海的時間眞不湊巧。他因此而錯過了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重新返回到他在黨內最喜愛的工作，即直接組織、指導農民。儘管如此，毛澤東仍然對自己的政治角色感到失望。1925年1月，毛澤東回到上海。他不再繼續在政治局任職。在毛澤東一生中的這段時間，他不再強烈地捲入到一些事務中，從而能夠更多地接近妻子。正

① Edward C. Rice, Mao' s W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 30.

如毛澤東自己所說，這是一段“休息的時期”。但四個月以後，毛澤東的生活再一次變得忙碌起來。他與妻子只在一起獃到 1925 年 4 月底那個時候，毛澤東再一次離開家，在湖南進行廣泛的農村調查。他的活動再次引起了當局的注意。於是，到 7 月份，他就不得不再次逃亡。但這一次卻是去廣東。在那里，毛澤東的工作是事實上的國民黨宣傳部門的部長。他還是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所長。農民運動講習所的目的，是致力于培養農村幹部，訓練他們的政治技能與軍事技能。毛澤東被任命爲國民黨宣傳部秘書；後來，成爲該部的代理部長。儘管是一個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但由於在國民黨組織內的地位提陞，毛澤東就彌補了自己的政治機遇。當時，共產黨人正在和國民黨人進行名爲“統一戰線”的合作。

1925 年 12 月，毛澤東回到上海。顯然，他的目的是動員人們，反抗他的家鄉湖南省的統治者。但是，也是爲了鞏固、加強他與中國共產黨的聯繫紐帶。儘管從 2 月到 3 月，毛澤東短暫地返回廣東，但 3 月份後，他就回到上海並領導共產黨的農民部。此後，毛澤東一直獃在上海，直到 1926 年 8 月。8 月以後，他回到湖南。毛澤東沒有住在家里。恰恰相反，就像當年學生時代時那樣，他在鄉下漫遊，考察農村的狀況。1927 年 1 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925 年 7 月，毛澤東離開湖南，南下廣東。此後，他是否再次見過楊開慧？有關這個問題，仍然有一些不確定因素。根據紅衛兵的材料，他們確實見過面。那是 1926 年，毛澤東從上海回到湖南以後。而且，楊開慧確實在 1926 年生了他們的第三個兒子——毛岸龍。儘管如此，有關毛澤東那段時期生活的大部分敘述都強調，當時他是多么的忙碌。1926 年和 1927 年間，毛澤東在鄉間發動農民，並且擔任全國農民協會總干事。他還領導了損失慘重的秋收起義。最後，在 1927 年十月，把軍隊帶進了井岡山，並建立了一個山區游擊根據地。甚至在深深地捲入共產黨的革命鬥爭生活並與政府當局發生激烈的政治衝突時，毛澤東仍然相信，老家是一個安全的避難所。那里充滿和平與安全感，他可以把自己的家庭留在那里。毛澤東也認識到公共事

務和革命成功需要一定的陰謀詭計，使用暴力，對敵人應該堅決予以殘酷無情的反對。儘管如此，毛澤東仍然相信，在自己童年生活過的那個小山村，和平、寧靜會佔上風。甚至當他不得不逃離湖南的時候，毛澤東仍然覺得，沒有必要帶着妻子和孩子跟自己一塊兒走。毛澤東相信，自己是絕對不會受到任何傷害的。這一感覺，使毛澤東忽視了對他的家庭來說的任何可能的威脅。在他的宣傳中，毛澤東把湖南當局的統治者描繪成一個邪惡的人。儘管如此，毛澤東顯然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傷害敵人的妻子與兒女。在某些方面，毛澤東對妻子兒女的那種責任感，與他對待兄弟姐妹們類似。他拒絕傳統中國有關責任的一些習慣性看法。本來，自己的活動可能會把妻子兒女和兄弟姐妹置于危險的境地。但對這個事實，毛澤東似乎無動于衷。當他們最終確實因他而受到傷害時，毛澤東把這視爲他自己命運的一個證明。

結婚以前，年輕的毛澤東實行嚴厲的禁欲主義。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結婚以後的毛澤東，對女人和性活動變得更有興趣。愛德華·萊斯注意到，毫無疑問，毛澤東確實愛楊開慧。儘管如此，萊斯寫到："但是，我們不應該就此假定，毛澤東對指楊開慧的愛導致他過一種一夫一妻制的生活。或者說，對他來說，共產主義是一種使他能夠把自己的性冲動進行升華的宗教。"①隨着黨的工作越來越採取軍事活動的形式，似乎有這樣一個日益增強的趨勢，即男女之間的親密接觸會導致性關係。一個前軍官告訴我們，毛澤東如何對處于他指揮下的女孩兒表示出極大的興趣，還對這些女孩進行過暗示性的含蓄評論。毛澤東還詢問了這個軍官和那些女孩兒的關係。這個軍官試圖向毛澤東解釋，他們都很忙，男女之間不會產生愛的感覺。然後，毛澤東就此評論到，當然，這個軍官還比較年輕。但是，毛澤東繼續說到，自己年紀已經足夠大；因而，女性的美麗總會在自己身上引發"有關性欲方面的感覺"②。然後，毛澤東發出了一個神秘的微笑。共

---

① Edward C. Rice, Mao' s W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 68.

② Edward C. Rice, Mao' s W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 66.

產主義行爲規範強調，在現代中國年輕人的文化中，男女之間的理想關係應該是純潔的。儘管如此，當被迫與他們的妻子分離的時候，許多成年不久的同志確實會擁有一些“革命的甜心”。

因而，一點也不奇怪，就在楊開慧遇難前兩年，毛澤東已開始與另一個女孩兒同床共枕。那個女孩兒後來成了毛澤東的第二個妻子。

在繼續探討毛澤東的第二次婚姻和他作爲父親角色的那些故事之前，最好總結一下有關他與楊開慧的第一次婚姻的某些事實性問題。

> 直到二十七歲或者二十八歲的時候，毛澤東還未與一個女人有過任何眞正的浪漫關係。
>
> 毛澤東與女人的最初交往，需要對某些政治活動進行一定的合法化。他娶了一個從社會身份方面看，遠遠比自己地位高的女孩兒（楊開慧不但來自于一個殷實、富裕和有良好教養的家庭，而且在她父親去世的時候，還得到了一筆豐厚的遺產）。
>
> 對毛澤東來說，當所有事情一切順利的時候，他卻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離開了他的妻子。但是，當他精神沮喪的時候，他確實回到了妻子的身邊。
>
> 毛澤東的妻子很漂亮，有人緣，比較受歡迎。而且，據稱她與毛澤東的母親長得很像。
>
> 對妻子和兒子的安全問題，毛澤東冒着很大的風險。最終，就毛澤東對他們的行爲而言，存在着某種拋棄感。

第二個妻子：賀子珍

1927年，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命運走到這樣一個關節點上：共產黨領導人相信，不久以後，國家權力將爲他們所掌握。尤其是廣東國民政府遷到長江邊上的武漢以後，他們的想法更是如此。但是，隨着與國民黨合作關係的破裂以及蔣介石的背叛，所有的夢想突然之間都

破滅了。共産黨人控制的軍隊試圖發動更進一步的運動，這就是秋收起義。但即便這次努力，最後也失敗了。按照中國共産黨的安排，毛澤東負責領導湖南和江西的大規模起義的一部分。他立即通知黨中央，自己將不遵循他們的政治路線。毛澤東的革命方式是，沒收和重新分配土地，不再打着國民黨的旗幟，向大衆宣傳建立工農兵蘇維埃的必要性。所有這些，都和共産國際的政策相反。共産國際要求，努力維持與國民黨的合作，不要用各種革命口號和決議嚇退任何穩健的因素。毛澤東的選擇還以一種非常奇怪的方式，違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他主要依靠的是軍事力量，而不是集中于動員農民。之所以説這很奇怪，是因爲毛澤東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投身于組織農民，而非軍事事務的。

毛澤東沒有服從黨中央的命令。而且，他的行動失敗了。這時候，毛澤東在黨内受到了譴責，還被撤銷了所有黨内職務，包括中央委員會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帶着剩餘的、大約一千人的武裝力量，毛澤東在一個山區根據地落下脚跟。那里是湖南和江西兩省的交界地帶，靠近井岡山。

這次失敗令毛澤東很沮喪。他努力重建武裝力量。正在此時，毛澤東遇到一個讀高中的女孩兒。女孩兒的父親在鄰近的市鎮開了一個書店，出售一些激進的出版物。她就是賀子珍，時爲當地由毛澤東幫助組織的共産主義青年團的支部書記。他們的相遇，是在 1928 年 6 月。當時，毛澤東的一個警衛員曾經在場。他後來這樣告訴龔楚當時的情况。

> “主席召集永新地區共産黨和共青團員開會，討論有關黨的發展和蘇維埃運動的拓展問題。這個女同志作了大部分發言，也有許多想法。晚上 11 點左右，會議結束了。毛主席請賀同誌留下來，再歎幾分鐘。毛主席説，他有一些重要的問題要和賀子珍談談。那天晚上，毛主席和賀同志單獨在一起聊了很久。第二天，賀同志又來了。她整天幫着毛主席作一些工作。那天晚上，賀同志沒有回家。次日

> 早晨九點，他們起床了。洗漱之後，毛主席高興地告訴我們：‘賀同志和我戀愛了。現在，我們已經由同志式的愛，變成了丈夫和妻子的愛。這是我們共同生活的起點。”①

毛澤東與賀子珍開始發展戀愛關係時，是相當迅捷和開放的。這使他最初接近兩個女人的方式之差異變得充滿戲劇性色彩。在追求楊開慧的時候，毛澤東還是非常謹慎的。他嘗試着小心翼翼地進行。毛澤東敬畏楊開慧的父親，他希望能夠證明自己在楊昌濟眼中的價值。但是，在尋求把握現代潮流的時候，毛澤東又表現出一定的競爭性，試圖成爲一個較楊昌濟爲佳的優越者。直到他能夠從經濟上供養楊開慧，或者在作爲一個職業革命家的人生旅程中，取得合理的成功之前，毛澤東不願意求婚。儘管毛澤東對楊開慧的追求與他政治活動的節奏相吻合，但是，只要他的公共生活涉及到楊開慧，他就會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間作一個明確的區分。以這種或者那種方式，毛澤東與楊開慧的關係受到他與楊開慧父親的關係的深刻影響。或者是由於對楊昌濟的積極感情，毛澤東感覺到對楊的女兒負有一種責任和義務；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責任和義務並不足以確保她的安全。或者是由於覺得有必要羞辱一下不但在社會地位上，而且在智識方面也更加值得尊敬的楊昌濟教授，毛澤東先是向他的女兒求婚，隨後又拋棄了她。

與此相對，跟賀子珍的關係卻很直接。她的作用在于對毛澤東的工作具有功能性的意義。毛澤東把賀子珍看作是與自己的職業工作直接相關的。他可以和這個女人一塊兒分享某些革命工作問題。但是，這個女人也是一個沒有明確身份（名分）的人。她的工作和關注完全都是毛澤東的工作和關注。毛澤東在江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默了六年，以便尋求自己的政治與軍事機會。在這六年中，賀子珍總是在他身邊，與他形影不離。客觀形勢也不需要他再像當年與楊開慧那樣，

---

① 龔楚：《我與紅軍》，香港：南風出版公司，1954年版，第144頁（譯者案：引文系據英文轉譯）。

進行長期的分離。

在江西革命根據地，許多同志都認爲賀子珍是毛澤東唯一的妻子。因爲，黨內幾乎沒有幾個人知道楊開慧的存在。毛澤東與賀子珍開始一起生活的時候，他三十五歲，是一個革命領導人。而賀子珍只有十八歲。儘管如此，她仍然是一個獨立自主的革命者。賀子珍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毛澤東身上，一直跟他呆在一起。同時，賀子珍也把自己的見識和觀點投射到毛澤東不斷鞏固的地位之中。實際上，對毛澤東來説，賀子珍完全就是一個無私的革命伴侶。而這種革命伴侶，正是1960年代的紅衛兵小報資料宣稱的、楊開慧當年扮演的角色。後來，毛澤東與賀子珍離異了。因而，宣揚個人崇拜的宣稱機構不但完全忽視了賀子珍的存在，而且還把賀子珍當年與毛澤東高度政治化的、且極富幫助性的工作方式，轉移到楊開慧的頭上去。

隨着毛澤東逐步成爲江西蘇維埃的一個革命領導人，賀子珍對他給予了大量支持。儘管如此，當她開始爲毛澤東生育孩子的時候，賀子珍就不再是一個激進的政治活動家。很大程度上，她成了一個傳統的妻子[1]。龔楚告訴我們，長征開始以前不久曾經見過賀子珍，當時她手里抱着一個嬰兒。就此，龔楚評論到，賀子珍“已經不再是一個

① 有關賀子珍爲毛澤東生育的孩子的確切數字，毛澤東的傳記作者們的看法是含糊不清的；彼此之間的説法，也是相互矛盾的。中國官方的資料幾乎沒有什么幫助。因爲，在毛澤東與賀子珍離婚以後，賀子珍基本上就成了一個不存在的人。那些注意到賀子珍爲毛澤東生過孩子的傳記作者們都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除了最後一個，所有的孩子都被送走，讓老鄉領養了。這或者是發生在江西革命根據地，或者是在長征途中。在1968年修訂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中，Snow聲稱，在江西的時候，毛澤東和賀子珍有兩個女兒。她們被送給“紅槍會農民”照顧，後來再也沒有找到。在陝北，賀子珍還生了第三個女兒（p. 468)。另一方面，Nym Wales告訴我們，朱德的妻子曾經對她説過，延安的那個孩子是毛澤東的第五個孩子（Yenan Notebooks, Madison, Conn.: By the author, Mungertown road, 1961, p. 48)。由於無法判斷朱德的妻子是否知道楊開慧爲毛澤東所生的兩個或者三個孩子，因而，許多學者假定，她可能的意思是賀子珍生過五個孩子。能夠肯定的是，在江西留下了兩個或者三個女兒；長征開始以後，又生了一個或者兩個。爲了本文的敘述目的，我假設有五個女兒。因爲，這是好幾個重要的毛澤東傳記作者們所使用的數字。在任何意義上，無論賀子珍爲毛澤東生過的女兒的確切數字究竟是多少，它都不會影響我們有關毛澤東的心理學解釋。

理想主義的、充滿活力的女孩，而是變成了一個安靜的家庭主婦”①。頭兩個女兒還在襁褓之中時，就被送到當地的農民家庭中，讓他們撫養。因爲，她們出生時，賀子珍正忙着幫助毛澤東作一些工作。她太忙了，沒有時間照顧孩子。第三個孩子也被送了人。因爲人們覺得，長征途中根本沒法帶着她。很自然的，即使長征開始時已經懷孕了，賀子珍也應該是跟隨將近十萬男人一起長征的那三十五個女人之一。與毛澤東結婚的時候，賀子珍曾經拍過一張照片。根據這張照片，愛德華·萊斯這樣描述，她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女孩。但是，有着某種小巧的美。她的外表暗示我們，她是在較好的、有教養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②。長征過程中，賀子珍受了重傷，有十八到二十片彈片留在她的身體中③。根據另外一張照片，到長征結束的時候，賀子珍已經變成了“一個衣衫襤褸，瘦弱的幾乎撐不住肥大衣服的女人”④。他們的第四個女兒是在長征途中生的，很快就被送給一戶農民家庭。最後，在賀子珍到達延安後不久，她就生了第五個女兒。從此以後，她的健康狀況就從來沒有恢復過。她也永遠失去了美麗的面貌。毛澤東開始對其他女人產生興趣。1937年，江青成了他的第三個妻子。賀子珍被送到莫斯科，“爲了她所謂的神經紊亂（精神错亂），接受長期治療”⑤。有一種説法認爲，共産黨人掌握政權以後，賀子珍被送回北京，並被安置在一個安靜的處所。她的地位很普通，沒有任何特別之處。還有一種説法，認爲賀子珍一直獃在蘇聯，從未回國。

有證據表明，長征過程中，毛澤東和賀子珍就已經分開了。毛澤

① 龔楚：《我與紅軍》，第396頁（譯者案：引文系據英文轉譯）。

② Edward C. Rice, Mao' s W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 66.

③ Robert Payne, Mao Tse-tung: Ruler of Red China,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0, p. 143.

④ Edward C Rice, Mao' s W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102.

⑤ Edward C Rice, Mao' s W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102.

東有一個警衛員，名叫陳昌奉。他描述過整個長征過程中，他與毛澤東的日常接觸。在他的描述中，從未在任何地方提到過賀子珍的出現。這個警衛員聲稱，是他爲毛澤東做飯和洗衣服；而且，毛澤東經常工作到深夜，是一個只與筆墨書本打交道的孤獨的人①。

毛澤東與賀子珍的婚姻破裂，具有辛辣的諷刺意義。這也是延安時代某些流言蜚語的起源。黨的其他領導人意見幾乎完全一致。大家都反對毛澤東的離婚。有許多資料指出，在衆多領導人之中，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婚姻情况持容忍態度。人們認爲，正是由於這種充滿同情的支持，毛澤東和周恩來才會建立起一種親密的關係。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康生，時爲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正是通過他的介紹，江青才入了黨。

有關賀子珍被拋棄以後的痛苦情形，可以在張國燾的夫人楊子烈的一段敘述中找到某些證據。在楊子烈最近的回憶錄中，她提及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辦公室遇見賀子珍的情形。那個時候，正是1937年九月，也就是賀子珍去莫斯科之前不久。當時，楊子烈與張國燾已經有將近十年沒有見面了，她正準備去延安和張國燾重新相聚。

楊子烈回憶到：

> "一個女同志正躺在床上。看見我進來之後，她立即站起來。她身材瘦削，神情疲憊，面色蒼白。她中等個兒，看起來很虛弱，也很害羞。穎超（周恩來的妻子）把她介紹給我：'這是賀子珍同志，毛主席的愛人……'
>
> 第二天早晨，我與賀子珍一塊兒起床。然後，我們就聊起來。
>
> '你爲什么獃在這兒，不回延安去？'
>
> '我身體太差，希望去莫斯科治療一下。'
>
> '既然目前這段時間，你還無法動身，你也不必獃在這兒。讓我們一起去延安吧。'

---

① 陳昌奉：《跟隨毛主席長征》，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8頁。

‘我不想回延安。澤東對我不好。我們又吵又鬧。他抄起了一條長板凳，我則拿起了一把椅子。唉！我們的關係，結束了。’

過了一段時間，劉中嫻（音譯 Liu Chung-hsien）偷偷告訴我：‘藍蘋把她自己打扮得非常妖艷。老毛就深深地被她吸引住了。子珍很妒忌。結果，他們就經常吵架。”①

埃德加·斯諾的前妻尼姆·威爾斯當時正在延安。根據威爾斯的說法，賀子珍指責“延安的明星女演員吳光薇（也叫吳麗麗），認爲她‘離間了自己與丈夫的感情’”②。威爾斯告訴我們，延安時期發生在史沫特萊窰洞里的一件事。當時，吳麗麗說自己喝了太多的酒。她坐在毛澤東旁邊，握着毛澤東的手。這樣看來，似乎暗示了二人之間的某種程度的親密關係。而這，與黨的領導人的道德標準是不一致的。後來，在賀子珍的堅決要求下，吳麗麗，還有史沫特萊被迫離開延安。用威爾斯的話來說，“1937 年，毛澤東四十四歲，正是他一生中的黃金時期。他是特別喜歡女人的那樣一種人，但是，他喜歡的女人從來都不是普通人。他喜歡一種有女人味的女人，她能夠給毛澤東一種家的感覺（在這方面，賀子珍做得很好）。他欣賞美貌、聰明和智慧。他也欣賞那種不但能夠忠實于自己，還尊奉自己觀點的女人”③。

周鯨文一度曾是“民盟”的一個高級領導人。1959 年，他離開中國。根據他的說法：

---

① 楊子烈：《張國燾夫人回憶錄》，香港：子烈出版社，1970 年版，第 333-334 頁（譯者案：此系據英文轉譯）。

② Helen Foster Snow （Nym Wales），Chinese Communist: Sketches and Autobiographies of the Old Guard,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ublishing Co., 1972, p. 250.

③ Helen Foster Snow （Nym Wales），Chinese Communist: Sketches and Autobiographies of the Old Guard,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ublishing Co., 1972, p. 251.

“毛澤東自己可能就爲其他人設立了可以追尋的榜樣，即娶一些非無產階級背景的女孩。他結過四次婚。據認爲，他一直在反對包辦婚姻。他的第四個妻子是藍蘋。當毛澤東在延安第一次見到藍蘋的時候，他就被她迷住了。因而，毛澤東會經常在午夜提着一個小燈籠，去拜訪黨的一些領導人。他説：‘没有藍蘋，我就無法繼續進行革命。’”①

毛澤東用自己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最終如願以償。他告訴黨的其他領導人，他的新愛人懷孕了。黨中央沒有其他選擇，只好接受毛澤東與賀子珍離婚，認可他與江青的新婚姻。正像過去經常發生的那樣，這一次，同事們再次被迫向毛澤東的意志屈服。因爲，毛澤東表現了這樣一種意願，即把問題帶到超越于他們的解決能力之外。根據有些資料的説法，當時曾召開了一個特别會議。在會上，經過直率的對話，他們達成了一項協定。同事們同意，毛澤東可以如其所願，與賀子珍離婚，並把她送往莫斯科。但是，毛澤東不能讓江青擔任任何公共職務，更不能允許江青插手黨内事務。1949 年以後，隨着新中國的建立，人們決定：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將在公共場合扮演共產主義運動高級領導的女主人，或者説第一夫人的公共角色。在 1960 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中，這一切都變得公開化了。江青爲自己被強制歸隱、遠離公共事務而深感痛苦。她更爲憤怒和不滿的，是王光美。因爲，在中國高級領導幹部的夫人中，王光美出盡了風頭，獨自壟斷了第一夫人的光輝。

① Chow Ching-wen, Ten Years of Storm: The True Story of Communist Regime in China,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p. 184.

第三個妻子：江青

毫無疑問，在毛澤東的生活中，沒有一個女人比江青更聰明，更久經世故和更富有野心。她來自于山東省。出生在一個藍姓的非常貧窮的農民家庭。在她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這眞是一個悲劇。母親把她帶回自己的娘家。於是，江青就改姓外公的姓，即李姓。有關李雲鶴在十多歲時是怎樣離開家的，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但大家一致同意，她很早就進入了戲院，藝名叫藍蘋。後來，進了山東省立（濟南）實驗劇院，並引起一個指導老師的注意。緊接着的故事，幾乎和毛澤東當年的情形一模一樣。那個老師離開了這所學校，應聘一個大學的職務。然後，這個老師安排她跟着自己，並爲她在該大學的圖書館找到一份工作。與毛澤東當年一樣，也是一個圖書館管理員[①]。後來，藍蘋又有過幾次婚戀經歷。她最終去了上海。在那里，藍蘋曾經在好幾部電影中演過一些小角色。1934 年底，或者 1935 年初，藍蘋與一個名叫唐納的演員結婚。據說，隨着藍蘋在演藝界越來越出名，唐納變得很沮喪；有一次，甚至企圖自殺[②]。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戰火燒到上海時，藍蘋先是逃到漢口，後來又去了重慶、西安，最後來到延安。在延安，藍蘋把自己的名字改作江青。江青是一個很有野心的人。她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在這次競爭中，還有另一個女演員，即吳麗麗；以及其他幾個著名的女性知識分子。根據李昂的叙述，毛澤東頭髮很長，不修邊幅；對一些女演員和知識分子來說，毛澤東是一個有着強烈吸引人的人——在這些知識分子中，就包括像丁玲這樣的女作家[③]。

---

① Edward C. Rice, Mao' s W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 103.

② Edward C. Rice, Mao' s W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 104.

③ 李昂：《紅色舞臺》，重慶：勝利公司出版社，1942 年版，第 75 頁。

通常認爲，江青爲毛澤東生了兩個女兒。第一個女兒童年時代的名字叫李訥。一些人認爲，這是江青被領養以後的姓和她第一任丈夫的名字之混和。但是現在，這個女兒的名字卻是肖力。第二個女兒的乳名叫毛毛。但上學以後的名字，則是李敏[①]。

按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同事們的協議，在近三十年中，毛澤東與江青的關係始終保持在高度私人化的層次上。從官方的、正式的角度而言，他們無視毛澤東的婚姻狀況。在公共場合，江青從來不與毛澤東一起出現。當其他領導人的妻子聚會時，她也不出席。然後，在文化大革命威武雄壯的歷史活劇中，江青變成了一個中心人物。不但在意識形態領域如此，就是在政治鬥爭中亦然。

這樣一來，儘管江青與毛澤東的婚姻曾經一直完全是一個私人問題，就像當年他與楊開慧的關係一樣，但是，這次婚姻很快將要變成一種政治安排。而且，這個安排的重要意義，遠比當年毛澤東與黨的另一個工作者——賀子珍的合作，更爲重大。這里面，存在着一個奇怪的悖論。毛澤東的第一次婚姻符合傳統農民的包辦婚姻模式，但是他拒絕了這次婚姻。儘管如此，毛澤東的最後一次婚姻最終仍然被弄成傳統中國統治者的那種婚姻原型。換言之，由於男性統治者的配偶的強烈野心和她的充滿妒忌性色彩的爭寵行爲，她就從王冠後面操縱了不恰當的權力，從而引起了嚴重的危機狀態。顯然，在江青一直隱忍不顯的那些年中，她必定對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形成了一種刻骨銘心的仇恨。王光美漂亮、迷人，受過良好的教育，在公共場合，扮演中國第一夫人的角色。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惡毒地指責王光美。她宣

① Roxane Witke 告訴我，江青曾經對她説，她跟毛澤東只有一個女兒。另一個女兒是賀子珍帶着一塊兒去莫斯科的。根據這種説法，當賀子珍不能繼續照顧自己的女兒時，是江青養大了賀子珍與毛澤東的最後一個女兒。如果眞是這樣，那就使江青與毛澤東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一個重要的傳記作者 Jerome Chen 認爲，毛澤東有兩個女兒是由江青生的。曾經當過毛澤東貼身警衛的翟作軍也持同樣看法。而 Donald Klein 和 Anne Clark 則聲稱："江青爲毛澤東生了兩個女兒。1957 年的時候，兩個人都在國內。根據她們以前的一個同學的説法，1959 年的時候，其中一個還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三年級的學生。也正是那一年，她離開了學校"（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p. 678)。

稱："劉少奇在延安的時候就反對我。他實際上是把矛頭對着毛主席的。"[①]這樣一來，最終，江青就顛倒了公共目的和私人動機之間的關係。她暗示，並不是她與黨的領導人的私人恩怨影響了公共事務。恰恰相反，是由於他們在政治上反對毛主席，才迫使她採取了某些有辱身份的舉動。江青狂熱地追求公共角色。毛澤東準備充分合作，給予他妻子的政治權力以某種基礎。此時，毛澤東認識到，他與江青的關係已經基本上變成一種政治性的關係。

儘管如此，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並且從那以後變得更加明顯——毛澤東的行爲都表明：對於妻子，他並不是一個毫無限制的政治支持者。在文化大革命後期的政治生活中，特別是在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林彪覆滅以後，毛澤東較多地支持老同事周恩來的政策。有好幾次，毛澤東都直接反對江青的政策和政治利益。

大量證據表明，晚年毛澤東與江青的關係並不是親密的夥伴關係。相反，在私人層次上，他事實上已經拋棄了江青，不再把他當作自己的妻子。最近這些年中，他們兩個人從未在公開場合一起出現過。他們似乎也未住在一起。可以得到的他們之間的有關通信表明，毛澤東感到，有必要指導江青。其方式正和他指導一個相當低級的官員的行爲時一樣。文化大革命中的 1967 年 4 月 12 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江青作過一次講話。這次講話中，江青用來描述她和毛澤東的關係時所用的詞彙，看起來幾乎一點也不像夫妻之間的那種詞彙。

> "主席對我是嚴格的，主席對於我首先是嚴師。當然，他不象有些人把着手那樣教，但是對我非常嚴格。許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爲人，我想同志們也許比我知道的更多一點。我們在一塊生活，他這個人是很寡言的，話

---

①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Hong Kong: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No. 4181, May 20, 1968, p.10) . 轉引自 Edward Rice, Mao' s W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108。

不多。有時候談起來，多數都是談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國內，海闊天空。”①

就毛澤東本人而言，他對江青在政治上的崛起，保持了非常明顯的沉默。但是，他也沒有特別支持江青的利益。確實，毛澤東與江青的政治敵人合作。他幾乎很少提及江青。其中一次，是在黨內會議上。當時，大家不同意江青的看法。毛澤東説，你們“可以把江青拿掉”；但是，自己將重新上山，再拉起一支新的紅軍，然後重新武裝奪取政權。這一套陳述是一種直接的威脅。但這也暗示我們，應該想起這樣一種事實：在提及退往根據地、上山打游擊時，毛澤東用以表達有關拋棄江青問題時説話的口吻，可以就像當年對賀子珍所作的那樣。

作爲父親的毛澤東

毛澤東與第三個妻子的關係，與他處理他跟其他同志們的關係，其方式是一樣的。在探討毛澤東作爲公共人物的時候，我們還會討論這個問題。此處我們不會再進一步深入追究毛澤東與江青關係的細節。現在比較恰當的作法是，轉向另一個問題，亦即毛澤東作爲一個父親的行爲。如前所述，毛澤東對待女人的方式，揭示出許多東西；它確認了我們有關他與母親關係之特性的假設。類似的，他作爲一個父親的行爲舉止，也有助于澄清毛澤東與他父親的關係的眞實特徵。把所有這些關係綜合起來，可以告訴我們很多有關毛澤東個性特徵中的情感展現。

和毛澤東生活在一起的幾個女人爲他生了七到九個孩子。其中，楊開慧生了兩個，也可能是三個兒子。賀子珍生了三個或者五個女兒，其中的兩個或者四個被送給農戶領養，還有一個和她母親一塊兒

① 江青：《爲人民立新功》，1967 年 4 月 12 日。

去了莫斯科。江青則可能生了兩個女兒，但是並不確定。

有關毛澤東的孩子的數目，缺乏確切的信息。這一點部分地反映了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某種風格，即不重視所有高級幹部的子女的重要性。這種行爲習慣肇源于俄羅斯的共産黨人，但是在中國遠比俄羅斯爲烈。一定程度上，這也恰恰是由於毛澤東自己希望事情是那樣。在好幾個場合，他並不是把自己孩子的不幸經歷當作悲劇。相反，毛澤東把這一切描述成爲他提供了某種權利，即要求其他人也要像他那樣，爲了革命而不惜犧牲自己的子女。

1930年，楊開慧被害。此後，悲劇性的事件就降臨到他僅有的幾個兒子的命運中。那時候，老大毛岸英只有八歲或者九歲，而老二毛岸青只比毛岸英小一歲多點兒。如果確實有一個名叫毛岸龍的三兒子，那么，他也只有四歲。如果説他的存在是完全出于紅衛兵的想象，那么，也似乎不太可能。不管這個最小的男孩是否存在，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隨着楊開慧被抓，這個男孩就不但在他的家庭中，而且在歷史上也完全失踪了。通常認爲，不管後來是誰照顧了他，那個人都決定，永遠保持這個領養的秘密。

有關這兩個較大一點男孩的經歷，也有着極大的不確定性。根據其中的一種説法，毛岸英與毛岸青和他們的母親一起被關進監獄。但是經過一個親戚的安排，他們被釋放出來，並被送往上海黨中央所在地[①]。根據紅衛兵的一份出版物，是黨組織想盡一切辦法把他們二人解救出來的[②]。孩子們被帶到上海。但是，或者是由於當時黨中央的有關領導人不喜歡毛澤東，或者是由於“當時黨的地下組織遭到了破壞”[③]，孩子們被丢在大街上，儘可能靠乞討謀生。住在小衖衕和門洞里，靠“揀拾垃圾”，他們兩個歷盡千辛萬苦。這一段時間，差不多將近七年。

---

①《毛主席革命的一家》，第一稿，載《霜晨月》（一份紅衛兵出版物），第1號，1968年1月10日。

②《毛主席的革命實踐活動》。這是一份紅衛兵的宣傳小册子，出版地、出版日期均不詳，但明顯出現在1966年的《學習材料》上。

③《毛主席的革命實踐活動》。

一個名叫童林（音譯，Tung Lin）的紅衛兵提供了這個故事的另一個版本。他聲稱，楊開慧遇難以後，三個男孩和他們的姥姥住在一起。後來，通過黨的地下工作者，毛澤東送了一封信，讓岳母把孩子們送到上海去。在一個名叫李崇德的舅舅①的護衛之下，三個男孩踏上了上海之旅②。他們被帶到一個小酒店。實際上，那里是黨的一個地下聯絡處。可能是感到毛澤東對自己的孩子明顯漠不關心，童林宣稱："儘管毛主席很忙"，他還是在一天早晨來看望了一下三個孩子，並請他的弟弟毛澤民代爲照顧他們。但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爲，在楊開慧遇難以後的那段時期，毛澤東根本就不在上海。他的弟弟也不在那里。相反，他們二人都在江西，和日益壯大的紅軍ںں在一塊兒。儘管如此，童林敘述的其餘部分，卻是可信的。它講述了幾個孩子是如何"失散的"。根據這種說法，最大的一個曾經在短期內被帶到一家去作"傭人"。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他們能夠通過賣報紙來掙點兒錢，從而結束街頭頑童的日子爲止。在這段時期，他們用的也是假名字。毛岸英叫楊永福，而毛岸青的名字則是楊永壽。**他們用的是母親結婚以前的姓。**

隨着蔣介石被抓的西安事變的發生，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第二次統一戰線。上海地方當局幫助找到了幾個孩子，並由黨組織把他們送到延安。他們到達延安的時候，毛澤東正準備和賀子珍離婚，而與江青結婚。毛澤東立刻把他們分別安置在幾個老鄉家中。然後，在賀子珍要離開延安、奔赴莫斯科的時候，其中的兩個男孩也被送往莫斯科，接受教育。當然，也是爲了安全起見。因爲，抗日戰爭已經開始了。

在蘇聯，兄弟倆被安排到一所位于伊萬諾夫的特殊學校。這個學校是由共產國際經督的，負責收養那些革命烈士以及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人的孩子。這些孩子經常是孤兒。那個時候，老大取了一個謝爾蓋（Sergei）的俄文名。而老二則叫尼古拉（Nikolai），綽號

① 譯者案：實際上，李崇德是孩子們的舅母，即楊開慧的兄弟、孩子們的舅舅楊開智的夫人。

② 童林：《毛主席革命的一家》，第 17 頁。

爲柯利亞（Kolai）。謝爾蓋曾經和陶利亞蒂（Luigi Longo）的兒子一起住過一個房間。後來，陶利亞蒂成了意大利共産黨的領袖①。毛澤東的兩個兒子的俄文都非常棒。但是，後來這卻成了一件很令人尷尬的事。兩個孩子顯然都不會説漢語，更不用説用漢語進行寫作了。因此，他們被送到另一個學校。在那里，蘇聯人接受漢語訓練。因而，在蘇聯有關中國的專家中，佔相當比例的一部分人都認識這兩個男孩。根據他們的記憶，謝爾蓋是一個謙虛、可愛的男孩。他有點兒被寵壞了，從來沒有提及過他的父親。尼古拉情緒冲動，在一段有限的時期中，會對各種事物都表示出強烈的興趣。他的行爲舉止有些奇怪。後來，尼古拉逐漸患上了嚴重的精神問題。1958年，在一次黨內會議上，毛澤東説，他的二兒子“瘋了”②。我們不清楚他的精神問題究竟是怎樣的。我們也不知道，這些精神問題是否源于他出生的時候，抑或是由於他與母親的分離而造成的震驚，還是因爲作爲一個街頭頑童，常年在街頭閒逛而導致的不安全感。一個蘇聯學者聲稱，他聽説這個病是精神分裂症。另一個蘇聯教授則告訴我們，有一次尼古拉曾這樣解釋自己的精神問題：在母親被害後，他被從一家送到另一家。其間，他曾經被騙到一個西方傳教士家。那個傳教士用一根木棒打了他的頭。這就是導致他精神問題的原因。而中國官方現在的説法是，在那些流浪的日子里，毛岸青被一群“小流氓”打了，從而變得精神不正常。

不管怎樣，兩個男孩都留在了學校。尼古拉沉迷于下棋。謝爾蓋則發展了一些友誼關係。他還和一個俄羅斯金髮女郎相愛了。他甚至爲一些哲學問題而着迷。後來，這些問題在亞歷山大洛甫（G. Alexandrov）教授1947年的那本名叫《西歐哲學史》的書中被提出來。兩個孩子顯然得到蘇聯政府的特別照顧。但那時的同學卻没有一個人知道，他們究竟是誰。

---

① Stuart R. Schram: Mao Tse-tung, London: Penguin, 1966, p. 265.

② 《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7月23日（譯者案：參見李鋭《廬山會議實録》，增訂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我們不清楚，兩個男孩什么時候返回中國。毛澤東與這兩個孩子的關係一直很冷淡、很疏遠。埃德加·斯諾曾經聽説過一些謠言。以此爲基礎，他問毛澤東，據稱他較小的兒子被培養成一個機械工程師，這個説法是否是眞的。毛澤東的回答逃避了這個問題。他説，他也不知道“他們（指蘇聯）”究竟教過他什么[1]。尼古拉的一些蘇聯同學告訴我們，1949年以後，他們曾經在哈爾濱見過他。在那里，他仍然保持着一種俄羅斯式的生活方式。根據中國人的説法，在毛澤東掌握政權以後，這個較小的兒子仍然住在鄉下。最終，成了某個公社的“會計”[2]。這與蘇聯的另一種説法並不相互衝突。蘇聯人認爲，1950年尼古拉被送到蘇聯去接受治療，並在醫院接受一段時期的療養。後來尼古拉的生活情形究竟任何？我們並不清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作爲父親的毛澤東從未把他帶回自己的家庭。

日本投降以後，大兒子在延安見到了父親。父親以這樣一番話來歡迎他：“你在蘇聯大學畢業了，但學到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只是知識的一半，這是不完全的。你還需要上另一個大學，去學另一半知識。這個大學中國過去沒有，外國也沒有，它就叫‘勞動大學’”。[3]然後，毛澤東直接把兒子送到一個農民家中去住。儘管如此，1948年的時候，毛岸英返回滿洲（即中國東北），並成爲一名俄語翻譯。第二年，一個蘇聯代表團來華北訪問。毛岸英一直陪着這個代表團，與他以前的一個蘇聯同學一起擔任翻譯工作。有個中國官員當着俄國人的面，問他：“你還沒有學過漢語嗎？”隨後，他被派往北京。在他繼續做俄語翻譯的時候，毛岸英與父親確實有過一些接觸。然後，毛澤東把毛岸英派往朝鮮，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獃在一起。1950年10月25日，毛岸英抵達朝鮮。恰好一個月以後，他犧牲了。一種説法認爲，那是發生在一次美軍的空襲中；另一種説法則指出，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p. 486.

② Han Suyin, The Morning Delug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2, p. 86.

③ 童林：《毛主席革命的一家》，第8頁（譯者案：此處引文據《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

他死于一次飛機失事的事故。不管怎樣，“打仗總是要死人的。沒有犧牲就沒有勝利。中國人民志願軍已經獻出了那么多指戰員的生命，他們的犧牲是光榮的。岸英是一個普通戰士，不要因爲是我的兒子，就當成一件大事。人心都是肉長的，不管是誰，疼愛兒子的心都是一樣。如果我不派我的兒子去，而別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樣，自己有兒子也不派他去上戰場，先派別人的兒子去上前線打仗，這還算是什么領導人呢？不必爲我難過。這種事是完全無法預料的。”①

有關毛澤東對他與賀子珍生的女兒的拋棄情況，我們已經提供了一些概略的線索。可能的情形是，自從她們出生以後，他從未見過這些女兒中的任何一個。沒有證據表明，毛澤東曾經對初爲人父的經歷表現出任何特別的興奮。他也沒有對拋棄這些女兒表現出極度的心里不安。當毛澤東談到他自己的家庭爲革命作出的犧牲時，他僅僅停留于那些被敵人殺害的親人。毛澤東從未提及爲自己遺棄、以後再也未見過的那些孩子。

我們不可能知道，毛澤東和賀子珍是否相信他們自己的行爲，是完全遵循一種“革命倫理”（revolutionary ethic）。換言之，他們是否基于這樣一種革命倫理，而在前四個女兒剛一出生的時候，就把她們分別送給當地老鄉，並視之爲某種爲了一項更加偉大的事業，而作出的巨大的個人犧牲。我們也不知道，他們這樣做是否僅僅出于傳統中國的文化模式。因爲傳統中國，允許對女嬰做這樣的處理。當然，一個可能的驗證就是，如果生的是一個男孩的話，他們會怎么作。對一個生長于就像賀子珍當年生長過的那樣的社會環境中的女孩來說，即便她已經成爲一個忠誠的革命者，她可能仍然保持某些傳統的情感。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她可能覺得，自己受到了詛咒，只能生女兒。她還在一定程度上覺得，丈夫有權利再娶一個女人，以便可能爲丈夫生

① 童林：《毛主席革命的一家》，第21-22頁（譯者案：此處引文系據有關資料整理而成。楊尚昆曾在1952年1月2日的日記中相對較爲簡潔、準確地反映了當時的情境：“長嘆了一聲之後，他說：犧牲的成千上萬，無法只顧及此一人。事已過去，不必說了。精神偉大，而實際的打擊則不小！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有下鄉休息之意”。參見《楊尚昆日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一些兒子。

儘管如此，在毛澤東這個例子中，沒有證據表明，子女的性別曾經在最細微的層次上影響過他的感情。實際上，與那些已知的女兒相比，毛澤東與兒子們的距離更遠。當然，這些女兒是由江青爲他生的。一方面，毛澤東不斷把兒子送到農民家庭中，和農民生活在一起；他也從未把那個精神上、或者情緒上“不正常”的兒子帶回家。另一方面，毛澤東又讓肖力和李敏住在古老的紫禁城內，離他住的那個孤獨的院落很近。她們都在北京大學上學①，但是又住在家里。有一種猜測，認爲較大的一個女兒嫁給了姚文元。而姚文元，是毛時代後期主要的幾個政治競爭對手之一；也是由江青領導的、更加激進的一個派系的支持者。埃德加·斯諾告訴我們，1965年的時候，他在北京遇見毛澤東。當時，“兩三個年輕的女孩兒在屋里進進出出。他她們的衣着很簡單、很樸素。有時，她們就站在後面，好像一些戰士。她們會是毛澤東的女兒嗎？當毛澤東站起來時，其中一個女孩兒攙扶着他的胳膊”②。

代際的循環

總結毛澤東作爲丈夫和父親的角色，我們發現：他的行爲模式爲我們有關他童年時代的假設，提供了很有說服力的支持。他對待幾個妻子的方式，強化了這樣一種觀點：毛澤東對自己的母親，充滿了深刻的矛盾心理。當他覺得，女人能夠滿足他的自戀心理的時候，他就需要女人。但是，他又很猶豫。因爲，他擔心，女人最終可能會拋棄她。隨着時間的發展，毛澤東逐漸克服了最初的猶豫。儘管如此，他從未克服對終極依賴感的恐懼。因而，在任何情況下，毛澤東都準備拋棄女人。

---

① Klein and Clark,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op. cit.

② Edgar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p. 222.

而毛澤東與子女的關係則爲我們有關他與父親關係的基本特性的假設提供了證據。從根本上說，毛澤東似乎並不想要任何兒子。因爲他自己深知，一個父親可能多么容易地就會受到傷害。毛澤東採取了行動。因而，沒有一個兒子可以像他當年對待父親那樣去行事。

如果毛澤東的童年經歷確實具有這樣一種特性，以至於使他覺得，父親實在是不懂得如何體諒別人，而且自私、貪婪，極度嚴厲、過于苛刻，那么，我們就可以合理地設想：當輪到毛澤東自已也成爲一個父親時，他就應該努力做一個富有同情心、能夠體諒别人的人，慷慨、大方，對他的兒子們非常和藹。但事實上恰恰相反。毛澤東儘可能避免作爲父母應該承擔的責任。他以政治活動爲自己的態度做合理性辯護。當其他人公開讚揚毛澤東拒絕袒護自己的直系親屬時，他本來可能具有的任何負罪感就必定得到了緩解。這也是由於，既然毛澤東願意犧牲他自己的親人們的幸福，那么，當他要求别人也付出類似的犧牲時，其他人會把毛澤東的這種要求視爲合理的。

偶爾的，毛澤東也會爲自己忽視子女的行爲做辯護。他所持的理由就是，父母對自己的子女應該寬容，而不應該尋求對他們的生活做毫無約束的控制。有一次，江青曾經對黨的許多高級幹部表示：不應採取“我是領導”的封建態度，並用這種方式來進行統治；在這方面，應該向毛主席學習。江青告訴這些幹部，我們家里是非常民主的，孩子們甚至可以反駁父親。有時眞希望和她們辯論；當然，辯論之後還得説理。但是，她們經常不跟我們辯論，實際上她們很尊重父母。江青繼而評論到：讓我們辯論吧，這有好處；讓他們造反吧，那有什么問題。畢竟，如果孩子們只會説“是的，爸爸”、“是的，媽媽”，那對他們有什么好處？[①]

這種容忍的姿態，與毛澤東力圖避免陷入父親角色的深刻慾望是一致的。確實，這非常可能。因爲默許的容忍經常會與偶爾的爆炸性憤怒結合在一起。這種憤怒是有關子女們缺乏個性的。這種情形在毛澤東身上經常發生。譬如，我們知道毛澤東與他的侄子、毛澤民的兒

① 參見《中共研究》（台北），1970年7月號，第114–130頁。

子毛遠新的一次談話。最初，毛澤東取笑毛遠新。因爲，儘管毛遠新歆在軍隊里，他卻從未練過射擊。那天天氣很冷，他們一直在游泳。在從水中走出來的時候，毛遠新感受到刺骨的寒風。他說："還是水里比較舒服些"。主席瞪了他一眼說："你就是喜歡舒服，怕艱苦。你就知道爲自己着想，考慮的都是自己的問題。你父親在敵人目前堅毅不屈，絲毫不動搖，就是因爲他爲多數人服務。要是你，還不雙膝跪下，企求饒命了。我們家很多人都是被國民黨和美帝國主義殺死的。你是吃蜜糖長大的，從來不知道什么叫苦，你將來不當右派，當個中間派，我就滿足了。你沒有吃過苦嗎，你怎么能當左派呢?"①

如此一來，寬容就變成了一種方法，即讓其他人暴露他們的弱點，以便可以較輕易地批評他們。這是毛澤東爲了從政治上和公衆角度保護自己，經常使用的一種策略。1958年，在一次黨的會議上，毛澤東說："蛇不讓它出來怎么能捉它？我們要叫那些王八蛋出來唱戲，在報紙上放屁，長長他們的志氣。"②

這樣看來，理解毛澤東歷史角色的一個關鍵就是，儘管毛澤東拒絕承擔做自己子女的父親的角色，但是，他卻試圖扮演一場革命的父親的角色。毛澤東基本上拒絕培育自己的子女，或者說使之社會化的責任。但是，他卻比其他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更加熱衷于扮演中國年輕人的父親的角色。儘管如此，最終毛澤東還是拋棄了那些組織成紅衛兵的中國青年。因爲，作爲"革命的兒女"，毛澤東認爲他們還是比較幼稚和不太合格的。

一個男人在如何對待自己的子女時，可能會有麻煩；儘管如此，他仍然試圖尋求，在培養子女的問題方面會成爲一個權威——這種情形，並不少見。但重要的是，在毛澤東這個例子中，他的矛盾心理恰好處于兩極之間。一方面是寬容，每個人必須允許年輕人發現他們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是對更大苦難的苛求。生活已經被安排得太容易了，父母應該對子女做更多的要求。

---

① 毛澤東：《與侄子毛遠新的談話》，1964年夏季。
② 毛澤東：《在漢口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4月6日。

這樣一來，毛澤東對革命未來的看法就深深地染上了他有關作爲一個父親的矛盾心理的那種色彩。他擔心，當自己從中國政治舞臺上消失時，中國革命的未來會是怎樣的？對青年教育，毛澤東也抱有一些搖擺不定的情感。他一直在考慮，中國的年輕一代應該得到怎樣的教育，以及更爲一般性的對待？毛澤東迷戀于教育政策。他相信，應該把孩子們送到鄉間去勞動，就像父親當年對他要求的那樣。這樣看來，毛澤東的看法似乎與他對父親的情感有關；與此同時，又通過他對待子女的方式，這些看法得到了強化。在描述自己與父親的鬥爭時，毛澤東能夠表現出很高興的樣子。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勝利所具有的心理特性。因爲他知道，父親是虛弱的。反過來，毛澤東必定從這種經歷中，獲得了有關父親角色的一種較爲低微的自尊感。因此，打那以後他就會希望：避免扮演一個負責任的父親的角色。但與此同時，毛澤東又用一般化的言辭，把父親角色應該承擔的責任理想化。只不過，這個父親所擔負的責任，卻是整整一代人的社會化工作。

經過前面的考察，現在已經到了合適的時候，讓我們把本書的分析從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轉向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

第三部分
作为公共人物的毛泽东

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

——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

第九章　政治創造性：技能問題

正是毛澤東的性格特徵，才使他能夠比其他人更加成功，並能夠把一百年來中國革命的各種分散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從而締造了中國人民共和國。對毛澤東這種性格特徵的確切重要性，我們無法加以準確評估。儘管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是一個勿庸置疑的偉大創造者。此前，我們已經考察過毛澤東私人生活的某些特性。事實證明，在一定意義上正是毛澤東私人生活中的這些性格特徵，爲他在中國政治的大環境中扮演公共人物的角色並施展其政治創造性，準備了潛在的條件。

毛澤東之所以具有創造性，個中秘密在于他擁有一種令人嘆爲觀止的能力。具體來說，毛澤東能夠把兩種完全不同的能力結合在一起。這兩種能力分別就是運用言辭的能力和運籌權力的能力。在大多數文化中，一個既能說會道、又善於做事的人都是非常少見的。而在現代中國，尤其如此。

毛澤東不但結合了這兩種技能，而且在這兩方面，他都很精通。就語言修辭和思想觀念這一領域而言，毛澤東不但是一個意識形態理論家，還是一個演說家。他的演說風格不但具有那種鼓動者式的煽動力，還體現出發言人式的某些特徵。此外，毛澤東也是一個熱衷于提出、創造與使用口號的能手。作爲一個審慎的行動者，他還是一個軍事戰略家與政治戰略家。有關智識觀念史研究的著名學者——譬如本杰明·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斯圖爾特·施拉姆和魏斐德（Frederick Wakeman）等——已經在毛澤東的作品中，發現了他的思想與東西方的偉大思想家們的關聯。對那些不太熟悉智識觀念史的神

秘結構的人們來説，毛澤東著作中的内容很可能不會給他們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儘管如此，所有讀過毛澤東的作品的人都承認，這些著作具有相當的歷史意義。它們不但是歷史環境和重大事件的客觀分析，還是一些可以激發熱情的陳述。類似的，在政治行動和實踐領域中，一些人把毛澤東理想化爲一個極富創造性的天才。這不但表現在軍事上的運籌帷幄，還表現在政治上的審愼周密。當然，視毛澤東爲一個戰略家，有些人對此持更加謹愼的看法。但即便是他們，也不得不承認毛澤東非同尋常的個人能力。

從歷史上看，無論何時，只要一個偉大的領導人展示出這種創造性才能的結合——譬如杰斐遜、列寧和邱吉爾——人們就傾向于通過某種程度的懷疑主義來調解對他們的看法。這不過是由於人們認爲，一個人既精通言辭、又善於行動，似乎有些超乎尋常，不太合理。正因如此，我們很容易理解這樣一些現象。譬如，一個像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那樣有着語言天才的人，在完成和實現他的政治行動目標方面會有某些麻煩。而一個像羅斯福那樣的人，儘管也有一副比較好的、激動人心的嗓音，但在人們的記憶中，他只是一個善於行動的政治家，而非基于他的言辭特色。

這個問題，可以從心理學角度得到充足理由並加以解釋。那些精于運用語言的人們，傾向于尋求某種私人特質。這種私人特質或者是在紙上信筆塗鴉，或者是站在一個安全的講臺上，發表演説。這樣的人可能會夢想改變整個世界。不過，他們還要冒着可能遭到誤解的風險。弗洛伊德曾經向我們證明了一些作家逃避殘酷現實和痛苦境遇的方式。按照他的看法，這種方式就是緊緊依靠某種基于嬰幼兒時期的“思想全能”幻象（omnipotence of thought）。所謂“思想全能”的幻象，即依賴于言辭的神奇魔力；而它的根源，則在于嬰兒時期的奇異經歷：在那個時候，嬰兒僅僅通過發出哭喊和聲音，就可以操縱他周圍的整個環境。在這種幻象的産生機制和有關自戀感的心理動力之間，存在着某種緊密的聯繫。這種緊密關聯有助于解釋，爲什么一些人通過把自己完全“投入”到他們的言辭活動中，可以發現極大的滿足感；以及爲什么作者會對批評，甚至僅僅對編輯工作，表示出極度

的敏感。

在某些程度上，依賴于言辭的政治家與專欄記者很類似。就像列奧·羅斯登（Leo Rosten）描述的那樣：

> "那些把人們引向新聞出版界的力量，包括……自我暴露和作出某些驚世駭俗的舉動的慾望；在'新聞界的責任'的託詞保護之下，將個人有關非正義問題的敵意以及感情投射到公共人物身上去的機會；'採取行動'的內在驅動力，以及有關接受、認可行動後果的內在焦慮感。最後，特別重要的一點是，某種附着于新聞出版工作的、可以不受傷害的感覺……作爲某些事件的旁觀者，而非參與者，新聞記者可以體驗由某些重大事件帶來的興奮和刺激，並由此獲得某種間接的愉悅感，而他本人卻不必冒着承擔這些行動性事件的後果的風險。"①

相反，偏于行動的人則必須更加直接地面對各種力量的衝突，並承擔某些責任。確實，這樣的人可能更加直接地經歷、體驗歷史事件的戲劇性發展過程，以及其中的英雄史詩式的行爲。但是，他們也冒着完全遭到忽略和遺忘的風險。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末流寫作者，也對永恆與不朽有一種更加現實的渴求。因爲言辭具有如許的魔力，爲了保護幾乎所有的印刷出版物，人們必須做出巨大的努力。甚至毛澤東言辭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些話，也比他大多數具體行動的故事得到較好的保存。

毛澤東的成功，相當程度上在于他能夠把主導其私人生活的那種矛盾心理拓展到公共生活中。毛澤東身上的"猴氣"，使他希望運用言辭的可靠魔力來刺激人們，乃至驚世駭俗，令人震驚。他還希圖藉助于言辭來鼓動甚至戲弄人們的情感。而"虎氣"，則使他對有關權

① Leo. C.Rosten, The Washington Corresponden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7, pp243-244。轉引自 A. F. Davies, Politics as Work, Melbourne politics monograph, Melbourne Politics Department, 1973, p. 30。

力運作的現實情形和人們敬畏權威的情感來源，表現得非常敏感。

在毛澤東的整個公共生活中，他總是搖擺不定：一會兒是一個講求言辭的人，一會兒又是一個注重行動的人。當他作爲政治戰略家的角色遇到麻煩時，毛澤東會突然變成一個語言大師，並藉此改變自己的命運。這就像大躍進運動失敗以後，他在權力逐漸讓位于劉少奇和鄧小平時所做的那樣。當時，毛澤東的反應就是發表了廬山講話。但當他作爲一個意識形態理論家的角色明顯失去號召力時，毛澤東又會突然改變自己的角色，再度成爲一個戰略家。如此，他就能擺脫所有那些有關其思想的神奇魔力的虛幻假象。譬如，面對文化大革命後期的那種情形，毛澤東採取了行動：他邀請尼克松總統訪華，從而爲世界秩序打開一個嶄新的局面。

値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的大部分詩詞都寫于他政治命運很低落的時候。譬如，1929年和1930年，那時他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又如延安時期——當然，在那里毛澤東也完成了他的大部分理論作品；還有1956年和1969年，當時他正處于從公共政治舞臺上淡出的時候。

以一種相當奇特的方式，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所具有的各種基本的矛盾心理，一起爲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所面對的、外部環境強加于他的各種假象，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統一性”。所有的政治領導人都難免有一種冒名頂替、弄虛作假的需要和嫌疑。因爲，在私人個性和公共角色之間，從來不會存在一種完美的協調。儘管如此，就毛澤東而言，他改變自己公共立場的需要，卻不可避免地與他私人個性中“眞實的”一面協調起來。因爲，毛澤東的眞正自我總是包含“猴氣”與“虎氣”的矛盾與衝突。

通過常規的歷史考察，我們很容易證明，藉助于在演說家和戰略家角色之間的搖擺，毛澤東如何捍衛和推進了他對公共政治事業的追求。儘管如此，還有一個更加困難，但也更加重要的問題需要認識。當時，中國人民正處于一個重要的、集體行動的歷史時刻。在這個歷史時刻，中國人民的最高需求就是某種全新的理念。而這種理念，乃是基于一些經過精緻闡述的思想觀念和切實有效的政治行動。換言之，這是一個全新的言辭和全新的行動的時代。認爲中國革命的特質

在于某種雙重的追求，這樣的理解並不是不合理。這種雙重的追求就是：第一，改變傳統中國的儒教文明；第二，尋求某種全新的行動體系，以便管理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中國人民渴望某種可以恢復中華文明在世界舞臺上的恰當地位的全新觀念和行動體系。但是，在這里詳細追溯這種渴望並不合適①。恰恰相反，本章的目的是：考察在爲中國人民提供全新的思想言辭和行動體系方面，毛澤東的表現是何等精擅與熟練。通過由毛澤東提供的這一套思想言辭和行動體系，就可以動員中國人民，並爲他們參與民族國家的生活提供一種全新的情感基礎。

這種解釋的需求給我們的理解強加了某種歪曲的成分。因爲，它要把實際上本來應該是緊密相連的事情，以分別隔離的形式來對待。我們認爲，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學會如何運用語言和觀念，部分是由於他發現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按照自己的力量而採取行動，以便贏得權威的結果。儘管如此，前述的考察策略卻要求我們：先從他如何變成一個有創造能力的意識形態理論家開始，然後轉向他如何轉變成一個戰略家。

意識形態：言辭的魔力

一個基本上是由文盲、不識字的人組成的社會，它的激情竟然能夠爲言辭所打動，並接受某種神秘的意識形態的指導——表面看來，毛澤東的這些認識和發現有些令人難以理解。自從俄國十月革命以來，在所有社會中——特別是在殖民地和落後國家——都有一些信奉馬列主義的熱誠學生。他們精心研讀馬列主義的一些經典性的教義文本，以便尋求通往權力的眞理性道路。但在所有這些胸懷壯志的人們中，只有毛澤東一個人才眞正取得了成功，並成爲一個有關革命意識

① 該任務在這樣一些作品中，得到了精彩解答。譬如，Joseph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Mary C. White,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New York: Atheneum, 1966。

形態的卓越理論家。

毛澤東的奇迹，部分在于中國人民的性格。許久以來，儘管基本上沒有接受過什么文化教育，但是，中國人民仍然對言辭文字的偉大力量和政治信念的重要意義，保持着極度的敏感。從歷史上看，對中國人來説，實行“文治”（ruled by literati）是最自然不過的權威形式。因而，所有的中國人從孩童時代就接受了這種一種觀念。他們相信，社會群體中的佼佼者是那些在文辭方面比其他人更優秀的人。就此而言，中國文化和歐洲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因爲西方文明也非常珍視聖經等文本的神聖性和語言文字的力量。西方人也認爲，應該尊敬那些可以精明地辨析法律言辭的人，而不管這種法是神聖法，還是世俗法。同樣，在中國文明中，精英人物的象徵性標誌就是精通言辭。兩千多年以來，中國人一直生活在對一個人的思想的敬畏之中。這個人就是孔子。

確實，毛澤東最具革命性的行動就是他向人們暗示：即便沒有得到偉大傳統的確認，一個人的某些思想也可能是神聖的。但請注意這一點，毛澤東的這種無畏行動也失去了其宣稱的革命性。因爲，他最終選擇的意識形態也體現出與傳統的一致性，即統治者應該是言辭的專家。毛澤東自己並不是不清楚他的困境。他熱情地讚揚實踐經驗的優點，激烈地批評“一切唯書主義”的書獃子式的罪惡。而更加深刻的矛盾，則在于毛澤東對書本知識和正規學習之間關係的看法。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這是毛澤東身上那種頑皮的“猴氣”的一部分；而且，這種“猴氣”還將被帶入意識形態領域。

作爲政治領袖，毛澤東最具象徵意義的事實是：一方面，他是馬克思主義正統理論的毫不妥協的支持者；但另一方面，他也是一個革新者。他創造了一些新的教義準則。這些教義準則可以被恰當地稱爲“毛主義”。毛澤東始終堅持，人們需要有正確的思想。他要求所有的中國人，利用大量的時間來討論他的思想，從而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水平。儘管如此，如果適當的調整在政治上可以證明是有益的，那么，毛澤東自己也隨時願意立即拋棄某些不合時宜的準則，而贊同一些實用主義的調整。

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與有關意識形態的問題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因而，我們很容易理解，他的名字爲什么總會處于各種爭議和衝突性解釋的中心。毛澤東領導的革命力量剛剛在北京奪取政權，那些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西方學者們就開始了爭論。他們在爭辯，由於强調農民的作用，毛澤東究竟應該是馬克思主義的眞正信徒，還是一個異端人物[①]。後來，圍繞着毛澤東卷帙浩繁的各種文獻中，有關戰爭問題、農民關係、知識分子、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等思想觀念的特性，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當然，在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也是他一生中與其他人最宏大的衝突中，意識形態問題顯得非常重要。

我們的目的，既不是評估毛澤東的意識形態，也不是追溯其智識觀念的發展。一些認眞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已經指出，毛澤東的理論寫作中存在着某些不連續、不穩定的斷裂性現象。他們暗示，他的理論作品並沒有揭示出他在哲學修養方面的正常發展；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作品可能是有人代筆的[②]。斯圖爾特·施拉姆是一個重要的毛澤東傳記作者。他向我們揭示了，在毛澤東的作品中存在着對一些不太重要的俄羅斯理論家們的著作的剽竊行爲和抄襲現象[③]。值得注意的是，在1960年代北京與莫斯科之間的意識形態論戰中，毛澤東本人在怎樣的程度上捲入了中方的反應，特別是回應文章的編撰和寫作，也存在一些問題。最後，自從毛澤東掌握國家權力以後，他對理論問題就表現出相對的沉默；與此相關，還有另外一件充滿神秘性的事情：爲什么迄今爲止尚未出版毛澤東的"全集"？當然，我們的關注點不在這些問題，而在別處。我們注意的問題是，從心理學的維度來考察毛澤東對文字言辭和思想觀念的運用。我們的分析方法是，首先

① See Carl A. Willfogel, The Legend of Marxism, China Quarterly, NO. 1, 1960, pp. 72-86; Benjamin Schwartz: The Legend of The 'Legend of Maoism',

就毛澤東對思想觀念的運用問題，作一番初步的考察；然後，根據毛澤東政治生活中不同階段具體情形的變化，追溯他對思想觀念的運用是如何逐步調整和修正的。

情感鼓動家：製造敵對關係

就像在精擅言辭的人和注重行動的人之間存在着差異一樣，在那些運用言辭的人們中間也存在一定的區別；這種區別端賴于他們是著作家，抑或演説家。而毛澤東似乎再次超越了那些本來可以把其他人區分開來的差異。因爲，他不但是一個著作家，還是一個演説家。演説家通常尋求他們自戀需求的直接、當下的滿足感。爲了控制聽衆們的情感，獲得他們迅捷的反饋，演説家會致力于追求某種風格，有時甚至不惜以喪失規則和嚴謹性爲代價。而在另一方面，寫作則要求更多的嚴謹性，更多的結構因素，以及能夠激發人們心理能量的更加持久的噴發。作家追求的自戀，是一種在時空方面有所延宕的滿足感。

在毛澤東的整個革命生涯中，他傾向于消弭著作家和演説家之間的區分（distinctions between writer and orator）。早年時期的毛澤東，確實在筆端凝聚激情。他能夠寫出一些充滿活力、結構嚴謹的作品。儘管如此，在相當程度上，毛澤東的許多“作品”最初只是一些發言和演講。實際上，這些作品後來都經過他人的改寫和編輯。毛澤東的一些有關軍事戰略、哲學問題、文化問題、階級鬥爭，以及有關中國在歷史發展中的位置等非常重要的作品，實際上都是口頭演説的杰作。

有關改變這些作品的形式，以便使之能夠更加符合書面交流的通常習慣，對這個具體編輯過程，我們幾乎一無所知。儘管如此，我們確實知道有關毛澤東作爲演説家的表達風格的一些問題。因而，我們也很清楚，在他最初的演説原稿和後來的編輯文本之間，必定存在怎樣的差距。根據我們獲得的、有關毛澤東本人演説情況的某些一手資料，我們知道，他並不是一個生動、活潑、充滿激情的演説家。恰恰

相反，毛澤東的演說之所以能夠取得戲劇性的效果，那是由於他似乎對那些因自己的言辭而激起的情感無動于衷。從那些未經編撰的演說文本中，我們也知道，毛澤東的講話可能總會跑題，前後不連貫，甚至拖沓冗長。儘管如此，最重要的是，他在言辭運用上可能很粗魯、野蠻，樸實無華，有時候甚至有些下流。通過大量生動的常用語，毛澤東豐富了中國的政治語彙。他把敵人稱爲“害人蟲”、“牛鬼蛇神”、“毒草”。有關一個人無能爲力的某些幽默用語，貫穿了他的各種比喻。譬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脚”、“蚍蜉撼大樹”，以及“被窩里捉跳蚤”。

顯然，在這些言辭的背後，毛澤東的眞正目的在于令人們震驚，激發聽衆們的感情。在這個基本的意義上，他是一個煽動家。儘管如此，毛澤東的演說風格與哈羅德·拉斯韋爾所描述的典型煽動家並不一致。根據拉斯韋爾的說法，煽動家會“把他自己的私人憤怒外在化”，並且充滿了“極度焦慮”①。但是，毛澤東的演說目標卻與拉斯韋爾描述的煽動家那一類型的人物一致。因爲，毛澤東也試圖努力激化聽衆們的感情。他講述聽衆們面臨的問題，而對合理的解決方法卻避而不談。他也沒有分散、釋放聽衆們的焦慮感或痛苦感。通常來說，毛澤東的演說始終有某種連貫一致的特性。譬如，他的目的在于使聽衆們感覺到，現在或者過去的情况是多么的糟糕。除非聽衆們可能把他視爲麻煩的根源，毛澤東通常很少會告訴聽衆，他們應該努力忘記自己遭遇的不幸命運。作爲一個演說家，毛澤東的關鍵手法是，通過把聽衆們受到極度壓抑的情感融入到可以容忍的公開宣泄渠道之中，他就努力把聽衆們經歷的那種原本屬於私人性質的痛苦合法化了。正是毛澤東，才給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提供了這樣一種公共集會的實踐習慣。在那里，人們不但可以傾訴他們的不幸命運，還可以“訴苦”。

毛澤東的演說風格是，在扮演那個驚世駭俗、令人害怕、能夠激發人們的情緒，但是又很聰明的“猴子”角色時，他盡力接近聽衆們

---

① Harold D. Lasswell;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New York: Viking, 1930.

的情感；但與此同時，他本人卻不被自己的演說激起的情緒所感染，他無動于衷，幾乎有些冷漠。毛澤東是一個優秀的演說家。用 A·F·戴維斯（A．F. Davies）的話來説，他預先就能夠知道"聽衆們情感的大致情況"①。作爲一個理論家，他能夠時刻對自己的情緒保持警惕。因而，他只是不得不"用自己的嘴來說出其他人的情感"②。

作爲一個演説家，毛澤東並不尋求表現出英雄人物或者堂皇、偉大的姿態。他也不是一個在進行道德説教的牧師。相反，作爲一個政治鼓動家，毛澤東對自己的使命有一種非同尋常的感覺。作爲其拓展，他對自己的國家也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在發言時，毛澤東總會表現出他是一個負有特殊使命的角色。我們已經注意到，兄弟姐妹們的犧牲是如何使毛澤東在他的個人意識中，確認了自己的特殊性。毛澤東的行爲方式在一定意義上似乎表明，他需要證明：即便母親不能繼續幫助他，使他成爲一個特殊的人，歷史也會幫助他實現這一點。

究竟什么是作爲演説家的毛澤東感覺到的、能夠控制他的聽衆——尤其是"中國"這個聽衆的情感的那種痛苦？相對而言，這個答案很簡單。沒有多少中國人生活在美國政客們所謂的"麵包與奶油的生活水平"（bread and butter level）以上。這些貧困的中國人對美好的生活充滿了激情的渴望，這種渴求幾近貪婪與奢望。儘管如此，中國人需要把他們被壓抑的情感合法化。而這，只有通過把整個國家描繪成一個遭到不道德的剝削的受害人，才能實現。

與其他大多數可能領導中國的潛在領導人相比，毛澤東處于一個更加有利的位置。他可以成爲中國民衆那種受到傷害的情緒的代言人。毛澤東來自一個比較富裕的農村家庭。但即便如此，那也不是一個有着持久的、穩定的經濟基礎的家庭。恰恰相反，那是一個剛剛擺脱困境、仍然處于上昇狀態的新富之家。更有甚者，作爲一個來自中國內陸的政治家，毛澤東深知與來自沿海大城市的那些中國人相處

① Davies, Politics As Work, p. 66.
② Davies, Politics As Work, p. 158.

時，自己所面臨的那種屈辱感、羞愧感①。在楊昌濟教授的幫助之下，毛澤東開始在人生之途上有所進步，並準備融入北京的知識分子圈子。自那時起，他就成了一個典型的中國邊緣人。毛澤東可以代中國農村立言。因爲，儘管並不處于農村社會的最低層，他也感受到社會歧視帶來的極度痛苦。儘管如此，爲了使自己的訴苦和抱怨變得合法一些，他不得不把問題稍爲變換一下，轉向中國的民族立場這一更加宏大的問題。

毛澤東成功地扮演了中國反對所有外國列強的民族主義代言人的角色（spokesman of Chinese nationalism）。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由於毛澤東很久以前就發現：作爲一個大膽的挑戰者，反抗那個通常被認爲是強權的象徵和權威的人物，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作爲一個來自農村的男孩，毛澤東認識到，挑戰父親——他所熟悉的最嚴厲的權威，並沒有什么太大的危險。

這就再次把我們帶回毛澤東與他父親的衝突，以及有關書本知識的問題。在論及這兩個問題的時候，毛澤東的說法非常精確："我熟讀經書，但是，我不歡喜那些東西……我成功地實現了繼續讀書。我如飢似渴地閱讀任何可以找到的書，但是，不包括經書。這就惹怒了我的父親。他本來希望我能夠精通、熟練掌握經書……"②毛澤東進一步觀察到："當我十三歲時，我爲自己找到了一種有力的理由和父親辯論。我引經據典，站在父親自己的立場上和他辯論（以便證明我自己的觀點）。"③在毛澤東的這些言辭中，有幾個非常有趣的問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澤東離開家、脫離父親的直接控制以後，

① 根據自己的個人經驗（譯者案：白魯恂 1921 年出生於中國山西），筆者體會到：中國內陸與沿海之間存在着深刻的鴻溝，且這種區分遠比鄉村與城市之間的區分爲烈。而後者是在所有社會中都存在的一種社會學分類。因而，對中國來說，沒有什么特殊性。作爲一個出生於內陸的人，我可以證明這些問題。因爲我後來在北京上學，故而曾經生活在北京社會中。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 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3。

③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 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32。

他顯然喜愛引用古典經書和傳統中國的略帶學術性色彩的歷史書籍。據統計，在《毛澤東選集》中，引用孔子等中國傳統經典的話要比引用馬克思的話多四倍以上①。其次，毛澤東堅持引經據典，運用這些名言，僅僅是爲了他父親的緣故。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爲了挑戰一個辯論中的對手。再次，在毛澤東作爲公共人物的整個生活中，他一直較爲欣賞並認爲是行之有效的論辯策略是，使用對手錶達過的一些價值觀念，以便使他們感到尷尬，乃至擊敗他們。

在與父親發生衝突時，毛澤東一般來説都會獲勝。由此，他在較小的時候就很老練地認識到一個非常精明的看法。毛澤東發現，在敵對關係中，通過採取恰當的引用，或者説名言警句的形式，某些思想觀念可以用于策略性的目的。採納某些在一種社會情境中是正常的言辭和觀念，而把它們運用于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社會情境——這種策略性的看法通常是智識觀念發展以後的産物。但對大多數人來説，這一點是難以企及的。確實，在傳統社會中，智慧的寶庫通常被認爲是有限的、確定的，也是已知的。因而，比較常見的現象就是，引用各種格言、名言、警句，以及某些神聖性文本中的段落，以便應用于所有的社會情境中。就此而言，毛澤東對言辭的運用，體現出某些傳統的特性。確實，這種特性總是能夠使他很容易就與中國的農民聽衆們，進行有效的交流和溝通。儘管如此，當他尋求的是一種敵對關係，而非和諧與共識關係的時候，毛澤東就改變了這種傳統的方式，並轉向

①《毛澤東選集》中，有關提及和引用中國傳統經典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百分比情況如下：

儒家和新儒家作品 22%
道家和墨家作品 12
民間傳説、純粹俚語 13
其他中外作家，未分類 7
馬克思、恩格斯 4
列寧 18
斯大林 24
總計 100%

資料來源：Vsevolod Holubnychy, Mao Tse-tung' s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China Quarters, Vol. 19, 1964. 7–9, p. 16。

某種非常不合傳統特性的運用。

後來，毛澤東就上學了。他繼續運用書本中的一些觀念和詞句，來處理他與老師和同學們的衝突性關係。我們應該還記得，就在毛澤東成功地説服東山小學的校長，使之接受他入學之後不久，他捲入了另一場尖銳的爭論。這次爭論發生在毛澤東與老師們之間，主題是有關那個充滿浪漫性色彩的歷史古籍《三國演義》的歷史眞實性①。不久以後，毛澤東到了長沙。在那里，他捲入了強行剪掉其他十多個同學的辮子的事件中。這次，他不得不和一個來自法政學校的學生辯論，維護他們剪辮子行動的恰當性。那個學生試圖引用“中國傳統經典，以便支持他的論點”。但是，毛澤東以政治問題爲基礎，提出了一個反對理論，“徹底使他啞口無言”②。

在毛澤東的整個一生中，運用某些言辭和觀點，以便使他人“啞口無言”，是他的政治風格的一個重要特徵。儘管在有些時候，他確實以言辭爲武器，傷害了他人的自尊。但是，更爲常見的情形是，他爲言辭賦予了一種幾乎是內在的、固有的力量。這種力量的意義在于，毛澤東相信：只要一個人能夠以正確的言辭來與他人爭辯，那么，其餘的每個人都會陷于無能爲力的境地。爲了尋找正確合理的言辭組合與安排順序，以便徹底駁倒對手，毛澤東會不斷變換他的立場，從一個觀點轉向另一個觀點。毛澤東總是運用對手的價值觀念來反駁他們。他這樣做時體現出的那種輕鬆自如和精巧技能，爲以上的分析提供了較好的注脚。

但這並不意味着，毛澤東對思想觀念問題沒有興趣；或者他沒有從概念性的探索中，得到滿足。早年的時候，毛澤東曾經迷戀于充滿浪漫色彩的歷史故事。他還有一種冲動，試圖閱讀身邊任何可以獲得的東西。毫無疑問，這種情形自然證明了毛澤東有一種積極的、富于想象力的意識，以及一種好奇感。儘管如此，他的閱讀也是一個非常私人化的問題（a very private matter）。那是他借以逃避他人的一種方

---

① Siao 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1959, p. 24.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p. 140.

式，一種遠離社會關係的各種要求的方式。毛澤東告訴我們，爲了讀書，他曾經在白天的時候，躲在田野里的一個小山包後面；而在深夜，他則遮住他住的房間的窗子。在學校的時候，“當老師從身邊走過”，他會“用一本中國經典古書”來遮住通俗小説①。

青少年時期的毛澤東，仍然堅持把利用書本作爲一種維護個人隱私、達致個人修養的方法（using books a means to privacy）。儘管如此，我們在這個階段開始發現一些衝突性的現象和矛盾心理。在他中年以後，直到老年，這些衝突和矛盾心理將會變得更加明顯。第一個矛盾就是，毛澤東對待書本的方式。他曾經把閱讀作爲一種逃避的方式。但是現在，卻對書面文字那種影響現實、指導生活的力量，形成一種強烈的信仰。而且，這一信仰是與前述那種有關把閱讀作爲一種逃避方式的看法結合在一起的。我們應該還記得，在長沙的時候，儘管曾經離開過學校，但毛澤東仍然經歷了一段在公共圖書館進行強迫性閱讀（compulsive reading）的時期。這種強迫閱讀的模式，與他把閱讀當作一種獲取私人特性、進行個人修養的方式體現出一致性。但隨後，就在他試圖結束“心理延緩償付期”的時候，毛澤東卻突然變成各種報紙廣告的一個熱情的信奉者。爲接受教育和以後的生活道路着想，毛澤東準備利用一系列的廣告。

毛澤東在長沙圖書館的閱讀經歷，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私人體驗？頗具暗示意義的事實是，在後來的生活中，爲了駁倒他的對手，毛澤東從未引用過自己在那段時間閱讀過的一些資料中的任何言辭。譬如，有關亞當·斯密、達爾文、密爾（穆勒）、盧梭、孟德斯鳩等人和有關希臘、羅馬、俄國、美國等國歷史的書籍。在毛澤東的整個晚年時期，他繼續把閱讀看作一種逃避外界事物、獲得私人個性的方式。但是，這並不完全是一種消極的活動。因爲，有證據表明，毛澤東不斷與他讀過的東西進行互動式的交流。譬如，在書邊做批注；有時候和作者們的觀點進行辯論；有時候贊同作者的看法；在其他一些時候，則試圖作一些歷史歸納，或者指出某些類似的事件，這種事件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p. 133.

通常來自于中國歷史①。更有甚者，每個曾經在毛澤東那個非常私人的避居地見過他的人，不管是在延安的窰洞，還是北京的那所靠近紫禁城的房子，他們都注意到在書桌和書架上堆積如山的書籍。從那些書中，可以看到向外突出的、標誌着讀過的段落的紙條。這些紙條暗示了毛澤東的廣泛閱讀，以及對閱讀內容做出的應對與反應。當然，自從文化大革命以後，全中國只有毛澤東一個人，住在排滿書架、圍繞着成堆閱讀材料的房間中。在這個世界的現代歷史中，幾乎沒有幾個人物曾經讀過如此之多的書籍，但又對自己曾經讀過的東西展示得如此之少。

毛澤東閱讀活動的另一個積極方面，則肇源于他第一次接觸報紙時產生的對報紙的迷戀。當時，還是 1911 年辛亥革命時期，毛澤東正在經歷他的軍旅生涯。我們應該記得，那時候，他每周的軍餉大約有七塊錢。其中，兩塊錢用做食物之需。此外，由於作爲一個學生，毛澤東不能親自“屈尊去帶水”，因而，還要有一筆不確定的花銷用來買水。儘管如此，“其餘的餉銀都用在報紙上，我變成它們的一個熱心讀者了”②。結束“心理延緩償付期”，回到長沙師範學校以後，毛澤東告訴我們，他總共花了大約一百六十塊錢。其中，“一定有三分之一是用在報紙上面的。因爲，正常的訂閱書報費每月大約需要一元。此外，我還時常從報攤上買一些書籍和雜誌。父親責備我，說是浪費。他說，這是在廢紙上花錢。不過，我已經養成了讀報的習慣。而且，從 1911 年到 1927 年，也就是當我開始爬上井岡山（換言之，即撤到這個與世隔離的山區游擊隊根據地，並且在此落脚）的時候，我從未停止過閱讀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每天的報紙”③。

新聞媒介不像讀書那樣，爲毛澤東提供了某種加強個人修養、獲取私人隱秘性的方式。相反，對毛澤東來說，新聞媒介與（政治性的公開）行動非常接近。我們已經注意到，到達長沙以後不久，毛澤東

① Stuart R.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ue-tung, New York: Praeger, 1963, pp. 12-14.

②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p. 142.

③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p. 150.

就受到激發，做出第一次表達自己政治觀點的行動："我非常激動，就寫了一篇文章，還貼在學校的墻壁上。"①自從貼出第一張墻報起，毛澤東就開始日益把新聞媒介和行動聯繫起來。基于新聞媒介的作用，他甚而還産生了一種期望，認爲言辭可以改變世界。甚至在毛澤東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他就在一份全國性的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當然，從師範學校畢業一年以後，毛澤東就會創辦他自己的刊物——《湘江評論》。這份刊物並沒有出幾期，而它的重要意義完全在于毛澤東的努力與貢獻。

儘管如此，在毛澤東的思想中，書面文字作爲提供私人特性的工具和作爲特定行動的途徑之間的區別，有點兒太嚴肅、端正而刻板。它們並未充分抓住毛澤東有關書本知識、思想觀點、知識分子和"以筆爲戰"的那些矛盾心理。這么多年中，僅僅除了幾個月的時間，在毛澤東的演説中，他一直都在讚美、表揚和譴責、批評書本知識與知識分子這兩種心理之間搖擺不定。譬如，在1964年3月的一次演講中，毛澤東聲稱：在所有人當中，"知識分子是最無知的"②。但隨後，在同年的5月份，他又承認：知識分子很重要，我們不能沒有他們③。有關書本知識，毛澤東經常告誡人們，不要讀的太多："書讀得越多越愚蠢"④。另一方面，他也強調："書是要讀，讀多了，害死人"⑤。

同樣，儘管在運用言辭、以便實現他的行動目標方面，毛澤東表現出非同尋常的技巧。但有時候，他也貶低和摒斥媒介的力量。譬如，毛澤東曾經評論過這樣一件事：1959年時，他自己弄了份三四千字的材料；但是很顯然，僅僅"紙上談兵"是沒有用的⑥。

有關思想觀念力量的一些矛盾心理，可以通過這樣一個事實來解釋，即毛澤東對幾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的敏感。因爲，他曾經注意

---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p. 140.
② 毛澤東：《在邯鄲四清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64年3月28日。
③ 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彙報會上的講話》，1964年5月11日。
④ 毛澤東：《在彙報會上的評論》，1964年3月。
⑤ 毛澤東：《春節談話》，1964年2月13日。
⑥ 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的講話》，1961年1月18日。

到："中國知識分子有幾種。工程技術人員接受社會主義要好一些。學理科的其次。學文科的最差。"[①]儘管如此，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這些年中，毛澤東曾經反復表達了有關書本知識和學校教育的無用性的看法。這種看法似乎與當年他曾反對的、他父親的觀點幾乎是完全一樣的。有這樣兩個生動的例子，它們足以說明這個問題："書不能讀得太多，馬克思主義的書不能讀得太多，讀幾十本就行了，讀多了就會走向反面，成爲書獃子，成爲教條主義、修正主義"。梁武帝這個人，年輕時做得很好；但後來讀書讀多了，反倒變得很差，最後活活餓死在台城文德殿[②]。在另一方面，毛澤東又評論到："現在課程就是多，害死人，使中小學學生、大學生處于緊張狀態，近視眼天天增加。"[③]

利用矛盾：鬥爭的方式

就像他的其他一些基本的矛盾心理一樣，毛澤東有關言辭、書本和知識問題的矛盾情感，使他能夠針對不同的情形，做出根本不同的反應。在毛澤東的整個革命生涯中，他把思想觀念當作攻擊性的工具來使用。與此同時，在運用意識形態的語言時，則體現出不同的混合：既把語言作爲達致個人私密性的工具，又作爲採取某種行動姿態的途徑。而且，他還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把這兩者結合在一起。作爲一個年輕的激進主義者，爲了尋求改變中國社會的鑰匙，毛澤東轉向了馬克思主義。但是，他也通過一定的方式緩解了自己對這種全新信仰的激情。這種緩解的方式不但包括遊歷傳統中國的一些歷史聖地，還包括試圖尋求他生命中的第一次戀愛。然後，從 1921 年到 1927 年，毛澤東就把馬克思主義視爲一種具有高度的實踐意義的行動指南，以便幫助他區分政治上的朋友和敵人，並用以確定他所在的社

① 毛澤東：《關於板田文章的談話》，1964 年 8 月 24 日。
② 毛澤東：《春節談話》，1964 年 2 月 13 日。
③ 毛澤東：《春節談話》，1964 年 2 月 13 日。

會中可資利用的緊張和衝突的根源。毛澤東和他那個時代的中國年輕人的修辭，主要是有關革命與壓迫的兩極化區分的觀念。儘管如此，他們在實際生活中發現的，卻不是一些充滿啓示意義的威武雄壯的歷史活劇；恰恰相反，他們發現的，是一些普通的、常規的利益衝突。這種利益的衝突構成了在所有開放社會中，日常生活中政治活動的基本質料。但是，在傳統中國的儒家秩序中，這些衝突會完全被約束、壓制，乃至窒息。這是因爲中國文化通常認爲，只有官僚精英才會關注公共事務。因此，在中國社會中，即便是在一定程度上，相當溫和、穩健的有關社會衝突的建議，也會被認爲是充滿革命性的。在毛澤東和楊開慧結婚的那幾年，他正忙于試圖在一個新型政黨中扮演一些負責開展組織性活動的角色。當時，毛澤東只不過是把馬克思主義看作黨派政治的一個標籤，以及有關他職業活動的含糊不清的智識觀念的一個權威。在寫有關湖南農村的階級衝突時，毛澤東採取的方式，與任何一個明智的、爲了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做準備的政治戰略家，在分析潛在的朋友和敵人、階級和利益時，可能會採取的方式幾乎是完全一樣的。目前爲止，意識形態還不是一種戰略性的指導(a guide to tactics)；相反，它只不過是爲了達到某種政治利用的目的，而尋求一些比較柔和立場時的一般性導向。

從1922年到1935年，毛澤東不爲共產黨的領導人所喜愛，一直在江西的游擊根據地壯大革命的武裝力量。當時，馬克思主義爲他宣稱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和保持個人自尊提供了必要的修辭。在這段充滿艱辛、痛苦的時期，毛澤東把自己的行動和一種國際性的意識形態聯繫起來。這樣，他就能挑戰政治對手，而不至於滑入含糊不清的山頭主義和派系鬥爭中。從歷史上看，這種山頭主義的幽靈曾經一直徘徊在中國鄉村。毛澤東拒絕接受那些在上海負責黨的工作的領導人對他的指責。他還不得不向他們證明，正是他們造成了一些革命行動的失敗。

長征以後，以及隨後在延安的那些年中，毛澤東發現，不僅在與對手鬥爭方面，就是在組織自己這一派時，思想觀念的力量都是難以估量的。整風運動期間，毛澤東的講話表明，他正在試圖尋求提出革命正統的判斷標準，並使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布爾什維克化。正是在

這一段時期，毛澤東發現，思想觀念可以重新改造人。他還發現，革命需要造就一批新人。經過艱苦的努力，毛澤東贏得了長征的勝利。如果說這還是一種客觀性勝利的話，那么，就主觀方面而言，毛澤東此後就覺得被迫要向人們證明自己的優越性。而證明的方式，就是要表現出自己比其他任何一個同事都更加熟悉馬克思主義。這就像很早的時候，年輕的毛澤東已經認識到的那樣。那個時候，毛澤東就發現，通過宣稱自己比其他人更加熟悉、了解書本上所說的東西，他就可以使自己領先于他的同輩人，甚至優于他的老師。

1949 年中國革命勝利以後，毛澤東首先關注的問題是贏得合法性。在他爲了獲取必要的尊重和敬意而努力的過程中，他還對共産主義意識形態的領導人——斯大林，表現出一定的依賴。但是他表現出的那種程度，簡直有些令人吃驚。毛澤東覺得，他不得不公開讚揚斯大林。這樣作，僅僅是由於他不能接受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他希圖給某個人留下印象，但那個人卻可能對他沒有任何不可分割的讚揚之意。成功感與依賴性，和全能感與依賴性是一對同樣的情感。毛澤東的母親被理想化了。但是被理想化了的母親也給予了毛澤東某種基于無法分割的愛心和關注而産生的那種滿足感。從此以後，全能感與依賴性這對情感就一直處于毛澤東心理生活的中心。

當然，隨着斯大林的去世，毛澤東希望，他最終會得到普遍的承認。他認爲，自己比所有的同輩人都優越。當赫魯曉夫玷污了共産主義運動的傳統，攻擊對斯大林的緬懷與回憶，並且拒絶承認毛澤東是一個特別的人物時，毛澤東再次運用言辭的力量，努力使他的對手啞口無言。

就在 1949 年毛澤東獲得巨大的政治與軍事勝利之前不久，也就是他贏得了整個中國，以及在同事們中間獲得獨一無二的重要性時，他的健康狀況迫使他放棄寫作，而完全依賴于口頭演講。好久以後的 1964 年，毛澤東解釋到：

“一九四七年，《論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就是我口講，有人記下，又經過我修改的，那時我得了一種不能寫東西的病。現在寫東西都是由秘書寫，自己不動手。當

然，有些東西是可以由别人代筆的。例如總理出國講話，就是黄鎮、喬冠華他們搞的。有了病，自己口講，叫人家寫，也是可以的。自己總是不動手，靠秘書，不如叫秘書去擔任領導工作好了。”[①]

那個時候，這種健康問題被懷疑是帕金森老年綜合症(Parkinson’s disease)。正是這一健康狀况，可能解釋了爲什么赢得國家權力以後，毛澤東的書面作品有所減少。但是，這可能不是全部的解釋。因爲，隨着毛澤東對自己的歷史角色越來越有自信，他也發現：既然自己也可以操縱實質性的權力，那么，使用攻擊性的言辭也就變得越來越不那么必需。從那以後，只要毛澤東覺得自己處于很脆弱的地位，並且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他就不得不重新轉向書面語言。這一切，就像當年中蘇論戰期間發生的那種情形一樣。

儘管如此，隨着毛澤東越來越把自己看作馬克思主義智識觀念傳統的合法繼承人，他不但很少寫東西，還允許自己的作品變得越來越被人們神聖化。最終，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允許他的某些書面作品中的詞句，變成全中國人民的迷戀對象。確實，1967年，中國出版界幾乎完全沉浸于僅僅印刷毛澤東一個人的作品的巨流之中。光那一年，中國就印了76 400 000册《毛澤東選集》；350 000 000册《毛主席語録》的小紅寶書；47 500 000册《毛澤東著作選讀》；以及57 000 000册毛主席詩詞。總而言之，將近540 000 000册毛澤東的各種作品，這個總量超過中國文學作品的總量。更有甚者，他的著作被翻譯成23種外文語言，以便向海外傳播。

從魅力型權威到實質性權力

從心理學上講，作爲讀者的毛澤東，與作爲作者的毛澤東是聯繫

① 毛澤東：《在邯鄲四清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64年3月28日。

在一起的。作爲讀者，他通過閱讀來尋求私人個性；而作爲作者，毛澤東雖然已經不再寫作，但他仍然受到高度尊敬。正如毛澤東自己解釋的那樣，他早年通過閱讀來逃避外界、尋求自我的那種行爲習慣，涉及到這樣一些問題。譬如，通過閱讀來體驗英雄人物冒險行爲的奇異故事，以及認同那些雖然遭到誤解，但是卻無所畏懼、大膽勇敢的人們。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毛澤東早年閱讀浪漫的歷史小説的行爲，也是與他和父親的關係聯繫在一起的。父親自負不凡，看似充滿權威色彩，實際上卻很脆弱。毛澤東與父親進行鬥爭，並且能夠輕鬆地控制和操縱父親。

因而，毫不奇怪，毛澤東對父親的矛盾心理，後來會反映在他有關言辭和意識形態的情感方面。更加特別的是，他還在兩種選擇之間搖擺不定。一方面，毛澤東要嚴格地遵循某些教條；另一方面，他直率地嘲笑、輕視那些可以在書本之中找到的東西。有時候，毛澤東認同嚴格的正統教義的優點，主張認眞學習那些近乎神聖的理論文本。而在其他一些時候，毛澤東則貶低正統理論，攻擊人們盲目地信仰形式主義的教條化準則，要求大家通過實踐經驗來學習理論，而不是僅僅學習書本。這樣一來，毛澤東不但是一個眞誠的信仰者，還是一個冷靜、客觀的批判者。這兩種個性的結合表明，毛澤東不受他自己的某些信念的束縛，因而，他是一個天生的領袖。意識形態方面的領袖，就像一個高級牧師一樣，必須在一條狹窄的小路上穿行。從路的這一邊來看，他應該是一個夠格的信仰者，以便開發那些通常被認爲內在于一個持久的教義準則中的潛力；與此同時，從路的另一邊來看，他似乎應該保持足夠的清醒、冷靜和客觀，以便在必要的時候，堅守某些教義準則。

但是，當面臨要在兩種角色之間進行轉換的時候，一個成功的意識形態領袖還必須表現出一定的誠意。一方面，需要嚴格地遵守某些教義準則；另一方面，又要無視這些教條主義的規定，作一些實用主義的革新。他必須避免雙重的困境。既不能表現得像一個怯懦的、教條主義的奴隸，也不能像一個玩世不恭者，爲了自己不斷變化的目標，而毫無道德原則地運用某些言辭。毛澤東有關書本知識和正規教育的

那種眞正的矛盾心理，就使這種情形變得確定起來。儘管在公開場合，毛澤東也會表現得猶豫不决，但他將會清楚地理解自己做出某些選擇的合法性限度。一方面，他可以在一定範圍内作出某些搖擺；但與此同時，他也要從自己的一些出人意料的觀點變化中，贏得最大限度的效果。

在言辭力量對毛澤東的私人意義和他的公共需求之間，還存在另一種心理學上的聯繫。而且，這種心理學聯繫，也更加深刻。同時，這種聯繫有助于解釋毛澤東超凡魅力的非常權威。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毛澤東迷戀充滿浪漫色彩的英雄，並有着強烈的自戀主義傾向。由此，似乎很明顯的就是，毛澤東在“延擱不信任”(suspension of disbelief) 上沒有什么問題。換言之，即他有一種在小説和詩歌描寫的虛幻世界中，發現現實的能力。毛澤東不但是一個讀者，他還是一個戲迷 (a theater goer)。因而，他很容易就陷入一個充滿想象的世界中，並且對這個想象的世界充滿激情。儘管如此，毛澤東還是一個富于行動能力的人；而且，他在行動中傾向于對行動的可能性幾乎不加任何限制。這樣一來，他就傾向于消弭這些區分，譬如願望和願望的實現，自己的慾望和他人的反應，以及他堅信自己是善良的那種感覺和其他人針對他的願望而做出反應、以便控制和改變其看法的那種能力。如果不是因爲毛澤東感覺到，需要運用言辭來與别人就他的觀點進行交流和溝通，那么，所有這些情感可能已經被限制在他的私人活動領域。

中國公衆顯然認爲，爲了整個國家的集體利益，毛澤東開發了他個性特徵中的某些潛能。確實，大多數中國人感覺到，在毛澤東個人的偉大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間，並不需要做明顯的區分。因而，僅僅通過同情和理解毛澤東對一些問題的浪漫看法和個人感覺，並寄與一定的敬意，中國人也可以體驗到某種偉大的感覺。如果不是因爲知道有關個人的全能感和對他人的依賴感之間的心理學動力機制，那么，我們可能無法認識到，那些看起來明顯有矛盾的感情之間居然存在着緊密的聯繫。這種聯繫可以回溯到某種普遍的人類經驗。這種經驗就是，嬰幼兒時期的完全依賴感；但與此同時，又能夠使自己的願望完全控制周圍的整個環境。與其他文化相比，中國文化更加獎賞依

賴感。中國文化還鼓勵這樣一種觀點，認爲在完全控制一切與完全受他人照顧之間，是無法進行區别的。中國的男性兒童不但受到就像珍稀寶貝式的那種哺育和對待，而且在小時候，他還是整個家庭的關注中心和嬌慣對象。通常認爲，童年時代是每個人一生中的黄金時期。在此期間，沒有什么需要自己去關注的東西，而且自己的願望還能控制周圍的環境。人們希望，到老年以後，中國的男人將會重新恢復這個狀態。也就是説，一方面是一個權威人物，但同時又是一個依賴他人的人；既得到精心的照顧，又可以使自己的每一個願望得到尊重。

這樣一來，全能感和依賴感（omnipotence and dependency），以及偉大感和無助感（being great and manifesting helplessness）之間的區分，就很容易糅合在一起。正如毛澤東消弭了他自己的願望和他的行動（aspirations and actions）之間的區别一樣，從心理學角度上看，中國人也拒絕在令人尊敬的順從和自以爲是的斷言之間進行區分。通過閱讀以及與公衆進行交流等實踐活動和行爲習慣，毛澤東使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一直處于活躍狀態，並且不斷爲之增加新的活力。他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感情，似乎在中國人那里激發了一種意識：他們也可以重聞那種全能感的喜悦之情。其方法就是，通過在言辭和行動方面的良好表現，他們可以復活嬰幼兒時期的美好回憶。那個時候，他們可以擁有任何自己想要的東西，因爲父母把他們視爲珍寶。這是在“培養日益成熟的政治自覺”（raising political consciousness）的過程中，經常會發現的一種心理機制。

這樣看來，毛澤東那種克理斯瑪式的權威魅力與中國人民之間的聯繫，在于他能夠通過自己的自戀感，在中國公衆中點燃和激起這樣一種感情，即只要服從某些嚴格的、甚至苛刻的道德標準，他們就能發現某種偉大的感覺。這種道德標準，將有助于他們重新獲得嬰幼兒時期的那種感覺，即他們的表現是如此之好，以至於父母們會覺得，讓他們的願望得到尊重是應該的①。如此以來，作爲領袖的毛澤東和

① 有關運用深度心理學的進路，來分析領導者和追隨者的關係紐帶的著作，參見 Irvine Schiffer, Charisma: A Psychoanalytic Look At Mass Societ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3。

作爲追隨者的中國人民就通過完全一樣的心理機制而聯繫在一起。這種心理機制能夠在不同程度上，把有關自我、全能感和依賴特性的各種感情聚合在一塊兒。

這種關係，發端于毛澤東對言辭的運用和中國人民對這些言辭的反應，並且基本上通過這一反應機制而得以維持。多年以來，這些言辭的性質已經有所變化。最初，這種變化是隨着毛澤東越來越變成一個演說家，而不是一個作者的時候發生的。後來，在他放棄一般性的演説，而轉向神秘性的批示和指導性的口號的時候，他的言辭自然又有新的變化。儘管如此，毛澤東言辭力量的基礎始終未變。這種言辭力量的基礎，端賴于它們激發人們情感的那種能力，以及能夠使中國人民確信，這些言辭表達了被揭示出來的眞理。有時候，正是後面的這種需要，或者説，使他的那些言辭對中國人民有意義的需要，才使外國人很難理解這些言辭所表達出來的那種訴求的力量。

演説家和口號製造家的秘密恰恰在于，他能夠以隱秘的情感來説出明顯的事實。而且，這種情感是如此隱秘，以至於聽衆們無視其顯而易見的特性，卻開始把陳詞濫調當作眞理。對那些陷入領導者和追隨者關係之中的人們來説，這種行爲中存在着某種奇異的魔力；而對那些處于這種領導者與追溯者關係之外的人們來説，一切看起來可能不過是一場荒謬的鬧劇。因而，美國人才會對約翰·肯尼迪這個令人振奮的斷言而激動不已："從今天的年輕人中，會出現明天的領導人"。似乎沒有人會追問，這些領導人還可能來自于其他什么地方。

就針對各種不同的動員風格而作出各自不同的反應而言，各種文化確實會有所不同。在美國政治文化中，幽默感仍然無礙于道德主義；電視也無法使人們認識到，大會發言人的冗長、沉悶、起伏跌宕、搖曳多變的音調，不過是一個自以爲是的傻瓜的標誌而已。而在中國政治文化中，由於象徵意義和現實表現相互混淆的傳統，口號的力量被極大地強化了。在大多數文化中，通常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即操縱象徵符號和更換言辭用語，實際上也就是改變現實世界。但在中國文化中，這種感覺似乎尤其強烈。因爲，在中國的漫長歷史中，一直是由讀書人來進行管理工作的。毛澤東本人就贊同這種觀點。有一

次，他說："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這就是精神變物質。"[①]

這樣一來，毛澤東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藉助某些帶有神秘色彩的口號進行統治，而不必對政策選擇和變遷作出具體而微的解釋。譬如，爲了建設新中國，毛澤東的建國方針是不但要利用新的、先進的，還要運用舊的、初級的科學技術。既然當時沒有什么其他實際可行的選擇，那么，這就不失爲一個非常合理的政策。對此，毛澤東把自己的這種政策選擇描述爲"兩條腿走路"。對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和地區而言，這個口號可能幾乎沒有什么意義。因爲，除了"兩條腿走路"，人們還能怎么走？但對於中國人而言，承認兩條腿才使走路成爲可能，就有一種揭示了眞理的感覺。

毛澤東愛使用一些名言警句，中國人民也愛引用毛主席的話。這最終把我們引向這樣一個問題，即毛澤東究竟以怎樣的方式，爲他的言辭和觀念賦予了一種基本上帶有宗教色彩的維度。有關這個問題，已經有很多討論。因而，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就說出那些被歸因于毛澤東思想的力量的神奇事件[②]。但重要的問題在于，我們應該注意這樣一個事實：毛澤東有關書本知識和正規教育的價值的矛盾心理，實際上和中國文化中的一種高深層次的矛盾心理相一致。那就是，儒家學派的學者氣質、規範特點和倫理精神；以及道家學派的直覺主義、神秘感悟和自發精神。從歷史上看，中國文化的內部總是充滿矛盾和衝突。就爲國家與社會提供神聖的、宗教性認同的合法性而言，不但是儒家，就是道家本身也完全不合適。更有甚者，就算想把倫理主義和神秘感悟完全混和起來，以便爲政治共同體創造一個宗教基礎，這也是不可能的。毛澤東的一個值得注意的悖論是，儘管他譴責中國人需要任何宗教，但他卻成功地給予中國人一套獨一無二的、連貫一致的觀念體系。在這套觀念中，正確的道德行爲和倫理行爲的價值，或者說儒學的一些基本準則，直接與人們取得的成就聯繫在一起。這種成就還突破了單純的人類理性能力的限制，或者說道家學派的某些基

① 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1963年5月。

② George Urban ed., The Miracles Of Chairman Mao, London: Tom Stacey, 1971.

本準則。根據傳統，對宗教觀念和公共事務之間的關係，中國人一直懷有一種令人奇怪的矛盾心理。共產主義爲中國人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倫理觀念體系，以及一種有關非理性的全新理解。如果說前者取代了儒學準則的話，那么，後者則取代了道家學說和其他傳統的“反儒教”的神秘主義。可能更加重要的是，毛澤東的思想把至目前爲止，一直被不恰當地拴在一起的某些思想觀念糅合爲一體。毛澤東本人有關思想觀念和個人感情的矛盾心理，迫使他把教義準則不止是當作一般的理性推理來對待。這樣一來，他就把自己的政治思想發展成一套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不但包括了理性化的解釋，還體現了忠誠和信仰的力量。

行動：作爲意志力的權力

毛澤東之所以會成爲一個成功的革命者，不僅是因爲他能夠動員起中國人民的情感。他還教導中國人民，只要我們做好準備，採取有目的的行動，那么，就不會有什么我們無法實現的目標。

我們曾經強調，在毛澤東早年的、作爲一種逃避現實的方式的閱讀行爲中，曾經存在某些充滿幻想色彩的、不太現實的因素。儘管如此，我們還必須認識到，通過閱讀，毛澤東也發現了某種可以控制他人的東西以及自主感。正如前面我們已經看到的，通過運用某些言辭以及閱讀中發現的資料，毛澤東就能夠控制他的父親。後來進入學校以後，他發現，通過閱讀，自己能夠認識到他人所不知道的某些東西，並由此可以獲得某種優越感，成爲同輩人中的佼佼者和主導者。而毛澤東在長沙圖書館那段時期的強迫閱讀，也必然是受到他那種爲了尋求主導意識和個人效能感，以及孤注一擲、充滿絶望的追求的激發。毛澤東相信，力量的淵泉在于言辭用語和思想觀念。

但是，如果毛澤東確實是一個對人類精神的全能感充滿信心的不折不扣的信仰者，那么，有關他通往權力之路的心理學維度，就幾乎不需要作出什么更多的解釋。儘管如此，具有重要意義的是，雖然毛澤東強烈地支持意志力的重要性，也因此對人類事務中的主觀能動主

義充滿信心，但他也與自己思想中重視個人願望的傾向進行鬥爭。毛澤東讚揚的，是一種更加具有實體性的權力觀念。

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青少年的毛澤東曾經度過這樣一段時期。當時，他沉浸于體格訓練的需求之中："在寒假中，我們在田野里徒步穿行，在山野間攀爬……下雨時，我們就脫去衣服，名之爲'雨淋浴'……在已經結霜的天氣里，我們還在野外露天住宿。甚至到了十一月份，我們還在寒冷的河流中游泳。"[①]所有這些活動似乎都是爲了消除自己身上的女性化特徵，特別是，反對他與母親認同的那部分特徵。而毛澤東從母親身上學到的，正是對意志力的信念，以及賦予全能感的某些優點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

1917年4月，毛澤東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該文以充滿預言色彩的語調，讚揚了體力活動的重要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他也爲個人主觀領域劃出一塊兒獨立王國。這篇文章的題目是："體育之研究"，署名爲"二十八劃生"（二十八是指書寫"毛澤東"這個名字時，其繁體字所必需的筆劃數）。該文最初發表在《新青年》雜誌上。這是一份由陳獨秀主編的新刊物。陳氏後來將成爲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領導人。這篇文章的論述主題是，健康的身體是成爲偉大民族的一個直接條件；國民的強壯和尚武的能力，這二者是同義詞。"國力恭弱，武風不振……夫體育之主旨，武勇也。"[②]在該文中，毛澤東明白無誤地賦予強健的身體以一種基本的重要性。"體強壯而後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速。"或者，"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苟野蠻其體魄矣，則文明之精神隨之。"毛澤東對比了文明人和野蠻人。他感到一種令人奇怪的需要，即讚揚野蠻人。他還覺得，應該把身體鍛煉等體育活動發展成一種幾乎是基本性質的活動形態。"運動宜蠻拙，騎突槍鳴，十蕩十決，暗鳴頹山嶽，叱咤變風雲，力拔項王之山，勇貫由基之禮。其道蓋存乎蠻拙，而無與于纖巧之事。動動之進取宜蠻。"

儘管如此，在通篇文章中，毛澤東仍然爲主觀活動和意志力留下一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p.146.

② 毛澤東：《體育之研究》，原載《新青年》，第3卷第2號，1917年4月1日。

定的對立領域。譬如："欲圖體育之有效，非動其主觀，促其對於體育之自覺不可"；"興味者運動之始"；"凡事皆宜有恆"……等等。

自從童年時代發表了這篇文章後的許多年中，毛澤東將經常會在表揚蠻力行爲的時候，突然宣稱某些與此相衝突、抵牾的挑釁性觀點。顯然，這是他的個性使然。不時的，毛澤東明顯感覺到，需要超越主觀意志的限制，以強壯的身體來證明他自已。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毛澤東蔑視核武器。他曾經有好幾次，令世界感到震驚。毛澤東稱核武器爲"紙老虎"。他說："是的，我們要有……管他什么國，管他什么彈，原子彈、氫彈，都要超過。我說過，原子彈響了，人類即使死一半，也還有一半。斯諾同我談話，問我爲什么不闢謠，我說不要闢謠。我只說過戰爭打起來人死一半，還有另外一半。"①

有時候，這種作出一些"野蠻"、好斗、充滿挑釁性斷言的需要會妨礙毛澤東的正常思考，迫使他採取一些他本人可能並未仔細考慮過的政治立場。譬如，在 1958 年 5 月黨的八屆二次會議上的一次發言中，毛澤東自認爲自己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暴君秦始皇。我們在前面，曾經引用過這段言論的某些部分。他在這樣說時的那種論斷方式，就體現出某種輕率的、充滿冒犯性的特點。

"範文瀾同志最近寫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興。這篇文章引用了許多事實，證明 古薄今是我國的傳統。敢於站起來講話了，這才像個樣子……可惜沒有引秦始皇。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專家……（林彪同志插話說：秦始皇焚書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②

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對暴力問題，毛澤東仍然懷有複雜的感

---

① 毛澤東：《聽取谷牧、余秋里彙報計劃工作時的指示》，1965 年 1 月。
② 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第一次講話》，1958 年 5 月 8 日。

情。因爲，儘管他一直毫無休止地讚揚鬥爭和混亂，但當毛澤東在詩歌中描寫某些戰鬥情況時，他也堅持運用他所喜愛的那種將事物理想化的心理防禦機制。無論何時，只要不得不論及嚴厲鎮壓的需要，毛澤東的言辭中就會體現出某種令人奇怪的、試探性的因素。譬如，有一次他曾這樣說："今年不要開殺戒，明年再說。罪大惡極的也先放慢一些，現行反革命按規定辦理。群衆要求非殺不可的，是有道理的，你領導可以等一等嘛！"①

有好幾次，毛澤東對暴力與戰爭問題，都採取了一種非常實用主義的觀點。他曾聲稱："所有一切可團結的人要團結。就是對反革命分子也不能都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才殺，有的要關起來，管起來。殺人要謹慎，切不可重複過去所犯過的錯誤，如過去搞根據地時殺人多了一些。延安時規定一條，幹部一個不殺。現在還關了一個潘漢年，絕對不殺。殺了就要比，這個殺了，那個殺不殺？總是不開殺戒。但是不是說社會上一個不殺？有些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人，民憤很大的人，不能不殺幾個。至於中央委員犯了錯誤就不牽涉殺不殺的問題，還是留在中央委員會工作。"②。他還宣稱，中國也曾從抗日戰爭時期日本的侵略中，獲得過某些好處："日本人在北京和我說，很慚愧，過去打你們。我說，你們做了好事。正因爲有了你們的侵略，佔領了大半個中國，使我們團結起來……"③

大多數現代中國的政治領導人都接受戰爭和衝突的現實。但是，毛澤東對待暴力的方式，令人覺得其中總有些強制性的、被迫的因素。這一點非同尋常，值得注意。毛澤東的這一態度，對他成爲一個戰略家非常有幫助。因爲，儘管其他政治領導人傾向于自發地、未經反省地使用暴力，但毛澤東則不同。比之其他人，他運用暴力的方式總會有一些更加出人意料的特性。他提倡暴力，更多的是一種內在感情的結果。因而，在考慮了外部的客觀環境，並需要對此做出反應時，他一定不能表現出軟弱。如此以來，毛澤東的行爲方式就表明，

---

① 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1963 年 5 月。

② 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的講話》，1961 年 1 月 18 日。

③ 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第二次講話》，1958 年 5 月 17 日。

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毛澤東處理強力關係的整個風格，就是建立在一些令人吃驚的、出人意料的基礎之上。

如此以來，儘管毛澤東在運用強力時，存在某種自動自發的重要因素，但明顯的，他從未因爲自己的憤怒而轉向暴力。恰恰相反，毛澤東認識到，其他人內心的潛在憤怒，使他們很容易就被動員起來，爲了某些衝突而鬥爭。自從童年時代起，他就對自己的情緒保持高度警惕，以至於毛澤東根本不允許他的感情把自己帶入與其他人陷于衝突的風險之中。

毛澤東的這些個人性格特徵爲他提供了進一步的戰略性優勢，即他似乎與他人的行爲不合節拍。當其他人希望和諧、秩序與和平的時候，毛澤東的看法卻令人震驚——他指出，衝突的時機剛剛成熟。當其他人被鼓動起來，並要求行動的時候，毛澤東卻號召大家冷靜、克制，進行理性的思考。

毛澤東的行動節奏不符合通常的節拍，而且他還能成功地迫使他人改變節拍，轉而跟上他的行動步伐。從根本上來說，毛澤東行動中的這一秘密在于，他堅信：意志力的恰當運用可以徹底改變人們有關究竟什么是“現實”（what is realistic）的定義。因而，他能夠重新定義各種可能性。如果說，毛澤東對全能感的強烈的主觀感覺僅僅是模糊的、被歪曲了的現實，那么，他當然就會一直遇到各種失敗。因爲，現實並不總能滿足需要實現的願望。但事實並非如此。毛澤東政治成功的關鍵在于，出于對拋棄感的恐懼，毛澤東一直感到有必要對自己的情感保持警惕；因而，他就形成了一種敏銳的感覺。即迅速調整狀態，以便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這種應變能力很重要。充滿悖論意味的是，也正因此，他比大多數人對現實更加敏感。以“似乎、好像”的方式來行事的技巧，需要一個人能夠洞悉任何特殊情境的基本特點，以便進而利用這種情境。

恰恰是由於自從很小的童年時代，毛澤東就面臨着拋棄感給他帶來的那種震驚，因而，他很早就認識到，在人類事務中，權力最終依賴於人們覺察到的不安全感，以及他們那種堅持認爲自己可能擁有的任何優勢的心理需要。因而，在處理與群衆的關係時，就有必要提醒

這些人，他們究竟從毛澤東的實際行動中，獲得了哪些好處。更有甚者，甚至在處理與那些親密同事們的關係時，這種要求也是勢在必行的，即從來不應讓同事們忘記，他們欠毛澤東什么。

儘管如此，在處理與群衆以及同事們的關係時，仍然總是存在着危險。這種威脅就是，他們可能會認爲，毛澤東爲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當然、應該的。換言之，“他們忘記了當年吃苦的日子”。或者，更加糟糕的情形是，他們可能會背叛他。他們不但不會依賴毛澤東，甚至還可能利用他。

在以上考察中，我們把毛澤東有關言辭和權力的非常情感的各種複雜維度全都綜合在一塊兒。如此一來，我們就找到了對其創造性天才的心理基礎的最經濟、最簡短的解釋：首先，通過訴諸于權力的實體性維度，毛澤東緩解了他對意志力與自戀主義之間關係的基本理解——這一點有些出人意料；其次，他可以理解其他人的不安全感。因爲，儘管毛澤東顯然對自己很有自信，但他也充分認識到焦慮感的完整涵義。

這就把我們引向造就毛澤東政治成功的另一方面的因素，即他對其他人的恐懼。毛澤東擔心，其他人可能會利用他。因此，他覺得有必要在自己再次被拋棄前，就拋棄其他人。

第十章　政治抛棄感：恐懼問題

政治涉及的，不僅僅是觀念與權力、計劃與行動的問題。政治還依賴於人們的相互協調，一致工作。儘管決策可能是一門個人獨自就可以完成的藝術，但一般而言，領導權以同志式關係爲開始。偉大的行動者需要支持者們的信任。而毛澤東在言辭和權力方面引人注目的成功，則以他與朋友和同事們的人際關係紐帶爲代價。

毛澤東在自己的統治與治理風格中，保持了靈活性給他帶來的優勢。這一點，在他獨自一人遠離政治舞臺，以及隨後又在一些特殊的決策過程中走上前台、進行干預的處事方式中，表現得也是如此。在此過程中，毛澤東還保存了某些通過調整來適應環境的內在應變能力中的出人意料的因素。中國革命的曲折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有關思想觀念和實際行動的一些看法的那種風格；這也給他的同事們帶來了極大的麻煩和問題。

通過支持一些出人意料或者新奇的政策，偉大的領導人能夠創造一些帶有戲劇性色彩的效果，並且吸引一批對此感興趣的公衆。但對那些熱情支持既定政策規劃的下屬幹部而言，要讓他們接受一些出乎意料的政策變化，總是非常困難的。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爲那些負責的官員們已經在他們支持的這些政策規劃中，傾注了自我的因素。下級官員們的榮耀，很容易就與他們對正在進行的事情的正當性之判斷混和在一起。那些有行政管理工作經驗的人們都知道，官僚機構的惰性不僅在于交流、溝通的複雜性和管理、控制的限度。這種惰性還在于，當人們對自己正在從事的事業懷着堅定的信心時，政策變化涉及的就遠非僅僅是一個智識觀念方面的問題。這就需要人們重新調整情

緒。考慮到理性智慧和感性情緒之間的內在區別，情感方面的變化波動總是會比理智方面的重新審慎思考要更加痛苦。

有些偉大的領導人對自戀感懷有強烈的感情；這種感情，我們曾在毛澤東身上發現過。這樣的領導人，傾向于把所有的心理動力集中于他內在的自我追求之中。這樣一來，他對外部的現實就只有很少的情感依戀。甚至，當這種現實可以被視爲是由他自己創造的產物時，也是如此。顯然，只要覺得政策的變化是由自己作出、而非外人強加于他的，那么，毛澤東對自己的信心以及對他無限創造能力的信念，就使他在情感上很容易接受政策的變化。

正好處于這些頂級領導人下面的，則是那些構成官僚機構的普通官員。他們可以有自己的方式來保護自己，並在情感方面保持克制，而免于因政策變化而帶來的各種後果的影響。當然，官僚主義者的秘密在于，他已經學會把自己的情感傾注于政策實行的各種方法、手段，而不是關注可能會有所變化的政策的實質性內容。這就是爲什么官僚機構的常規化不止是一個習慣問題，它還爲一種強烈的情感義務所強化。在中國，這就意味着，黨的下級領導幹部可以使自己忙于各種活動的儀式和禮節之中，並自發地支持任何現行的可能政策。

最容易受到政策變化的傷害的群體，總是那些直接接近偉大領導人的官員。而這個領導者行使領導權的可見形式，是與某些特殊的政策聯繫在一起的。這些官員不能逃避。他們不能像下級官員們那樣，用程序主義的方式來處事。如果他們努力使自己的行爲僅僅是爲了取悅于領導人對自我的追求，那么，他們就變成了無能之輩和阿諛奉承者。一些人曾經哺育、關懷過偉大領導者的情感。如果他們收回了對領導者的情感，那么，這也就傷害了領導者對自戀感的渴望——即如毛澤東曾經歷的那樣。因而，可以確定的是，對那些曾經對他表示出崇敬之意的追隨者，領導人會有某種矛盾心理。滿足感可能突然間就變成了懷疑和不信任。

在大多數政治系統中，有關主要政策變化的智識性理解和情感性接受之間，存在着某種難以逾越的鴻溝。對此，人們經常會有一種本

能的理解。因而，也會有一種近于普遍的期望，即新的政策呼喚新的官員。通常，這會伴隨着與管理階層和政府機構有關的人事變動。儘管如此，人們通常認爲，共産主義政治體系中有關人事與政策之間的關係，與上述情況有些不同。從理論上來説，最高的忠誠是獻給中國共産黨和革命事業的。熱情的革命者會認同那些基于“路線”性質的政策變化的需要。他不會允許自己的感情陷于某些特殊的政策規劃之中。當然，在具體實踐中，人事問題仍然存在。黨的許多政策路線的變化經常伴隨着内部的派系鬥爭和組織清洗。

就此而言，中國政治和毛澤東與助手們之間緊張關係的歷史，在特定程度上一點兒也不令人吃驚。此外，考慮到策略選擇和政策義務之間的正常關係，我們完全可以理解這樣的情形。即在權力鬥爭中，當每個人都認識到策略性的、充滿彈性的政策變化的需要時，這種衝突就會有所減弱；另一方面，在管理一個巨大的、變動不定的國家的過程中，當權力不得不指向于無數的、經常是相互衝突的目標時，這種衝突就會變得更加劇烈。近年，有好幾部研究著作曾經認眞而詳細地考察了中國領導人之間，特別是毛澤東和他的直接追隨者之間政策分歧的各種客觀基礎①。

除了因内在于不同的行政性視角和義務的邏輯而引起的各種衝突外，毛澤東和同事們衝突的另一個客觀性結構基礎在于，他和那些同事們的制度性關係。我們已經注意到，毛澤東的統治風格不是行政長官那種有連續一致的命令的風格。相反，他的風格在孤獨的幕後退隱和強烈的台前干預，以及政治統治和行政治理之間搖擺不定。這種運用權力的方式，不完全爲毛澤東所獨有。在一些當代的組織機構中，以及傳統的中國皇帝身上，都可以發現類似的行爲方式。

譬如，毛澤東與那些負責管理實質性政策規劃的追隨者們的關

① 對此，可參見 Roderick MacFarqu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Stanley Karnow, Mao and 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2; A. Doak·Barnett, Uncertain Passage: China' s Transition to the Post-Mao Er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1974。

係，與這樣一種並非少見，但卻極其複雜的關係很像。此即董事會主席和那些負責日常事務管理和運行的經理人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可能會極其微妙、複雜。特別是當這個主席有着強烈的個性，積極行動主義者的本能，以及他的年齡足夠大、並且懷疑下一代人實現其管理目標的能力時，就更是如此。有時候，這種關係非常奇怪，以至於可能深刻地影響公司的運營狀況。儘管如此，這種關係卻極少得到系統的研究。也正因此，我們幾乎沒有什么指導工具，可以更好地理解毛主席和處于他下面的行政官員們的關係[①]。

爲了理解毛澤東和直接追隨者們緊張關係的客觀基礎，一個更加有用的類比可能是傳統時期中國皇帝和大臣們之間的衝突。有關中華帝國政制體系的描述，傾向于夸大皇帝和官僚機構之間完全統一、沒有衝突的特性，或者僅僅強調宰相首輔和其他官員們之間的衝突。而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大多數朝代最具連續性的衝突是發生在皇帝本人和親近大臣之間[②]。傳統中國有關國家治理之術的大量著作都強調，皇帝需要注意，不能一直信任他們的大臣；而大臣們也要保持警惕，不要激起皇帝的憤怒。這種精神在《韓非子》一書中，得到了較好的揭示。《韓非子》是法家政治哲學最流暢、最清晰的闡釋者。1970年代初期，在毛澤東開始發起“批孔”運動的時候，他曾經讚揚過這本書。對這種統治方法之精髓的一段典型論述，可見于韓非子在《揚權》一節中所作的有關評論。毛澤東必定讀過這段話：

“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 量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

① 有關經理人和董事會主席與總統和行政官員之間的關係，Myles L. Mace 曾做過有益的研究。參見 Myles L. Mace：Directors：Myth and Reality，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1971。

② 有關皇帝和大臣們的關係，參見下列著作中的相關描述：Michael Loewe，Imperial China：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the Modern Age，New York：Praeger，1966；E. A. Kracke，Jr.：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960-106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John F. Fairbank，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7。

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彼將代之。”①

毛澤東發現，自己面臨的客觀情形，特別是1949年掌握國家權力以後的形勢，經常要求他得注意一些正如韓非子這個早期的哲學家曾揭示的、那種充滿陰謀詭計的、拜佔庭式的思考。毛澤東曾經反復告訴我們，爲了維持自己的革命影響力，他是如何戰鬥的。他還多次提及，在領導階層的核心圈子中，在“兩條路線”之間以及他與那些被誤導的同事們之間，存在着怎樣你死我活的殊死鬥爭。確實，“兩條路線”之間的鬥爭這一概念，不但有着意識形態的依據，還有一定的結構性基礎。這一點値得注意。“兩條路線”這一術語最初進入中國精英們的語彙是在1958年，毛澤東部分引退之後。當時，按照安排，領導階層將會分成“兩條線”。“一線”或者“更高的一條線”由毛澤東本人組成，他將只關注宏大的政策問題；“二線”由劉少奇領導，包括那些負責政府日常管理和運行的領導幹部。文化大革命中，上述結構性的區分變成了意識形態衝突的基礎。這種意識形態衝突被認爲發生在“兩條路線”之間，即分別由毛澤東領導的眞正革命者和與劉少奇有關的“修正主義者”。

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有關黨內衝突和緊張的故事就主導了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隨着毛澤東之後的政治繼承問題或者說接班人問題越來越尖銳，事情就變得更加如此。這種緊張和衝突的故事涉及一些合理而客觀的問題。譬如，有關毛澤東那種略帶歷史主義色彩的視角和那些負責日常行政事務的幹部們更加克制的觀點之間的區別；一個年邁的政治家和負責日常事務的行政官員們之間的，以及一個必須扮演終極統治者角色的人和那些希望取代其權威的人們之間的自然衝突。有關當代中國的各種敘述——不論是由共產主義政制的批評家，還是該制度的支持者所寫——在不同程度上，都圍繞着這樣的一

①《韓非子·揚權》。作者採用的譯文爲 Sebastian de Grazia, ed., Masters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3, p. 357 頁；轉引自 W. K. Liao, tr., The Complete Works of Han Fei-tzu, Vol.2, London: Probsthain, 1950。

些主題和問題。儘管如此，僅僅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客觀”分析，不可能爲我們描述有關當代中國政治的動力機制的完整故事。即便這些問題確實存在，也是如此。之所以會是這樣，是因爲作爲一個主要的行動者，毛澤東是一個對情感問題非常敏感的人。他傾向于對自己內心深處的矛盾做出反應。特別是，毛澤東的這樣一些個性：他把衝突行爲理想化，但這又與他對批評的極度敏感結合在一起；他把兄弟關係理想化，但卻無法維持這種兄弟關係的互惠互動；他的心理很矛盾，即希望利用他人，但又擔心被他人利用；他相信人民群衆集體意志的力量，但與此同時，又要確保他自己意志的絕對重要性。恰恰正是由於毛澤東的這種個性特徵，才使有關上述那些衝突的心理分析變得如此重要。

所有這些導致中國領導人趨于分裂的實質性問題，都發生在一種情緒性氛圍中（emotional context）。而且，這種情感境遇深深地染上了毛澤東個性特徵的色彩。因爲，處于毛澤東生活核心的，是一些有關親密感和恐懼心理的東西。毛澤東擔心，其他人可能會利用他的情感。這種恐懼感貫穿了毛澤東的整個一生，這使他覺得，有必要在別人能夠拋棄自己之前，就率先拋棄那些人。

儘管有關中國精英政治存在着一種秘密的幃幕，從而使我們很難確定所有的具體問題，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恰當指出主導精英關係的情感基調。這種情感基調就是，一種無所不在，廣泛蔓延、滲透于社會各個角落的懷疑感。這種懷疑是有關兄弟式的友愛情誼是否眞實存在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毛澤東對兄弟式友愛情誼有一種純粹形式意義上的理想化；而這種理想化的形成，最初源自于他對自己兄弟的情感的一種心理反動機制（reaction formation）。青少年時代，毛澤東大量閱讀了有關揭竿而起、替天行道的農民起義英雄們之間的友誼的浪漫敘述。這些閱讀進一步強化了他對兄弟式情誼的感情，並且爲之賦予了堅實的內容。因而，毛澤東有一次曾經告訴他的親密助手陳伯達和康生，他自己從正規教育中，什么也沒有學到。陳伯達是毛澤東的私人秘書，有時候還代爲他捉刀，潤色文字；而康生，則一度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頭兒，也是毛澤東與江青結婚的決定的支持者。毛澤東

說："我就是綠林大學的，在那里學了點東西。"[1]正如毛澤東在隨後的談話中暗示的，起義英雄們彼此共享一種純潔的心理；而這種純潔性正是後來革命中同志式關係的本質特點。儘管如此，雖然毛澤東把同志式情誼理想化了，但卻沒有證據表明，他曾經成功地與任何人維持過眞正的兄弟式情誼關係。

在毛澤東政治生涯的早期階段，通過在農民中建立起權力基礎，以及創建江西蘇維埃政權，他爲自己赢得了一定的聲望。此時，他並沒有任何特別親近的朋友。那段時期，他的名字與朱德的名字經常會被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儘管如此，毛與朱的關係仍然只是一種領導紅軍游擊隊的功能性技術互補關係，以及一種基于共同利益的結盟。

毛澤東怎樣成爲中國共産主義運動中的一個主導人物？有關這段故事，仍然處于遮蔽狀態；並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非同尋常的神秘性。在1931年11月7日的瑞金會議上，毛澤東被選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爲了探尋後來有關這次會議的叙述中，究竟有什么東西被過濾和忽略掉了，人們曾經作出不計其數的嘗試和努力。與此類似，人們還考察過1935年8月的毛兒蓋會議。在那次會議上，經過與張國燾的鬥爭，毛澤東的權威得到了確立。一些研究揭示了某些可能的問題，也説明了主要當事人各自不同的政治利益和個人雄心。儘管如此，圍繞着毛澤東崛起的各種神秘性仍然存在。很大程度上，這是由於我們不可能確切指出，究竟是怎樣一些力量促使那些當事人在選擇的時候轉向了毛澤東，並將之視爲最合適的領導人。

當我們將目光轉向毛澤東，對他的個性特徵給予一定關注的時候，大部分神秘性就消褪了。在毛澤東的個性特徵中有一種東西，這種東西使那些觀察者們發現，在毛澤東身上體現出他們自己的某些個性與雄心。毛澤東個性特徵的基本特點，使他可以輕鬆自如地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這種個性特徵源于毛澤東非同尋常的綜合能力。一方面，他對其他人的情感很敏感；另一方面，他又總是努力克服、抵制自己的行爲受到情感因素的影響。毛澤東並

① 毛澤東：《和陳伯達、康生的談話》，1965年12月21日。

不需要做過多的努力就可以使其他人覺得，他們從他的個性中準確地發現了自己想要發現的東西。

一旦毛澤東這種個性特徵和他引人注目的非凡智力水平，以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們發現自己置身其中的那種情勢的邏輯相結合，那么，事情的發展就是順理成章，極爲自然的。當歷史發展到抗日戰爭將近結束時，中國共產黨人正試圖使他們的政治運動變得“人性化”，或者說更加充滿人情味兒，更加容易理解。因而，爲了達此目的，毛澤東就非常突出，並被挑出來作爲一個合適的政治領導人，以便得到公衆的認同。毛澤東的個性特徵，曾經使他得以在中共黨內激發起各種完全不同個性的人們的信心。現在，隨着中國共產黨準備逐步拋棄原來那種較少人情味的“游擊隊”和“八路軍”形象，以便尋求更加一般化的大衆性支持，毛澤東的這種個性再次發揮作用，使他成爲中國共產黨的一種象徵。這是當時歷史情境中一種合乎邏輯的選擇。

共產主義革命勝利以後，毛澤東繼續堅持對同事們施加這種影響力。毛澤東的每個同事都不時覺得，他們完全相信，就其個人而言，毛澤東支持、同情，或者說至少理解自己所追求的目標。隨着毛澤東變得越來越孤獨，越來越變成一個神秘的預言家式人物，下屬們也容易越來越傾向于把他們自己的意圖，理解成毛澤東的某些願望的線索與暗示。我們擁有的有關毛澤東在私人會見中的行爲表現的各種證據表明，相對而言，他的風格經常是消極的。他鼓勵其他人大膽發言。作爲一個“聽衆”，通過並不直接挑戰他們的基本觀點，毛澤東允許他們膨脹、夸大對他的信任。儘管有些值得注意的例外，但總體看來，毛澤東的行爲方式是不在面對面的關係中，運用權力，或者進行批評。恰恰相反，攻擊經常發生在一些較大型的、更加公開的會議上，或者通過一些代表大會來進行。這些攻擊通常是隱秘的、間接的、含糊不清的。

最大限度的減少直接命令或者信號，與此同時，允許其他人假定，他們熟悉毛澤東的意願——這種處事風格，是毛澤東在向適當群體闡述政策變化時一種相當典型的方式。僅僅通過抓住毛澤東意圖中的某些線索，他的同事們就總會大膽前行，支持一項新的政策或者新

的運動；與此同時，宣稱這將是毛主席的意思。這樣一來，他們就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毛澤東孤獨的行爲方式，確實允許其他人利用這種情形，對他的願望進行解釋。當然，這也確保了把失敗解釋成因執行者的冒險行爲所致，而不會對毛澤東克理斯瑪型權威的神秘特性構成威脅。

甚至在某些充滿戲劇性的政治創意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這種模式。這些創意通常被認爲是毛澤東革命精神的表現。譬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陷入革命騷動和混亂之中。一度存在的普遍看法是，這段時期的所有發展背後，都有毛澤東在插手。儘管如此，當所有這些事件過去之後，反思性的評論揭示出的情況卻是：在執行毛澤東的意願方面，其他人是最積極、最充滿活力的；而毛澤東本人，則會假裝表現出他一直保持着非同尋常的疏離感。有關大躍進中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創意，毛澤東僅僅作過這樣一個公開評論："人民公社好"。更加令人驚奇的是，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從未作過任何面向全國的公開講話，以便保衛或者支持任何一個特殊的行動計劃。至多，他對一些有限的團體發表講話。或者，給這個或者那個紅衛兵組織送幾封信。毛澤東後來收回了對紅衛兵的支持。爲此，他的最後一個信號採取了這樣一種神秘的形式：毛澤東以芒果爲"禮物"，送給最初的一個"工農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毛澤東傾向于在同事們中激發創造力，同時卻保持獨立，遠離政策的實際執行。但如果就此傾向進行推測，認爲從個人感情上講，毛澤東不希望捲入實際的政治實踐，那也是不恰當的。相反，毛澤東並不公開闡明他對政策的有關希望，而是迫使其他人激起他的個人感情，以便將他們覺得需要做的事情合法化。這種行爲方式的基本特點在于，他們不得不聲稱，自己與毛澤東有一種親密關係；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得不"利用"毛澤東。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毛澤東能夠保持個人的孤獨感和疏離感，並控制自己的感情；與此同時，又對他人的情感保持敏感。之所以如此，是因爲毛澤東有一種更加基本、更加重要的恐懼。這種恐懼就是毛澤東擔心，自己的感情再次"被他人利用"。如此以來，那些足夠膽大、敢於宣稱跟毛澤東有某種親密關係的人，就不可避免地冒着一定的風險。這種風險就是，毛澤東會覺

得，在那些人“拋棄”自己以前——就像母親當年所作的那樣——他被迫要收回自己的支持性承諾，並且“拋棄”他們。

在毛澤東的整個革命生涯中，一個最具連續性的行爲模式就是，不斷與同事們建立私人關係紐帶，然後再破壞這種紐帶。起初，這種關係發生在他與那些地位比他高的上司之間，然後是地位比他低的下屬，特別是那些潛在的政治接班人。在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早期，毛澤東與黨內領導人物的私人關係的持久性，完全不受他的掌握和控制。因爲，在反對中國共産黨第一代領導人的各種鬥爭中，他只是一個非常邊緣性的、不太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毛澤東對這種組織清洗的反應，就成爲他後來的行動方式的先兆。他能夠突然中斷與同事們的關係。譬如，毛澤東一度把陳獨秀——中國共産黨的第一代領導人理想化。這種理想化曾經達到這樣的程度，即在離開北京給他帶來的各種興奮和激動，以及離開第一個愛人——楊開慧給他帶來的友愛之情時，毛澤東的藉口就是：他不得不去見陳獨秀。毛澤東聲稱，陳獨秀對他的影響，“可能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人”[①]。儘管如此，毛澤東還是非常平靜地接受了陳獨秀的倒台。最初是出于一種技術性的理由，即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後來，毛澤東覺得自己拋棄以前崇拜的英雄是恰當的、合理的。因爲，陳獨秀“失敗以後，就不活潑了”[②]，並且變成了一個“不太重要、沒有個性的人物”。

對中國共産黨隨後的那一代領導人——瞿秋白，毛澤東沒有理由抱有任何特殊的感情。儘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一個兄弟的犧牲與瞿秋白的遇難有聯繫，毛澤東從未對瞿秋白的命運表達過任何情感。當毛澤東隨着紅軍主力進行長征的時候，瞿秋白被拋棄了。在這個被拋棄了的留守群體中，包括毛澤東最小的兄弟。瞿秋白和毛澤覃後來都被國民黨人殺害了。

毛澤東曾經宣稱，他從來不是黨隨後的領導人李立三的朋友。儘管兩個人還在學生時代，就已經相互認識。毛澤東告訴埃德加·斯諾，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154。

②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4月25日。

在長沙師範學校唸書的時候，他覺得“需要一些親密的朋友”。因而，他後來做了一件從他的個性來説，毫不奇怪的事：毛澤東在報紙上發了一篇廣告。之所以説不奇怪，是因爲我們考慮到他對言辭用語和交流溝通之關係的心理學趨向。毛澤東説，自己“接到了三個半答復……這‘半’個回答來自一個不置可否的青年。他就是李立三。李在聽完我講的那些話後，一言不發地就走開了。我們的友誼始終沒有發展起來”[1]。李立三很快就積極投身于中國激進的年輕一代的政治活動中。但儘管如此，不論是李立三，還是毛澤東，二人後來從未克服彼此之間因第一次見面而帶來的那種反感。看起來，事情可能是這樣，兩個人都過于雄心勃勃，因而他們覺得，無法接受對方做朋友。

實際上，隨後毛澤東與同事們之間發生的一切故事，正構成了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歷史。因爲，一旦毛澤東在中共黨内獲得相應的權威地位，他就開始表現出一種引人注目的行爲模式，即先是親近感，然後就是拋棄。唯一的例外是幾個有關轉瞬即逝的不信任事件，以及兩個值得注意的邊緣性拋棄的例子，即他的妻子和周恩來。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這些事例將依次告訴我們很多有關毛澤東個性特徵的東西。

毛澤東在中共黨内政治地位的最初崛起，是圍繞着他與黨内那些“留蘇派”領導人的激烈衝突而展開的。那些領導人安穩地躲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中；而毛澤東卻在艱苦奮鬥，以便建立游擊隊的革命根據地。在長征中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宣稱，他要求成爲同輩群體中的“老大哥”和領導者。長征中痛苦考驗的一個重要標誌，是他與張國燾的分裂。當時以張國燾爲首的那支武裝力量，可能比毛澤東領導的那支隊伍更加強大。一旦作爲中國共産黨象徵性的領導人爲人們所接受，毛澤東與朱德的關係就有所下降。朱德較爲年長，是武裝部隊的司令。他的名字一度曾與毛澤東的名字密切相連，以至於在一段時間里，紅軍曾經廣泛地被稱作“朱毛部隊”。

---

①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rev.ed., New York: Grove Press, p. 146.

1949年共産主義革命勝利以後，有一段短暫的穩定時期。但是，隨後就開始了日益頻繁的、更加充滿戲劇性色彩的人事變動。第一個出事的，是東北地區的一把手高崗，以及他的同事饒漱石。緊接着，是受人尊敬的、主管軍事工作的彭德懷和羅瑞卿。但是，這些人事變動僅僅拉開了毛澤東後來拋棄他“在軍隊的最親密戰友”以及指定的接班人這一鬥爭的序幕。最先捲入文化大革命騷亂之中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他們被稱爲“牛鬼蛇神”。緊隨其後的，是陳伯達和其他一大批人的倒台和遭殃。當然，隨着那場帶來巨大災難的騷動的平息，社會秩序又恢復了。此時，遭到清除的是另一個指定的接班人——林彪。直到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有個現象一直令全世界感到迷惑不解：爲什么毛澤東會拒絶對分別由周恩來代表的穩健性因素，以及跟他妻子江青有關的激進性力量，表示不加限制的支持。可能的情形是，上述每一方在特定程度上都覺得，毛澤東正在接近于拋棄他們所代表的事業。

顯然，一些實質性的問題和客觀上的考慮促成了這種長期的激烈衝突。類似的因素，促成了共産主義運動傳統中的那些黨内鬥爭、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些活動，把共産主義運動中的某些習慣性行爲實踐合法化了。這些行爲習慣，包括暴露和揭示各種意見分歧，以及尋求變化不定的政治忠誠。儘管如此，通過對這些衝突記録的更進一步考察，我們發現，毛澤東的個性特徵，特别是他本人對衝突問題的高度熱情，扮演了一種核心角色。毛澤東多次承認過這一點。

年輕的時候，毛澤東就寫過一首詩：“與天奮鬥，其樂無窮；于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①自從那個時候起，毛澤東就相信，甚至是最具私人化特點的衝突，也只會帶來好處。毛澤東喜歡矛盾、衝突，並且在死亡之中也能發現一些積極的東西。顯然，這種精神爲他賦予了某種熱情，使他不憚于面對自己與同事們之間的分裂性衝突。

① 《毛主席的革命實踐活動——韶山陳列館館長馬玉清同志報告》。

"我們的黨也有兩種可能.一是鞏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時，一個中央分裂爲兩個中央，在長征中與張國燾分裂，高饒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經常的。去年以來。全國有一半的省份在領導集團內發生了分裂。人身上海天都要脫髮、脫皮，這就是滅亡一部分細胞。從小孩起就要滅亡一部分細胞，這才有利于生長。如果沒有滅亡，人就不能生存。自從孔夫子以來，人要不滅亡那不得了。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你說不做，實際做了。精神上要有準備。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滅亡總會有的"[①]。

毛澤東知道，其他人未必同意他對爭議的偏愛；確實，大多數中國人傾向于避免公開的衝突。譬如，高崗事件以後，毛澤東覺察到，如果說那不是純粹的沉默的話，那么，黨內就是籠罩着某種膽小怕事的恐懼氛圍。因而，1956 年 4 月，他在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警告大家："發言中表現神氣不足，下級對上級關係像老鼠見了貓一樣，靈魂被吃掉了似的。"[②]高崗因屈辱而自殺，必定有人爲此而感到震驚。儘管如此，通過區分所謂的"破壞性的"活動——譬如高崗、饒漱石的活動——以及"建設性的"衝突，毛澤東化解了這個難題。他號召實行一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當然，事實證明，毛澤東對相互衝突的觀念的訴求，產生了一定的結果。歷史也表明，甚至對毛澤東來說，這種結果的意義也非常複雜，遠遠超出了他本人的想象[③]。

---

① 毛澤東：《在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1958 年 12 月 19 日。

②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6 年 4 月 25 日。

③ 显然，Roderick Mac Farquar 在他有关文化大革命起源、计划为三卷本的系列研究的第一卷中，确立了有关某些冲突和问题的明确无疑的联系。这些冲突和问题可以追溯到 1956-1957 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那段时期。当时，一个持续性的主题似乎就是毛泽东有关冲突控制的心理的基本问题。有关毛泽东在完全的控制和不受约束的冲突之间矛盾心理的摇摆，参见 Roderick MacFarqu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op.cit。

敵對情感和同志情誼

在直接與他接觸的那批同事們的圈子中，毛澤東無休止地追求兄弟式情誼，與此同時，也包含着對較高層次的觀念交鋒的渴望。這種追求使他與同事們的關係很難持久。毛澤東能夠對人表現出輕鬆的幽默，也可以寬容地接受他人的缺點；他還能由此轉向尖酸刻薄的評論，毫無體諒的羞辱，甚至直截了當的侮辱和譴責。毛澤東這種多變的能力暗示出，他無法控制自己去攻擊、冒犯、挑釁他人的那種心理冲動。儘管如此，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毛澤東並未完全屈從于這種攻擊性心理冲動。恰恰相反，他通常都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通過逐步調整自己的情感和行爲，從而超越他人的行動節奏，毛澤東成功地實現了使自己的行爲驚世駭俗、出人意料。毛澤東能夠表現出與當時情境要求的不一致的感情。在其他人都很緊張的時候，他能夠保持心態放鬆；反之，在其他人都傾向于放鬆的時候，他卻要求緊張起來。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在他克理斯瑪型權威的吸引力之中，這種非同尋常的情緒變換能力是一個關鍵性要素。但對那些與他進行直接接觸的人們來説，這種能力就給人以一種絶對充滿威脅的感覺。人民群衆欣賞具有這樣一種能力的高高在上的領導人，他的個人情緒不會受時間之流的操縱和擺布。而對那些直接與領導人接觸的領導幹部們來説，則不然。面對一個充滿矛盾心理和具有強大能量的上級領導，卻不清楚自己在與他的關係所處的位置，因而，這些人就只會感到某種不安。

甚至，在有的時候，毛澤東可能會試圖讓他的同事們安心。即便如此，使他成爲一個卓越的戰略家的那種極其重要的因素，即對衝突的迷戀和對出人意料的行事的偏好，也必定使同事們對他心懷畏懼。譬如，1961 年，就在彭德懷被打倒之後不久，毛澤東曾經在一次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表示："所有一切可團結的人要團結。就是對反革命分子也不能都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才殺，有的要關起來，管起來。殺人要謹愼，切不可重複過去所犯過的錯誤，如過去搞根據地時

殺人多了一些。延安時規定一條，幹部一個不殺。現在還關了一個潘漢年，絶對不殺。殺了就要比，這個殺了，那個殺不殺？總是不開殺戒。但是不是説社會上一個不殺？有些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人，民憤很大的人，不能不殺幾個。至於中央委員犯了錯誤就不牽涉殺不殺的問題，還是留在中央委員會工作”。我們不會犯斯大林的錯誤，我們也不該犯赫魯曉夫的錯誤。他太文明了，只是把那些人從中央委員會中驅逐出去[①]。斯大林太嚴厲了，而赫魯曉夫又太軟弱了。從這段談話中，毛澤東的同事們怎能不注意到他的矛盾心理？

不可避免的，在毛澤東與同事們的關係中，偷偷溜進了某些充滿威脅的因素。這種給人帶來威脅的個性，很容易通過一個事實得到最佳的理解。這個事實就是，儘管毛澤東總是拒絶兄弟式情誼的要求，但是，他卻願意嘗試着在同事們中間扮演父親式的角色。與此同時，他卻不願意做自己的兒子們的父親。本來，作爲中國共産黨的最高權威人物，毛澤東在與同事們的關係中扮演老大哥式的角色，應該是合理的。儘管如此，正如我們知道的，完全因爲他的個性使然，毛澤東無法像對待兄弟那樣，去對待任何人。

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理解這樣一個事實：毛澤東有時會運用中國文化中父親曾採取過的各種傳統手段，借以提高下級幹部的處事能力。譬如，令子女有羞愧感，侮辱他們，以及支持一些“反面例子”(毛澤東顯然發現，公共環境中有相對的安全感，因而，較之他自己家庭中的情境，就更容易扮演“父親”的角色)。在實施懲戒的風格方面，毛澤東的行爲具有非常明顯的家長式特點。譬如，1957年，在決定應該如何對待那些總愛製造麻煩的作家時，毛澤東有過一段言論。實際上，他自己一度也曾是個製造麻煩的寫作者。毛澤東説：“對於蕭軍、丁玲之類的人，殺、關、管都不好。要抓他小辮子，在社會上把他搞臭。”[②]在同一段講話中，毛澤東還揭示了他對父親角色的矛盾心理。父親究竟應該是一個寬容的人，還是一個懲罰者？對

① 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的講話》，1961年1月18日。

②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27日。

此，他猶豫不决。毛澤東堅稱，應該容許黨内存在各種不同的觀點，"有屁讓他放"。但隨後，他又補充了一句："對於學校鬧事的黨員，討論清楚再開除黨籍"。最後，他聲稱："不要急于開除黨籍。"[①]此時，毛澤東必定使聽衆們處于某種困惑之中。他們不知道，毛澤東究竟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父親"，還是一個蠻不講理的"父親"。

這么多年以來，毛澤東總是試圖向同事們傳達一種相當寬容的態度。他傾向于協商、勸誡，而不是過度的懲罰；他暗示，變革或者恢復關係總是可能的。就在發起對高崗和饒漱石的清洗以後不久，毛澤東向政治局談及"黨内處分"問題。他説："縣、區、鄉幹部處分過多過重。高級幹部（包括處長以上）犯錯誤結論難作，處分下不去……過嚴過重都不對。除反革命外，都要給予改正機會。"[②]

同事們很難確定，毛澤東究竟如何區分：什么是可以改正的行爲，什么又是難以改正的行爲。他們從來不能確定，毛澤東如何决定：是這樣的一些錯誤，而不是其他的錯誤，可以通過適當的自我批評得到糾正。儘管如此，有個事實可以確定：在毛澤東看來，一個官員的地位和級别越高，换言之，他越接近毛澤東，而且與毛澤東的關係越接近于一種潛在的同志式情誼關係，那么，毛澤東就越發覺得，他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有一次，在論及中國共産黨歷史上的"十次分裂或者大的路綫鬥爭"時，毛澤東聲稱：按照他的看法，一旦某個同志獲得了一定的領導地位，那么，任何的改革就不再是可能的了。毛澤東説："犯了大的原則錯誤，犯了路綫、方向錯誤，爲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③]

這種有關扮演父親式的紀律監督者角色的矛盾心理，如果再與毛

①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27日。

②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4月25日。

③《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译者案：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北京，出版者不详，1988年版，第555页）。

澤東有關兄弟式情誼關係的矛盾心理結合在一起，就使我們很難確定：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些行爲習慣是否構成了某種懲戒，或者思想方面的改造和變革；抑或是，這些活動習慣僅僅是一些常規性的努力，以便重新喚起革命激情。譬如，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幹部們都被下放到農村地區的“五七干校”。他們要在那兒獃上6個月到6年的時間，以便“從勞動中學習”。儘管如此，我們並不清楚，這種安排是否構成了某種懲罰、改造，抑或僅僅是一種爲了復興人們革命激情的機會。一些經歷過這些“學校”的幹部否認他們是在遭受懲罰；而其他人則認爲，毫無疑問，他們確實在接受懲罰。有關毛澤東眞實意圖的一個線索，可能在“五七”這個名字。這個“五七干校”，不但指毛澤東1966年5月7日寫給林彪的一封信。它還指毛澤東1915年作過的某些事情。那個時候，政治方面日益覺醒的中國年輕一代獲悉大總統袁世凱與日本人之間的交易。對此，他們非常震驚。當時，年輕的毛澤東還在長沙。據稱，他曾經在一本名爲“明耻篇”的小冊子的封面上寫下這樣一段話：“五月七日，民國奇耻！何以報仇？在我學子。”①

羞耻和復仇、屈辱和怨恨之間的聯繫（the linkage of shame and vengeance, of humiliation and hate），在中國文化中很普遍。因爲中國人廣泛運用羞耻感來鎮壓人們的反抗②。但對毛澤東來說，非常特別的是，羞耻感和受到壓抑的反抗心理被與他面臨兄弟式情誼時遭遇的各種問題聯繫起來。

這通常是一個很合理的假設：有些個體本能地感覺到，羞辱他人可能會激起符合自己希望的、但也是充滿挑釁色彩的活動；但在壓制自己的冒犯性活動方面，他們可能會有一些困難；因而，這些人覺

---

①《读<明耻篇>后题词》（译者案：可见于《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② 有關壓抑性反抗的基本問題和敵意在中國政治文化中的角色，作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做過分析。參見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 I. T. Press, 1968。

得，需要把挑釁性活動表現得很理想化。毛澤東就相信，通過羞耻和侮辱，一些人可以被激發起來，重新行動，以便改正和恢復自己的形象。這種信念，並不是建立在“人性善”觀點的基礎之上。恰恰相反，這種信念似乎與他自己對挑戰性活動的情感有關。在毛澤東那里，他對那些曾經給予他最大傷害的人們的挑釁情緒是最強烈的。可能的情形是，毛澤東形成了某種有關反抗和挑釁活動之情感的心理反動情結。因爲，他對理想化的運用經常採取這樣一種形式，即對那些一度曾經傷害過他的人們表現出非常夸張的慷慨。確實，有時候毛澤東似乎喜歡説一些令人震驚的話。他聲稱，敵人有許多優點。這樣一來，在通常看來相當不可能的情境中，毛澤東卻偏偏提及美國的政策、蔣介石和日本對中國的入侵。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前不久，他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一番講話。這番講話必定使與他共事已久的同志們震驚不已。毛澤東堅稱，儘管1930年代“留蘇派”曾經把自己擠出政治局，並遠離黨的中央委員會，但他對“留蘇派”毫無惡感和敵意①。

毛澤東能夠把自己充滿敵意性的感情，轉變成恢復與下屬們的關係的慷慨行動。這種行爲方式和毛澤東的早期情感發展歷程有關係，並在鄧小平身上得到了較好的體現。鄧小平曾經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個飽受攻擊的鬥爭目標。但充滿戲劇性意味的是，在經歷了6年的軟禁之後，他迎來了政治上的新生。鄧小平不但重新進入了政治局，還成爲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我們應該還記得，在攻擊鄧小平是一個“牛鬼蛇神”的時候，毛澤東曾經抱怨，他“耳朶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來，6年不向我彙報工作”②。對於被忽視，毛澤東表現出非同尋常的痛苦。這種痛苦，讓我們想起他童年時代的情形。當時，隨着兄弟們的相繼出生，毛澤東不再是母親愛心的唯一關注對象。當時，他必定感覺到某種深深的痛苦。毛澤東對鄧小平行爲的進一步描述，非常強烈地暗示我們：在毛

①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工作彙報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24日。
②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工作彙報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24日。

澤東的童年記憶與成年行爲之間，存在着某種聯繫。他把鄧小平的行爲描述成“如喪考妣”，即就像在父母的葬禮上。值得注意的是，某個兄弟姐妹的出生，經常會與有關消逝和死亡的第一次生動體驗聯繫起來。當然，在毛澤東的陳述中，存在一種角色的互換：他把生者與死者之間的關係逆轉過來。儘管如此，仍然存在一定的連續性。因爲，在這兩個例子中，正是毛澤東本人假想自己已經死亡；並且他希望，其他人應該爲他的去世這一事實感到悲痛。通過對毛澤東的行爲裝聾作啞，聽而不聞，鄧小平對待他的方式就好像他確實已經去世了。這一切，正如在毛澤東剛剛開始學會說話的時候，母親卻對他的呼聲表現出“耳朶聾”，聽而不聞一樣。這兩種情形是一致的。反過來，這些情形曾促使毛澤東想傷害母親，甚至於達到這樣的程度，即把自己想象成已經死亡了。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必定感覺到的那種憤怒，可以通過一定的想法得到克制和約束。這種想法就是：我是無辜的，我值得母親去愛，也值得部下們的關注；是他們背叛了我，而我對此卻沒有任何怨恨。因此，我反過來傷害他們的方式，就應該是否認我對他們懷有任何怨恨心理。我將把母親和兄弟們理想化。通過對那些自以爲是的部下們表現出這樣的慈悲與博愛，毛澤東就會使那些人覺得，他們是毫無希望的，他們總得欠着我的人情。

看起來，這似乎是一個非常極端的假設。儘管如此，我們確實從毛澤東自己的言辭中，找到了證據。當被迫參與黨內鬥爭的時候，他傾向于把自己描繪成一個有着純潔的心靈，但卻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人。1964 年 7 月，毛澤東曾向一個來訪的日本社會主義者團體描述過，有關自己被“留蘇派”從黨的高級領導地位上擠下來的感情：

> “黨內出右派的時候，我就是左派。黨內出“左”傾機會主義時，我就被稱爲右傾機會主義。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個孤家寡人。（**再一次的，我們發現這樣一個形象的毛澤東：一個謙遜卑下、受到漠視、遭到隔離和不公正對待，以及無能爲力的個體——引者注**）。我說，有一個菩

薩，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後來，在長征中間，我們舉行了一次會議，叫遵義會議，我這個臭菩薩，才開始香了起來。”①

在毛澤東與那些掌權的同事們之間的關係中，他的情感之流一直游離于親善、友好和敵意、憎恨之間。而且，毛澤東的這種情感之流是非常明顯，絕對不會遭致誤解的。確實，他與所有那些被清洗的同事們之間的關係都破裂了。而圍繞着這種關係破裂的那種情感氛圍的轉折與變遷，可以很容易地就勾畫出來。再一次的，我們可能會發現同樣的情感反應（emotional reaction）。這種情感反應，在考察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與他父母的關係、以及他作爲父親和丈夫的角色時，我們就曾經注意到。有關毛澤東和高崗、彭德懷、劉少奇，以及林彪關係破裂的更加簡潔的概述，揭示出一個重要問題。這個問題就是，那些表面看來似乎是出乎意料的、被夸大了的情感反應，也形成了某種模式，而且，這種模式符合我們對毛澤東心理發展歷程的理解。

譬如，毛澤東與高崗的關係就是他情感反應模式的一個典型例證：最初，以強烈的、積極的情感，和高度的信任爲開始，隨後，這種關係就會因爲某種基于妒忌的懷疑感而受到破壞，最後，發展成深刻的不信任。毛澤東第一次見到高崗，是在長征接近尾聲的時候。當時，他帶領的紅軍正進入陝西，並把高崗從一個監獄中解救出來。此前，高崗正因爲他那現實主義的、“反對左傾”的政治路線，而受到當地左傾共產黨人的拘押。毛澤東立即認可了高崗，認爲他是一個有價值的領導人。毛澤東還公開宣稱，高崗是中國革命必需的、不可或缺的領導人。因爲，“外來幹部比較本地幹部，對於熟悉情況與聯繫群衆這些方面，總要差些。拿我來講，就是這樣。我到陝北已經五六年了，可是對於陝北情形，對於與陝北人民的聯繫，我比高崗同志他

① 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左左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

們就差得多”[1]。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越來越讓高崗承擔更多的領導責任。日本投降的時候，毛澤東就把這個充滿活力、口齒清楚的部下，派到由蘇聯軍隊佔領的東北地區。1946年，當林彪的部隊向長城以南挺進，準備應對即將到來的內戰時，毛澤東讓高崗負責管理整個東北。當時，東北地區是最大的一塊兒解放區。

儘管如此，自那兒之後不久，逐漸的，毛澤東就對高崗日益獨立的處事風格，變得越來越有所懷疑和不信任。很大程度上，高崗的問題主要是不向中央彙報其行政管理活動的任何細節。1949年11月，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毛澤東穿越了東北全境。他發現，到處掛滿了斯大林的畫像，卻沒有一幅是毛澤東的。於是，問題就開始變得嚴重起來。然後，根據赫魯曉夫的說法，當毛澤東到達莫斯科的時候，斯大林曾經直截了當、毫無隱諱地告訴他，高崗經常繞過北京，與斯大林進行聯繫，就好像他將會成爲一個獨立的共產黨領導人[2]。更有甚者，打那以後，每年的日本戰敗紀念日，斯大林都會送給高崗一件禮物：一輛嶄新的轎車。毫無疑問，斯大林希望建立這樣一種觀念，即東北地區應該和蘇聯有某種特別的聯繫；甚至，可能最終會成爲一個緩衝國，就像外蒙古那樣。儘管如此，斯大林必定也知道，他這樣作，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中散佈不信任。

毛澤東有權利對高崗的行爲予以嚴重關注。當然，一個簡單、直接、明瞭的免職是合理的。儘管如此，這個問題涉及到與斯大林的關係。正如我們很快就要注意到的，成年的毛澤東曾經公開表達過，對斯大林這個人的某種依賴關係。毛澤東從未公開批評過他的母親；類似的，他也從未公開冒犯過斯大林。童年時代，毛澤東曾經發現，爲

---

① 轉引自 Klein and Clark,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p. 43（譯者案：引文出自《整頓黨風學風文風》，演講于1942年2月1日，發表于《解放日報》，1942年4月27日，曾收入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輯：《毛澤東集》，第8卷，東京：北望社，1972年，第78頁）。

② Nikita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trans. Strobe Talbot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4, pp. 243–244.

了某個人的那種無法分割的愛，他得進行競爭。他覺得，自己與那個能夠給予愛心的人之間，有一種特別的關係。在高崗問題上，毛澤東又遇到了類似的情境。他的反應是，對自己的情感保持完全的警惕和克制，譴責高崗"忽視"他，以及建立高崗私人的"獨立王國"。唯一能夠令人驚奇的事實是，直到1954年，毛澤東才完全拋棄了高崗。最後，高崗被迫自殺。

清洗高崗的那段時期，在毛澤東、中共領導階層以及蘇聯之間，還存在着某種明顯的親密關係。彭德懷的去職，則發生在黨內深刻分歧剛剛開始出現的時候。麻煩開始于毛澤東堅持一些大膽舉措的時候，在領導階層內遭到了強烈的反對。1956年的"百花齊放"運動中，毛澤東相當自信，他要求所有人——特別是知識分子，來批評現行的政治體制。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中，則爲了加快工業化發展的步伐，而實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一些充滿幻想、不切實際的政策。到1959年的時候，因爲集中于爲實現共產主義而進行的各種政策所導致的經濟問題，已經促使中共黨內大多數領導人不再支持毛澤東的各種發展規劃。這段時期，毛主席明顯處于守勢。一年以前，劉少奇和鄧小平曾經努力讓毛澤東從國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來。現在，他們似乎希望，毛澤東能夠退得更遠一些。黨和國家的管理者們可以預見到混亂和災難。確實，到1961年和1962年的時候，發生了廣泛的糧荒和經濟停滯。作爲中國軍隊的主要領導人物，以及長期以來中共領導階層中一直受到尊敬的一員，彭德懷最先行動，挑戰毛澤東的政策。當時，他剛剛從莫斯科訪問歸來。這樣一來，彭德懷就邁出了反對毛澤東的政策的第一步。

在這種氛圍中，毛澤東開始反擊。他決定，要與那些可能會挑戰他的角色的人們進行鬥爭。1959年7月23日夜，在黨的整個領導階層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發出挑戰。他說："你們講了那么多，允許我講個把鐘頭，可不可以？"[①]作爲一個引言，毛澤東說，他剛剛吃了

①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7月23日（譯者案：可參見李鋭《廬山會議實録》，增訂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三次安眠藥；但是，藥物尚未發生作用，睡不着。現在，他的激情被調動起來："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

在一定程度上，毛澤東的反擊是成功的。領導階層堅稱，需要修正大躍進運動中的比較極端的政策。但他們也同意毛澤東的要求，即最公開的批評者——彭德懷元帥應該被免職。確實，作爲大躍進運動的後果，軍隊的士氣狀況和經濟的發展現狀都受到一定影響。出于對這一問題的擔心，彭德懷曾經批評過毛澤東對某些事務的管理。在他的"萬言書"中，彭德懷引用了另一個將被免職的領導人——張聞天的話。大意是這樣："毛主席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更有甚者，彭德懷還注意到："歷代開國之君都英明而厲害。"①

毛澤東對彭德懷第一份萬言書的狂熱、大膽、令人震驚的反應，可能引起了其他人的干預。因爲，出于他那種猴氣精神，毛澤東大膽説出了他所知道的其他人對他的評論：

> "我已到了'斯大林的晚年'，又是'專横獨斷'，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作大魚釣出來'，而且有些像鐵托，所有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講話了，只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講話的資格，簡直黑暗極了，似乎只有你們出來才能收拾局勢似的，如此等等。"②

通過集中批判他的主要批評者，並把自已描繪成一個基本上受到

①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 年 7 月 23 日（譯者案：可參見李鋭《廬山會議實録》，增訂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② 毛澤東：《關於如何對待革命的群衆運動》，1959 年 8 月 15 日。

誤解、遭到不恰當對待的人，毛澤東試圖贏得同事們的支持。這種風格，讓我們想起他年輕時代曾採用的辦法。當時，爲了試圖引起同學們的支持，毛澤東曾激烈而惡毒地攻擊校長，並且抱怨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和虐待。當然，實際上，我們可以進一步地回溯得更遠一些。譬如，他的童年時代。那時，毛澤東就相信，通過譴責他的父親，他能有效地動員家中的其他人，以便支持他。毛澤東曾經告訴埃德加·斯諾，爲了反對父親，他曾經在家中形成了一條“統一戰線”。這種行爲方式給我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毫無疑問，毛澤東相信，通過重新敘述他如何受到了父親的虐待，所有那些聽過這個故事的人都會本能地覺得，他們不得不同意他的行爲的恰當性。顯然，毛澤東從未設想過，從他的敘述中，有人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更應該引起同情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父親。毛澤東的這種自戀感覺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在彭德懷這個例子中，通過公開闡明對手的觀點和看法，他覺得自己就消除了這種風險。在其他一些可資比較的情境中，不論發生在此之前、抑或之後，毛澤東的策略手法也是如此。毛澤東總是確信，他能夠控制那些聽取他發言的人們的情感。1960年代，在與蘇聯論戰時，毛澤東不斷挑戰蘇聯人，讓他們把中方的論點公開化；同時，還在中國大膽發表俄國人的論辯文章。

一方面，渴望讚揚；另一方面，又把他人的批評公開化——二者之間的結合非常突出。這就使我們確信，由於此前某種不公正的拋棄感，毛澤東曾形成了強烈的自戀情感；但現在，這種自戀感必定受到了嚴重的震驚。毛澤東覺得，自己曾被那個他最重視的人，即他母親深深地傷害；而且，在他看來，這種傷害是不公正的。因而，他很容易就無視父親那種較少具有威脅性的批評。這樣一來，到晚年的時候，毛澤東認識到，通過允許其他人發表批評性的聲音，他就可以聲稱自己的某種內在優越性。毛澤東能夠保護自己，免受拋棄感給他帶來的那種痛苦。這種保護自己的行爲方式和他對批評問題的清醒認識，是爲了用理想化的心理機制來保護自己；這也是爲了證明，他對那些明顯的批評者的清楚理解和慷慨大度。

童年時代，毛澤東能夠把父親對他的批評，轉化成一種確認自己

相對於父親的道義優越性的方法。與此類似，彭德懷最終的悲慘“萬言書”，使毛澤東可能表現出安詳、沉着、高尚而優雅的風範。這封寫給毛澤東的信是這樣的：“我誠懇地感謝你和其他許多同志對我耐心教育和幫助……三十餘年辜負了你對我的教導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難以言狀，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也對不起你，今後必須下大功夫繼續徹底反省自己的錯誤……爲此請求中央考慮，在軍委擴大會議以後，允許我學習或離開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邊學習一邊參加部分勞動，以便在勞動人民集體生活中得到鍛煉和思想改造。”①毛澤東立即決定，把彭德懷的信和他自己對此所作的評論，一起向全黨傳達。毛澤東的評論是：“倘從此徹底轉變，不再有大的動搖（小的動搖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我建議，全黨同志都對彭德懷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態度，予以歡迎。一面嚴肅地批判他的錯誤，一面對他的每一個進步都表示歡迎，用這兩種態度去幫助這一位同我們有三十一年歷史關係的老同志……讀幾年書極好。年紀大了，不宜參加體力勞動，每年有一段時間到工廠和農村去作觀察和調查、研究工作，則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將同德懷同志商量，作出適當的決定。”②從此以後，人們再也沒有聽到彭德懷的聲音。

有關毛澤東政治拋棄問題的下一個例子，來自于他與劉少奇的關係破裂。劉少奇曾經被廣泛地譽爲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也是他正式指定的第一個接班人。當然，這次分裂涉及到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充滿戲劇性色彩的事件。在這次運動中，黨和政府的幾乎所有組織機構全都被打破了。在這里，我們並非要爲那些有關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這場重大事件的叙述來提供補充。相反，我們的目的是，探討這次騷動在情感方面的某些維度。

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標準叙述都承認，在所揭示的事件中，毛澤東

① 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1959 年 9 月 9 日。

② 毛澤東：《對<彭德懷來信>的批語》，1959 年 9 月 9 日（譯者案：可見于《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8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版，第 520–521 頁）。

的個性特徵扮演着重要角色。儘管如此，卻幾乎沒有什么作品曾經清楚地解析過毛澤東與劉少奇關係的情感動力機制。當然，二人的政治分歧有着堅實的政策理由；而且，他們的政治風格也存在着區別。這種風格差異已經得到了較好的理解。但從心理學角度而言，値得注意的就不僅是二人性格上的區別，還有雙方敵意的情感強度。這種強烈的怨恨和敵意性的情感最終會達到這樣一個極端，以至於會涉及個人性格中的某些基本因素。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始于 1923 年。當時，毛澤東第一次發現，自己是湖南地區革命鬥爭的一個有效組織者[①]。毛澤東的母親和父親相繼辭世，離他而去。這使毛澤東獲得某種解脫。因爲在中國，對家庭承擔某些義務是一種公開的壓力。而現在，他不必再爲此而猶豫不決。實際上，他剛剛把弟弟和妹妹動員起來，參加一些令人興奮但又充滿危險的反抗運動。儘管在家里有一個妻子和一個兒子，但毛澤東的精力主要集中于對某種全新形式的兄弟式情誼和領導權威的追求。儘管如此，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只是在延安時期的“圓桌”運動中才眞正變得緊密起來。當時，年輕的劉少奇帶頭幫助中國共産黨實現了布爾什維克化。在他的幫助下，中國共産黨由過去各種政治上的派系團體和軍事上的山頭主義，發展成爲一個列寧主義政黨。在中國共産主義制度建立之後的最初一些年中，如果説不是出現了某種觀點分歧的話，那么，就是逐漸出現了一種勞動分工。劉少奇集中于紀律問題、組織工作、私人行爲規範，以及一般而言的，一種工作倫理，一種通過節儉和犧牲來實現進步的觀點。而毛澤東則關注革命的神秘圖景、理想主義、冒險行爲，以及最重要的，意志力、自發性和革命激情的重要意義。

有關這兩種處事方式的區別，已經有大量的研究著作。特別是，洛維爾·迪特摩爾（Lowell Dittmer）敏鋭地注意到，劉少奇符合哈羅德·拉斯韋爾歸納的“義務性的”人格模式，而毛澤東則體現出“戲

① Jerome Chen,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85.

劇性的"個性特點。實踐最終證明，這些區分具有非常明顯的、充滿説服力的論證意義。儘管如此，實際情況可能並不是這樣；這種區分可能産生某種互補關係。確實，儘管雙方的緊張本來可能更早地就會威脅他們的關係，但毛澤東和劉少奇一直都需要對方。譬如，1955年的時候，他們已經處于明顯不同的軌道上。但隨後，1957年的經濟下降卻使二人重新聯手。因而，到1958年以及大躍進運動開始的時候，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可能比各自本來的觀點所暗示的更加緊密一些①。到大躍進結束的時候，他們仍然能夠對彼此之間的差異進行縫縫補補，至少表面看來是這樣。當然，話雖如此，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他們之間所有的各種分歧，卻一下子全都爆炸性地涌現出來。

從心理學角度看，毛澤東對劉少奇那種最終的強烈反感，讓我們想起他對父親的敵意。毛澤東的父親和劉少奇象徵着同樣的一種力量，即常規化的行爲，對經濟增長的持續熱情，以及中國特色的工作倫理。毛澤東將會譴責劉少奇，認爲這個位居高職的"當權派"是資產階級價值觀念的支持者。和這個指控同樣荒謬的，可能是用一些客觀性的標準來檢驗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當然，這是在一種較爲深刻的意義上。毛澤東的這些指控有些道理。因爲，就和他的父親一樣，劉少奇熱衷于中産階級倫理，即提高個人的經濟地位和物質生活條件。

在整個童年時代，毛澤東都相信，通過攻擊父親那種爲了整個家庭的經濟增長而犧牲每一種東西的過度熱情，他就能贏得母親、弟弟和妹妹的同情。類似的，毛澤東相信，通過攻擊劉少奇和他的盟友們熱衷于追求經濟增長和綜合性經濟利益的力量，他就能擊敗劉少奇。對毛澤東來説，不止是革命者，就是任何有着正確的思考方式的人們，都應該鄙視資産階級的行爲方式和生活態度。毛澤東輕視中産階級生活的單調、無聊和常規化。這就爲我們提供了他對劉少奇的攻擊

① Roderick MacFarqu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pp. 312–317.

和對父親的敵意之間的某種心理學意義上的聯繫。當然，世界上曾經廣泛流傳這樣一種看法，即文化大革命涉及的不僅僅是實質性的政策問題，還恰恰涉及到上述的一些心理學議題。那些雖然對發展中國家的公共政策沒有絲毫的興趣，但卻共享這樣一種看法的人們，把毛澤東視爲他們的支持者：他們不但懷疑父母的價值觀念，就是對中產階級價值觀念的代言人倡導的那些觀念，他們也懷有深刻的不信任。

如此以來，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衝突，就涉及到政治風格、個人氣質和政策判斷的區分。所有這些方面聚合在一起，導向一種直接的對抗。在這種對抗中，就像他與父親的鬥爭一樣，毛澤東需要證明，與傳統的、常規的邏輯推理相比，他的內在感情——或者說他的"猴氣精神"，爲他的行動提供了一種相對而言更加確定的指導。就像他父親一樣，劉少奇完全缺乏對猴氣精神與相關力量的任何理解。這就使毛澤東極度自信，並且甘願去冒各種非同尋常的風險。這恰恰是由於，他們的行爲在毛澤東的內心深處激發了一定的需要，以便由此來檢驗全能感的那種神奇魔力。而這種神奇的全能感，是由毛澤東的自戀感爲他賦予的。

自從文化大革命的戲劇帷幕拉開以後，有關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的個人情感如何影響了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與同事們的關係，似乎不會再有什么新的事件好補充的。儘管如此，毛澤東與林彪關係的破裂可能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林彪的例子揭示了毛澤東對受人景仰與被人膜拜的心理需求，以及他對情感方面任何抗議和不滿的猜疑與不信任。在毛澤東的所有同事中，就公開讚揚毛澤東的偉大而言，沒有人比林彪走得更遠。而對這些人，毛澤東從未表現出比對林彪更加深刻的懷疑和不信任。

毛澤東和林彪最早的接觸是在 1928 年。當時，毛澤東正帶領山區游擊隊退往井岡山地區，林彪則是朱德領導的部隊中的一個年輕軍官。作爲江西蘇維埃紅一方面軍的司令員，林彪顯然對革命的最終勝利表現得有些悲觀情緒。1930 年，毛澤東給這位朋友寫了一封信，後來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爲題公開發表。長征過程中，林彪的健

康狀況有所惡化。於是，到達延安以後，毛澤東讓他休息一下，暫時從軍隊的積極管理活動之中抽身出來。毛澤東還讓林彪做抗日紅軍大學的校長。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毛澤東開始“讓林彪和彭德懷處于相互爭斗的狀態……通過授予彭德懷以一線部隊的指揮權，他還有意識的忽略林彪”①。從那時起，一直到1959年，儘管一直忍受着不佳的身體狀況，林彪曾經取得一些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成績，但他的地位卻一直處于彭德懷的後面。譬如，林彪指揮的第四野戰軍曾經打遍全中國，並最終解放了海南島。自從解放戰爭取得勝利以後，這支部隊就被撤回東北。儘管如此，當主要由四野部隊組成的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奔赴抗美援朝的戰場的時候，負責指揮的卻是彭德懷，而非林彪。只是在1959年8月黨的八屆八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隨着彭德懷的被清洗，林彪才被任命爲國防部長。這樣一來，他就贏得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領導權。

那段時期，林彪似乎正在逐步成爲毛澤東更加親密的戰友。表面看來，似乎確實是這樣，毛澤東越來越對林彪表現出信任。特別是當毛澤東號召全國都來“學習人民解放軍”之後，更是如此。這似乎在暗示，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行政領導應該學習和模仿林彪的一些政策手段。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不得不依靠林彪領導的軍隊。最後，爲了結束文化大革命，以便恢復社會秩序，他也不得不依靠林彪的軍隊。儘管如此，到1970年9月的時候，毛澤東聲稱，他與林彪及其麾下的將領處于直接的衝突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聲稱，在黨的九大的全體會議上，七名將領對他發動了一次“突然襲擊”，其中就包括林彪。按照毛澤東的意思，新的國家憲法不應該設國家主席之職。但是，他們不理睬毛澤東的指示。毛澤東把這次事件稱之爲“兩個司令部之間的鬥爭”。當時的具體形勢如何，我們仍然還不清楚。儘管如此，林彪和那些將領越是推動要求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一

① Stanley Karnow, Mao and 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2, p. 137.

職——當然，這個職位最終將會是他的接班人的——毛澤東就越對他們的動機表示懷疑。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他們這樣搞，總是有個目的嗎！"[①]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他已經告訴林彪和那些將領："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嗎！半句也不頂，等於零。"[②]根據我們對毛澤東的了解，他之所以會對這種被忽視的情形表現出如此痛苦的感情，這一點毫不奇怪。

從心理學角度看，更具重要意義的是這樣一個事實。毛澤東覺得，他被人忽視了；而且，這個忽視他的人曾經爲了奉承他、討好他，以及利用他的自戀感，而無所不用其極。文化大革命那些年中，在林彪的導演和指揮下，人民群衆把毛澤東理想化了。正是林彪，爲毛澤東的"小紅寶書"寫了前言；也正是林彪，不斷讚揚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力量。不管林彪的最終意圖究竟是什么，毛澤東很快就對他産生懷疑——這一事實極具啓發意義。實際上，恰恰是這個人正在竭盡全力地滿足毛澤東的自戀感。在給他妻子江青的信中，毛澤東寫到："他（指林彪）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我是被他逼上樑山的，看來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問題是，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吧"[③]。後來，毛澤東公開攻擊林彪。他指控林彪，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及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和支持中，實際上是"形左而實右"。換言之，林彪表面上看來是在同情和支持毛

---

①《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譯者案：可見于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北京，出版者不詳，1988年版，第555頁）。

②《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譯者案：可見于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北京，出版者不詳，1988年版，第555頁）。

③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澤東；但實際上，他的動機卻是完全不同的。

毛澤東對林彪的阿諛奉承表現出一定的矛盾心理。他需要和林彪奉承、恭維的那個毛主席的行爲表現得言行一致。但與此同時，毛澤東越來越對任何可能影響他情感判斷的企圖表現出更加懷疑的態度。這就使我們想起他與母親的情感經歷。正是母親，一方面給予他對自己價值的一定感覺，同時，又使他對拋棄感表現出某種恐懼心理。林彪顯然恰切地認識到這一點：毛澤東的心理動力是內斂型的，集中于自我的戲劇性表演；而非外向型的，集中于任何特定的客觀事物或者具體目標。儘管如此，在對毛澤東作出下一步判斷的時候，林彪的假設卻是不準確的。林彪認爲，毛澤東的內斂型心理意味着，他會僅僅滿足于停留在扮演某個合適的榮譽性角色上，而不會要求控制實質性事務。而後者這一立場，通常意味着需要承擔某些責任性義務。林彪正確地認識到，毛澤東不愛承擔責任。但他卻完全誤解了毛澤東的個性特徵。林彪沒有注意到，促成毛澤東對阿諛奉承的那種明顯的、無法抑制的渴望的心理根源，同樣也激發了他的另一種潛在的心理，即懷疑感和無法擺脫的不信任感。從毛澤東的心理視角來看，林彪的行爲中可能存在“現象”與“本質”的區分，這一點非常清楚。對此，毛澤東表現出高度的敏感。而這種敏感是與毛澤東對內心深處那種矛盾心理的持久認識相關的。這種矛盾心理必定在他童年時代就已經扎下根了。當時，母親不得不對自己在情感關注和愛心體現方面表現出某種實用主義式的傾向。針對母親的這種行爲，毛澤東就形成了某種心理上的反動，並因此產生了最初的心理需要，即運用理想化機制來對自己的那種心理反動進行約束和控制。

如果要否認毛澤東與林彪關係的破裂曾經受到這種深層次心理考慮的嚴重影響，那只有一個辦法。這就是要證明，基于客觀的理由，林彪背信棄義的不忠行爲超過了可以想象的限度。但毛澤東會覺得，要想提出“客觀”的理由來證明林彪的不忠行爲，實際上很困難，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這就暗示我們，毛澤東不自覺地認識到，其他人可能不會接受他爲了拋棄自己指定的接班人而提出的各種主觀理由。

全國的幹部們被告知，林彪曾經有三次試圖暗殺毛澤東。儘管如此，這種宣傳並沒有立即引起一場自發的憤怒抗議。這一事實暗示我們，許多中國人感到有些困惑，他們很難簡單認同官方宣傳中毛澤東和林彪之間分裂的所謂“客觀”理由。因而，提供有關林彪有計劃的陰謀的各種具體細節，就成爲勢所必需之事。這就是一般稱之爲代號“五七一工程”的秘密圖謀。只需要對它們的音調和重音稍加改變，這幾個數字的漢字發音，聽起來確實很像“武裝起義”或者説“政變”幾個字。爲了進一步確立林彪陰謀的可信性，黨的各級領導幹部都被發給一份文件。據稱，該文件勾勒和概括了陰謀者們的罪惡計劃；還把毛澤東稱爲“B-52”。這是一個比喻，意指毛澤東的行事風格。他傾向于在世界的高空翱翔，而不爲人們覺察；他會扔下炸彈，卻遠遠躲在人們可以接觸的範圍之外。該文件描述毛澤東的用語本來可能激起全黨各級領導幹部們的憤怒。但仔細研究一下，這些言辭多少也確實接近事實的眞相：“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從幾十年的歷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不被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①這樣一來，爲了使毛澤東和林彪之間關係破裂的“客觀”理由看起來顯得很合理，在描述毛澤東的行爲時，該文件就不得不用大量的、非同尋常的筆墨，並且還冒着極大的、令人尷尬的風險——這就勢必成爲一個很自然的選擇。最後，據稱林彪曾試圖逃往蘇聯。在他叛逃過程中，死于一次奇怪的飛機失事，地點在外蒙古境內。

如此看來，就像毛澤東和同事們關係破裂的其他例子一樣，林彪這個案例揭示出，當面臨一些有關政策問題的實質性分歧時，毛澤東總會表現出某些情緒性的反應。而這種情緒性反應，就使毛澤東不可能與那些被他認爲是對手的人，繼續保持任何私人關係。儘管具體的模式可能會有所不同，但它們都符合毛澤東這種或者那種不同的基本

① 1971 年底，有關“571”陰謀者們制定的可疑文件的複印本在香港出現。作者引用的就是這一版本，參見 Issues and Studies，May，1975，pp.78–83。

心理反應類型。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這些情感反應類型是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情感特徵的基本特點。

三個例外

儘管如此，在毛澤東的公共生活中，還有三種關係類型。在一定程度上，這三種關係似乎對上述那些一般的模式構成挑戰。這就是，毛澤東與斯大林的關係，與周恩來的關係；以及在相當次要的程度上，與最後一個妻子江青的關係。

與大多數毛澤東拋棄過的人相比，基于客觀的基礎，他與斯大林的分裂有更多的理由。儘管如此，毛澤東從未公開譴責過斯大林。到斯大林的生命即將終結的時候，毛澤東仍然把他當作一個值得尊敬的人物。確實，在一些私人談話中，以及黨的秘密會議上，毛澤東曾經多次批評過斯大林的某些特殊行爲。但是，他從未對這個蘇聯獨裁者的整體人格進行過攻擊。他也從未對斯大林表現出強烈的敵意。毛澤東本人有關斯大林的基本評價是“三七開”：“斯大林的成績算它七分，錯誤算它三分。”這一評價已經成爲中國共産黨有關斯大林問題的一個基本原則。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對斯大林的評價，並未捲入任何情感性因素。相反，這一評價非同尋常地注重對斯大林的政策及其革命實踐的客觀評估，甚至是一些充滿技術性的估計。毛澤東對大多數人的描述都帶有強烈的情感色彩，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儘管如此，他對斯大林的評價則冷靜而客觀；即便論及斯大林的某些政策，譬如肅反、大清洗的時候，也是如此。但實際上，對大清洗等政策的評估，本來會涉及到強烈的情緒性反應。毛澤東說：“斯大林有許多形而上學，並且教會許多人搞形而上學……蘇聯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學，就是那么硬化，要么這樣，要么那樣，不承認對立統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錯誤……”接着，毛澤東就表示：實際上，斯大林不可能實行嚴厲鎮壓。他沒有殺掉所有的反動派，或者把他們全部投進監獄。

1936年和1937年殺了很多人，1938年就比較少了，1939年就更少了。這説明，不可能殺掉所有的反對派[1]。

毫無疑問，在毛澤東的整個一生中，斯大林是他一直保持敬畏的人物。對於斯大林，毛澤東似乎非常願意承認某種依賴性。我們已經評論過毛澤東在去莫斯科時的一些非同尋常的舉止。那時候，離他建立新中國政權還不到兩個月；而且，他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個月。這是毛澤東的第一次出國經歷。當他和斯大林在一起的時候，毛澤東似乎表現出一定的敬畏之心。而且，他似乎還感覺到，他正在參與世界歷史的潮流，而不只是經歷中國本身的事件。之所以會在莫斯科停留那么久，是因爲毛澤東一直堅持，只與斯大林打交道；此外還有他惡劣的身體狀況和談判的各種困難。爲了贏得斯大林對新中國發展的幫助，這種談判進行得相當艱苦。儘管如此，毛澤東從未對這種艱苦談判的必要性表現出公開的不滿。恰恰相反，在後來描述當時發生的事件時，他還對自己與斯大林對抗的能力表示滿意。1957年，他曾經對一些省級高級領導幹部們表示："我們就和斯大林有不同意見，我們要簽訂中蘇條約，他不訂，要中長路，他不給，但老虎口里的肉還是能拿出來的。"[2]

對毛澤東來説，斯大林是"老虎"；而他，不得不盡力做一個"猴子"。毛澤東的立場是，他不得不作出努力，以便贏得斯大林的注意和尊重。多年以後，毛澤東曾經告訴黨的另一批領導幹部們，斯大林最初對中國共産黨人評價並不高；只是在中國參加朝鮮戰爭以後，斯大林才覺得應該重視他們。儘管如此，毛澤東也知道，朝鮮戰爭以前，斯大林看起來似乎輕視中國；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認識到中國作爲一個偉大國家的可能潛力。在黨的八大上，毛澤東曾經作過一次講話。當時，毛澤東正沉浸在即將開始的大躍進運動的陶醉感中。他夸耀，中國將比蘇聯提前進入眞正的共産主義社會。因而，他在八大發言中説，1949年6月，他如何派了黨的一個代表團去蘇聯；以及在一

---

①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27日。
②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27日。

次宴會上，斯大林如何建議爲了中國將會超過蘇聯的美好未來而乾杯。但是，中國代表團的領導人説，他不能爲了這個祝願而乾杯。因爲，“你是先生嘛，我們是學生”。斯大林回答説：“不對，學生超不過先生，那還算什么好學生。”[①]

如此以來，毛澤東就被向斯大林證明自己的心理需求所驅動。他對斯大林忽視中國很敏感，但同時他也知道，斯大林傾向于看好中國的未來。在毛澤東私人生活的所有人際關係中，他處理與斯大林關係的方式最容易讓我們想起他與楊昌濟教授的關係。他認爲，楊教授是“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楊教授曾經爲他提供了前往北京、與那些激進知識分子的領導人進行接觸的偉大機遇。楊教授還爲他準備了一個將要成爲他第一個生活伴侶的女兒。斯大林也是一個能夠幫助毛澤東獲得進步的人。毛澤東覺得，通過自己的學識，特別是哲學方面的知識，他能夠給斯大林留下印象。不僅在斯大林去世之後，就是在他去世之前，毛澤東曾經在許多場合竭盡全力地評估、讚揚——以及最重要的，批評——斯大林的哲學作品。楊昌濟教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而毛澤東對斯大林的最大批評，就是他極爲輕視人們意志力的重要性。毛澤東閲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評論以這樣的語句開始：“斯大林這本書從頭到尾沒有講到上層建築，沒有考慮到人，見物不見人”[②]。毛澤東進一步批評斯大林，認爲他沒有認識到：“人類認識自然的能力是無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是無限的。現在認識不到的，將來可以認識；現在改造不了的，將來能夠改造。”[③]

顯然，儘管伴隨着某些邊緣性的批評，但毛澤東對斯大林持久認同的基礎在于，他相信，在馬列主義使徒式的接班人中，自己是最值得注意的一個。當然，他與斯大林的蘇聯繼任者的關係破裂的強烈情感反應，部分原因在于他爲這樣一種信念所激發，即他在世界共產主

---

① 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第二次講話》，1958 年 5 月 17 日。

② 毛澤東：《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語》，1958 年 11 月 9-10 日。

③ 毛澤東：《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語》，1958 年 11 月 9-10 日。

義運動歷史中的恰當位置被否認了。沒有必要在這里考察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強烈怨恨情緒。需要指出的，只是對赫魯曉夫的怨恨情緒反映了毛澤東的情感結構。因爲，毛澤東覺得，沒有必要調和矛盾；他可以在同一個講話中，譴責赫魯曉夫這個俄國佬的相互矛盾的品質特點："赫魯曉夫過于謹愼，過于不平衡，是鐵拐李，不是兩條腿走路"；"赫魯曉夫也懂得了搞緊張局勢"，甚至捲入一些冒險活動中[①]。

如果斯大林活得更長一些，那么，毛澤東與他最終也會走到個人關係破裂這一點——這個推測，非常容易理解。儘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毛澤東對蘇聯的某些行爲表達過痛苦的感情，但很明顯的是，他對批評斯大林保持克制。可以理解的是，這部分要歸因于他對某種理想的忠誠與執著。這種理想曾經一度可能使毛澤東成爲世界範圍內所有共產主義運動的得到承認的領導人；因而，現在如果譴責斯大林，就會敗壞毛澤東一度擁有的雄心壯志，使自己受到懷疑。

毛澤東不可能堅持公開對斯大林在歷史上的角色表示敬意。他這樣做也可能是源于這樣一種認識，即在一定程度上，他與斯大林都分享着某種以僞裝面目出現的、類似于冒名頂替者的那種自負。這種自負是有關他們宣稱自己在歷史上的偉大的。實際上，斯大林和毛澤東都受某種傳統的約束。這種傳統就是，他們的合法性訴求，需要他們不止是政治領導人，還應該扮演哲學家的角色。當然，根據從楊昌濟教授那兒得到的經驗，毛澤東認識到，儘管自己可以儘可能享受帶有哲學性質的討論樂趣，但是，他並不屬於世界頂級哲學家。當然，他知道，斯大林也不是。這樣一來，毛澤東雖然願意暴露斯大林作爲一個哲學家的弱點，但這種批評只會限制在這樣的層次上，即他對斯大林的批評可以加強自己作爲一個辯證思想者的斷言。除了這種溫和的批評外，毛澤東仍然堅持這樣一種充滿自負色彩的主張：他和斯大林都是哲學思考者。

確實，自從斯大林去世以後，以及隨後的各種發展，毛澤東從來也沒有希望自己作爲世界上所有共產黨人的最高領袖而得到承認。他

① 毛澤東：《和各協作區主任的談話》，1958年11月30日

對哲學討論也變得越來越沒有多少興趣。毛澤東同意林彪的觀點，即"毛澤東思想"是有力量的。但是，他越來越傾向于不再那么自負，不再去作一些哲學性的精緻化思考。儘管如此，對可能已經發生的事實，他並不願意與之妥協。這樣一來，毛澤東就感覺到某種持久性的需要，即應該對他與斯大林共同擁有的那種自負，保持忠誠和執著。另一方面，毛澤東對斯大林死後的蘇聯進行了批評，這種批評是爆炸性的，也是尖酸刻薄的。毛澤東這樣做的原因，部分可以歸結爲某種不滿。這種不滿必定在毛澤東內心深處得到了穩固的確立。因爲，這么久以來，他不得不順從一個毫不體諒、同情別人的上級。儘管對那個同樣蠻橫、毫無同情心的父親，毛澤東從未表現過屈服、順從，但對斯大林，他卻實行自我約束和克制。這再次暗示我們，毛澤東總是充滿自信。他相信，儘管父親曾經虐待他，但最終，他能夠戰勝父親。毫無疑問，從他與斯大林的屈辱經歷中，毛澤東也得出同樣的結論。他決定，自此以後將再也不會對任何人表示順從。

毛澤東接受自己與斯大林關係中的某種從屬地位，這有些不符合他的個性。與此相應，他與周恩來的穩定關係，同樣也不符合他的個性。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政治關係的標準解釋是，周恩來的穩定地位很少來自于毛澤東的個性。恰恰相反，這更多要歸因于周恩來的能力：他能夠調整自己的政治航向，使之與當時的主流政治氣候相一致；他還能夠確保不讓自己的政治地位在領導等級序列中高於第三個位置，並滿足于這種位置。儘管這種觀點包含着大量的眞相，但是，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看起來有點兒比這更爲複雜。

確實，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總是更爲複雜的關係的一部分。而且，這種複雜的關係還要涉及到另一個重要的人物。最初，是那些遭到清洗的領導人；隨後，則是江青。

在毛澤東、周恩來和江青這個三角中，兩個男人之間的吸引力很少是出于雙方共同分享的某些價値觀念。相反，這更多的是出于他們個性中優點和弱點相互補充的那種方式。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他們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傳統。最終，每個人都發現，他們彼此需要對方的幫助和協調。毛澤東來自于一個日益上昇、富于進取心的農民

家庭，而周恩來則是逐漸沒落的地主官僚傳統的後代。周恩來自己的父親很早就去世了。他後來在一個伯父的家庭中長大。那個伯伯是一個小官員，負責當地的民事管理和刑事事務。儘管如此，周恩來還是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被送到一個大學讀書。後來，作爲一名合格的候選人，周恩來前往法國參加勤工儉學的工讀計劃。而毛澤東只是在第一次上海之旅中，爲那些赴法勤工儉學的朋友“送行”。在法國，周恩來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回國的時候，他與中國共産黨最初建立時那些最具影響力的領導人保持着適當的聯繫。

周恩來的個人風格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城里人，有些大都會和世界主義色彩，在通商口岸的激進主義運動中，如魚得水。而毛澤東，則來自于中國内陸；雖然從來不是一個農民，但卻是一個鄉下人。當毛澤東試圖在那些來自沿海城市的人們中尋求承認時，他唯一合乎邏輯、有説服力的角色，是一個聰明的、能夠向人們講述中國農村民衆種種苦痛的激進主義者。另一方面，周恩來總是表現得溫文爾雅、久經世故。因而，幾乎每個人都發現，他們很難相信，周恩來會是一個革命者。當他還在南開大學讀書的時候，周恩來因爲被指控從事某些激進活動，而遭到逮捕。但他的大學校長卻大聲疾呼，譴責當局是一些不學無術的人，竟然無法區分自由主義的愛國者和共産主義的革命者。因而，校長把周恩來從那些無耻的、丢臉的警察手中保釋出來。只是到後來，那些警察才發現，周恩來捲入共産主義運動的程度，比他們最初懷疑得還要更加深刻得多。

在毛澤東和周恩來加入中國共産黨、展開工作的第一年，這兩個分别是溫文爾雅、彬彬有禮、有着世界主義眼光的都市青年和來自于農村、眼界相對偏狹的農民後代，在黨内問題上一直持不同的看法。周恩來與那些接受莫斯科指揮的、獃在上海的領導人站在一邊，而毛澤東則在江西山區根據地中遭到排擠。當周恩來最初投入農村的共産主義運動，從事一些軍事性工作的時候，他就加強了毛澤東競爭者們的勢力。只是在長征過程中，因爲周恩來的嚴重健康問題，這兩個人的政治命運才走到一起。從那時起，周恩來似乎認識到，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有效性與合法性將不得不來自一個理解農村民衆疾苦的領導

人；幾乎與此同時，毛澤東也認識到，他需要一個“局外人”或者“旁觀者”，這個人基本上能夠把他的運動向世界傳達。

這么多年中，這種功能上的分工變成了一定形式的相互依賴。周恩來能夠理解毛澤東的意圖，而不必遷就毛澤東，對他舉行阿諛奉承；而毛澤東則認可了周恩來某些政治技能的必要性，而不必使那些政治技能成爲自己公共形象的一部分。這樣一來，作爲公共人物，這兩個人通常被認爲是獨立的、完全不同的演員；他們經常扮演一些在某種程度上有點兒矛盾性的角色。儘管如此，在個人層次上，確實有一些迹象表明，二人之間存在着眞正的情感和理解。黨內的一個傳說指出，解放戰爭初期，黨的領導人被迫撤離延安。當時，周恩來身體不好，毛澤東對此很關心。他堅持讓周恩來騎着由騾子拉的擔架。而那，本來是爲毛主席準備的。那些看到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一起的旁觀者們，都對二人之間沒有什么繁文縟節這種情形留下了深刻印象。譬如，一個法國人告訴我們，當他接受毛澤東會見的時候，周恩來就坐在這個偉人的旁邊，悠閑地翻閱一張報紙。顯然，他沒有注意毛主席的講話。這一圖景讓那個法國人很驚奇：“想象一下，誰敢在戴高樂身邊看報紙？”[1]

儘管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風格截然不同，但通常來説，所有人——不管他處于政治光譜的哪一端——都承認，周恩來準確地反映了毛澤東的意圖。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紅衛兵正在熱衷于搗毁一切“舊事物”的痕迹。運動高潮的時候，周恩來能夠通過一個電話就阻止鬧事的學生，使他們不去破壞古老的杭州城中最有價值的藝術品。因爲，即便是最激進的“毛主義的信奉者”也知道，穩重的、做事不帶情緒性偏見的周總理可能代表了受人尊敬的毛主席的意見。在另一個極端，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和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Nixon）毫不懷疑，在與周恩來談判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是在與毛澤東打交道。這一堅定的看法因以下事實而強化，即在談判中的各次會議上，周恩來

① C. L. Sulzberger, The Age of Mediocrity: Memories and Diaries, 1963–1972, New York: Macmillan, 1973, p.8.

會經常爲自己的某些行爲致歉。顯然，這種道歉行動是爲了使談判與他從毛澤東那兒得到的指示相一致[1]。

儘管如此，在毛澤東、周恩來以及江青的奇怪三角關係中，毛澤東顯然一直拒絶在周總理與他妻子之間的政治鬥爭中，對任何一方給予充分的、公開的支持。隨着林彪退出中國政治舞臺，他們之間的三角關係就主導了中國的政治生活。在這種三角關係的後面，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外交政策給予特別支持，但也包括一些內政方針。儘管如此，他允許 1974 年批林批孔運動具有一定的反對周恩來的涵義。對公開支持周恩來，毛澤東顯得很勉強。最具說服力的例子，是 1975 年初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時，毛澤東顯然沒有支持周恩來的某些建議。否則，該次會議就變成了周恩來和他那更加溫和的政治風格的明顯勝利。

另一方面，不論是在公共場合，還是在這些活動的幕後，毛澤東也從未對江青給予有效的支持。毛澤東顯然發現，在他們的私人關係大概有所降低的時候，允許江青扮演一定的公衆角色還是有用的。從政治上來説，兩個人都發現彼此的有用性。毛澤東需要一個激進的代言人，尤其是在文化領域；而且這個代言人將不會具有充滿威脅性的行政權力。而江青需要的，是作爲毛主席的妻子所應得到的權威。儘管如此，就像總會發生的那樣，對誰可能利用他的問題，毛澤東一直保持着極度的敏感。毛澤東和江青之間關係的這種複雜性，在 1968 年 7 月二人會見紅衛兵運動領導人時所的一些評論中得到了揭示。當時，毛澤東正準備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約束和克制。在和那些年輕的紅衛兵領導人交流看法的過程中，毛澤東和江青之間也彼此交換了一些實質性的觀點。譬如，江青表示：對你們這些年輕人，我們負有政治責任；但是光從政治上幫助你們還不夠，你們還必須自己幫助自己(毛澤東顯然會把這解釋爲江青的一種坦白，即在“培養”其個人發展方面，江青的能力有一定的缺陷；因此，他需要自己照顧自己)。

---

① Marvin Kalb and Bernard Kalb, Kissinger,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4, Chapter 10.

毛澤東容忍這個評論。但隨後，就像晴天霹靂，他突然對江青很尖刻：總是指責別人，卻從不指責自己（這個觀點，毛澤東似乎對其他女人也曾有過；再一次的，這似乎讓我們一直回溯到他小時候：當時，母親讓毛澤東自己“照顧自己”）。後來，江青只能以這樣的言辭來回應：儘管我很想幫助你們，但是不要把我放到這樣一個位置，那樣我就無法幫助你們了①。

毛澤東迷戀矛盾。這爲他提供了機會，使之能夠表達他的矛盾心理。看起來，這種迷戀矛盾的心理是理解毛澤東與周恩來、江青三角關係的一個關鍵。他沒有冲動到完全拋棄周恩來和江青中的任何一方，就像他和所有其他同事們的關係那樣。這是因爲，周恩來和江青之間的緊張，足以阻止其中任何一方會對毛澤東形成一種威脅。通過允許他的“總理”和他的“妻子”，以及“穩健派”和“激進派”之間存在矛盾，以便控制晚年時期的政治劇場，毛澤東就能夠再次使自己免于作出一些充滿感情色彩的承諾的需要，以及自由地扮演如其所願的“猴子”角色。

如此一來，儘管最初毛澤東與周恩來、江青的關係，看來似乎與他拋棄某些親密同事們的那種模式，構成一種例外。但實際上，這種關係是另一種形式的、更有說服力的拋棄感；而且，這種形式的拋棄感可能更爲符合歷史事實。在拋棄林彪、劉少奇以及其他一些早期的同事們時，毛澤東部分的是出于對他們可能危及自己個人情感的一種心理反動。通過拒絕公開支持周恩來或者江青，毛澤東就可以超越自己，不必對任何特殊的、可能企圖取代他的同事們承擔義務。對未來中國，毛澤東一直保持着相當的熱情，並抱有極爲確定、不容懷疑的渴望。不管怎樣，中國仍將前行。但是，毛澤東無法繼續扮演統治性“猴氣”角色以後的未來中國，究竟是按照與周恩來的穩健風格相一致的政策繼續前進，抑或是受江青式的更加激進觀點的主導？就像他難以認可接班人的需要那樣，毛澤東的個性特徵使他難以回答這個問題。

---

① 該毛澤東：《招見首都紅代會負責人的談話》，1968年7月28日。

第十一章　問題再思考

——毛澤東個性特徵及其政治活動的心理學分析

通過把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和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並列在一起，以便確定其情感之流中的某些共同模式，我們試圖較好地理解，究竟是哪些可能的因素促成了這個歷史性偉人的成功。在本書開始的時候，我們曾經暗示過，所有的人物——包括偉人——都有一定的隱私權；但是，如果能夠增進我們對這個人的公衆行爲的理解，我們就應該洞悉那些隱藏在他的公衆角色背後的私人生活。

我們相信，本書已經實現了這一設想。至今爲止，有關當代中國的通常解釋都承認，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生活中，毛澤東的個性特徵是一種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重要力量。儘管如此，這些解釋通常大都滿足于停留在這樣一點上。他們注意到，毛澤東是一個“革命浪漫主義者”；他“懷疑常規化的管理和官僚制度”；他是一個“人類意志力”的信奉者，而非“技術和理性”主義者。一些更加深入些的解釋則指出，毛澤東對無序和混亂的態度，體現出某種非常不合中國傳統的無畏感；他欣賞衝突和鬥爭；他不太重視中國人對和諧秩序的那種通常的渴望。他一直被認爲是一個“具有戲劇性的創造能力”，或者説，一個具有克理斯瑪型權威、體現出超凡魅力的領導人。他的政治風格是，無論何時，只要是穩定、安靜和有序的進步佔主導地位，他就表現出深刻的不滿，要求人們保持持久的政治熱情，進行永無休止的反抗和鬥爭。

在這里，我們不但可以發現毛澤東這些或者那些性格特徵的心理學淵源。我們還能認識到，這些特徵看起來是多么和諧一致，並爲我

們提供了某種模式，以便確定其思想和行爲中某些反復出現的類型。母親對毛澤東充滿愛心的強烈支持，爲他提供了持久的渴望，即力圖抓住，或者說，重新抓住某種全能感帶來的幸福狀態；這樣，他的心理動力就被轉向內在的自我。如此以來，這一經歷就爲毛澤東提供了某種自戀感。後來，這種自戀感就成爲他超凡魅力型權威的心理欲求與號召力的基礎。儘管如此，母親後來也“拋棄”了毛澤東。這就使毛澤東認識到，從此以後，要時刻對自己的情感義務保持警惕，從來不能把自己的感情指向身邊的親近人物或者其他什么可能的目標；恰恰相反，毛澤東會運用理想化，以之作爲一種心理防禦機制，並將自己的情感留給一些抽象的、遙遠的事物，譬如烏托邦式的革命、世界性的政治力量以及歷史進步等。母親的“拋棄”，也培養了毛澤東對兄弟式情誼的深刻的矛盾心理。他一直拒絕扮演作爲自己兄弟姐妹們的一個眞正的兄長角色，但是，對理想化的、兄弟式同志情誼關係的吸引力，他卻有着深刻的理解。從他與父親接觸的經驗中，毛澤東認識到，權威可能會受到傷害。他開始輕視那些似乎擁有權力的人；儘管如此，卻試圖引起那些人的注意。毛澤東還決定，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處于“父親”的立場，承擔“父親”的責任。他躲避充當自己孩子父親的角色。最終，毛澤東還堅決反對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爲中國應該有一個國家元首，即便只是象徵性的。於是，他和林彪之間就是否需要設一個國家主席，發生了衝突。最終，在 1975 年 1 月的新憲法中，毛澤東取消了這個職位。

要理解毛澤東作爲一種革命精神的靈魂，其關鍵在于認識到他是這樣一個人，即他的生活並未因受到強力權威的約束而窒息；他不需要反抗過度的控制。毛澤東運用的言辭，是那些成長、生活在這樣一種家庭環境中的人們使用的言辭。在這種家庭環境中，很大程度上體現出某種清教徒式的禁欲主義色彩，並且具有一定的專斷意味。畢竟，對於反抗行爲來説，這種修辭是唯一可用的、爲人們所喜聞樂見的修辭。儘管如此，父親更多的是忽略他、輕視他，而不是約束他、控制他。最終，毛澤東總是能夠用他自己的方式來使父親的願望落空。

毛澤東的反抗意識來源于另一個角落。他對這個世界的憤怒之感來自他曾經歷的某種體驗。他曾經體會過某種安全感、穩定感以及支持性的自我確信；但後來，這種安全感和自信心卻無法維持。這就使毛澤東感覺到，他永遠在追求的是一種虛假的、令他上當受騙的東西。按照毛澤東自己的看法，他的反抗權利源于這樣一些方面：譬如，對道德正義的理解；他覺得，自己應該總是得到“傾聽”，而不是遭到“忽視”；他深信，那些掌握權力的人者只會考慮自己的利益，就像他父親的行爲表明的那樣，因而，他們對他的“需求”不會有什么積極反應。

從歷史上看，我們可以區分出兩種一般類型的反抗。一類人需要破壞、打倒權威，因爲他們一度遭到嚴重的壓制；另一類人則需要改變世界，因爲他們一度曾經熟悉過某種安全感，但這種安全感現在卻無法維係，對此他們表現出深刻的不滿。我們知道，毛澤東屬於第二種類型。這樣説的證據，不但來自于他童年時代的某些經歷，而且還因爲，毛澤東把他自己的反抗需求和他對人民群衆的深刻理解結合起來。他理解人們對安全感、穩定感的渴望，對某種社區感或者共同體的追求，以及對一定程度的認同感的慾望。對那些因爲他們生活的世界不能繼續維持他們一度經歷過的那種程度的自信而倍感憤怒的人們來説，這是一些共同的目標。

儘管毛澤東童年生活的那段關鍵時期也屬於19世紀，但他的反抗精神與那些和他同代的西方人並不類似。因爲，那一代西方人覺得需要反抗的，是某種具有一定的壓抑感、約束力的維多利亞式或者清教徒式的社會秩序。相反，更爲恰當的理解是，毛澤東身上體現出當代西方激進者們的許多特點。這一代西方人的父母曾經竭盡全力，以便確保使他們的子女免于不安全感和挫敗感，他們這樣做的時候，甚至有些過分。而且，這一代人的父輩從未有效實行過自己的嚴厲權威。儘管如此，這一代人的世界卻從來不能滿足這些被移植的期望。如此以來，這代人最終就會不斷地認識到，他們並未得到恰當的信任，他們正受到忽視，他們不被允許參與那些將影響自己的討論。對這些人而言，他們在反抗目標方面的矛盾心理體現在：一方面，希望

引起他人的注意；但另一方面，也是爲了尋求在某種“家庭”式的環境中，獲得匿名感。這種“家庭”可以爲他們提供某種親密的安全感。而這種安全感，一度曾由他們自己的家庭所提供，但現在，卻無法在現實中得到實行與維持。

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的行動風格，不但是一個反抗者，還是一個安全感的提供者。在理解他人的情感方面，毛澤東是一個天才。這就使他能夠認識到領導權和依賴感之間的聯繫。出于他個人自戀感的需要，毛澤東認識到，每個人對自己嬰幼兒時期的安全感和喜悅之情，必定都有一種持久的迷戀和渴望。那個時候，“個人願望的全能感”（omnipotence of the wish）尚未從依賴感之中分離出來。生活本來可以是多么奇妙！這種記憶的普遍力量可以從一個事實中得到證明。這就是，在那些生活似乎沒有爲他們提供多少，甚或完全沒有提供任何希望的人們中，自殺行爲是非常少見的，他們還對死亡表現出某種持久的恐懼①。

毛澤東能夠把他個性中的“猴氣”與“虎氣”兩種特徵結合起來。他也能在公共場合中表現出各種矛盾心理和衝突個性。這種能力也依賴于另一個事實。這就是，他拒絶放縱自己的感情，使之捲入到公共事務中，以至於使他對任何直接、具體的目標或者個人表現出某種“義務感”。就情感方面而言，毛澤東最大的震驚來自于他母親的行爲。這是一個事實。另一個事實是，他另一個兄弟的出生。毛澤東很清楚，自己本來應該愛護這個兄弟，但實際上，他卻沒有。這兩個事實，就鼓勵毛澤東運用理想化的方式來處理人際關係，並以之作爲一種基本的心理防禦機制；與此同時，卻抑制他自己的眞實情感。如此以來，毛澤東就能夠從事一些高度抽象的、有價值的事業；同時，在戰略性層次上，克制自己的感情，使之完全冷靜而客觀，以至於情感方面的任何變化或者説策略權宜都是可能的。

---

① 在與 Harold Lasswell 的一次私人交流中，他向筆者指出這一點。他進一步觀察到：“每個人”必定都受到嬰幼兒時期美好記憶的潛在影響，這或許不是一個夸張的説法。在嬰幼兒時期，依賴感和全能感是相互混和的。因爲，如果未經歷過這種生存方式，任何一個嬰兒就不會活下來。

一個關鍵性的事實，支持了我們有關毛澤東情感發展歷程的解釋的合理性。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經注意到，在我們的叙述中，這一事實已經含蓄而隱約地表現出來了。但在此之前，我們並未覺得，有必要對它做直截了當、明白無誤的評論。從心理學角度而言，這個重要的事實就是，自從童年時代與他父親的衝突起，毛澤東就總是採取某些行動，以便將其他人誘入一種與他處于衝突性的、相互敵對關係的境地；在他生命中的每一個階段，無不是如此。他並未學會分散自己的敵對情緒，或者説，學會容納整個世界。恰恰相反，毛澤東的行動習慣是，他將和某個人——換言之，一個獨一無二的主要"敵人"——形成一定的關係。毛澤東會把自己與這個假想"敵人"的關係套上枷鎖，限定在相互衝突的可能之中。不管對方的具體傾向性如何，毛澤東似乎都有辦法，把那個人拖進與他的衝突之中；隨後，毛澤東就會集中自己的心理潛能，把當下情境中獨一無二的衝突精緻化。

這種關係模式最初以毛澤東與他父親的關係爲開始。隨着他選擇與老師和校長們進行明顯的、毫無理由的鬥爭，這一模式就變得更加突出。青少年時期以後，以及在參加中國共產黨以後的整個革命生涯中，毛澤東就不可避免地發現，他覺得自己有必要和某個人進行鬥爭。這些衝突，傾向于爲他的生活模式提供某種結構化、定型化的因素。幾乎每次衝突都需要一個扮演某種充滿戲劇化意味的角色。在毛澤東的思想意識中，這些角色似乎比"反對派"這個詞有着更加生動的理解。通常而言，他與其他人的衝突都涉及到個人關係問題。但有的時候，他也會和一個更大的對手建立起某種衝突的紐帶。這次是美國，下次是日本，以及最爲激烈的，是與蘇聯的關係。

在進行這些鬥爭的時候，毛澤東能夠採取不同的立場，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這些立場和角色對各種不同的觀衆都會具有吸引力。他的行動，總是令人看起來好像他的個性特徵是安全的、穩定的。在一個較小的範圍內，這種善變特性使毛澤東能夠成爲其他同事們的主導者。在政治局以及比之更大的中央委員會這兩個圈子中，毛澤東總是能夠在任何時候都發現一個多數派。這個多數派將會認同他當時可能表現出來的、任何帶着面具的角色。在一個更爲寬廣的範圍內，毛

澤東總是把自己表現成一個能夠滿足人民群衆當時需要的人物。在所有情境中，毛澤東的個性特徵和當時他所表現出來的那種角色，似乎相當般配，“就好像”他們本來就是天生一對兒。

這些心理學的考慮，展示了在動員中國人民的情感方面，毛澤東非同尋常的超凡魅力的神秘特性。儘管如此，這種心理學考慮可能也解釋了毛澤東在維係、保持他的偉大革命成果方面存在的問題。因爲，正如我們剛纔注意到的，毛澤東有一種基本的恐懼。他擔心自己再次受到其他可能主導自己情感生活的人的傷害。這種恐懼是如此深刻，以至於使毛澤東“拋棄”了所有的妻子和子女。不特此也。這種恐懼還使他不可能對任何同事給予持久的、永恆的支持。

這種有關拋棄感的心理問題，使毛澤東不可能把他超凡魅力的權威委託或者傳授給自己的助手和同事，以便使他們能夠繼續執行毛澤東通過他的權威而贏得的革命成果。問題並不僅僅在于，他的接班人們不能通過超凡魅力的權威來進行統治；因而，他們就不得不依靠一些常規性的實踐習慣和官僚主義的制度機構。而這些管理形式，恰恰是毛澤東深刻懷疑和不信任的。毛澤東更深層次的困難似乎在于，基于某種深刻的心理原因，他無法對任何人維係一種積極的感情；因而，他就不可能認同任何人，作爲自己的合格接班人。

這種難以想象的觀點，必定是通過這樣一種方式來提出的。雖然毛澤東引人注目的個性特徵使他可能重新塑造這個世界上最古老、最遼闊的社會，但是，它也可能使他無法保護自己的革命成果。在不得不“拋棄”那些最直接、最親近的同事的同時，毛澤東實際上可能也在“拋棄”他曾經寄于最大理想的東西，即革命。從毛澤東的個性視角來看，在直接的、親近的同事們和他所鍾情的革命之間，必然存在着一條極爲寬闊的鴻溝。因爲，那些同事們太接近毛澤東，以至於他不能允許自己的感情被導向對他們的偏袒；而他所鍾情的革命，則是遙遠的、抽象的，因而也是一個安全的目標，可以傾注他自己的感情。儘管如此，甚至在追求最爲抽象的理想觀念時，歷史的過程也要依賴于那些從事特定任務的特殊人們。

毛澤東的接班人（或政治繼承）問題，最終會得到解決。中國將

會産生新的領導人。不管他們對毛澤東可能具有怎樣的私人情感，這些新的領導人將不得不承認，就締造現代中國而言，毛澤東是偉大的。正如歷史上的所有偉人一樣，毛澤東將得到無上的尊敬和至高的榮譽。特別是對那些試圖尋求毛澤東偉大特性的神奇魔力，以便確保自己領導權威的合法性的人們來説，就更是如此。這樣一來，隨着時間的流逝，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可能就會變得越來越被遮蔽在神話性的幃幕之中；相應的，人們將更加難以透徹理解毛澤東的私人活動領域——儘管在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身上，必將隱藏着毛澤東之所以偉大的秘密。雖然如此，歷史可能會進行一次輕微的轉向。這並非不可能。儘管現在看起來，這種轉向似乎沒有什么可能；但是，將來或許會揭示出有關毛澤東生活經歷的更多事實，從而使人們可能更好的評估我們對毛澤東偉大特性的解釋。

無論如何，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是穩定的、無可置疑的。不管他的接班人可能是誰，這個繼任者將會具有與他完全不同的個性。毛澤東生活的時代，正處于中國要對現代世界作出應對和反應的時候。他希望中國進行變革，並在世界上所有人的眼中，變得繁榮富強。儘管如此，他也希望中國能夠保持自己的風格。作爲一個領導人，毛澤東來自中國農村，在一個相對有限的偏僻環境中接受教育。而且，他不熟悉任何一門外語。毛澤東之所以懷疑、不信任城市生活，部分地反映了這樣一個問題，即他不能與那些與他同時代的、更加都市化的、具有世界主義色彩的中國人和諧相處。在探索現代中國像西方那般的發展道路方面，較之毛澤東所願意做的，那些人走得更遠。

在切斷與儒家傳統基本生活方式的關係方面，中國社會究竟將走多遠？這是一個潛在的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儘管如此，毛澤東仍然運用他在政治方面的資質，以及他克理斯瑪型權威的天才，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再造中國。但另一方面，毛澤東也無法擺脱他自己生活過的歷史環境的限制。因而，他有關一個全新的中國的看法，仍然在許多方面顯示出一些通常總是與中國的偉大特性聯繫在一起的特點。譬如，強調群體，而不是個人；重視行爲的正確性；相信意識形態和道

德觀念的重要性；關注教育孩子，並使之社會化的合適方式；不但對其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很敏感，還對屈辱問題很敏感；以及與中華文明有關的所有其他特性。毛澤東之所以能夠爲中國帶來令人驚奇的變革，恰恰是由於他認識到某種強制性的、類似于歷史任務或者說使命的力量；這種力量仍然在激發中華文明的後裔，繼續爲了行動的正確性和民族的偉大而努力奮鬥。

心理學只能作爲一面透鏡，使不同個體的生命史（life histories）變得鮮活、生動起來；而無法作爲一個望遠鏡，以便預測未來。毛澤東在歷史上的最終地位，將不僅僅取决于童年時代的生活經驗對他以後生命中各個階段的持久影響；它還取决于那些有關只有明天（或者說未來）才會出現的問題的各種考慮。今天，有關毛澤東的歷史評價呈現出兩種相互衝突的説法（就是説，如果我們可以恰當地排除一些邊緣性的聲音，那么，毛澤東就或者是一個魔鬼，或者是一個半神半人者）。按照其中的一種看法，人們基本上把毛澤東描述成一個充滿情緒性的人物；一個浪漫的革命者；總是願意挑戰人們的常識，製造混亂；以及，在給生活添加某些調味品，使之更加富有情趣的同時，又在阻撓進步，越來越妨礙中國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並試圖在二者之間尋求某種平衡。另一種看法，則爲毛澤東打破常規的舉動而興奮不已，爲他非同尋常的看法而鼓掌歡呼，並爲他偏好平等主義甚于物質進步而祈禱和叫好。

我們對毛澤東的心理學解釋，並未給這樣一個問題提供任何答案，即歷史將證明，究竟哪一種視角是“正確的”，抑或“錯誤的”。恰恰相反，我們一直在試圖找出，那些處于毛澤東個性特徵的核心，以及在以上兩種視角中，都眞實存在的矛盾心理。

毛澤東晚年一直爲這樣一個問題而困擾不已。他覺得，曾經有一種革命精神，指導過自己的一生；但他擔心，中國的下一代是否會保持這種革命精神？當然，可以確定的是，在中國總是存在某種反抗精神。因爲，人們要從長期相互依賴的狀態中擺脱出來，總得有一定的過程。這種過程會具有某種不可避免的特徵。恰恰是這種特徵，確保了總會有一些人變成永無休止的反抗者。儘管如此，毛澤東的疑慮的

合理性在于，將來幾乎沒有幾個人會面臨那種與當年影響他早期生活經歷完全一樣的歷史性力量。

如此以來，就對其個性特徵、乃至現代中國社會政治的歷史發展的重要意義而言，毛澤東的生活經歷中就存在着某種奇怪的矛盾。就歷史視角而言，他屬於一個逝去了的年代。那個時候，中國還是農業文明，仍然生活在她古老的傳統中；只有那些最不安分的、生活在沿海開放口岸的市民（citizen），才試圖尋求進行具有現代意義的變革。儘管如此，從心理學角度講，毛澤東的生活經歷卻呈現出某種不受時間約束的、永恆的、普遍的重要意義。就其與現代中國的誕生的相關性而言，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涉及的，是現在幾近完成的中國革命的一個階段；就其與具有克理斯瑪型權威的革命領導人的心理發展歷程而言，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的故事則有着持久的相關意義。

毛澤東對自己的個性特徵有着深刻的洞察。儘管如此，晚年時期的毛澤東，卻無法在兩個方面之間進行區分。一方面，在歷史上的某個時刻，他是非常合適的革命領導人；但另一方面，中國未來的革命精神則需要一個完全不同的角色。中國的年輕一代是否會對“革命”事業表現出合適的責任感和激情？在對這個問題的焦慮中，毛澤東似乎把革命目標描繪成爲了實現某種靜止的狀態，而這種靜止狀態是符合他那一代人的烏托邦式革命理想的。如此以來，他就忽略了一個現實，即對革命的任何一代接班人來說，他們的目標是進行一些超越前一代人的想象能力的變革。這樣，我們就發現，甚至對他認爲自己所鍾愛的造反與革命的價値，毛澤東也表現出一定的矛盾心理。他擔心，中國的下一代是否具有充分的“革命”特性；以及，他們是否恰當地“符合”他對合格革命者的看法。作爲中國革命的“父親”，他面臨的問題就和那些眞正的父母們面臨的問題很相似。當然，毛澤東的困境在于，他是否眞正希望中國的年輕一代受到他自己的“猴氣”的激發，以及通過他們自己自動自發的創造，可能最終改變他試圖爲中國賦予的各種東西；或者說，他是否希望，中國的年輕一代僅僅以循規蹈矩的方式來表現他們的革命自發性。

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和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其性格特徵的

頂點在一首詩的某些詞句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那是 1975 年初，寫給周恩來的一首詩[1]。當時，正是黨的十屆二中全會之前不久。正如我們經常看到的那樣，自從那首懷念母親的詩詞以後，毛澤東運用言辭時，就不但揭示了他的自覺關注，還有他深刻的內在焦慮。非常恰當的，這首詩詞的題目是“訴衷情”。全文如下：

父母忠貞爲國酬，
何曾怕斷頭？

如今天下紅遍，
江山靠誰守？

業未就，
身軀倦，
鬢已秋；
你我之輩，
忍將夙願，
付與東流？

前兩句聽起來，充滿了堅定的自信語調。因爲這兩句表明了這樣一種觀點，即那些爲革命作出犧牲的父母，絕對可以確定：隨着自己的犧牲，這將對他們的子女意味着什么。下一句就開始透露出某種懷疑情緒。毛澤東揭示出他對這樣一個問題的焦慮和不安心理：當沒有強健的“衛士”，也沒有眞正的“父親”的時候，可能會發生什么事？隨後，在末尾幾句中，絕望佔據了毛澤東的心理。因爲他承認，作爲“父母”，自己的能力有限度。該詩詞的開頭幾句和最後幾句之間，構成了強烈的對比。這種對比強調了毛澤東的一個觀點，即儘管其他人可能是堅定的、有信心的父母，但他知道，自己缺乏作爲一個有影響

① 譯者案：實際上，毛澤東該詩作于 1974 年，並在 1976 年前後抄給周恩來。

力的“父親”的能力。因爲，作爲一個帶有叛逆色彩、天性愛反抗的兒子，他自己就非常成功。在這些表面看似自信的種種表現的背後，隱藏着某種不安全感和自我懷疑心理。這就産生了毛澤東引人注目的兩種精神：“猴氣”與“虎氣”。

這首詩詞寫于毛澤東的晚年。當時，他必定一直在反思，作爲一個公共人物，自己曾經扮演過的所有各種不同角色。就此而言，這首詩詞就爲貫穿本書始終的心理學解釋，提供了一個確認性的佐證。

索 引

注意：以下索引頁碼爲英文版，可見于中文版的切口處；另外，n 指原文的頁下注。

Abandonment 拋棄感：by mother 被母親拋棄 92，93，124，280–81；narcissism and 自戀感和拋棄感 285–86；political 政治拋棄感 261–304，310–11；wives and themes of 妻子和拋棄感主題 185

Adaptability 適應能力、多變性，27–28，310

Administration 行政管理，see Bureaucracies 參見官僚政制

Adversary relationships 敵對關係，using 利用敵對關係，239–42

Agitator 煽動家，236–45；see also Revolutionary career 參見革命生涯

Aggression 冒犯、反抗：fear of 對冒犯的擔心，in Chinese culture 中國文化中，125；shame and 羞恥感和冒犯，in Chinese culture 中國文化中的，279

Alexandrov，G. 亞歷山大洛甫，220

All–China Peasant' s Union 全國農民協會，204

Aloofness 孤獨感、疏離感，27，28

Ambivalence 矛盾心理：about books 有關書本知識的矛盾心理 9，169，235，244–45；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n Chinese culture 中國文化中儒家與道家之間的矛盾心理，253–54；about education 有關教育問題的矛盾心理 43，61，235，244–45（see also Education 參見教育）；exploiting 利用矛盾心理，245–49；about intellectual pursuits 有關智識追求的矛盾心理，132–33；in mother–son

relationship 母子關係中的矛盾心理，75–88；nature of 矛盾心理的特質，35–38；playing out 展現矛盾心理，308–9；and public life 公共生活和矛盾心理，229–33；security of 有關安全感的矛盾心理，130–31；about social identity of family 有關家庭的社會身份之矛盾心理，145；toward wives 對妻子的矛盾心理，223；about words 有關言辭的矛盾心理，249–50；see also Operational code 參見行爲符碼

American culture 美國文化，fairness in 公正觀念，136

Anti–Confucian Campaign（1973，1974）批孔運動，64，312

Appearance 外表，see also Physical appearance 參見體質外貌

Authority 權威：arranged marriage and parental 包辦婚姻和父母權威，182–85；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line of 中國共產黨和權威路線，59；close control of delegation of 對權威之代表的嚴密控制，55–27；confronting 反抗權威，118–19；diffuseness and lack of clarity in defining lines of 確定權威路線上的分散性與缺乏明晰性，59；even–handedness of 公正觀念，in U. S. culture 美國文化，136；as responsive to whim 根據稀奇古怪的念頭作出反應，95，136–37；as source of justice and injustice 作爲正義和非正義觀念的起源，138–39；see also Leadership 參見領導權

Autumn Harvest Uprising（1927）秋收起義，134，204，206–7

Barnett，A. Doak 鮑大可，41

Boldness 大膽，50

Books 書本知識：ambivalence about 對書本的矛盾心理，9，169，235，244–45

Boorman，Howard 霍華德·伯爾曼，27，199

Breaks（splits；political abandonment）分裂（分歧、政治拋棄感），261–304，310–11

Brigade leadership 集體領導，69

British culture 英國文化，fairness in 公正觀念，136

Brothers 兄弟，see also Siblings relationship 參見兄弟姐妹

Buddhism 佛教，75，77，78，126

Bunzel，Ruth 盧斯·本澤，37

Bureaucracies 官僚機構：distrust of 對官僚機構的懷疑和不信任，43；interventions in operations of 干預官僚機構的日常運行，55–57；leadership and 領導和官僚，262–69；operational code and dislike of 行爲符碼與對官僚機構的反感，58

Center，the 中央，59

Central Committee（Chinese Communist Party）中央委員會（中國共產黨），Mao removed from 毛澤東被排擠出去，206，278–81；Mao's majorities in 支持毛的多數派，310

Central Committe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中央委員會（蘇俄共產黨），276

Chai Tso-chun 翟作軍，214n

Chang Ching-yao 張敬堯，192–93，198

Chang Kuo-t' ao 張國燾：on Mao 對毛的評論，22；split with 與之關係破裂，202，268，273，274，278

Chang Wen-T' ien 張聞天，284

Chao Chao-kuo 趙超構，31

Charismatic leadership 超凡魅力的領導（克理斯瑪），12，250–54，310；see also Leadership 參見領導

Chen，Jerome 陳志讓，200，214n

Chen Ch' ang-Feng 陳昌奉，210

Chen Po-ta 陳伯達，267，273

Ch' en Tu-hsiu 陳獨秀，187，196，197，256，271，278

Chiang Ch' ing （Li Yun-he，Lan P' ing，third wife） 江青（李雲鶴，藍蘋，第三個妻子），210–17；children of 江青的孩子，214，222；and Cultural Revolution 江青與文化大革命，107，214–16，303；on Mao，對毛澤東的評論，35；and Mao on formal education 江青與毛澤東對正規教育的看法，267–68；and Mao on himself 江青和

毛澤東對自己的評價，36–38；and Mao on Lin P' iao 江青和毛澤東論林彪，292；marriage with 與江青結婚，212，219；on parent–children relationship 父母與子女的關係，224；partial abandonment of 對江青的部分拋棄，272，273；relationship with 與江青的關係，213–16，295，299–300，302–4；resentment of 江青的不滿，212–13；used 利用 107

Chiang K' ai–shek 蔣介石，30，279；characteristics of associates of 與下屬關係的特徵，143；kidnapping of 軟禁，219；Mao compared with 與毛澤東的比較，26，29；in moratorium phase 心理延緩償付期，164；turns on Communists（1927）背叛共產黨，206

Ch' ien Lung 乾隆皇帝，168

Children 子女，see also Father role，參見父親的角色

Ch' in Shih Huang–ti（emperor）秦始皇（皇帝），7，156，257；identification with 認同秦始皇，63，64

Chinese Communism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effects of Mao on 毛澤東的影響，40；and ignoring private matters 忽視私人事務，102；shaping of 塑造，9；see also Maoism 參見毛主義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中國共產黨，22，256；Bolshevizing 黨的布爾什維克化，247，288；brotherhood in 黨內的兄弟情誼，100；and Ch' en' s downfall 黨與陳獨秀的去職，271；and Ch' ü Chiu–pai 黨與瞿秋白，272；diversity of views within 黨內觀點的多樣性，277；divisions within（1950s–1960s）黨內的分裂（1950–1960 年代），283–84；founding of 黨的建立，91，187，189，198，200，202，300；and Li Li–san 黨與李立三，272；line of authority and 黨與權威路線，59；and Mao Tse–min 黨與毛澤民，103–4（see also Mao Tse–min 參見毛澤民）；Mao as leader of 毛澤東作爲黨的領袖，268–69；Mao' s personality and intra–party struggle 毛澤東的人格特徵與黨內鬥爭，273–75；Mao' s power in 毛澤東在黨內的力量，272–73；organization of 黨的組織，42；organizational work for 黨的組織工作，202–3；policy changes and loyal to 政策變遷和對黨忠誠，263；punishment within 黨

內處分, 277–78 (see also Purges 參見清洗); "Ten Great Splits" in 黨內十次大的路線鬥爭, 278; "two lines" struggle and 黨的兩條路線鬥爭, 266; violating polices of (1927), 違背黨的政策, 206; see also Central Committee and Politburo 參見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

Chinese culture 中國文化: ambivalence i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儒家與道家之間的矛盾心理, 253–54; arranged marriage in 包辦婚姻, 181–85; authority in 權威, 95, 136–37; emotional control and 情感控制, 123–24; father-son relationship in 父子關係, 119–20; fear of aggression in 擔心冒犯, 125; power of slogans in 口號的力量, 253; privacy and 隱私權, 21; shame and aggression in 羞恥與冒犯, 279; sibling relationships in 兄弟姐妹關係, 93–96; Western influence on schools and norms of 西方觀念對中國文化中的學校生活和行爲規範之影響, 178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 dynamics of modern 現代化的動力, 8–9

Chinese people 中國人民: link between Mao and 毛澤東和中國人民的關係紐帶, 100; see also Nationalism 參見民族主義

Chinese revolution 中國革命, 3; dynamics of 革命動力, 9; essence of 革命本質, 233; institution and 制度與革命, 16; as response to personality of Mao 對毛澤東人格特徵的反應, 8; see also Cultural Revolution 參見文化大革命

Chinese society 中國社會: leaders as imperial figures and 作爲帝國政制和中國社會的領導, 4; see also Chinese culture 參見中國文化

Chinese thought 中國思想, traditional, 中國傳統思想 44–46; see also Confucianism 參見儒家

Chou En-lai 周恩來, 27, 127, 128; and Mao-He-Tzu-chen relationship 與毛澤東、賀子珍的關係, 210; partial abandonment of 對周恩來的部分拋棄, 272, 273; poem to 寫給周恩來的詩, 314–15; relationship with 與周恩來的關係, 295, 299–304; support for 支持周恩來, 215

Chou Shih-chao 周世釗, 21

Chow Ching-wen 周鯨文，212

Ch' ü Chiu-pai 瞿秋白，272，278

Chu Teh 朱德，23，105，268；declining relationship with 關係削弱，273；Mao compared with 與毛澤東的比較，33

Chung Kuang-ying 鄭觀應，147

Churchill，Sir Winston 溫斯頓·邱吉爾，163，230

Clan leadership 宗族領導，69

Clark，Ann B.安·克拉克，199，214n

Clothes 服飾，20–23

Collectivization（1955）集體化，51

Comintern 共產國際，197，206

Communism 共產主義：leadership of world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247，298；modernization and 現代化與共產主義運動，167–68；see also Chinese Communism，Maoism，Marxism 參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毛主義、馬克思主義

Communism Manifesto（Marx and Engels），《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195

Communist party 共產黨，see als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參見中國共產黨

Communization（1959）人民公社化運動，51，53，56

Comradeship 同志關係：absence of real，缺乏眞正的同志情誼 268；developing school 發展學校中的同志情誼，172；father role and 父親角色與同志，276–79；and formal association 同志與正式社團組織，173–74；hostility and 敵意和同志，275–94；idealization of 對同志關係的理想化，98–101，156，268；leadership and 領導權與同志關係，261；shame 羞恥感，aggression and 冒犯，279；value of 有關同志關係的價値觀念，for Chinese 對中國人而言，150；see also Peer relationship 參見同輩人關係

Concis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Soviet Union Publication）《簡明哲學詞典》（蘇聯），47–48

Conflict 衝突：and gaining father' s attention 贏得父親的關注，128–30；intra–party 黨內矛盾，273–75；method of 有關衝突的方法，309–10；purged 被清洗，134，271，273，281–94；reactions to 對衝突的反應，in operational code，行爲符碼 61–66

Confrontation style 反抗的風格，153–55

Confucianism 儒家：ambivalence in Chinese culture between Taoism and 中國文化中儒家與道家的矛盾，253–54；break with 與儒家關係破裂，63–64，312；end of 儒學的終結，178，179；search to replace 尋求替代儒家，233；sibling relationship in 儒學中的兄弟姐妹關係，95，98–10；as source of sense of moral superiority 作爲道德優越感的緣起，126

Confucius 孔子，47，54，64，190，234；cited in Mao' s work 毛澤東作品中對孔子的引用情況，240

Consciousness，raising of political 逐漸培養起來的政治自覺，251–2

Contradiction 矛盾：use of concept of 對矛盾概念的運用，44–49

Conversation 談話：unexpected turns of 談話中未預期的轉折，7–8

Cressy–Marcks，Violet 懷利·克羅西–馬科斯，28–29

Criticism 批評：reactions to，對批評的反 in operational code 行爲符碼，61–66

Culture 文化：see also Chinese culture 參見中國文化

Culture Revolution (1966) 文化大革命，40–43，225，270；boldness in 文革中的大膽無畏，52；and break with Liu Shao–ch' i 文革中與劉少奇關係的破裂，287；Chiang Ch' ing and 江青與文革，107，214–16，303；Chou En–lai in 文革中的周恩來，302；historical allegory in 文革中的歷史典故，63；importance of Mao' s words during文革期間毛澤東的言辭之重要意義，248；and Lin Piao 文革和林彪，291，292；purges in 文革中的清洗，273；and swim in Yangtze 文革和暢遊長江，72–73；"two lines" struggle in 文革中的"兩條路線"鬥爭，266

Darwin，Charles 查理斯·達爾文，163，168，242

Das Kapital (Marx) 《資本論》(馬克思), 35

Death 死亡: birth of sibling and sense of 兄弟姐妹的出生和對死亡的感覺, 92; concept of contradiction used against 用以對抗死亡的矛盾概念, 47–48; Culture Revolution as response to 作爲對死亡的一種反應的文化大革命, 41; wonderment on the death of family members 對家庭成員死亡的敬畏感, 108–9

Decision maker 決策者: traits as 人格特性, 43; see also Operational Code 參見行爲符碼

De Gallue, Charles 夏爾·戴高樂, 27, 302

Deification 神化: a feature in 神化特徵, 201

Dependency 依賴感: leadership and 領導權, 12–13, 308–9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辯證唯物主義, 45

Dialectics 辯證法, 44–45

Dissenters 持不同政見者: purging 清洗, 205

Dittmer, Lowell 洛維爾·迪特摩爾, 288

Drama 戲劇: Chinese appreciation of 中國人對戲劇的理解, 7; use of 對戲劇的運用, 31–32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Stalin)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 297

Education 教育, 143–74; admission 接受入學, 149–51; ambivalence toward 對教育的矛盾心理, 43, 61, 235, 244–45; behavior while getting 上學期間的行爲模式, 149–55; of brothers of Mao 毛澤東的兄弟的教育狀況, 101–2; in commercial school 商業學校的教育, 167; confrontation style used in period of 上學期間的反抗風格, 153–54; degree 教育程度, 174; desired qualities in 預期的教育特質, 117–18; expanding intellectual world 拓寬自己的知識視野, 156–57; first military experience compared with 與第一次軍旅生活體驗的比較, 160–61; influence of western 西方教育觀念的影響, 150, 177–79; normal school 師範學校, 20–22; peer relations and 教

育和同輩人關係，149–54，172；physical labor and 體力勞動和教育，132–33；as practical investment 教育作爲一種實際投資，144；primary school 小學，80–83；self 自我教育，168–70；social injustice and getting more 社會不公正和獲得更多教育的關係，146–47；as teaching nothing 什么都沒教的教育，267–68；in traditional middle school，傳統中學的教育，168；type of received 接受教育的類型，5；university 大學教育，90–91，186–88；urban-based 以城市爲基礎的教育，158–60

Egalitarianism 平等主義，belief in 對平等的信念，43

Electrons 電子，127，128

Elegant，Robert S.，羅伯特·S.·艾黎珍特，41

Elite style 精英風格：popular vs.與群衆路線相對， 60–61

Emi Hsiao 蕭三，162

Emotions 情感：abandonment by mother and control of 爲母親所拋棄和對情感的控制，124；anger 憤怒，32；and Chinese culture 情感與中國文化，123–24；command of 駕馭自己的情感，27–29；critical development of 情感的關鍵性發展，193–96；drama and 戲劇與情感，31；importance of control of 對情感進行控制的重要性，123–26；Mao on 毛澤東論情感，14–15；transience of 情感的短暫性、非持久性，86–87；see also Rebellion 參見反抗

Emperors 皇帝：Mao' s style reminiscent of style of 毛澤東的風格令人想起皇帝的風格，55

"Energy of the Mind" (Mao)，《心之力》（毛澤東)，186

English 英語：lack of knowledge of (language) 缺乏英語知識，167，168

Erickson，Erik 艾瑞克·艾黎克森，163

Examinations (school tests) 考試，173

Failure 失敗：fighting back in face of 對失敗進行反抗，53–54；of Great Leap 大躍進的失敗，51，91，284；withdrawal in face of 面對失敗的退縮，52–53

Family 家庭，69–142；ambivalence over social identity of 有關社會身份的矛盾心理，145；brothers 兄弟，see Mao Tse–min，Mao Tse–tan 參見毛澤民、毛澤覃；daughters of 女兒，see Li Min，Li Na （see also under specific wives）參見李敏、李訥（也可參見各個特定的妻子）；father 父親，see Mao Jen–sheng 參見毛順生；grandfather in 祖父，74–75；leaving home 離家出走，149；mother 母親，see Wen Ch' i–mei 參見文七妹；sons 兒子，see Mao Aan–ching，Mao An–lung，Mao An–ying 參見毛岸青、毛岸龍、毛岸英；sister 妹妹，see Mao Tse–hung 參見毛澤紅；wives 妻子，see Chiang Ch' ing，Ho Tzu–chen，Yang Kai–hui 參見楊開慧、賀子珍、江青；see also Father role，Husband–wife relationships，Sibling relations 參見父親角色、夫妻關係、兄弟姐妹關係

Fan Wen–lan 範文瀾，257

Father role 父親角色，175–226，315；changes in 變化，126–27；in Chinese culture 中國文化中，119–20；to colleagues 作爲同事們的父親，276–79；concept of contradictions and 矛盾概念和父親角色，46–47；defined 確定的父親角色，217–26；as obscure area 作爲含糊不清的領域，175；refusal to accept 拒絕接受父親角色，141–42，223–24，306–7

Filial piety 孝，75

Firstborn son 長子：importance of，重要性 93；responsibilities of 長子所應承擔的責任，16，94，97，98

“571” Plan “五七一”工程，293

Food riots 糧食騷動，145，146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boldness in 英勇無畏，52

Foreigners 外國人，48

Fraternity 兄弟情誼，see Comradeshi，參見同志關係

French culture，法國文化：arbitrary punishment and 專橫的懲罰，136

Freud，Sigmund 西格蒙·弗洛伊德，163，231

Friendship 友誼, see Comradeship 參見同志情誼

Gaulle, Charles de 夏爾·戴高樂, 27, 302

God 上帝, 7

Gods 神, men as 人作爲神, 48

Golden Monkey 美猴王（孫悟空), 37

Goodness 善良品質: myth of 神話, 13

Government operations 政府運作過程: intervention in 干預政府運作, 55–57; see also Bureaucracies 參見官僚機構

Great Heroes of World《世界英雄豪杰列傳》, 157

Great Leap (1958), 大躍進, 296; failure of 大躍進的失敗, 53, 91, 284; hand of Mao assumed in 認爲毛澤東在背後發揮作用, 270; inviting criticism of 引起對大躍進的批評, 283; Liu–Mao relations and 大躍進與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係, 288; as risk 作爲冒險的大躍進, 52

Guerrilla warfare 游擊戰, 51

Han Fei–tzu 韓非子, 265–66

Han Su–yin 韓素音, 199

Han Wu–di 漢武帝, 156

Handshake 握手: characteristics of 特徵, 33

Health 健康, 25; in 1960 一九六零年的健康狀況, 27; obsession with 對健壯的迷戀, 133–34; problems in adolescent 青少年時期的健康問題, 175; recourse to illness 訴諸于疾病, 133–34; as source of punishment 作爲懲罰的緣起, 85; see also Physical fitness 參見身體健康狀况

History 歷史: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現代中國的歷史動力, 8–9; views of 對歷史的看法, as young student 作爲年輕的學生, 157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an Philosophy (Alexandrov)《西歐哲學史》, 220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163–64

Ho Tzu-chen (Ho Shih-chen, second wife) 賀子珍（第二個妻子）, 35, 205–13, 214n; break up of marriage 婚姻破裂, 210–12, 219; children of 賀子珍的孩子, 209, 210, 217, 222; meeting 與賀子珍相遇, 207; relationship with 與賀子珍的關係, 208–10, 214–15

Hsiang-Chiang P' ing-lun, 《湘江評論》, 244

Hsiao Chun 蕭軍, 277

Hsiao Li 肖力, 214, 222–23

Hsiao San 蕭三, 170, on Mao 論毛澤東, 34; on Mao' s mother 論毛澤東的母親, 79–80

Hsin Ch' ing Nien (New Youth, Journal) 《新青年》(雜誌), 187, 256

Hsin Min Hsuch Hui (New People' s Study Association) 新民學會, 174, 187

Hu Shih 胡適, 22

Huang Ch' iung 黃瓊, 37–38

Huang Huang 黃興, 145

Humiliation 屈辱: by Stalin 由斯大林帶來的屈辱感, 299; wakened 覺醒了的, sense of national 民族屈辱感, 144, 147; see also Nationalism 參見民族主義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1956) 百花齊放運動, 51–52, 283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s 夫妻關係, 172–226; absence of enduring 沒有持久的夫妻關係, 87; concept of contradictions and 矛盾概念與夫妻關係, 46–47; death of first wife and 第一個妻子的犧牲, 107, 108; idealization of 理想化, 185, 194; mystery of 神秘性, 34–35; see also Chiang Ch' ing, Ho Tzu-chen, Yang Kai-hui 參見楊開慧、賀子珍、江青

I Pei-chi 易培基, 198

Idealization 理想化：of decision to leave home 決定離家出走，147；as defense mechanism 作爲一種心理防禦機制，4–66；of fraternity 兄弟情誼，98–101，156，208；of mother 母親，82；sex and 性欲，176；of woman 女人，185，194

Ideological innovation 思想觀念的創新：common pattern of 共同模式，163

Ideologue 意識形態理論家，229–36；characteristics of 特徵，249–50；faith 信仰，reason and 理性，254；general features of 一般特徵，229–33；see also Maoism 參見毛主義

Illness 疾病：recourse to 訴諸疾病，133–34；see also Health 參見健康狀況

Imperial system 帝國政制：Mao' s style reminiscent of style during 毛澤東的風格令人想起帝制時期的風格，55；traditional 傳統的帝國政制，265

Impersonal relationships 非人格化的關係：operational code and 行爲符碼，57–59；village life and 鄉村生活，72

Individual will 個體意志，see Willpower 參見意志力

Institutionalization 制度化：effects of Mao' s dislike of impersonal relations on governmental 對毛澤東反感政府管理制度的非人格化關係之影響，58；see also Bureaucracies 參見官僚機構

Institutions 制度：building enduring 建立持久的制度，16

Intellectual pursuits 智識追求：abstract unreality of 抽象的不現實性，169

Intellectual world 智識世界：education expanding 通過教育來擴展，156–57，see also Education 參見教育

Jao Shu-shih 饒漱石，273，277，278

Jefferson，Thomas 托馬斯·杰斐遜，230

Justice 正義：father and sentiments of injustice and 父親與有關正義和非正義的情感問題，135，139–42；sentiments about 有關正義的

情感，135–42；social injustice and getting more education 社會不公正和獲得更多教育的關係，146–47

K' ang Sheng 康生，210，267

K' ang Yu–wei 康有爲，156

Kao Kang 高崗：break with 關係破裂，134，273，273–78，281–83

Karl Marx' s okonomische lebren（Kautsky）《馬克思論階級鬥爭》（考茨基），195

Karnow，Stanley 斯坦利·卡爾諾，40–41

Kautsky，Karl 卡爾·考茨基，195

Ke Lao Hui （Elder Brother Association）哥老會，146

Kennedy，John F.約翰·F.·肯尼迪，14

Khrushchev，Nikita 尼吉塔·赫魯曉夫，247，276，282；on Mao 論毛澤東，26，42；Mao on fall of 毛澤東論赫魯曉夫下台，40；Mao' s hatred for 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厭惡，298

Kiangsi Soviets 江西蘇維埃，207–10

Kierkupp 柯卡普，195

Kissinger，Henry 亨利·基辛格，18，27，302

Klein，Donald 唐納德·克萊因，199，214n

Know Shame《知恥篇》，279

Korean War 抗美援朝，52，221，290–91；death of oldest son in 戰爭期間長子犧牲，108；Stalin and 斯大林和抗美援朝，296

Kung Ch' u 龔楚，31，207，209

Kuomintang 國民黨，203，206

Lan P' ing 藍蘋，see Chiang Ch' ing 參見江青

Land reform（1950）土地改革，51

Lao–tzu 老子，45

Lasswell，Harold D. 哈羅德·D.·拉斯韋爾，10，237，288，308n

Laziness 懶惰：Mao on 毛澤東論懶惰，122–23

Leader–follower dependency 領導者和追隨者的相互依賴心理，12–13，308–9

Leadership 領導權：bureaucracies and 官僚政制和領導權，262–69；charismatic 超凡魅力的領導，12，250–54，310；comradeship and 兄弟情誼和領導權，261；concept of 領導權的觀念，98；dependency and 依賴心理和領導權，12–13，308–9；party leaders 黨的領導人，271–73；policy and 政策和領導，269–71；problems in styles of 領導權的風格問題，261–62；see also Operational code 參見行爲符碼

Lenin，Vladimir I.弗拉基米爾·I.·列寧，54，63，163，230

Leninist party 列寧主義政黨：essential question for 基本問題，63；see als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參見中國共產黨

Li Ang 李昂，23，214

Li Chung–de 李崇德，218

Li Jui 李鋭，20，21，23

Li Ku 李固，37

Li Li–san 李立三，42，202，278

Li Min（Mao Mao，daughter）李敏（毛毛，女兒），214，222–23

Li Na（Hsiao Li，daughter）李訥（肖力，女兒），214，222–23

Li Ta–chao 李大剑，91，187

Li Yuan–hung 黎元洪，161

Li Yun–ho 李雲鶴，see Chiang Ch' ing 參見江青

Liang Ch' i–ch' ao 梁啓超，148，165

Lifton，Robert J. 羅伯特·J. ·理夫頓，41

Lin Piao 林彪，279；break with 關係破裂，215，273，281，290–94，302，304，307；death of 林彪之死，294；in Japanese war 抗日戰爭中的林彪，282；and Mao identifying himself with Ch' in Shih Huang–ti 毛澤東自己認同秦始皇，64，257；and Mao' s "thought" 林彪和"毛澤東思想"，299

Little Red Book 紅寶書，117，248，292

Liu Chung–hsien 劉中嫻（音譯），211

Liu Shao-ch'I 劉少奇，134；break with，關係破裂 57，273，281，287–91，304；losing power to 喪失權力，92，233，283；Mao Jen-sheng compared with 與毛順生比較，288–89；and "two lines" struggle "兩條路線"的鬥爭，266，wife of 妻子，as China's first wife 作爲中國第一夫人，212，215；work with 一起工作，202

Liuists 劉少奇一派的，41

Lo Chang-lung 羅章龍，278

Lo Jui-ch'ing 羅瑞卿，273

Logic（Spence）《邏輯》（斯賓塞），168

Long March 長征，105；appearance during 長征時期的外表，23；Chou on 周恩來論長征，301；Ho Tzu-chen and 賀子珍與長征，209，210；success 長征成功，247

Longo，Luigi 陶利亞蒂，219

Loyalty 忠誠：policy changes and 政策變遷和忠誠，263；sensitive to 敏感，86，87

Luther，Martin 馬丁·路德，163

Malraux，André 安德烈·馬爾羅，5；on Mao 論毛澤東，18；on Mao's feminine appearance 論毛澤東的女性化外表，33

Man of action 行動家：quality as 品質，230，233

Manchu Dynasty 清朝：fall of 崩潰，159，160

Mao An-ch'ing（Nikolai，son）毛岸青（尼古拉，兒子），218–21

Mao An-lung（son）毛岸龍（兒子），218，219

Mao An-ying（Sergei，son）毛岸英（謝爾蓋，兒子），218–22；birth of 出生，199，200；death of 犧牲，218，219，221–22

Mao Hsuan-hsin（nephew）毛遠新（侄子），224–25

Mao Jen-sheng（father）毛順生（父親），83，111–42；adopting values of 採納父親的價值觀，122–23；ambivalence about words and ambivalence about，有關言辭的矛盾心理，249；as authoritarian 作爲一個專斷的權威，74–76；being spokesman for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arguments with 作爲中國民族主義的代言人和與父親毛順生的鬥爭，239–40；biography of 傳記，112–13；characterized 特徵，79，112；clashes with 衝突，78，80，82；conflict and gaining attention of 衝突與贏得關注，128–30；death of 父親之死，107；emotional control and 情感控制與父親，123–24；hatred for 憎恨父親，90，115–16；joking about 嘲笑父親，116–17；justice–injustice sentiments and 父親與有關正義和非正義的情感，139–42；Liu Shao–chi compare with 與劉少奇比較，288–89；Mao as viewed by 對毛澤東的看法，117–18；and Mao' s apprenticeship in rice shop 毛澤東到米店做學徒，143–44；and Mao' s cause of suffering 毛澤東感受痛苦的緣由，114–15；and Mao' s enrollment in commercial school 毛澤東報名參加商業學校，167；and Mao' s going to school 毛澤東上學，101–2；Mao' s interpretation of relation with 毛澤東對與父親關係的解釋，doubted 懷疑，97；and Mao' s style of confrontation 毛澤東的反抗風格，155；and Mao' s teaching career 毛澤東的執教生涯，171；measure of existence for 存在的檢驗標準，112；method of conflict with 與父親衝突的方式，309–10；mother–son relation and 母子關係與父親，76–77；rises to economic well–being 經濟日益富裕，69–70，72，73；and running away from home 離家出走，81–82；task assigned Mao by 父親分配給毛澤東的任務，113–14；victories over 戰勝父親，118–22

Mao Mao (Lin Min, daughter) 毛毛（李敏、女兒），214，222–23

Mao Tse–hung (adopted sister) 毛澤紅（領養的女兒），74；biography of 傳記，106–7；death of 犧牲，99，102；failure to mention 沒有提及毛澤紅，89–90

Mao Tse–min (brother) 毛澤民（兄弟），74；accomplishments of 取得的成績，97；biography of 傳記，102–4；birth of 出生，89，92–93，96；children of 毛澤民的孩子，224；death of 犧牲，90，102，104，108；education of 教育狀況，101–3；and father 與父親的關係，114；Mao on 毛澤東的評論，225；Mao and children of 毛澤民的孩子和毛澤東，108；and Mao' s children，毛澤東的孩子與毛

澤民，218–19

Mao Tse–tan （brother）毛澤覃（兄弟），74；biography of 傳記，104–6；death of 犧牲，99，102，105，107，272；education of 教育狀況 101–2，104；Mao and children of，毛澤覃的孩子和毛澤東，108；Mao' s failure to mention 毛澤東沒有提及毛澤覃，89–90

Mao Tse–tung 毛澤東：birth of 出生，69；characteristics of 個性特徵，se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參見特定個性；childhood of 童年時代，70–83；education of 教育狀況，see Education 參見教育；enters politics 開始參與政治活動，159；family of 家庭狀況，see Family 參見家庭；first article 第一篇文章，159；first indication of belief in supremacy of political justification，第一次表達對政治正當性優先意義之信念，160；first introduced to army life 第一次捲入軍旅生活，160–6；first military experience 第一次軍旅生涯的體驗，161–62，170；first published article by 第一篇發表的文章，177；health of 健康狀況，see Health 參見健康；on himself 毛澤東自述，7–8，14，36–38；inheritance of 遺產繼承，141；leadership by 毛澤東的領導，see Leadership 參見領導；moratorium phase in life of 一生中的心理延緩償付期，162–71；as political creator 作爲一個政治創造者，16；scope of life of 生活領域的限度，5–6；secret of greatness of 之所以偉大的秘密，6–7，12；summary of character of 個性特徵的總結，305–15；teaching career 執教生涯，171–73

Maoism，毛主義，4，235；characterized 特徵，40–43；see also Chinese Communism 參見中國共產主義

Marriage 婚姻：individual over parental choices in 個體選擇與父母之命，180；rebellion against arranged 反抗包辦婚姻，181–85；theater and 劇場，32；women' s rights and arranged 女性權利與包辦婚姻，193，194；see also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s，Women 參見夫妻關係、女人

Marriage reform 婚姻改革，193

Marx，Karl 卡爾·馬克思，7，35，45，54，131；quoted in Mao'

s work，毛澤東引用馬克思的狀況，240

Marxism 馬克思主義，6，7，139，152；books influencing Mao’s faith in 影響毛澤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書，195；justice-injustice and 正義和非正義，138；and Maoist dialectics 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的辯證法，44–45；turned on its head 顛倒過來，117；unevenness of Mao’s 毛澤東理解馬克思主義的不穩定性，235–36；uses of 對馬克思主義的運用，245–46

Marxist study group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8

Mass media，大衆媒介：importance of 重要性，164

May Fourth Movement 五四運動，179，188–89，192

“May 7th Schools” “五七”干校，278–79

Mead，Margaret 瑪格麗特·米德，37

Mencius 孟子，45，199

Mental-physical activity 腦力活動與體力活動：dichotomy in 兩分法，131–33

Military Campaigns 軍事運動：health during 健康狀況，106，see also Long March 參見長征

Military command 軍事指揮權：in Autumn Harvest Uprising 秋收起義，206–7；first experience of 第一次經歷，170

Military coup 軍事政變：Lin Piao and 林彪，293–94

Military life 軍旅生活：first experience of 第一次經歷，160–62

Mill，John Stuart 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密爾），168，242

Min-kuo Jih-pao（Republican Daily，newspaper）《民國日報》，103

Modernism 現代主義，126

Monkey image 猴子形象，36–37

Montesquieu，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孟德斯鳩，168，242

Moodiness 情緒化，18–19

Moratorium phase 心理延緩償付期，162–75

Mystery 神秘性：Mao conveying sense of，毛澤東傳達的那種神秘

感，34–35

Narcissism 自戀感，193–94；abandonment and 自戀感與拋棄感，285–86；imposture and 自戀感與以僞裝的面目出現 14；Lin Piao and Mao's 毛澤東的自戀感和林彪，291，292；worship and 崇拜與自戀感，12–13

National greatness 民族偉大性：Mao's greatness and restoration of 毛澤東的偉大特性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250–53；physical fitness as cause of 強健體魄作爲民族復興的條件，256

National humiliation 民族屈辱：awaked sense of 覺醒了的民族屈辱感，144，147

Nationalism 民族主義：wakened 覺醒了的，and Mao's travels 毛澤東的旅行，189–91；awakening 日益覺醒的，8，144，147，188；being spokesman for 民族主義 代言人，238–39（see also National greatness 參見民族偉大性）；pigtail cutting and 剪辮運動與民族主義，159–60

Newspapers 報紙：importance of 重要性，164–67

Nepotism 任人唯親，102，105，107–8

Nixon，Richard M. 理查德·M.·尼克松，43，52，232，302

Nuclear weapons 核武器，256–57

Oedipal situation 厄狄普斯情結，77

Oksenberg，Michael 米歇爾·奧克森博格，41，56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Our Task"（Mao）《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毛澤東），248

On Protracted War（Mao）《論持久戰》（毛澤東），26

Operational code 行爲符碼，43–66；approaches to risk–taking and reason in 冒險方式與行爲符碼合理性，49–54；close control of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in 嚴密控制權威的代表，35–57；consistency vs. contradiction in 一致性與矛盾律，44–49；popular vs. elite style in 群衆

路線與精英風格，60–61；reaction to criticism and conflict in 對批評和衝突的反應，61–66（see also Contradiction 參見矛盾）；trusting personal or impersonal relations in 信任人格化的關係還是非人格化的關係，57–59

Orator 演説家：blurring distinction between writer and 消弭了寫作者與演説家之間的區別，236–38

Organizational work 組織工作：round nationalist question 民族主義者的組織問題，192–93；for Party 共產黨，202–3

Origin of Species（Darwin）《物種的起源》（達爾文），168

Party congress 黨代會：secrecy of 秘密，61

Past 過去：ambivalence over China’s 有關中國過去的矛盾心理，127

Payne，Robert 羅伯特·佩恩：Hsiao san on Mao 蕭三論毛澤東，34；on Mao 有關毛澤東，25，31–32，170；on Mao’s angriness 有關毛澤東的憤怒，32；on marriage of Mao to Yang K’ai-hui 有關毛澤東和楊開慧的婚姻狀況，199；on moratorium period in Mao’s life 有關毛澤東生活中的心理延緩償付期，163–64

Peasant Movement Training Institute 農民運動講習所，203

Peer group cohesion 同輩人群體的團結：western influence in education and 西方觀念對教育和同輩人群體團結的影響，178

Peer relationships 同輩人關係：injustice in 不公正，138；in school 學校生活，149–54，172；urban 城市生活，170；see also Comradeship 參見同志情誼

P’eng Chen 彭眞，57

Peng The-huai 彭德懷，273，276，278；break with 關係破裂，281–87；Lin Piao set against 林彪反對彭德懷，290–91

Permissiveness 默許與放任，224–26

Personal relations 人格化的關係：operational code and 行爲符碼，57–59；see also Comradeship 參見同志情誼

Personal cult 個人崇拜: and functioning of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中國政治體系的運行功能, 39; Mao on 毛澤東論個人崇拜, 40

Philosophy 哲學, 44-45; see also Confucianism, Maoism, Marxism 參見儒家、毛主義、馬克思主義

Physical appearance 體質外貌: changing 變化, 18-27, 177; clothes 服飾, 20-23; feminine 女性化特質, 32-33

Physical exertion 體力活動: moral worth and 道德價值, 130

Physical fitness 健康狀況, 131-35, 255-56; compulsive interest in 強烈興趣, 176-78, 180; virtues of 體質的優點, 131-32

Physical vitality 身體活力, 25-26

Pigtail cutting 剪辮子, 159-60

Poetry 詩歌, 232

Policy 政策: violating Party 違背黨的政策, 206

Politburo 政治局, 310; Mao removed from 毛澤東被擠出政治局, 202-3, 206, 279-81

Political abandonment 政治拋棄感, 261-304, 310-11

Political creativity 政治創造性, 229-260; secret of, 229

Political justification 政治正當性: supremacy of 優先性, 160

Popular style 群衆路線, elite vs. 精英風格, 60-61

Populism 民粹主義, 43, 60-61

Power 權勢、強力: importance of gradations of 強力等級的重要性, 153; of Mao 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權力地位, 272-73; of slogans 口號的力量, in Chinese culture 中國文化, 253; words as source of 言辭作爲力量的源泉, 242-43, 254-55 (see also Words 參見言辭); see also Leadership, Willpower 參見領導權、意志力

Pragmatic policies 實用主義的政策: consolidation of 鞏固, 43

Primogeniture 長子繼承制, 93, 94; see also Firstborn son 參見長子

Privacy 隱私權: effects of absence of 缺乏隱私權的影響, 71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y 職業革命家, see also Revolutionary career 參見革命生涯

Purges 清洗, 134, 271, 273, 281–95

Reason 理性, 10; in operational code, 行爲符碼 49–54; suspicion of 懷疑, 95

Rebel 反抗者: Mao's appeal as 毛澤東作爲反抗者的吸引力, 11

Rebellion 反抗: developing feeling for 日益形成對反抗的情感, 98–99; lesson in, 經驗教訓 121; source of 反抗的起源, 126–27; sources for learning spirit and tactics of 學習反抗精神與策略的緣起, 116, 307–8; see also Revolution 參見革命

Red Guards 紅衛兵, see Cultural Revolution 參見文化大革命

Red Star Over China (Edgar Snow) 《紅星照耀中國》(斯諾), 209n

Religion 宗教, 75, 77, 78

Responsibilities 責任: of firstborn 長子應承擔的責任, 16, 94, 97, 98; of parenthood 父母應承擔的責任, avoided 避免承擔責任, 141–42, 223–24, 306–7

"Return Students" "留蘇派", 279–81

Revolution 革命: continuing problems of 革命的持久性問題, 313–14; developing feeling for 日益形成對革命的情感, 98–99; glorification of 把革命榮耀化, 43; see also Chinese Revolution, Rebellion 參見中國革命、反抗

Revolution of 1911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 159, 160, 162

Revolutionary career 革命生涯: and Autumn Harvest Uprisings 秋收起義, 206–7; critical period in moving toward 走向革命過程中的關鍵發展階段, 193–98, 200–1; explanation of sensitivity to commitment to revolution 對革命義務與革命熱情很敏感的解釋, 86; revolutionary spirit 革命精神, 307

Rice, Edward 愛德華·萊斯, 197, 204, 209–10

Risk-taking 冒險行爲：in operational code 行爲符碼，49–54

Ritualization of emotions 將感情儀式化，6–7

Romanticism 浪漫主義：Maoism and 毛主義，40

Roosevelt，Franklin D.富蘭克林·D.·羅斯福，13–14，230

Rosten，Leo 列奥·羅森，231

Rousseau，Jean-Jacques 讓·雅克·盧梭，168，242

Rural life 鄉村生活：glorification of 將之光榮化，60–61

Russian Affairs Study Group 俄羅斯問題研究會，198

Russian leadership 俄國的領導：ambivalence toward 矛盾心理，42；see also Stalin，Joseph 參見約瑟夫·斯大林

San Kuo Chih Yen Yi（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三國演義》，154，190，241

Shram，Stuart 斯圖爾特·施拉姆，230；on Mao 論毛澤東，144–45；on Mao as theoretician 論毛澤東作爲理論家，235；on Mao's description of Changsha military activity 論毛澤東有關長沙軍事活動的描述，160；on Mao's first marriage 論毛澤東的第一次婚姻，199

Schwartz，Benjamin 本杰明·史華慈，230

Selected Readings from Mao Tse-tung 《毛澤東著作選讀》，248–49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Mao）《毛澤東選集》，240，248

Self-confidence 自信心：acquiring 獲得，75–88

Self-Education College 自修大學，104–5

Sexual behavior 性行爲：after first marriage 第一次婚姻之後，204–5；Yang K'ai-hui and 楊開慧，196

Shame 羞恥感，279

Shaw，George Bernard 喬治·蕭伯納，163

Sheng Shih-ts'ai 盛世才，104

Sheng-shih Wei-yen（Words of Waring，Chung Kuang-ying）《盛世危言》（鄭觀應），147

Shui Hu Chuan 《水滸傳》, 98, 100, 156

Shun 舜, 156

Siao Yu 蕭瑜: on Mao 論毛澤東, 19, 101, 149; on Mao' s argument in school 有關毛澤東在學校與他人的爭論, 154; on Mao' s leaving school 有關毛澤東離開學校, 157; on Mao' s love for Tao Stu-huing 有關毛澤東與陶斯咏的愛情, 186; on Mao' s manner of walking 有關毛澤東的走路方式, 34; on Mao' s schoolmates 有關毛澤東的同學, 151

Sibling relationships 兄弟姐妹關係: birth of siblings and 出生順序, 96–97; brothers 兄弟, see Mao Tse-min, Mao Tse-tan, 參見毛澤民、毛澤覃; in Chinese culture 中國文化中, 93–96; in Confucianism 儒家觀點, 95, 98–101; and death of siblings 兄弟姐妹的犧牲, 108–9; parental authority and 父母權威, 135; with sister 與妹妹的關係, 106–7 (see also Mao Tse-hung 參見毛澤紅)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 (Mao)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毛澤東), 290

Smedley, Agnes 安格尼斯·斯沫特萊: and Mao 與毛澤東, 33, 34, 211–12

Smith, Adam 亞當·斯密, 168, 242

Snow, Edgar 埃德加·斯諾, 39, 211; on angriness in Mao 有關毛澤東的憤怒, 32; on beatings at school 有關學校時的鬥爭, 81; on children of Mao' s brothers 有關毛澤東兄弟的孩子, 108; on death of Mao' s family members 有關毛澤東家庭成員的犧牲, 108–9; on emotional control in Mao 有關毛澤東對情感的控制, 29; on Ho Tzu-chen 有關賀子珍, 35; on magical powers in Mao' s thoughts 有關毛澤東思想的神奇魔力, 12; Mao on his father 毛澤東論他的父親, 115; on Mao' s leaving school 有關毛澤東離開學校, 158; Mao on Li Li-san 毛澤東論李立三, 272; on Mao-Ho children 有關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孩子, 209n; on Mao' s daughters 有關毛澤東的女兒, 223; on Mao' s family 有關毛澤東的家庭, 78; on Mao' s feelings toward siblings 有關

毛澤東對兄弟姐妹的感情，89；on Mao' s habits 有關毛澤東的行爲習慣，21；on Mao' s manner of speaking 有關毛澤東的說話方式，28；on Mao' s marriage to Yang K' ai-hui 有關毛澤東和楊開慧的婚姻狀況，198-200；on Mao' s physical appearance 有關毛澤東的外貌，24；on Mao' s physical vitality 有關毛澤東的身體活力，25；meeting Mao as exceptional event 會見毛澤東作爲一件非同尋常的大事，18；on relationship of Mao with his father 有關毛澤東與他父親的關係，121；on sons of Mao 有關毛澤東的兒子，220；on united front against father of Mao 有關毛澤東反對他父親的統一戰線，285

Social consciousness 社會自覺：awaked sense of 覺醒了的社會意識，144-47

Social gradations 社會等級：sensitivity to 敏感，152-53

Socialism 社會主義：first contract with 第一次接觸，162；see also Communism，Marxism 參見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

Solomon，Richard H.理查德·H.·所羅門，62

Speeches 演說：characteristics of 特徵，8；style of public 公共演說的風格，29，30

Spence，Herbert 赫爾伯特·斯賓塞，168

Spontaneity 自動自發：belief in 信念，43

Staring down 盯着某人看，使之屈服，30

Stalin，Joseph 約瑟夫·斯大林：Kao Kang and 高崗和斯大林，282-83；Mao on 毛澤東論斯大林，276；Mao compared with 與毛澤東比較，284-85；Mao' s ambivalence toward 毛澤東對斯大林的矛盾心理，42；Mao' s dependency on 毛澤東對斯大林的依賴，247；Mao' s health and dealing with 毛澤東與斯大林打交道時的健康狀況，134；the relationship 關係，51，295-99；Yang Chang-chi compared with，楊昌濟與斯大林的比較，297，298

Stein，Gunther 岡瑟·斯坦因，25-26

Stereotyping personality 人格特徵的原型，26-27

Strategist 戰略家：general features of 一般特徵，229-33；violence

and 暴力行爲，257–59

Student 學生：Mao as 作爲學生的毛澤東 20–22；see also Education 參見教育

"Study of Physical Culture" (Mao)《體育之研究》，255

Succession problem 政治繼承或者接班人問題，52

Sulzberger，C. L.索爾兹博格，27

Sun Yat-sen 孫中山，162

Swimming 游泳：and conflict with father，與父親的衝突 121–22；Cultural Revolution and 文化大革命，72–73

T' an Yen-k' ai 譚延闿，198

Tanaka 田中角榮，116，127

T' ang na 唐納，213

Tao Szu-yung 陶斯咏，186

Taoism 道家，253–54

Teaching 執教：as career 作爲一種職業，98，171–73；as highest position outside politics 作爲政治領域以外的最高職位，108

Teng Hsiao-p' ing 鄧小平，57，273；break with 與鄧關係破裂，291；Mao ignored by 毛澤東受到鄧的忽視，91，92，232，283；rehabilitated 鄧的復出，280

Theater 劇場，see Drama 參見戲劇

"Three sleeping pills" speech "三次安眠藥"講話，53–54

Ting Ling 丁玲，214，277

Tito，Marshall (Josip Broz) 鐵托元帥，285

"To be attacked by enemy is not a bad thing but a good thing" (Mao)《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毛澤東)，62

"To Reveal One' s True Feelings" (Mao)《訴衷情》(毛澤東)，314

Treachery 背叛：explanation of sensitivity to 對背叛行爲很敏感的解釋，86

Ts' ai Yuan-pei 蔡元培, 186
Tseng Kuo-fan 曾國藩, 70
Tso Tsung-t' ang 左宗棠, 70
Tung Lin 童林 (音譯), 218, 219
"Two lines" struggle "兩條路線" 鬥爭, 266

United Students Association 學生聯合會, 192
Urban life 城市生活: distrust of 懷疑、不信任, 60-61

Versailles Peace Conference (1919) 凡爾賽和會, 188-89, 192
Violence 暴力行爲, 9-10, 64-66, 257-58
Voluntarism 人類的能動性, see Willpower 參見意志力

Wakeman, Frederick 魏斐德, 230
Wales, Nym 尼姆·威爾斯, 209n; on Ho Tzu-chen 有關賀子珍, 211, 212; on Mao 有關毛澤東, 28, 34
Walking 走路: feminine style of 女性化特點, 33-34
Wang Hai-jung 王海蓉, 148
Wang Kuang-mei 王光美, 212-13, 215
Wang Ming 王明, 278
War 戰爭, 258; developing a feeling for 形成對戰爭的感情, 98-99; idealization of 把戰爭理想化, 64-66
Washington, George 喬治·華盛頓, 157
Weddings and funerals 婚禮與葬禮: unity of 統一性, 47
Wen Chi-mei (mother) 文七妹 (母親): abandonment by 爲母親拋棄, 92, 93, 124, 280-81, 306; arranged marriage and death of 包辦婚姻和母親去世, 185; and birth of second son 第二個兒子的出生, 89; biography of 傳記, 75, 76; and clashes with husband 與丈夫的衝突, 120-21; death of 母親去世, 83, 104, 176; and Mao' s formal education 毛澤東的正規教育, 147, 148; and Mao' s sense of his own

goodness 毛澤東對自己善良品質的認識，128，129；and Mao’s style of confrontation 毛澤東的反抗風格，154–55；poem on 寫給母親的祭文，84–85；relationship between son and 母子關係，75–88；Yang K’ai-hui compared with 與楊開慧的比較，189

Whim 稀奇古怪的念頭：authority as responsive to 權威對稀奇古怪的念頭的 反應，95，136–37

Wielding the scepter (Han Fei-tzu) 《韓非子·揚權第八》，265

Wilke，Roxane 羅克森·維爾克，214n

Willpower 意志力，27；course of events and 事物的進程與人類的意志力，109；efficacy of 意志力的效能，86；physical fitness and 健康狀況與意志力，256；power as 作爲意志力的權力，254–60；Stalin and 斯大林和意志力，297；supremacy of 意志力的重要性，117，118；as ultimate source of justice 意志力作爲正義的終極來源，139

Wilson，Woodrow 伍德羅·威爾遜，230

Wives 妻子，see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s 參見夫妻關係

Wolfstein，Martha 瑪莎·沃爾夫斯坦因，37

Women 女人：abstract idealization and avoidance of 抽象的理想化機制與避免和女人接觸，175–81；idealization of 把女人理想化，185，194；relations with 與女人的關係，175；resistant to 對女人的抗拒，in adolescence 青少年時期，87；sexual behavior 性行爲，after first marriage 第一次婚姻之後，204–5；see also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s 參見夫妻關係

Women’s liberation 女子解放，183

Women’s rights 女子權利，193，194

Words 言辭：ambivalence toward 矛盾心理，249–50；late uses of 後來對言辭的運用，247–48；media uses of 新聞媒介對言辭的運用，243–44；to silence opponent 使對手啞口無言，241；slogan 口號，252–53；as source of control and mastery 作爲控制和駕馭他人的力量源泉，242–43，254–55；summary of position on 總結毛澤東有關言辭力

量的立場，260；uses of 言辭運用，230–31

Workers behavior 工人的行爲擧止：study of style of 研究工人行爲擧止的方式，23

Worship 崇拜，12–13；see also Leadership 參見領導權

Writers 寫作者：blurring distinction between orator and 消弭演說家和寫作者之間的差異，236–38；excelling as 作爲寫作者非常優秀和突出，230–32；see also Words 參見言辭

Wu (emperor) 梁武帝，245

Wu, Lily 吳麗麗，211–12，214

Yang Chang-chi 楊昌濟，207，208；death of 去世，194–95，199；Mao on 毛澤東論楊昌濟，186；as a mentor 精神導師，174，186–92；sexual mores and 性行爲規範，196；Stalin compared with 與斯大林的比較，297，298

Yang K' ai-hui (first wife) 楊開慧（第一個妻子），185–206，214；children of 楊開慧的孩子，217；death of 楊開慧犧牲，199，202，205，218；development of relationship with 發展與楊開慧的關係，189，196，197，207–8；fear of being damaged by 擔心受到楊開慧傷害，192；Ho Tzu-chen behavior transferred to 賀子珍的行爲被移植到楊開慧身上，208–9；Mao leaves to travel 毛澤東離開楊開慧去旅行，189–91，271；marriage to 與楊開慧結婚，198–99，200–1，246；summary of relationship 關係總結，250–6；time spent with Mao 楊開慧與毛澤東獃在一起的時間，210–4

Yang Tzu-lieh (Chang Kuo-t' ao) 楊子烈（張國燾的夫人），211

Yang Yu-fu 楊永福，see Mao An-ying 參見毛岸英

Yang Yu-shou 楊永壽，see also Mao An-ch' ing 參見毛岸青

Yao 堯，156

Yao Wen-yuan 姚文元，223

Ying-ch' ao (Chou En-lai' s wife) 穎超（周恩來的妻子），211

Youth 年輕時代：fraternity and 兄弟情誼，99 (see also

Comradeship, peer relationships 參見同志關係和同輩人關係); interest in development of 對發展年輕人的興趣, 98; see also Education 參見教育

Yuan Shih-kai 袁世凱, 162, 279

譯校後記

白魯恂 (Lucian W. Pye) 這部嘗試從政治心理學進路來研究毛澤東的名作譯稿，從最初接受翻譯工作，到現在準備整理出版，大約三年的時間過去了。個中原因，既涉及原定出版計劃的擱淺，也包括筆者因攻讀博士學位而暫時中斷譯校工作等。如果不是蕭師延中先生的不斷鼓勵和不懈努力，這部譯稿可能到現在還會丟棄在電腦中某個被遺忘的角落。

一

那還是三年前的春天 (Sars 即將肆虐京城)，適逢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即將來臨之際，海內外的人們紛紛以不同形式來展開對這位世紀偉人的追憶、懷念和反思。曾以研究毛澤東而聞名的蕭延中先生，也爲大陸一家出版社精心選擇和策划了一套計劃爲 10 卷本的《國外毛澤東研究經典譯叢》。設想中的叢書將從政治史、思想史、心理學等不同角度，充分反映 50 餘年來海外研究毛澤東的豐富成果，入選作品也都是堪稱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代表作。白魯恂這本出版于 1976 年 (毛澤東去世那一年) 的名作，即爲其中之一。

一起列入叢書的 10 本書中，有幾本此前曾在中國大陸出版過中譯本。所以，此番只須根據這些著作的英文最新版進行適當的譯校和修訂即可。但有些作品也很經典，只是因各種原因而一直沒有出過中譯本。在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以後，如果能把這些作品翻譯出版，引入到漢語學術界，這無論如何都是一個重大的貢獻：不但可以促進與外部世界的學術交流，還可以方便國內學人的研究使用。當然，這也意味着一個艱巨的嘗試。畢竟，要把這些作品引介到中國，別的且不

說，光是這項翻譯工作就誠非易事。特別是其中有些專業性很強，涉及史事很多，對譯者要求也較高。筆者不敏，有幸被蕭先生選中，得以加入這一把海外毛澤東研究的優秀成果，特別是白魯恂的政治心理學進路，翻譯和引介到漢語學術界的工作中來。

在漢語學術圈里，白魯恂更以“派伊”這個名字而爲人熟悉。不過，筆者此前對他了解無多。而印象最深，也最容易引起讀者共鳴乃至或者爭議的，可能是他那個非常著名的看法，即中國充其量只是一個文明（civilization），或者一個文化國家（cultural-state），而非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後來才逐漸了解到，白魯恂實際上是一個研究比較政治學和政治文化的大家重鎮。他曾撰寫和主編過多本相關理論著作，並以東南亞和中國爲例進行過具體考察，還直接參和間接影響過美國的對華政策。不過，相對於同樣研究比較政治學的阿爾蒙德(本書就是題獻給他的)，大陸學界對白魯恂的關注和引介似乎較少。儘管此前也有些作品（包括著作和論文）被翻譯成中文出版過（包括繁體版和簡體版），但總體而言，特別是就白魯恂的整個作品來看，卻不算多，甚至可以說很少。因此，這次翻譯本書，不單是把從政治心理學研究毛澤東引入國內的一次嘗試，也是讓漢語學術界更加全面了解白魯恂的一個機會。

二

最初接受本書的翻譯工作時，筆者正師從蕭延中先生，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攻讀碩士學位。先生平常對筆者和其他同學要求即很嚴厲，在外語方面尤其如此。尤憶當年打算投考先生時，他曾鄭重表示：“如果外語還過不了關，其他你就不用多談了”。因筆者那時CET（大學英語考試）六級還未通過，而兩位學姐的外語能力都很棒，先生故有此語。從先生處回來後，筆者絲毫不敢懈怠，加緊努力學習，終于在1999年冬天順利通過CET六級，並在同年研究生入學英語考試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績，總算沒有讓先生失望。但先生的期望則更高。他希望，筆者不要僅僅滿足于這些小成績，而應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外文須作爲一門語言工具來掌握，以便爲以後進

行研究和交流打下基礎。因此，列入先生門墻以後，筆者仍隨時注意加強外語學習，並先後考完 GRE 和 TOFEL。或許正因如此，先生覺得，筆者的外語水平大約是可以信任的，可以嘗試着擔任白魯恂此書的譯校任務[①]。

但筆者卻很怕辜負先生的信任和期望。雖然已通過了 GRE 等英語考試，但自己離具體的翻譯工作還差很遠。這次算是第一次正式的親密接觸，所譯對象又是從政治心理學來研究毛澤東的。而對政治心理學，筆者還很陌生；對毛澤東，也了解不多。因此，筆者心下常懷惴惴，不敢冒險。但在蕭先生不斷鼓勵下，筆者勉爲其難，接受了翻譯任務；還被委以重任，負責對全書進行統校工作。

先生希望，通過翻譯這部書，一是可以檢驗和鍛煉筆者的語言能力（既包括英文翻譯，也涉及中文表達），二是可以借此增進對毛澤東和現代中國政治的了解，三是可以熟悉政治心理學。政治學理學是一個非常有意思，也很有潛力並值得認真嘗試的研究領域，先生對此一直興趣很大。只要有機會，他總願跟學生談及這些有價值的研究領域，並極力鼓勵大家去嘗試。他還希望，我們這些弟子中，以後能有人走上這條路。但筆者不才，後來"叛逃"到歷史系，終于辜負了先生當年的美意。

三

接到翻譯工作後不久，就趕上 2003 年的非典，接着就是封校。這本來是壞事，但用毛主席的話來說，壞事也可以變好事。非典和封校使筆者得以集中精力來進本書的行翻譯。不過，在此前後因面臨論文寫作、畢業答辯以及其他情況，翻譯工作也是時譯時停。

按原來計劃，將由一個學弟來翻譯序言和第一章，其餘部分由我來負責。後來，因他有事，就全部改由我來翻譯。特別需要說明的，是譯稿第一章借用和參照了蕭先生此前的相關底本[②]，並在此基礎上

① 當然，這也是先生對我前一段時間語言學習的一個考試，更是一次鍛煉。

② 曾收入蕭延中編：《外國人評毛澤東》，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 年版。

重新審定，着重對其中漏譯（特別是注解）和誤譯等處進行適當的補充和修訂。

“事非經過不知難”。此前，筆者總愛批評有些譯作很糟糕，不是這里譯的不好，就是那里翻的錯了。但眞正輪到自己來進行翻譯時，才發現這實在是件苦差事。光是選擇合適的中文來對應英語，就已經很不容易。譬如，原文從毛澤東與母親的關係中引申出的一個關鍵詞：abandonment，到底應該如何譯？筆者思量再三，最後採用了“拋棄感”這個譯法，但仍然感覺不太滿意。

“信”且如此，“達”和“雅”就更可想而知。明明英文看起來很順，但翻譯成中文就怎么看也不對勁，或者勉強譯過來也覺得有些彆扭。尤其是跟漢語表達習慣不太一樣，英文中常常有許多長句和從句，且往往有好幾個層次。遇到這種情況，在翻譯順序和文字組織上就得頗費躊躇。

甚至漢語助詞的選擇也鬧出不少笑話。在最初的譯稿中，“的”、“所”很多，幾乎觸目皆是（此番修訂後，雖然較此前好了些，但也未根本解決這個問題）。標點符號也不太好處理，譬如究竟該用逗號還是分號，冒號還是破折號，還眞難判斷和選擇。

四

從四月開始翻譯，中間斷斷續續到七月份終于完成了第一稿。但這一稿譯得實在太粗造，蹩腳的翻譯，拙劣的文筆，簡直有些慘不忍睹。不過，因急于送出版社和有關部門預審，所以未經過仔細校訂，就先這樣先交過去了。

隨後（2003 年 9 月），筆者就到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去了。在此過程中，一方面因課程較緊張，加之稿件送審過程中出現波折（有人對用政治心理學來解釋毛澤東，還是覺得有些難以接受①），所以，書稿譯校一事就暫時擱置起來。

2003 年 12 月，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舉行毛澤東一百一十周年

① 這證實了白魯恂在原書前言中所說的那個“科學事實”。

紀念研討會。白魯恂先生參加了，中國大陸相關機構也派員與會。這是次難得的機遇，隨後也有消息傳來：白魯恂的譯作有望在大陸出版。蕭老師很高興，發 E-mail 給筆者報告好消息。筆者也很高興，就把這個消息報告給了大洋彼岸的白魯恂先生，告以大作譯稿有望近期出版。

不過，出版機構出于政治正確性的穩妥考慮，決定先出叢書中沒有爭議的幾本，對其他幾本則暫時擱置，以後出版與否另行再議[①]。事情就這樣拖了下來。筆者發信給白魯恂先生，向他說明情況，並請求諒解。承蒙白魯恂先生回信，他表示非常理解這一點。

在此前後，蕭先生曾多次向筆者表示歉意（這更讓筆者感到愧不敢當）。他本來希望書稿順利出版，既可以爲筆者掙得一筆稿費，也可以爲以後的履歷塡上一筆，但沒想到會出現這種狀況。不過，蕭先生表示：他一定會想方設法，爲本書爭取出版機會（同時，要筆者不可放鬆，抓緊時間繼續對譯稿進行修訂）。確實，國內先後有幾家出版社曾與蕭先生聯繫和商洽過，但後來都不了了之，沒了下文。

今年，毛澤東去世三十周年。經過李銳老先生（這里向他致意!）的積極斡旋和蕭延中先生的不懈努力，此書終于得到出版機會。筆者曾發信給白魯恂先生，告訴他這個好消息。不過，到現在還沒收到回信。

五

今年初，得到蕭先生通知，本書有望出版。隨後，筆者在原來譯校的基礎上，對譯稿進行了進一步修訂。這里主要對譯校過程中的一些翻譯問題和技術處理略作解釋。

首先，尊重英文原意。除非原文中個別明顯錯誤之處，以加注“譯者案”的形式加以改正（如稱李銳爲毛澤東的同學，毛遠新爲毛澤覃的兒子等）外，大都參照上下文，根據具體情境來進行翻譯。譬如，毛澤東曾多次表示，自己是“和尙打傘，無發（法）無天”。此意他也曾對斯諾說過。但不知是翻譯人員的原因，還是斯諾自己的創造，這句話傳到英語世界後，就變成了這樣：“A lonely monk with a

① 包括此番一起出版的所羅門：《毛的革命與中國政治文化》。

leaky umbrella"。或許是其中的 lonely 和 leaky 向人傳達了一種悽慘悲涼的意象，所以白魯恂認爲：這句話表達了毛澤東的謙卑情緒和自我哀憐。但實際上，"和尚打傘"表明的是毛澤東大膽無畏的氣慨，跟此處英文表達的意思風馬牛不相及。1990 年代前後，這句話出口轉內銷，又返回中國，當時確實有人把它譯成："一個打着漏傘的孤獨的和尚"（或類似的意思）。在本書中，爲適應上下文的敘述思路，筆者仍然這樣翻譯。但在譯者案中，標明正確的譯文。

其次，有關引文處理。白魯恂在書中大量提到建國以後毛澤東在歷次會議上的講話，但他多引自外文資料彙編，特別是紐約出版的一套 Miscellany of Mao Tse-tung Thought。不過，這類資料在大陸目前多未公開發表，一般只見于文革期間群衆組織出版的各種版本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因版本衆多，不易處理，所以這些講話通常只注明講話場合（某次會議）以及講話時間，而不再注明具體出處。有幾條還採取了間接引語的方式實行轉譯。只有個別情況（如 1959 年廬山會議上的講話，和 1971 年林彪事件前後的講話等），注明參照最近的公開出版物。

白魯恂還曾引用一些大陸不易見到的香港出版物（如龔楚的《我與紅軍》和楊子烈的《回憶錄》等），來描述毛澤東的私人印象和公共形象等。本譯稿中均據英文轉譯，並以"譯者案"的形式加以說明。此外，還有些文革期間的個別群衆出版物，現在也不易查找，同樣採取了根據英文轉譯的處理方法。

再次，斜體文字問題。白魯恂在原書中曾多次用斜體來強調某些文字，譯稿爲醒目起見，一律以黑體標出相應的部分。

此外，譯稿在不太好懂的關鍵詞後面附以英語原文，便于讀者準確地理解原著意圖。外國人名第一次出現時，也附以英文原名。筆者又將索引一併譯出，便于檢索。

六

筆者首先要非常感謝蕭延中先生的提攜和幫助。如果不是蕭先生的堅持和鼓勵，筆者可能不會接受這項艱巨的翻譯任務；同樣，如果

不是蕭先生的堅持和努力，這部譯稿可能早已丢棄在電腦中的某個角落，至少目前還未必能出版。感謝蕭先生，儘管他告訴筆者："翻譯質量由你自己把關，最後我就不看了"，但在具體翻譯過程中他仍時不對筆者加以指點，譯稿中有些譯法即得自蕭先生的啓發。感謝蕭先生，惠允我使用他原來翻譯過的本書第一章的底本，卻不願一同列名，而極力鼓勵筆者單獨署名。

筆者還要感謝白魯恂先生。他不但用航空信件寄來了爲中文版趕寫的序言，還讓秘書通過 E-mail 寄來了自己的學術簡歷。對筆者在翻譯工作中遇到的問題，他也通過 E-mail 給予了耐心的解答和熱情的幫助。在前言中，他曾提到一個打算跟自己合作撰寫此書、但後來因距離太遠而没有實現的名叫 P. L. Liu 的人。這個人的中文名字是什么？白魯恂先生很快就給筆者回信。他表示，因自己的電腦打不出漢字，但不妨這樣來解釋：那個人的全名是 Liu Ping Lin；Liu 是建立漢朝（Han dynasty）那個人的"劉"，Ping 是和平（Peace）的"平"，Lin 是鄰居（Neighborhood）的"鄰"。

筆者還要感謝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父親），他們允許筆者做這些清貧的文字工作，而不是讓我擠出時間回家去探望和陪着他們。

筆者還要感謝李國芳博士等在查閲毛澤東講話方面提供的無私幫助。

當然，譯事非易。因筆者學識和精力有限，舛誤之處在所難免（實際上，直到此番交稿以前，筆者還在譯校中查出三個重大的翻譯錯誤）。希望讀者能隨時加以批評指正，並將這些意見寄給筆者（xiangeliu@yahoo.com.cn），以便以後修訂再版時加以改正。

劉憲閣
2006年4月
北京